

像睡醒的獅子一樣站起來！

你們人數衆多，不可征服。

擺脫你們身上的鎖鏈，

像搖落沉睡時落在你們身上的露珠！

你們是多數，他們是少數。

獻給

我親愛的妻珍·羅埃，
她在我從事工人階級活動的年代裏
一直是我的忠實的同志。

威廉·加拉赫

「像獅子一樣站起來」(代序)

英國共產黨
總書記 哈里·波立特

「克萊德河畔的反叛」和「雷聲隆隆」——加拉赫過去的這兩本書，曾經鼓舞了千千萬萬的男女工人。這兩本書曾經幫助了他們的政治教育，這兩本書曾經使他們更堅決地憎恨貧窮、失業和戰爭；這兩本書曾經啓發了一種對「卑微人物」的永恆的熱愛和對「大人物」的不調和的憎恨。這兩本書提供了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的美好希望的遠景；這兩本書提出了這樣的一種對照：一面是共產主義的純潔與光榮，一面是那些野心家、機會主義者和鑽營者的卑鄙齷齪與厚顏無恥。這些人在社會民主主義的高調之下包藏着他們的背叛和變節。

現在他的新書「像獅子一樣站起來」出來了。書名多麼恰當！起這個名字真是天才之筆，因為這本討論當代基本問題的現代作品，會使你真想站起來做點工作！

自從一九五〇年大選以來，熟悉比爾（按指加拉赫——譯者）的人都感覺到他在搞些什麼東西。他的眼睛閃閃有光。這種閃光對於一部分人來說是提出了希望，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則是揭露。

正在搞些甚麼東西了

他會走進我的辦公室來，樸實天真地問我這句引語和那句引語。我會在我的桌上不時地常看到一些詩歌之類的散文，我就會暗自地想：「唔，唔，正在搞些什麼東西了，這個老戰士正在為

工人階級的敵人製作毒汁，而為忠貞於工人階級事業的人製作美好豐盛、有益健康的一餐。」
現在我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比爾那時正在寫一本新書。

好，這本書終於寫好了。你一拿起它，就放不下。這種書會使你不睡睡覺，使你用煤、用電太多而感到拮据。它從頭到尾都緊緊地抓住你。它巧妙地使你感到激動，就像任何驚險的偵探小說一樣。讀一讀這本有二十六章的書就等於受到一種很好的教育，它討論了政治情況的各方面，順手解決了各種不同的問題，從美國貸款說起，直談到麻醉品以及訪問達特模爾監獄和派克賀斯特監獄的一些經驗。

在每一頁上，在每一章中，都充滿着加拉赫不屈不撓、堅貞不阿的階級精神，這種精神使他成為英國勞工運動一個出色的領袖，而時間會越來越證明，工人階級因為他不再當共產黨議會議員的事而遭受了多麼重大的損失。

恩義之感

讓我直截地說，閱讀這本書，使我和其他每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都深深地感激威廉·加拉赫同志。正當新的機會展現在工人階級的前面，同時他們已因自己的經驗而對正把英國勞動人民導向他們從來沒有面臨過的最嚴重的境地的「社會民主主義」感到幻滅的時候，這本書對加強爭取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一種新的鼓舞。

有人說熟悉就會產生輕視，這句話頗有道理。在讀「像獅子一樣站起來」的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過去都是怎樣地把加拉赫在議會中的工作看做理所當然的事，而當菲爾·皮拉丁加

入和他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們也有同樣的想法。

十五年來比爾在他老稱之爲「工廠」的地方爲工人階級服務。讀讀他的恰到好處地從他對每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的發言中所引出來的話，不但是一種教育，而且也是一種鼓舞。這些話真像是吹過「歐洲最優秀的紳士俱樂部」的一陣清風。它們戳破了那種故弄玄虛的、像是彬彬有禮而實則腐敗透頂的英國政治的氣氛，那種板着面孔的商人政客的气氛。這些話痛擊了那些懦怯的右翼工黨領袖，並使那些假裝「左傾」的辛威爾、斯特拉徹、克羅斯曼、富特、比萬以及招貼女郎珍妮·李之類的人物落入可輕蔑與可恥的境地。

忘我的服務

「像獅子一樣站起來」記述了一個議會議員爲人民服務的事蹟：忘我地爲那些靠養老金過活的人，爲那些本來無需死於肺癆病的人，那些在朝鮮和馬來亞送死的人，那些要求事故賠償（否則他們將永遠得不到）的人，那些在達特模爾監獄和派克賀斯特監獄的人（如果用不同的辦法對待他們，這些人都可以成爲較好的公民），那些在尼日利亞爲他們的合法權利而鬥爭的人，特別是還記述了他一貫地主張我國和蘇聯、人民中國及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貿易、和平和友誼。

同時，這本偉大而令人開卷有益的書寫得銳利刻骨，有政治理解力、懇切和幽默，而且還寫得善於作政治上的種種對比，這種本領就使工人階級的敵人無法答覆，這種本領就使這本書在工人階級文學中成了獨特的東西。

這本書將如何地受到窮人的愛好啊！它又會如何地爲富人所憎恨和攻擊啊，攻擊的人還該加

止勞工運動中那些一九四五年七月在議會裏唱「紅旗歌」而忘記了這幾行的人：

今天正配懦弱和卑鄙的人的口胃，

他們心頭只看到金錢和地位，

富人的眉頭一皺他們就奉承，

還侮辱稱號的神聖。

一件偉大的工作

在有些地方，比爾讓他詩人的氣質盡情地奔放，在有些地方則又和勃雷克及吉伯齡開玩笑，他這種態度使我高興，但是我深信，這將使這兩位先生在墳墓裏輾轉不安。然而這正是他所做的一件偉大的工作。

至於他對聖經的知識，無論是在英國聖公會裏或是在天主教會裏，很少有人對他們所信仰的教義有他那樣熟悉的。當比爾在下院中用恰到好處的引語向他們進擊的時候，他們該是多麼難堪啊！難怪議長要表示「厭惡」了。難怪溫特吞氣青了臉並要求議長制止加拉赫引用他自稱信仰的基督教教義了。

「像獅子一樣站起來」真是一本你應該有的書。現在就去找一本，讀它，研究它，你一定會說，像我現在所說的一樣：「多謝你，比爾。你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來繼續進行鬥爭。你使我們從沉睡中醒來，並且使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爭取英國走向共產主義。」

前 言

馬哥特·巴利希

一九五〇年大選的那一天，在從西費夫到培斯利回家的路上，我對比爾·加拉赫說：「你應該再寫一本書了。」

他回答說：「是的，我自己也會這樣想。」

比爾是說了就做的人，本書就一章一章地寫出來了。每一章都是一幅生動的圖畫，描述他豐富的經驗。他曾畢生站在工人階級鬥爭的最前線，經驗豐富，知識淵博。

在讀這本書時，人們會對比爾·加拉赫為勞工運動所化的精力和時間，驚嘆不已。他有無窮的精力。但是，在讀這本書時，人們更驚嘆的是書中出現的那些美妙的詩句；因為比爾像毛澤東一樣，善於輕鬆愉快地按各種不同的主題寫各種不同的詩篇。而且不僅只是詩而已；在下院的走廊裏，人們還能看見比爾一連幾個月地腋下挾着一本代數書踱來踱去。他的眼睛會閃爍喜悅的光輝，說道：「我想當一個數學家。」無疑地，他是一個有多方面才能和多方面興趣的人，他是一個顯示工人階級真正的文化的人。

在下院裏，連那些最憎恨他的政見的人也不能不為他的人格所感動。他是一個道德方面、政見方面和知識方面都很正直的人，這些品質在黑暗腐敗的下院中，放出了燦爛的光芒。他的人格是他們所不得不讚美的，可是他們並沒有去學習這種品質。

在一九五〇年的大選中，比爾·加拉赫失去了他的議席，這是對英國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運動的一個巨大的打擊。他在本書中清楚而客觀地分析了使他落選的原因，分析了工人階級必須從中汲取的教訓。

殖民地的各族人民，也同樣遭受了一個重大的損失，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議會議員能像加拉赫那樣硬直地維護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的，他在各個殖民地國家中的許多私人朋友們，在知道了西費夫選舉的結果後，曾紛紛寫信給他，表示他們深深的惋惜和個人若有所失的感覺。

本書中所提到的、黃金海岸的小額納斯特·波騰（他已認加拉赫作義父），以稚氣的方式表示了千百萬殖民地人民對加拉赫所共有的感情。很多到英國來進大學的非洲人的一件要事，就是到下院去拜訪加拉赫，並對他為他們所做的事情，親自表示深深的感激。

這本書主要是講一九四五年以後的事，從工黨政府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的大獲勝利——那時，工人們對於呈現在他們面前的種種可能性是充滿着希望的——一直到現在，一九五〇年的秋天。這是偉大的勞工運動的領導方面一碰到資產階級任何一點點反對的跡象就不斷地、怯懦地退却的一幅可悲的圖畫。這是一幅接二連三地大叛賣的圖畫，也是一幅爲了美元而出賣我國獨立的圖畫。工黨領導方面始終堅持的唯一的進攻，乃是對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進攻。但是，共產黨仍然站在進攻工人階級的真正敵人——資本主義，不論它是英國的或美國的——的最前列，並將繼續戰鬥，直至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了保障。

像加拉赫在一九五〇年西費夫選舉結果揭曉時所說的：

「……至於我呢，我在進下院之前，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者。當我在下院時，我還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者。今後，我仍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者。」

目 錄

代序	
前言	
第一章 投降	一
第二章 美國貸款	二
第三章 煤和辛威爾	三〇
第四章 危機	三
第五章 有性格的人物(?)	四
第六章 人民肩負重担	四七
第七章 馬歇爾援助(?)	五
第八章 給南尼的電報	六
第九章 達特模爾	七
第十章 共產主義和宗教	六
第十一章 「說謊——再說謊——他們仍然在說謊」	九
第十二章 英鎊貶值	二〇
第十三章 關於麻醉	二九

第十四章	原子彈	二二四
第十五章	影片和醜劇	二三四
第十六章	碼頭工人是偉大的	二四零
第十七章	盟約	二五九
第十八章	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分子」	二六七
第十九章	藉誌謝意	二七四
第二十章	命令	二八二
第二十一章	這是帝國議會嗎？	二九〇
第二十二章	巴勒斯坦	二九八
第二十三章	凍結工資	三〇一
第二十四章	殖民地	三〇六
第二十五章	至聖的天使	三〇七
第二十六章	誰要和平？	三〇六
譯後記		三二二

第一章 投降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對德戰爭結束時，邱吉爾寫了一封信給副首相艾德禮，請他繼續留在聯合政府，一直到對日戰爭結束；否則就要負提早大選的責任。在工黨大會開幕前一天，工黨執行委員會於五月二十日（星期日）在布拉克浦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了這封信。會議決定向工黨大會建議：工黨退出聯合政府。大會一致批准了這一建議。但是，這一建議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並不是一致通過的。有兩個居於領導地位的委員，贊成繼續組織聯合政府；這兩個人後來在確定工黨政府的政策中，當然有決定性的發言權。但是，這些會議是嚴守秘密的，他們的名字從沒有公開透露過，雖然有人却信誓旦旦地悄悄談論着。

現在，一九五〇年，政府機器的權力是無上而又無情的；那些曾在私人談話中說出那兩個人的名字的人，如果受到責難，就會竭力否認他曾透露過這種消息。

然而，在聯合政府結束時，邱吉爾和保守黨決定提早舉行選舉，滿想利用鬼話說邱吉爾是贏得戰爭的勝利的人。但是，儘管所有報紙、電台和電影都大吹大擂，他們沒有能達到這一目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邱吉爾是一個幾乎使戰爭失敗的人。由於他深惡痛絕社會主義，害怕工人階級，雖然羅斯福堅持爲了縮短戰爭必須開闢第二戰場，但是他却反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他準備消費時間、物資和人力，爬上他所說的「歐洲軟弱的小腹地帶」（按指巴爾幹半島——譯者）；同時希望隨着歲月的消逝，蘇聯會在對德軍主力進行巨大的戰鬥中大大削弱而使英國和美國能橫

跨歐洲及其他各地，扶持舊的政權。這就是他一切政策的主旨——使「那幫舊人」保持政權，口頭上却總是掛上「民主」的字眼；使工人繼續被壓迫，被剝削。

邱吉爾的民主花樣是什麼樣的民主呢？那全是少數特權者所期望的東西——對大多數人說來，則是蕭條和貧困。

正是因為奉行這種政策，英國的軍隊才在德國人被當地的抵抗力量趕走時，在希臘登陸。大家都知道的醜事是：我們的軍隊在那塊被法西斯蹂躪的土地上，從來沒有和德國人交過手。他們針對抵抗力量和革命的工人階級作戰。總有一天，這將被看作是歷史上可恥的一頁。

邱吉爾一心一意地執行他的反動政策，他終於把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從第一次所答應的一九四二年一直拖到一九四四年。即使在第二戰場開闢以後，某些戰略措施也是十分軟弱的，以致英國和美國的軍隊不久就陷於嚴重的危險中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國人發動進攻，突破了美軍的防綫。形勢是危急的——絕望的。艾森豪威爾向邱吉爾求援。這位先生，全力奉行一種腐朽的反動政策，希望這種政策會使「蘇聯筋疲力竭」，並使他們在戰爭結束時毫無辦法。然而，當毀滅威脅着我們的軍隊時，他去找誰呢？不是去找羅斯福和美國人。不是的，他找的是斯大林和蘇聯人！

這裏是一些來往的電報。這些電報本身就說明了一切。共產黨一貫主張：我國人民的繁榮、安全和幸福有賴於和蘇聯親密的友誼和同盟。整個戰爭過程，特別是在亞爾丁●事件中，充分而徹底地證明了這一政策。讀一讀這些電報，然後再羞愧地想一想從那時以後所發表的對這個英勇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末，希特勒軍隊在西戰場亞爾丁一帶舉行進攻，突破了英美軍的防綫，使它們陷於窘境。

——譯者

的、從不負人的盟國的一切造謠誣蔑吧。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邱吉爾致電斯大林：

「西戰場戰鬥緊急，最高統帥部必須當機立斷。閣下根據自己的經驗，當深知要在主動權暫時失去之後防守極遼濶的陣綫，該是如何危急。艾森豪威爾將軍很願意而且必須知道閣下所預定採取的行動，因為這種行動當然會影響到艾森豪威爾以及我們的全部緊要決定。據我所接到的消息，我方代表泰德空軍元帥因氣候關係，昨晚留滯在開羅。他沿途停滯了很久，其咎不在貴方。如果他尚未到達貴處，那麼，就盼望閣下預先通知一聲，究竟我們能否指靠蘇軍於一月間在維斯杜拉河陣綫或其他地方開始大規模的進攻，並盼望把閣下所願告知的其他種種事項一併見示。這一極為秘密的消息，除了轉達勃魯克元帥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並責其嚴守秘密外，我決不告訴其他任何人。務請火速賜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斯大林給了邱吉爾如下的覆電：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尊函，已於一月七日晚間收到。

可惜泰德空軍元帥至今尚未到達莫斯科。

利用我軍在砲兵和空軍方面對德軍的優勢，此點甚為重要。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就要有便利空軍行動的良好天候和沒有妨礙砲兵射擊的低層雲霧。我軍正在準備反攻，但此刻天候對我軍進攻不利。然而，我軍最高統帥大本營估計到西戰場上我盟軍的情況，已決定加速完成進攻的準備事宜，並不問天候如何，決至遲於一月下半月內在整個中央戰綫上開始向德軍大舉進攻。閣下儘可相信，我們爲了協助我們光榮的盟軍，必將做到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

一月九日，邱吉爾在覆斯大林的電報中寫道：

「閣下這封令人興奮的信，使我不勝感激。我已把尊函交給艾森豪威爾將軍，只令他一人知道。祝閣下宏謀大策完全成功。」

蘇軍最高統帥部爲了加速援助西綫的盟軍起見，決定把蘇德戰場上進攻德軍的日期，從一月二十日提前至一月十二日。一月十二日，蘇軍在從波羅的海延伸到喀爾巴汗山的遼闊的陣綫上，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參加作戰的蘇軍有一百五十個師，並有大量的砲兵和空軍的支持。他們突破了德軍陣綫，並將德軍擊退了數百哩。

一月十二日，在西戰場的德軍（其中包括完成結集、準備發動另一次進攻的第五和第六坦克軍）停止了它們的進攻，並在五、六天後撤出西戰場，調到東戰場，來抵抗正在進攻的蘇軍。德軍在西戰場的攻勢就因而失敗了。

一月十七日，邱吉爾致函斯大林稱：

「尊函奉悉，感激莫名。空軍元帥泰德深受閣下賞識，誠不勝欣慰。」

茲因閣下在東戰場上開始強大攻勢，謹代表聯合王國政府向閣下深致謝忱，並特此祝賀。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計劃，以及該計劃會因倫斯特德發動先發制人攻勢動作而深受阻滯無法實現的情形，現在閣下諒已一目了然。我深信我方全綫戰鬥將會不斷進行下去。蒙哥馬利元帥所率領的英軍第二十一集團，今天已在羅爾蒙特以南地區開始進攻。」

紅軍這一大規模的進攻，解除了英軍和美軍所受到的壓力，並爲比較容易地和順利地進軍柏林開闢了道路。

如果贏得戰爭是爲了歐洲的資本家和地主，那末邱吉爾和美國人就打了勝仗；但是如果戰爭

是爲了解放一般人民而進行的反法西斯戰爭，那麼紅軍和抵抗運動就打了勝仗。

然而，保守黨人認爲他們可以用邱吉爾作爲資本，所以他們就貿然贊成提早選舉。選舉決定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舉行。在西費夫，工黨在該區內及其周圍活動了一些人來和我對抗，但是沒有成功。因此，他們從德哈姆地區帶來一個年輕小夥子，並着手扶植他。他們在選舉中的所作所爲，我想，必定是歷來所進行的最骯髒的競選活動。他們爲了進行宣傳，甚麼下賤和卑劣的事都幹。

像我已經說過的，我們的政策一直是要和蘇聯友好通商。不僅如此，作爲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由於有共同的理想，我們自然要和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聯合起來。對於蘇聯，尤其是這樣；那兒工人階級因推翻了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建立了工人階級的政權而改變了整個歷史的進程。這是第一個工人的政府，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

一九二〇年邱吉爾醉心於對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干涉戰爭時，甚至於現在的工黨領袖們也曾號召成立一個「行動委員會」，而且戰爭不停止的話就以總罷工相威脅。艾德禮會被感動得說過以下的話：

「俄國人正自紊亂中建設一個以社會正義爲基礎的新社會。世界和平，除非奠基於社會正義上，是無法持久的。蘇聯的敵人之所以不喜歡蘇聯，並不是因爲他們害怕它會進攻他們，並不是因爲它是「無神的」國家，而是因爲他們唯恐這個國家將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上向前邁進。」

但是，這些話是他和其他的人在落入金元大資本家手中以前說的。他們今天就唱不同的調子了。相形之下，我們却始終是一貫的。我們主張和偉大的工人的祖國建立兄弟般的關係。這一點

常常被工人階級的敵人加以曲解，以便使工人階級離開共產黨人。因為反動派知道，歷史上清清楚楚地寫着，只要哪裏的工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哪裏的地主和資本家就永劫不復。在工人們和共產黨被隔開的地方，那裏的地主和資本家就繼續騎在人民頭上。凡是稍微注意研究一下戰後歐洲形勢的工人，都能體會這個簡單的道理。

因此，我們聽到了作為反共運動的一部分的各式各樣的謊言；硬說共產黨人接受並執行「來自莫斯科的命令」。這真是一個愚蠢的謊言，經不起一駁。只有在有權力強制執行命令的情況下，才能發出命令。就是最無知的工黨領袖們，也應該懂得這一點。

英國政府制定了各項法律和規章。我們必須遵守它們，否則就要承受其後果。在工廠裏做工的青年，接受經理或工頭的命令。他必須按照給他的命令做工，否則就要承受其後果。但是，試想有人在莫斯科想到要下命令給我或給在英國的黨，那怎麼行呢？英國共產黨必須做這樣，做那樣，否則——便怎麼樣呢？在莫斯科的，或者在我國以外別的地方的任何人，有什麼權力命令在英國的黨或英國黨的任何黨員呢？

詭計多端的莫里遜先生或許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他四出叫囂，說英國共產黨和「工人日報」是由莫斯科津貼的。他這樣說，恰恰暴露了他那可悲的靈魂的淺薄。人們能夠不顧自己所處的極大的劣勢和種種的阻撓而獻出自己的勞力與工作，像我們的同志們那樣，在他看來，除非有金錢的津貼，這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在戰時，當他在內政部任職並負責鎮壓「工人日報」時，為什麼我們沒有聽見他唱他那心愛的「莫斯科來的錢」的調子呢？已故的李斯·史密斯急於要找尋一句誣譏「工人日報」的話，會跑到內政部去見亞歷山大·馬克威爾，並且向他提出了一些事先準備好的問題。這些問題

自然都得到了答覆，並以打字文件的形式出現；我會私下看過這個文件。使李斯·史密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爵士不得不承認：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錢是從國外來的，而檢查我們郵件的結果清楚地證明我們從本國人民中收到足夠的錢來維持我們的黨和報紙。

當我在下院提到這個文件而談到其內容時，辛威爾就搶着發言，並且堅持說：莫里遜既然是內政大臣，就應該告訴下院，是否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工人日報」或共產黨接到國外來的錢。這對於口若懸河的莫里遜先生是一個多好的機會。但是，他一言不發。

辛威爾又接着說：「我們有權利弄清楚，這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而，莫里遜先生仍是啞口無言地坐在那裏。他知道這不是真的；但是，他沒有那種道義上或政治上的勇氣，敢於站起來說這不是真的。但是，在一九四五年，蘇聯曾拯救了歐洲的事，是大家都明白的。從英勇的斯大林格勒——這是歷史上最偉大和最壯觀的軍事偉蹟——之日起，我國和其他各國的人民都會注視紅軍攻勢日益增長的氣勢，這一攻勢跨過俄羅斯，經過中間各國直到德國，使納粹軍隊一敗塗地。

的確，我國人民在那時都認識到，他們應當如何感謝蘇聯人民的堅忍和犧牲。這種情形，甚至使邱吉爾於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辯論過程中談及克里米亞會議時，也不得不說：

「我從克里米亞及其他我的一切接觸中所帶回來的印象是：斯大林大元帥和蘇聯的領袖們，都希望與西方民主國家忠誠友好地、平等地共處。

「我同時覺得他們是言必有信的。據我所知，沒有一個政府在履行其義務時，即使對它自己是有害的，能有蘇聯政府那樣地堅定不移。」（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一二八三——一二八四欄）

五年來美元操縱下的宣傳，改變了這一切。報紙、電台和電影一齊出動來毒害人民的思想。他們無疑地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但是，在一九四五年，這種宣傳還沒有流行，因此，雖然費夫的工黨黨員們用盡一切方法散佈惡毒的誹謗，但是他們沒有能破壞費夫各礦區對我黨的支持。這樣，我又作為西費夫的代表選上了議會。然而在此以前，我是議會中唯一的共產黨人，我非常高興地知道，在一九四五年的議會裏，我有了一個戰友，就是菲爾·皮拉丁，他在斯德普納的曼爾·恩德的選區中，戰勝了原來的工黨議員，這個議員在選舉中，只得到該選區工黨黨員冷淡的支持。

菲爾是一個好同伴。他的態度鎮靜而具有說服力，這使他能和大多數工黨黨員相處得很好。一般地說，他比我做得更好。

不論如何，菲爾和我是在一起了。我們在卡文特花園王街的黨辦公處碰了面，一同到下院去。這是怎樣的一個下院啊。工黨議員差不多有四百個（三八四個），其中大部分都是新當選的，都急於要做工作。他們多麼熱情，多麼興奮。他們趾高氣揚。他們打敗了保守黨，並且要繼續使保守黨不能抬頭。他們歡呼、大笑和狂叫。當保守黨意識到他們的失敗，且為他們的前途擔憂而試着在邱吉爾進來時來一次示威，他們却遭到工黨議席方面的反應，這真把他們嚇壞了。他們第一次在下院這個「神聖的地區」聽到了令人激動的「紅旗歌」的合唱聲：

「讓鮮紅的旗幟高高地舉起，

我們將在它的引導下共存亡，

讓懦夫們退却、叛徒們冷笑吧，

我們要使紅旗在這裏不停地飄揚。」

是的，先生們，這是了不起的示威。「我們要使紅旗在這裏飄揚」，就在這下院飄揚。可惜，他們並沒有能使紅旗長久飄揚下去。那「一次」不僅嚇倒了保守黨，它竟使工黨領袖們嚇得更兇。他們不久就明確規定：唱紅旗歌是違反工黨政策的，違反工黨綱領的。但是，在開始的一些日子裏，紅旗却在想像中高高地飄揚着；保守黨人相形之下則是灰溜溜的。他們一羣在那屆議會頭幾個星期中那種畏懼狼狽的樣子，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在新當選的工黨議員中有一句流行的話：「他們完蛋了，他們再也起不來了。」這就是他們心裏所想的，也是他們所希望的。

敵人是保守黨人而不是共產黨人。在開頭的那些日子裏，我們的關係是最密切的和最融洽的。但是，這種情形不適用於工黨領袖們，也不適用於工黨政府。大約在這個時候，我寫了「雷聲隆隆」的最後一章。最後的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工黨獲得了一個大好的機會。如果政府抓緊這個機會，利用這個機會，那麼，保守主義在英國就一去不復返了。但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將是一件艱難困苦的事，路上有着各種各樣的阻礙。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必須着着實實地予以運用以支持工黨政府。爲了這個目的，共產黨的力量是決不可少的。只有它才能完成這件工作。因爲這個緣故，我願重複我在選舉前就說過的一句話：工黨政府或者是向保守黨投降，或者是請求共產黨的支持。」

工黨領袖們不準備走後一條路。它的後果很快就變得顯而易見了。我代表共產黨，並把它作爲真正的工人階級政策的重要一部分而要求撤退我國在希臘的軍隊。這是最早的一次考驗。外交大臣貝文諂媚其保守黨敵人。呵，是何等樣子的諂媚呀！當時他竟宣稱：他所主持的外交部任用着原班人員，並且就奉行着邱吉爾和保守黨人所採取的政策。

看，瞧瞧他們吧。他們黯淡無光的眼睛睜開來了，閃爍着一縷希望。他們相顧環視，開始微笑了。他們又復蘇了。貝文正好把他們從一個深淵的邊緣帶到了安全的地方。在這開始的時期中，當貝文一錯再錯，準備大力復活保守主義時，他們是如何歡呼他，如何讚揚他啊。

貝文雖然總是用他個人的名義（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沒有更妄自尊大的人了），但是實際上他是代表他的內閣同僚們說話的。工黨政府已開始走上了向保守黨人投降的道路。

第二章 美國貸款

隨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對日戰爭的結束，租借法案也結束了，突然地結束了。這使得工黨政府陷於困難的境地。我們的貿易差額是對我們大大不利的，而大量的重建和復員工作又必須進行。美國人提出貸款以代替租借法案。工黨政府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貸款。在早期，整個工人運動，包括共產黨在內，都準備全心支持政府，使它安穩地開始它的工作。

當提出的貸款問題交付討論的時候，菲爾和我到休息室裏去斟酌各種意見，結果投票贊成貸款。在今天，一個政府貸款給另外一個政府，本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在通常的情況下，只需要傳閱通知就行了。但是，在戰爭結束後的初期，情況決不是平常的。美國因為它的經濟在戰時沒有受到損害，戰後擁有一切有利的條件，而英國和歐洲各國却在一切不利的條件下受苦。

在美國，大壟斷資本家是十分強大的，他們自然會利用他們巨大的資力來擴張他們在國內外的利益。但是，我們那時候極少考慮到這一點。貸款將有助於工黨政府來解決它的燃眉之急，使它能夠進行它的國有化計劃和房屋計劃。這便是我們當時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假如我們清楚地了解美國資本家的性格，那麼，我們會反對貸款，並且在必要時，贊成束緊褲帶，以避免我們已經開始陷入的奴役狀態。許多年來，我們即在注意羅斯福「進步」的資本主義政策的發展，可是我們竟沒有看到統治美國的真正力量。

我們應當從白勞德的幾乎不可思議的曲解中得出一個更嚴重的教訓。白勞德因為受到羅斯福

的政策影響，提出了一個荒謬的理論，說什麼資本主義現在已經「人道化」了，它將與共產主義者合作，以促進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產生。他根據這種觀點，提出並執行了解散美國共產黨的決議。英國黨內沒有一個人不反對白勞德的行動的。然而，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到羅斯福所採取的友好政策的影響。

但是，戰爭的結束使美國資本主義面臨一個需要迅速重新調整政策的形勢。只有東歐各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西歐反動勢力在美英軍事當局的支持下，抓到了政權，並把解除作爲抵抗運動主力的工人武裝的工作，當作他們第一個任務。因此，美國外交政策就是不惜以任何代價來維持這些資本主義政府，並且在所有這些政府之上，建立美國的霸權。

這點，我們應當在一開始就搞清楚的。

請看貝文先生在下院站起來所發表的斷然的聲明吧：

「……我們必須考慮德國基本工業的所有權。這些工業從前是屬於大亨們的，他們與德國軍事機構緊密地聯繫着，他們資助希特勒，並在兩次戰爭中都是德國侵略政策的一部分。……我們的意圖是：這些工業在將來應該收歸公有並交由公共管理。這種公有的確切形式現在正在擬製中。這些工業應歸德國人民所有並由他們來經營。」（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但是，美國人告訴了他另外的意見。美國接收了英佔區，貝文只能充當其新主子的「應聲蟲」；同時，原來的一幫地主和資本家就在美國人的監督下，重新完全掌握了土地和工業。對社會主義作戰，對歐洲工人作戰以支持腐朽的資本主義——這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外交政策，它決心殘忍地執行這個政策。

羅斯福的一些忠實朋友，因為忠於羅斯福而著名的一些人們，一個個從杜魯門政府中被趕出去了，而由大壟斷資本家所中意的人物，代替了他們。杜魯門政府變成了將軍和銀行家的政府。全是社會主義兇惡的敵人——全是狂熱地擁護殘酷無情地追逐私利的人。

在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在我們的國家裏曾經呆過一個特別忠實於羅斯福總統的信徒，他的名字叫約翰·魏南。我記得一天晚上在歡迎莫洛托夫的招待會上，他談到我在美國很有名的話。

我說：「太有名了，因此他們不讓我到那裏去訪問一次。」

他聽了之後大吃一驚。我解釋說，一九三六年當我申請到芝加哥去看我姐姐的時候，我曾經被拒絕發給簽證。我說完後，他告訴我，如果我需要簽證，可以去找他，他將設法使我得到簽證。他又高又黑，深黑色的頭髮，並且有一副可以說是十七世紀時代的普通清教徒的面孔。

他是一個正直、說話沉着並且一望而知是一個誠懇的人，但是，他顯然缺乏幽默的涵養。這在招待會進行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了。莫洛托夫站在我們面前，一張擺滿杯盤的桌子旁邊，和貝文面對面。他們正在乾杯，那就是說，他們一直在過量地喝着烈性的酒。莫洛托夫還看不出怎樣，但貝文已頗有醉意了。莫洛托夫提議為紅軍乾杯。一個侍者看到我沒有酒，走過來遞給我一杯。

我輕輕地說：「不要，不要，把它拿開。」

侍者堅持說：「你應該乾杯。」

我有一點激怒地大聲說：「拿開。」

周圍的客人有些兒吃驚。莫洛托夫笑着說：「我已經做了四十年的共產黨人了，但是，從來沒有見過像加拉赫這樣的共產黨人。」

貝文接着說：「他是一個長老教會的共產黨人。」

別的人都大笑起來了，但是魏南却拍着我的肩膀說：「很好，很好，我也是個長老教會信徒呢。」

直到這時為止，一切都是有趣而愜意的。假如有人在笑，而這笑又是對我而發的，誰管它呢？這時，莫洛托夫想到了了一個很妙的主意。

他對貝文說：「我們來爲加拉赫同志乾一杯。」

貝文回答道：「贊成。」

假如他們當時喝了，那麼一切仍然是很順遂的，但是，莫洛托夫還有話說。

他告訴大家說：「加拉赫同志有兩點勝過貝文先生——第一，他是一個共產黨人；第二，他頭腦清醒。」

這引得哄堂大笑。這次是笑貝文的。那是他絕不會寬恕的一件事情。他喜歡大笑，但總是取笑別人的。他是一個非常好發脾氣的人，象和他比較起來，都顯得是遲鈍的了。

戰爭初期，工廠中的情況很壞，他作爲勞工大臣的那副虛張聲勢的樣子，並不能有助於使人產生信心。某一星期日的下午，他去愛丁堡向車間代表的一個集會講話，搞得很不妙。晚上，他在格拉斯哥和克萊德的車間代表們見面，被大鬧了一頓。結果，不得不叫警察來恢復秩序。那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當蘇聯遭到進攻的時候，飛機生產大臣比維布魯克奉命去莫斯科，不久，便和斯大林取得關於英國給予蘇聯何種物質援助的諒解。當他回來的時候，他計劃到各個主要工業區去走一趟，呼籲推行增產運動。在某些工業中，特別是在克萊德，情緒仍然是激動的。比維布魯克的一個朋友在下院和我談話，建議我利用我對克萊德車間代表的影響，以免他去講話的時候發生任何麻煩的

事情。我答應盡力去作。我和爲首的車間代表們接上了頭，請他們召集一個會，我將在會上講話。

我和他們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會見了，那是比維布魯克預定到那個區域去訪問的一星期以前的事。我發表了一個演說，談到比維布魯克和斯大林所協議的政策，並請他們把下星期的集會變爲英國工人和蘇聯工人之間團結的真正的表示。我很費勁才得到他們的同意。他們對於他們在工廠和造船廠中所受到的待遇，特別是對於貝文的不同情的態度，存在着十分憤怒的情緒。但是，在三小時以後，我們獲得了協議。接着，我向新聞界發表一個聲明，這個聲明會被廣泛地發表。聲明說，車間代表將歡迎比維布魯克，並且表示他們支持和蘇聯聯盟。

這次集會很成功，雖然甚至比維布魯克也清楚地知道，會議在某些階段是草率的。第二週，英國每家電影院都在放映比維布魯克和克萊德車間代表們集會的情形。這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

在同一週的星期二，我在下院圖書館走廊裏碰見了貝文。

他大聲吼着：「你真是個好人。」

我問道：「出了甚麼事情嗎？」

「你在對我做了甚麼事情以後，却對那——比維布魯克安排了一個接待。」他說話的時候眼睛直瞪。

我說：「我對你做了甚麼事情以後？你遇到的事情與我毫不相干。」

他接着說：「那很好，我知道那是誰安排好的。」

他說到這裏便不說了；但是我敢斷定，他決不會相信車間代表們在發洩他們對勞工大臣的憤怒，是因爲他們覺得這位大臣沒有給予他們以公平的待遇。貝文所能想到的一切，只是某人在對

他作私人的攻擊。

約翰·魏南並沒有幫我得到簽證。他回美國去了。他是多年來生活在羅斯福的良好影響之下，並與這種影響有密切關係的人。對他說來，到處鼓動起來和挑撥起來的瘋狂的憎恨，必然給了他以可怕的打擊。他所追求的一切，他所希望的一切，以及羅斯福精神所代表的平穩緩和地進步的一切幽夢，都被粉碎了，摧毀了。狂暴和破壞是目前當權者的指導原則。

「活下去呢還是死？」約翰·魏南決定「死」。這位善意的、誠實的好人的自殺，是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的。

一九四六年，我得到了簽證，但這並不是沒有困難的。我是通過格拉斯哥美國領事館申請的。在等了一個時期以後（我繳了我自己和我妻子的護照），我會去看看事情有無進展。一點進展也沒有。我把我們的護照取回來又把它們寄到倫敦去，倫敦把這件事提交給華盛頓的國務院。可是，當我從格拉斯哥的辦公室出來的時候，我的一些朋友問我進行得怎麼樣。

我回答說：「一點進展也沒有。我受到非常駭人的待遇。實際上，」我笑着加上一句，「我被當作南斯拉夫人一樣地看待。」

那就是我說的：「像一個南斯拉夫人。」因為在「那個」時代，「民主和人類的最兇惡的野蠻敵人」，便是南斯拉夫人。

鐵托和他的黨羽，比東歐任何一國的領袖更多地談論共產主義。所有這些國家，按照美國和英國的報紙、電台、電影和政治的宣傳，都是蘇聯順從的衛星國；而且按照當時一般的說法，其中最順從的還是南斯拉夫。看吧，那時報紙上和下院裏面對於鐵托和南斯拉夫人的咒罵是多麼兇惡與狂暴啊。他們和別人一樣，是莫斯科的奴隸。沒有得到克里姆林的許可，他們不能想、不能

說、不能動。你要懷疑這點，你就等於將自身置於良好公民的範疇之外了。普里特、普拉茨—米爾斯、菲爾和我不斷地發出詢問，結果是保守黨和工黨議席那裏響起了一片的嘲笑聲。「鐵托是克里姆林的工具，比任何別人都更徹底，這是絕對無法改變的。」這些話刊在報紙上，印在會議事錄上。「莫斯科的衛星國、奴隸，他們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動。」

然而，南斯拉夫行動了——它斷絕了和蘇聯的友誼關係並且追隨於金元之後。現在他們對於南斯拉夫有甚麼可說的呢？他們會承認他們的宣傳是欺騙的宣傳嗎？他們承認東歐其他的任何國家，假如它們要捨棄社會主義的道路去追求腐朽的金元資本主義，它們是完全有自由這樣作的嗎？它們是有自由這樣作的，但是，它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堅強信念，足可抵抗放在他們道路上的一切的誘惑。只有那些不相信工人階級的人，那些想利用借來的財富（這些財富一定得用工人的血汗和勞動來償還的）擺架子的人，才會捨棄共產主義的道路而去追求金元「民主」的虛偽的光彩。

這個金元「民主」是多麼可怕的東西啊。當我準備取消我們的旅行的時候，簽證通過了；結果，我妻子和我恰恰在鐵幕對我們降下之前，去美國走了一趟。

財富？是的，那裏有很多的財富。歐洲任何地方都不如它。和美國的金融大王和工業巨頭比較起來，我國封建王侯在最昌盛的時代也不過是一些「小氣鬼」（用美國人的土話來說）而已。它是一個富足的國度，但它也是一個窮得可怕的國度。

我們在那裏看到貧民窟和令人驚駭、摧人心腸的貧窮，比歐洲任何國家的任何情況還要壞。那裏有各色各樣的信仰，但是，所有這些信仰都在迎奉一個而且把它看成高於一切的最大信仰，這就是對萬能的金元的信仰。到處你都可以聽到：「找金元，不管如何或在甚麼地方找到它。」

我們到芝加哥市郊去拜訪培斯利地方的老朋友的時候，做父親的，一個老社會民主黨人，對我悲嘆着到處都是的卑鄙的貪婪。

他說：「每個人都在追求金元。」

他的兒子，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尖銳地反問道：「爲甚麼我們不應該這樣呢？這個國家是金元創造出來的。」

我確信，說出這句已經成爲老生常談的話的青年，是不知道這句徹頭徹尾錯誤的鬼話——是金元而不是人創造了美國——是由工人階級人人憎恨的敵人亨利·福特那裏散佈出來的。

「這個國家是金元創造出來的。」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我回憶起查理士·狄更斯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一段東西。馬丁·曲茲勒維特到達紐約，安排好膳宿之後，便傾聽討論美國的事情的話。於是我們便看到以下的敘述：

「說老實話，那是沒有甚麼興趣的，大部分可以歸結爲兩個字——金元。他們的一切關心，希望，快樂，愛情，道德和交往，似乎都融化在金元之中了。無論甚麼時候，他們只要一有機會閒聊時，總是離不開金元兩個字。」

「人們是由他們的金元來衡量的，度量衡是由金元來測定的；生命是由金元來拍賣，估價，哄抬或賣掉的。除了金元而外，第二件受人看重的事情就是爲獲得金元而作的任何冒險。」

「任何不顧他的名譽和善意的人，只要他更多地拋棄那毫無價值的道德、榮譽和公正，他就能賺得更多的金元。商業買賣變成了大欺騙和大盜竊。把國旗當作無用的破布來毀壞它，一星一星地踐踏它，一條一條地撕破它，好像從一個墮落了的士兵的臂膀上取下來一樣。」

「爲了金元，甚麼事情都幹。」

與這種害人非淺的對金元的渴求相聯繫着的，便是不斷的戰爭叫聲。蘇聯和東歐國家不接受或不崇拜金元。轟炸它們！趁我們壟斷原子彈的時候，把它們從地球上消滅掉！報紙上天天是眩目的大標題。戰爭，戰爭，戰爭。假如我們在佔優勢的時候不進攻蘇聯，我們就完蛋了。書籍出版了，一本是一個小丑大使布立特著的，另一本是前國務卿貝爾納斯著的，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人著的——全要轟炸蘇聯人。在他們能來到美國以前，消滅他們。甚麼！我的上帝，回頭看看，或許他們已經在這裏了。聽聽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領袖們的話吧。他們有什麼區別？老兄，不要問我。聽他們的。「我們已經開始武裝歐洲國家，並且爲了我們的目的而利用它們了。」不會就這麼率直的，但是，他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在離開紐約之前，遇見了一位著名的保守黨議會議員，他那時也在訪問美國。

他問我：「你看過這樣的報紙嗎？」

我回答道：「我時常說我們國內的報紙是『黃色報紙』，但是，假如和美國的報紙比較起來，那還純是白色的呢。」

他接着說：「至於那些政治家，老實說，加拉赫，當我聽他們說話的時候，就使我羞於承認我是一個政治家。」

我十分同情他的話。然而，這些政治家正是那些提議給我們金元貸款的人，這個貸款使我們附屬於美國，並且通過這種不斷增長的附屬過程，它已經驅使我們陷入貿易的危機之中了，還使毀滅性戰爭的陰影嚴重地籠罩着我們的國家。

第三章 煤和辛威爾

在倫敦的時候，我曾和奧麗芙·阿諾特及培治·阿諾特同住在白堊園的一個房間裏。他們不但照顧我的健康，而培治在我晚上回家的時候，還給我解除一天辛勞所很需要的一種安慰。因為那時培治正在寫作一本「礦工史」，這本書將成爲有關採礦工業的經典著作。

第一卷已經出版，第二卷正在寫作中。我有機會，或者應該說是有特權，在他用打字機打完每一章後，先讀到它。那本書是關於對礦主的貪婪掠奪，進行持久的猛烈的鬥爭的歷史。在這一鬥爭過程中，全國各礦區發生了對煤業公司的一種深刻而強烈的仇恨。這種情緒在其他任何工業中，都沒有像煤工業中所表現的那麼強烈。因此，實行國有化就成了礦工們迫切的問題。那就是他們很希望每週縮短工作時間並且提高工資水準。應該指出，礦工是工人在議會裏得到代表權的首批工人。培治·阿諾特在「礦工史」第五十五頁中說：

「在一八七四年的選舉中，這個最新的法令（指「選舉權法」的擴大——加拉赫註）即被加以利用，亞力山大·麥克唐納和湯馬士·柏特被選爲議會議員。他們雖然是自由黨黨員，但他們是第一批「工黨議員」，第一批工人階級的代表。」

從那個時候起，自由黨黨員就在若干選區替工人階級的代表開了路，這些代表後來被稱爲「自由黨—工黨議員」。在一八八八年，又有一個礦工基爾·哈狄，在中拉納克選區以工黨第

個候選人的資格，參加競選。他和自由黨無關而且是反對自由黨的。在他的第一個競選綱領中，除了其他項目之外，還有在英帝國內的所有領土和國家都實行地方自治的一條。蘇格蘭和威爾士也包括在內。基爾·哈狄的主張受到了肯寧漢、格蘭恒和斯特林·羅培遜等人的支持，這些人在數月以後，組織了一個蘇格蘭工黨。從那時起，工黨對蘇格蘭的政策中一直有現在爭論頗多的蘇格蘭議會問題。但所謂「一直」，是指到一九四七年為止，那一年莫里遜集團就禁止了這種提議，並且橫眉怒目地對付任何支持這種意見的蘇格蘭工黨議員。

哈狄綱領中的另一項就是「取消上院」。如果他今天還活着，看到「社會主義者們」正熱心地抓住任何機會，支持這個封建主義陳腐的殘餘並變成它的一部分的時候，那麼，他取消這個制度的願望一定會增強一千倍的。他一定會支持我所說的關於「改革上院」的話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我們都聽到反對黨的可敬的議員們像過去一樣出來說他們是那麽熱切於推翻世襲原則。他們世世代代地曾經爲了在英國維持世襲原則而奮鬥，可是現在他們却說：『啊，我們並不關切世襲原則。』他們是這樣嗎？他們會把取消世襲原則的辦法全面應用、從根剷除它嗎？他們會嗎？不，我想他們是不會的。但是，老是這樣的：每當他們遇到任何攻擊的時候，或者每當他們感覺到人民可能起來反對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準備作各種讓步。像托爾斯泰所說的：『富人可以替窮人做任何事情，但就是不願離開他們的背上。』反對黨的那班人就是這樣：當提到任何關於像上院這樣落伍事物的建議時，他們是願意做任何事情的，但就是不願放棄上院。上院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呢——就是可能拖住英國人民的進步……」

「無論根據任何民主原則，上院都沒有存在的理由。上院或者具有權力，或者沒有權力。如

果它沒有權力，那麼就是設之無用；如果它有權力，那麼，這種權力就一定會被用來阻礙下院所達到的各種進步。

「那位可敬的博學的先生、東萊斯特區的議員（杜諾凡先生）曾經問起：兩年時間比一年有什麼更大的好處。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把這種話與議院的問題相提並論。今晚有許多人都曾提到牛津區的可敬的議員（賀格先生）。我記得幾年前這位可敬的議員的受人崇仰的父親曾經和我有過衝突，結果是我被關進了萬士華斯監獄。不久之後，他的父親就進了上院。我絕不會准許任何人說，與他爲伍的那些人比與我爲伍的那些人好些；我也絕不會承認兩年時間或一年時間的本身有什麼好處；我絕不承認上院作爲議院的第二院究竟有甚麼好處。我建議政府應該及早勇敢地執行勞工運動領袖們多年來所主張的政策——取消第二院。下院是完全能够完成它所應做的一切工作的。」（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二八七——二八九欄）

哈狄和礦工們是堅決主張礦山國有化的。已往的每一年，每一次反對礦主的新鬥爭，都把這個問題在他們面前更迫切地提了出來。當哈狄選進議會以後，他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爲達到這個目的提出一個法案。所以，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辛威爾在提出他的礦山國有化的法案時，他是在實現英國礦工們所長期等待的一個希望和要求。

辛威爾充分地利用了他的機會。由於他的聰明，計謀多端，頭腦靈活，因而能把礦工的情感與希望最充分地表現出來了。保守黨方面沒有提出真正的反對。事實上，當那個法案被送到一個常設委員會（我被選任爲該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去考慮修正時，辛威爾還引用了在該委員會中領導保守黨反對派的哈羅德·麥克米倫所著的一本書中的話。麥克米倫在那本書中表示：解決煤工業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實行國有化。不但如此，在戰爭的後期，「李德報告書」也已發表，並被聯

合政府所接受。

這個報告是由大煤礦公司的七個高級代表徹底調查煤礦工業後寫成的，其中沒有一個礦工代表。那個報告是對那些罪無可逃的英國煤礦礦主的控訴書。一般講來，可以說他們已從採礦工業中發掘出他們所能發掘出的一切東西了，而且，幾乎沒有加進一點點東西。那個報告只是沒有提到實行國有化，但是，任何讀過那份報告的人都可以明白地看得出來，實行國有化是唯一的希望。不但採礦工業是這樣，所有其他依靠它的工業也是這樣。該委員會的主席查爾士·卡勞·李德（後來他被封爵）曾任費夫煤業公司的總經理多年。他被認為是我們的「第一流採礦工程師之一，在這方面，他確是進步的。許多人曾經寫過的「坎木里煤坑」，證明了這一點。目前正在開採的，恰在被國營煤業局接辦之前一天才開始採掘的「羅士煤坑」，將比坎木里煤坑要進步。

是的，李德爵士是個進步的工程師。但在政治方面，當他遇到一些他所不歡喜的事物的時候（他當然不喜歡我的政見），那麼他的思想就閉塞起來了。在大戰的時候，他與涂拉朋勳爵及詹姆士·巴布爾一起被委派在蘇格蘭中央管理局中，管理蘇格蘭的採礦工業。

我曾在下院中及國內反對那種結果很難實行的雙重管制。後來我還到愛丁堡去見管制委員會，把我的意見提出來。當我走進室內時，涂拉朋和巴布爾已經在那裏了。我們等待了李德幾分鐘。當他進來的時候，他兩眼瞪着我，大聲說：「來吧，加拉赫，把牌攤在桌上。雙重管制到底怎樣？」

我就以我認為是相當明白而平易的態度，把我的意見解釋給他聽。按理那個管制委員會是管理煤礦，負責生產的。然而却是煤業公司，而不是管制委員會，管理那些煤礦經理們的，而這些經理們却又是管理和指揮煤礦工作的。

我堅持經理們應對管制委員會負責，在經理部與礦工們發生意見分歧的時候，應該立即找管制委員會，而不應該先找公司的代表，並在解決不了的時候，再找煤業公司的總經理。涂拉朋勳爵和巴布爾對於我所講的話表示相當有興趣，巴布爾自己後來還貢獻了相當好的意見。然而，當我一講完的時候，李德即狂暴地吼道：「一片胡說八道。」

我看看其他兩個人，然後說道：「這使我想起彭松比所告訴我的他父親時代的一個故事。他的父親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私人秘書。彭松比說，當他們去巴爾摩拉爾的時候，一向都是由一個年老的蘇格蘭貴族主持宗教儀式的。他有個習慣，就是在朗讀聖經的時候，常常插入他自己的話。有一次，他這樣讀着：『駱駝穿過鐵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一片胡說八道。我們祈禱吧。』」

其他兩個人都大笑起來。李德看看他們，而後又看看我，低聲地說：「呃，如果聖經中有這種話，那就是真的。」他的腦筋已經緊閉起來了。

但是「李德報告書」却是一個證件，證明他對礦業的了解，證明他準備採取相當無情的措施把採礦工業由它所已陷入的深坑中挽救出來。無論如何，誰都知道，保守黨方面並沒有積極反對國有化。他們主要關心的就是補償金問題。在這一點上，辛威爾和工黨政府完全站在保守黨一邊了。

他們提出一種意見，說是只有兩種辦法：或者依照批准的方式給予補償金，或者予以沒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曾提出過一個很行得通的建議，任何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政府都可以爲之奮鬥，並得到人民的支持。如照目前的方式給予補償金，那就意味着我們將有一大羣「永遠領養老金的人」來坐吃我們的國家。

我的建議就是：對於礦主以及其他受國有化影響的人們，應給予與他們目前收入相等的終身年金。這樣做法並無絲毫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在目前這一代的礦主死去之後，英國和它的礦業即將擺脫一切負擔了。可是不然，他們並不接受這個提議。如果他們接受的話，那麼一定會與保守黨發生一場真正的鬥爭，而勝利一定是操在工人階級手中的。

在那個法案（指工黨所提出的煤礦國有化法案——譯者）中，規定以一筆天大的鉅款（一億六千四百萬英鎊）分配給那些礦主們。給款的日子，亦即該法案生效的日期，定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該法案規定在兩年內把那筆鉅款分配給每個要求補償金的礦主。用兩年來實行「分贓」，似乎是個很長的時間。同時，該法案又規定在那兩年之內，應該由煤礦工業方面給予礦主們「臨時付款」。因為政府已經明白地表示：雖然在私有的時候，政府曾經給予津貼，可是，煤礦工業現在一開始就須設法獨立經營，而不能再得到政府的補助了。因此，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兩年中間，礦主們就領取其「臨時付款」。關於這種付款，我曾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向燃料電力大臣提出過下面的問題：

「……在整個補償金的分配問題尚在討論期間，有鑒於國家和礦業的經濟情況，是否現在要提出立法以減少付給舊礦主的補償金和臨時付款的數目？」

賈茲克爾先生：「不，先生。」

加拉赫先生：「我極端鄭重地請問大臣，讓舊礦主們參加全國協助委員會，比讓礦業的充分復興受到阻礙，不是要好得多麼？爲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把錢付給這班人？大臣是否願與下院議長商討立法予以阻止呢？……」

艾木里士·休士先生：「大臣是否已看到國營煤業局最近的報告說：在今年的第一季中，該局獲利四

百五十五萬一千鎊，而其中的三百八十萬鎊却要落到礦主的口袋裏去了？」（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五五八——五五九欄）

而後，到了一九四九年底，忽然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小法案，叫做「延長臨時付款法案」。那個法案告訴我們說：「對於一九四九年和接着的幾年中的臨時付款，需要加以規定。」「接着的幾年中」！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主意。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律師與訟棍正在為「分贓」而工作。

政府給予礦主的是「一筆整數，他們對於如何分法，不能取得同意。律師們和訟棍們就為了解決他們的錢和他們的問題而在工作；可是，礦主們却不必付錢給這些律師和訟棍。當那個繼辛威爾担任燃料電力大臣的賈茲克爾告訴我們說，是我們要付出一切費用給這些律師與訟棍時，我受到有生以來最大的震驚。

假如叫礦主們自己付錢，事實上他們也應該付，那麼我敢打賭，分配工作早就完成了。在「一九四九年和接着的幾年中」，工資微少的礦工們雖然情況艱苦，但可以斷定，那班礦主和律師們倒都着了「公平的一份」。

然而，該法案在委員會討論的階段時，辛威爾却以一個高人的手腕來處理這種情況。出席該委員會的礦工代表以及全國各地的礦工們，都認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像辛威爾那樣的人物。我懷疑還有任何人曾經有像他在處理該法案時所造成的這種印象。補償金的事被忘記了，或者是被忽略了。其他的一切缺點，也是如此。他變成礦工的鬥士了，並且也從不放過機會表示其熱烈贊成礦工的目標。我們其餘的人都沒有什麼事可做，雖然我們之中偶然也有一兩個人加入討論，攻擊一下保守黨。我們仍舊是親密的伙伴——工黨黨員和共產黨人。保守黨仍舊是敵人。那時，金元的宣傳，還沒有在英國很好地展開。

因此，我們都是好朋友與好伙伴，大家都急於推進這個工作。我們是這樣地親密，當這個法案變為法令，國營煤業局即須設立的時候，辛威爾曾在艾德禮與工黨政府的知悉與同意之下宣佈；他希望由礦工工會派出參加煤業局的代表，是共產黨人阿瑟·霍爾納。試想一下這個事實以及自從美國壟斷資本佔領英國以後的目前情形吧。霍爾納參加國營煤業局，共產黨人艾畢·莫法特參加蘇格蘭煤業局。是的，他們必須請霍爾納參加。其他任何人都不中用。霍爾納和莫法特是礦工工會中最能幹、最有才智、最可靠的兩個人。我懂得，大家今天看到他們所說所行的時候，要相信這一點是多麼的困難。但是，這件事是有的，或者說，是曾經有過的。

爲什麼我們的代表沒有參加？是我們反對促進國有化工業嗎？當然不是，我們都是贊成國有化，並願意盡力使它成功的。但是，我們不相信國營煤業局裏塞滿了社會主義的敵人——私人企業的朋友，國有化就可以得到成功。

有些工黨議員同我辯論這個問題。他們說，我們需要懂得生意經的人才。對這一點我就回答說，在工會和合作社運動中，這種人才多得很多。我說，我們自己的人一個商人的分別在於：商人的思想和整套想法都是孜孜於如何爲少數人，爲董事們和股東們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不顧到多數人的福利。商人一生都是這樣想的，他改變不了。

至於我們自己的人呢，儘管他們能力有限，却總是想到多數人的福利，而不管少數人的利益的。這就是爲什麼現在許多工人在聽到他們的工會和工黨領袖們爲利潤辯護，反對他們的增薪要求時，會那樣感到詫異。

那就是我們對於國營煤業局的態度。如果讓工人運動在該局的代表（他們主要應該關切僱用的人們）的薪水，與工會職員的薪水相做，那麼，我們的代表就將參加了。但是，我們的代表拒

絕自己拿工會的身份用作幌子以掩蓋那些反社會主義的大商業投機者的活動。

辛威爾在霍爾納問題上雖然失敗了，但是他還是名聞全球。不但礦工們，而且連其他工業中的工人們都受整個氣氛所影響，認為他是工黨政府中傑出的「左派」人物，認為他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為工人階級的事業而奮鬥的人物。

此後，到了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冰雪封住了鐵路上的貨車，發電廠得不到它所極需要的煤炭。這是一個運輸問題，靠利用軍隊打掃鐵路上的冰雪才得以解決。但這竟給了艾德禮一個天賜的良機。

艾德禮在各方面都是個小人物，身體小，胸襟小，在言論和行動方面都沒有過一個深刻而真摯的思想。這是一隻怒吼的兔子啊！這句話是我住在白堊園時有一次偶然講出來的。培治·阿諾特說：「噢，你無需費心，馬克思已經解答過了。」他轉向奧麗芙說：「把描寫約翰·拉賽爾勳爵的那一段翻譯出來。」於是奧麗芙就忙開了，給了我下面由德文本翻譯過來的譯文：

「他真正的才能就是能把他所接觸到的一切東西都縮小到他自己那樣侏儒般的樣子，把外界的事物以極小的比例描繪出來，並把它們變成他自己所發明的那個庸俗的小宇宙。他那種大化小的本能，只有他那種小化大的本領，可以超過。」

「作為一個講演者說，他從來不放棄一個值得一提的概念，一句深刻的格言，一個有分量的可敬的意見，一個有力的描寫，優美的思想，生動的譬喻，幽默的素描，或是真實的理解。」

「他有一個獨特的習慣：常把他的枯燥、冗長、單調、拍賣商人般的言論和從歷史上找來的賣弄學問的譬喻，一些關於「憲法的光榮」、「國家的共同自由」、「文明」與「進步」等誇張的莫名其妙的語言混在一起。」

「只有在他本人被對手激怒和刺痛，使他拋掉他的高傲自滿的假面具而表現出一切易於激動的軟弱的徵象時，他才流露真情。」

他使我記起我在一家小機器廠中所認識的一個工頭。那家廠裏所僱用的幾個人都是脾氣很好、技術平常的鑄床工人和裝配工人，因此這工頭和他們相處得很好。有一天他介紹了一個新工人，而這個新工人後來變成了非常好的技師。工頭山美就常挑他的錯處並且折磨他，直到把他排擠出去為止。當艾德禮看到辛威爾成爲工人階級運動中最受人談論的人物時，他的感覺大概也像山美一樣。那次「冰凍」就給他一個機會來處理這種日漸增大的威脅。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所給予他的力量。他也知道辛威爾的弱點，那就是：他怕參加一個會把他推到更左的鬥爭，而這他所不願意的。因此，雖然解決運煤火車的問題是運輸大臣的事，然而，他却派了辛威爾而不派班士，企圖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他身上去。辛威爾當時應該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這應該是誰的責任。當他沒有這樣做的時候，他就註定要失敗了。下一步驟就是把他調開可能發生危險的職位，而把他放在既不能危害艾德禮同時對辛威爾自己又沒有好處的職位上。於是，辛威爾就由燃料電力部調到國防部去。由被認爲是工人階級的代言人調爲軍事巨頭的代言人。

啊，曼尼，曼尼（按係對辛威爾的暱稱——譯者），「跌得多麼厲害啊」。對於艾德禮先生或貝文先生都不再是一個威脅了——曼尼，你自己知道你對他們有怎樣的看法。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了。只是一個「助手」，無論頭銜多麼響亮，也只是英國帝國主義戰爭製造者的一個「助手」，而且更可憐的，更可憐得很的，還是美國帝國主義戰爭製造者的一個「助手」。

有一天晚上在下院中，我忍不住提醒他說，一九一八年在「格拉斯哥草地」舉行反戰示威，在談到「工人階級的真正敵人」英國資產階級的時候（他和目前的許多工黨領袖，包括貝文和莫

里遜在內，當時都這樣說），他曾經說過：「我們要狠狠地打擊他們，使他們的牙齒都打哆嗦。」

我一直都記得這句話，我也記得其他好多關於他的事。因為我們曾經很接近了好幾年。在格拉斯哥城中，我是他最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一向對他抱有希望。他是那麼敏銳，那麼聰明，但是總缺少一件東西，就是基於信仰工人階級的那種穩定性。他曾多次碰到困難而改變了立場，但是，最大的考驗到來了，艾德禮打算把他和對他抱有信心的工人們分離開。假如他曾對艾德禮說：「給我原來的工作，不然就不幹」，那麼，艾德禮或許已經敗北了。即使艾德禮遇到這種挑戰敢把他趕走，那麼工人們，尤其是礦工們，也一定會要他回來續任原職的。可是，缺乏信心就造成了他的失敗。

第四章 危機

財政大臣休·達爾頓是一個很直率、熱情、喜歡拍人肩膀的大臣，說話大聲而吵人，他的笑聲則更大更吵人。可是，沒有一個比他更容易接近的大臣了。要想同達爾頓講話是沒有困難的。當你在議會休息室裏遇到他時：

「哈囉，休，我想跟你講幾句話。」

「好的，威利，」他會大聲地說。「你需要什麼？我會考慮怎樣來幫助你的。」

這就是會議員找到他時的一般情形。他是主張低息放款政策的人，因此，像我們主張減低利率的這些人就特別感到他的和藹可親。在戰前、戰時和戰後，我都曾多次提出過這個問題。我一向主張地方當局應該得到不付利息的貸款，以建造房屋。

我在某一次演說中曾提醒過這個事實：即要求付利息的唯一理由是，放貸者借錢給人是一種冒險，而利息就是這種冒險的代價。我不承認放貸者要冒什麼險。他們總是要有担保，保證他們可以收款。我請他們注意報紙上有些廣告說：「有錢出借。數目自五鎊起至五千鎊。無需保證。」我說：如果有人能替我借到不要保證的五千鎊，那麼我願意同他平分。

但是，無論一般貸款要算利息有什麼理由（我並不承認它有任何理由），地方當局為建造房

屋而借款竟然還要付息，那是絕對沒有任何理由的。這種借款是一定會歸還的。不但如此，地方當局所建的房屋越多，它們出租房屋的房租越便宜，那麼，一般居民的健康與生活也就會更好更美。

我不只講過一次，地方當局將可付出任何政府或任何國家所能希望的最高利息——強壯的人民、健康的母親和幸福的兒童。

遠在四十年前，約翰·麥克里恩、約翰·惠特萊、戴維·寇爾克武德和我，即曾在格拉斯哥及蘇格蘭西部對這個極重要的房屋問題一再進行過宣傳。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地方當局從事建造房屋這回事。惠特萊因提出建造八鎊房租的鄉村房屋而特別著名。是的，鄉村房屋每年租金八鎊。我們曾經開過多次大小會議，建造房屋的每個方面都會加以討論，而每一次的要求總是要替那些最需要的人們建造房屋——房租最低廉的房屋。從那時起，這個要求一直是房屋政策中的主要問題；這就是：使那些最需要房屋的人們得到房租低廉的房屋。唉，今天我們離開那要求太遠了。各地方當局因為債務重重，就把房租提高，而不是降低，因而就變成不是那些最需要房屋的人得到房屋，却是那些能够付得起房租的人得到房屋了。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已使休·達爾頓把利息減低到百分之二點五。這是有幫助的，但只是一個開始。我們要求他降低到百分之二，並希望最後能壓低到百分之一點五。如果你認為這樣做太激烈，那你只要問一問你那個地方的當局，這對幫助他們平衡房屋賬目方面，有多麼大的意義。可是，即使財政大臣只作了這一點小讓步，也就引起保守黨黨員們對他大發雷霆了。他們從不放過一個攻擊他和他的「低息放款」政策的機會。然而他仍然闊步前進，並在通過的時候回敬他們若干沉重的打擊。

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在工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充滿樂觀情緒的演說。他在演說中說：「今天我是心頭得意地在這裏講話的。」

他們是怎樣抓住了這句話啊！經濟困難正在急劇地增加（保守黨員們多麼會誇張啊！），貿易入超正在逐漸增加，而財政大臣却「心頭得意」，在到處招搖。到那年年底時，困難更增加了，他們的嘲罵與譏笑也就更經常更大聲。他「心頭得意」。

最初，當他們嘲笑他的時候，他就哈哈大笑地藐視他們。顯然他還是得意的。但是過了幾個月，笑聲就比較不開心了，到了後來就很容易看出，他不得不強為歡笑了。而後，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復活節——時間那麼短，可是變化多麼大。他不是心頭得意，而是傷腦筋地到下院來極嚴肅地宣佈：我們是在經濟危機的針氈上。那是財政大臣悲傷的一天，但保守黨人沒有放過他。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和一九四七年復活節之間，是什麼東西使一個快樂的戰士變成一個悲觀的先知的呢？

一九四六年年底，杜魯門解除了美國的物價管制，物價幾乎立即上漲百分之四十。戰爭結束以來，我們一直由美國運來數量不相稱的貨物，而美國却由我們方面運去很少的貨物。這就意味着我們與美國的關係，發生了嚴重的貿易逆差。然而，即使如此，這種逆差還是有辦法克服的，只要我們買美國貨不必全部用美元付款就行了。買美國貨要全部用美元，這就是使我們受不了而跌倒的原因。我們找不出美元來償付我們對美國的債務。

在這種情況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去鼓勵其他的供應來源。其他供應來源就是蘇聯和東歐的產糧國家。的確，在戰後的頭幾年中，它們所能輸出的剩餘物品可能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們能供給他們十分需要的農業機器及其他的機器，那麼，我們在最短期間，就可以得到我們所很

需要的輸入品——而無需付出美元。這就是我們應該常常記取的重要事實。

然而，我們無法對美國償付我們的美元債務——怎麼辦呢？

慷慨的美國資本家們說：「不要緊，我們可以借錢給你，使你能够償付，足够使你用到一九四九年底。」

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底，美元借款因對美國付款以大得出乎意料的速率而快要用光了，因而節約問題已在認真地考慮中了。

後來就發生了物價上漲，而把我們置於死地。依照新的用款速度，美元借款在一九四七年底即將用光。那時我們就要完蛋了。不但有物價的上漲來騷擾我們不幸的財政大臣，而且還有加拿大，在那時以前，它一直是接受英鎊付款的，但是，現在也被美國所迫，要求美元付款了。我們不但要以美元付給美國，而且還要以美元付給加拿大，以便加拿大可以用美元付給美國。

他們還想騙我們說，那些有大美元的小子們是我們的朋友。絕對不是！自從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已把英國的血吸乾了，只是拿出一點「施捨」，使我們繼續付錢，使我們繼續受奴役。

看吧——在一九四九年，我們會和阿根廷有過一次關於肉類協定的拖得很久久的談判。那時我們是極缺乏、極需要肉類的。艾迪絲·薩末斯基爾博士向下院報告說，阿根廷要求美元付款和過高的價錢，而我們已經拒絕了這些要求。安托尼·艾登就站起來代表他自己和保守黨發言說，他們完全同意政府的拒受「勒索」。

你對這句話是怎樣想法？「勒索」，是罪惡詞彙中最下流的罪惡。但是，當我大聲叫將過去「喂，美國怎麼樣？——美國一直就是這樣幹的」，他却默不作聲了。

我們反對阿根廷，並拒絕被勒索。爲什麼我們不反對美國，並且說出：「不付美元，也不付

過高的價錢？」英國能够這樣做的時候，英國就是自由獨立的了。那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所希望看到的：英國的強盛和獨立自恃。一個屬於工人階級並由他們管理，建築在社會主義經濟穩固的基礎上，所有的人都過着幸福富裕的生活的國家。

說我們侍奉，或者願意把英國交給蘇聯或任何其他國家都是謊話，那是一種最下流的大謊。正是那些賣國賊們，已把英國賣給了美國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造出這種謊話來掩蓋他們自己的賣國行爲。

當我們與阿根廷的談判發生困難時，我們轉向那方面呢？我們轉向了蘇聯，與他們成立協定，讓他們供給我們大批畜類飼料，使我們能養肥畜類，增加我們自己的肉類供應。穀物是照預定日期交貨的，而且還極注意質量。這就是商務大臣所發表的聲明。有誰看不出這種養肥我們的畜類的飼料的供應，無限地加強了我們與阿根廷討價還價的地位，並使我們可能採取了當時所採取的立場呢？如果我們與蘇聯建立貿易與友好關係，我們早就富強得可以站住腳跟，並且結束目前美英之間單方面的貿易現象了。這對於最愚笨的辦公務的人，難道竟不是很清楚的嗎？

無論如何，危機是有原因的——以美元付出過高的價格——而這個危機是美國資本家強加給英國的。這個危機是故意製造的，故意維持的，以便使我們處於「萬能金元」的控制之下。

這就是一九四七年復活節，財政大臣帶着他的預算案來下院時所要面對的情況。他必須提出些什麼呢？減少輸入、減少國內消費、增加輸出。他並未提議去找另外的供應來源。他並未提議把負擔放在大資本家的身上——沒有提及資本稅。不，負擔要放在人民身上。提高間接稅，因而煙草價格猛漲，工人階級的主婦們只能得到最少量的物品。

當煙草價格漲到每英兩三先令六辨士時，我們曾特別呼籲對領取養老金者、殘廢軍人和其他

領取恩給金的人都應免除附加稅。達爾頓同情這個建議，但不知道如何施行。我擬訂了一個極簡單的方案送給他。這個方案是太簡單了，他的專家們竟不屑一顧。這些專家們工作了一個月，企圖找出一種艱難的方法來施行，但在白費精力以後，終於不得不採用我在一個月之前所提出的那個極簡單的方案。只不過，我提議每週以每英兩一先令的價格賣給每人二英兩煙草，他們却改成每週以每英兩二先令的價格賣給每人一英兩煙草。除開這一點以及沒有把它擴大適用於殘廢軍人和久住醫院的病人之外，那個方案就與我原來所提出的方案一樣。一種簡單而容易施行的用來處理這種優待權的方法，却因吝嗇而給搞糟了。

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討論「財政法案」時，我曾發表下面的談話：

「拿那些不拿養老金的老年人的情況來說，他們竟不能享受關於煙草的優待權利，而須付全部的費用。我們盡力向他們保證過的那些殘廢軍人呢，情形也一樣。我們曾經說過，當他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將照顧他們的一切，可是，現在這些殘廢軍人，如果他們想抽煙的話，每英兩黑色捻捲煙却須付出三先令六辨士。我不知道其他牌子煙絲的價錢。

「除殘廢軍人之外，還有那些久住醫院的病人，他們的妻子或母親正在家裏盡量省儉，想使她們的丈夫或兒子能在醫院裏儘可能地住得舒服些。然而，却把這種很重的罰款加在他們的身上，要他們付出這些附加稅……

「在決定任何優待權時，總是只有最少的優待權，而不是胸襟寬大、合乎人情能把那些需要援助的人都包括在內。這一次的優待權單給予領養老金的人，其餘的人都被擠斥在外。我要呼籲委員會中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議員對財政大臣施用壓力，以求取消這種附加稅，如果不能全部取消，無論如何也要財政大臣取消對殘廢軍人、久住醫院的病人和六十五歲以上的不領養老金的老人的附加稅。」（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

年一月一日，第八三九——八四〇號

要辛勤工作、提高生產、漸漸增加輸出。後來這些話不但很快地成爲保守黨領袖們的日常口號，同時也成爲工黨領袖們的日常口號了。

減少國內消費，增加輸出。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大選之前，安諾林·比萬先生寫了一本叫做「爲什麼不信任保守黨？」的小書，由高蘭茲書店出版，並在競選運動中被廣泛地加以利用。比萬先生提出了好多論據來說明不應信任保守黨的理由。一般講來，他的論據是很有力的，尤其是他的最強的一個，也是他最着重的一個論據。那是什麼？他說，假如讓保守黨上台的話，那麼他們將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來全力從事輸出。他在這個問題上引用了邱吉爾、厄斯金·希爾和其他保守黨員的話，並接着說：

「這個問題的邏輯很清楚。我們將來就得接受較低的生活水準，以便向外國賣出較多的貨物。……但是，假如我們爲了增加輸出而降低生活水準，那麼我們就要少向外國買東西，因而也就使它們更難於向我們買東西。」

「假如我們在這裏採取緊縮政策，我們剛好使別的國家也不得不採取緊縮政策，那麼最後的結果將比最初的結果更壞。……富裕產生富裕，貧乏產生貧乏。……簡而言之，如果企圖通過減少消費而增加輸出，那麼將會減縮世界市場，而不是擴展世界市場。這是一種失望、絕望、達到最後災難的主張。」

可是，他關於「最後災難」的話，看起來好像是正確的，雖然掌管政策的人並不是保守黨員，而是他自己和他的工黨同僚們。

在達爾頓演說之後的討論中，我乘機發言，指出經濟危機是不可能用減少人民消費品的數

量來克服的。那是一種製造危機的方法。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從最初的日子開始，我們一直就指出：所有資本主義危機的發生，都是由於資本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由於瘋狂的競爭而增加了物品產量，同時工人階級的購買力却被壓得很低。因此，在生產量與消費量之間就產生了鴻溝，從而產生了生產過剩的危機——「富裕中的貧窮」。我們一向主張應將他們所生產的物品多多地給予人民，一直到人民獲得最後的解放，那時候人剝削人的制度就永遠結束了。

舉個例說，這裏是我由艾德禮在一九三七年所寫的叫作「工黨展望」一書中所引用的一段話：

「在現代資本主義已經獲得發展的全世界各國中，都會發生過那些遭受這種制度的痛苦並反對這種制度的人們的某種形式的反抗。……資本主義在各國所帶來的罪惡，程度雖有所不同，但一旦發現了它的根源，凡是有頭腦的男女都可以看得出治療的辦法是一樣的。那根源就是私人佔有生活資料，治療的辦法就是公有化。」

我們從來沒有夢想到那些所謂社會主義者們竟會出來主張相反的意見：少給人民以物品；多用物品於輸出。

這種情形是由於美元情況而發生的，然而事實仍然是：無論輸出增加到什麼程度，它的可能性總是有限度的，我們永遠不能通過輸出物品來解決美元問題。這是決不可能的。可是，他們仍然繼續實行他們的減少消費品，提高稅額和增加輸出，作為解決危機的辦法。

到秋天，我們又有了一個預算案（秋季預算案），在這個預算案中，財政大臣是有機會表現他的治療方法的功效的。情況改善了麼？由於那年初減少消費，我們是否感覺到比較好一些了呢？不，情況更壞得多了。不但沒有脫離危機，我們却陷得更深了。愁悶，每個人都愁悶，到處

都看不到一張快樂的面孔。

然而，解決的辦法一直是有的，就像解決領恩給金者的煙草問題一樣簡單而清楚。把負擔放在資產階級的身上——把他們的利潤和資本真正予以削減，並發展非美元區的供應來源。這就是解決危機的辦法，也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叫你的專家們來做這件工作吧，好幾十個人，好幾百個人，把所能找到的專家都找來。讓他們對於每一種複雜而無意義的公式，如減少國內消費、增加輸出等，從事反覆的研究和推敲，但他們將永遠無法使美元的收支平衡。

我在下院中竭力想把這一點說個清楚：結束美元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結束美元付款和美元債務。工黨議員們曾經多次對我說過：「威利，你所發表的是一篇偉大的演說，是我聽你講過的最好的演說之一。」但似乎那也就是他們所能了解的最高程度了。顯然，我就像蕭伯納「人與超人」劇中的主人公一樣，話講得够好的，能使他們感到有興趣，但是他們對於我所講的內容如何，似乎却無所謂。就下院而言，我是白費唇舌的。

減少消費並未發生功效。情況變得更惡劣。那麼怎麼辦呢？再減少消費，再提高稅額和更追求增加輸出。我們就這樣蹣跚地往前走，直到一九四八年復活節應該提出另一個預算案的時候。達爾頓再度在下院中只能報告說情況已進一步地惡化了。原來斷定的治療方法正在摧毀任何恢復的希望。但達爾頓在走向下院的途中，曾以他大聲講話的爽快的態度與一個新聞記者談話，向他透露了預算案的內容。那個記者就趕緊找電話，通知他的報館。在一般情形之下，他的報道將在財政大臣發表演說以後的那一版報紙上刊登出來。可是那天較早的一版正好爲了要等賽馬的「最後消息」而未出版。預算案的秘密恰能趕上這一版的「最後消息」，因此當財政大臣站起來發表他的預算案演說時，那一版的報紙已經在街上售賣了。

這對於達爾頓是個大不幸。誰也不會因這個新聞而得到好處。看來對於賭徒們，也已太遲了，無法加以利用。然而，達爾頓的命運已經註定了。前一天，保守黨前座議員中的高級領袖之一奧利維·史丹萊就會經指責過達爾頓的低息放款政策是對於英國財政穩定的一個威脅，並要求撤換他。我們將看到，保守黨經過一時期的雌伏之後，現在又跑出來，覺得很神氣了。在這種情形下，達爾頓是沒有希望了。保守黨一定要他辭職，他也非辭職不行。他對他的錯誤曾向下院表示歉意，而他的道歉也為下院所接受。這事情似乎就此結束。但是第二天，保守黨又進行攻擊，並要求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他的失職行為。艾德禮和莫里遜都贊成組織那個委員會，並且還正式提出議案。

我是反對那個提案的唯一議員。皮拉丁和若干工黨議員都贊成我所講的話。以下就是我的話：

「我認爲讓這個提案不經討論，並且沒有人提出反對這個提案的議案即被通過，是不行的。我認爲處理這件事情的方式，以及對於奧克蘭主教區的可敬議員（達爾頓先生）的錯誤所取的态度，是可恥的。首相前幾天曾經說：沒有什麼可發佈的，也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假如情形是那樣，而我也相信是那樣，那麼這個提案又有什麼必要？每個人都知道這個錯誤的性質。我很相信，這位可敬的議員在和那個記者談話的時候，他心裏一定以爲這件事不會在他發表演說之前傳到街上去的。錯誤就是這樣。他在本院對於他的錯誤發表了坦白而勇敢的聲明，並且已被下院和反對黨的領袖所接受。」

「當我們發現這件事會如此演變時，我們大家都感到大吃一驚，但是，我認爲讓這件事情再發展下去，是十分不恰當的。我堅決認爲這位可敬的議員不應該因爲他所犯的錯誤而被撤去財政大臣的職位。我希望把我堅決反對這個提案的意見寫在記錄上。」（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四六七——一

還有好多人，像考文垂區的克羅斯曼等都會十分賣力地向坐在前座的議會議員們發表意見。達爾頓終於把事情弄糟了。他因為自己所說的話而下台了。第一天他提出預算案，第二天，使保守黨員們高興的，他就下台了。

他的繼任者在外貌、作風和可親的程度上都與他正相反。在保守黨員的高聲歡呼中，冷淡、無情而不易親近的克利浦斯爵士來填補達爾頓辭職後的空缺。假如說達爾頓會「用鞭子鞭撻我們」，那麼克利浦斯則是「用蠍尾鞭來鞭撻我們」的。

如前面所講的，在實行一切的削減政策後，危機更加惡化了。現在克利浦斯却提出最厲害的削減。除國內消費的削減之外，再加上資本支出的削減。削減掉政府在建造房屋、衛生、教育上的用費，但在軍備費用上却不削減。據說克利浦斯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是的，還據說是一個基督徒，一個「和平王子」的信徒，可是現在他却這樣：提議在影響人民健康、教育及其他福利的各方面都削減費用，但却堅決地維持美英帝國主義者所要求的軍備。

提出此種軍費重擔的藉口一向是說恐懼偉大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的攻擊。說這些話的到底是那些人呢？難道他們過去不都是喋喋不休地主張社會主義政綱，常常說所有現代的戰爭都是由於資本家的貪得無厭而產生的嗎？可是，現在他們却為美國的金元煽動家們服務，抵賴自己過去的行爲，燒掉他們自己的書（這是事實），而繼續奉行可能把全世界引入毀滅的可怕的宣傳和政策。

讓我們在這裏討論資本支出的削減和極端荒謬的所謂「俄羅斯的威脅」的說法之前，先看一下其中幾個人物，盡量搞清楚他們究竟是些甚麼貨色。

第五章 有性格的人物（？）

「哦，奸雄與小人該打入地獄而無法超生，那些狗啊，不難叫它去向任何人搖尾乞憐。」

（莎士比亞的「國王李查德二世」）

當邱吉爾繼張伯倫担任首相的時候，他派克利浦斯爵士到莫斯科去任駐蘇大使。克利浦斯會被工黨開除過，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八年至三九年的和平與統一的競選運動中聯合了獨立工黨和共產黨。結果，他得到了是一個極端左的社會主義者的聲譽。這種聲譽是很令人誤解的。我和他在統一競選運動中相處的經驗，使我對於這點深信不疑。但是，無論如何，邱吉爾顯然認為派遣一個有這樣聲譽的人到莫斯科去，乃是一種友好的姿態。然而，要使莫斯科英國大使館中所瀟漫的氣氛有所改變，是必須派遣比克利浦斯更有政治頭腦的人，才能奏效的。

不論在哪裏，我們的外交官都是反蘇分子。莫斯科大使館尤其如此。詹姆士·阿爾德利奇在他的傑作「外交家」一書中，無情地揭露了那個大使館的情形。那裏絲毫無意去了解蘇聯人民或蘇聯領袖，或者和他們建立友誼。相反地，那裏設立了一切障礙，使大使館及大使館的人員不知道他們週圍所發生的事情。別國大使館的人員定期地來拜訪我國大使館，互相交換各種各樣的反蘇論調。住在蘇維埃生活的心臟——莫斯科的我國代表們，對於蘇聯的無知，是很難有人能與他們

相比的。然而，外交部以及政府（通過外交部）却從那個大使館取得關於蘇聯的情報和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應該怎樣的意見的。

克利浦斯的到任，並沒有改變英國大使館不友好的反蘇氣氛，也沒有改變由大使館發出的「情報」的性質。在希特勒進攻蘇聯時，這一點就明白地暴露出來了。

我對阿萊克斯·斯龍說：「希特勒的末日到了。全蘇聯人民將奮起抵抗他，他決不能征服這樣堅決的人民。」

但是，外交部、邱吉爾以及他政府中的閣員們結果竟相信完全不同的東西。所有那些所謂「知道內幕」的人都堅決認為：「三個月後，蘇聯就會無力作戰了。」在克利浦斯回倫敦時，一般的意見並無改變：紅軍正處於毀滅的邊緣，現在，任何一天都可能看到它的毀滅。克利浦斯向邱吉爾和政府作了一次報告。報告的內容從來沒有公佈；但是在議會走廊裏，到處竊竊私議着：報告決不是有利的。就是不管這些竊竊私語，依里奧特·羅斯福也曾報道說：邱吉爾正在和他（伊里奧特）的父親爭論供應蘇聯的問題。邱吉爾爭辯說：最好把供應品交給英國。當俄國崩潰時，供應品就要落入希特勒的手裏的。

「當俄國崩潰時」，這句話表明他確信什麼事情行將發生。連一句「假如俄國崩潰了」也沒有。他得到了情報，因此他對這個問題十分肯定。後來，照他的話說：當紅軍給納粹軍隊以「致命的打擊」時，他在下院是以這樣的話來形容的：「紅軍的意外的，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勝利。」

這十分清楚地說明：他和那些專家，曾經絕望地迷入了歧途。對於這點，在莫斯科的大使館——儘管當大使的是克利浦斯——是必須負責的。但是，當戰爭主要是由於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而勝利結束時，同一個克利浦斯爵士却在—本號稱為斯大林傳的書上，寫了一篇序

言，以下是我從那篇序言中摘引來的：

「本書是敘述一個空前最偉大的人的，因為他給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我們只有認識蘇聯革命的目的和這個人的政策（自列寧逝世後，他即負責領導這個革命），我們才能執行我們自己對蘇聯友好合作的政策。我們自己的前途及全世界的前途大多有賴於這種政策的成功。」

克利浦斯是否真是這樣想的呢？他這樣寫是真誠的嗎？我認爲不是這樣。我認爲他只是「附和」當時所流行的話，僅僅是重複他的主人邱吉爾在幾個月以前所說過的話而已。請比較一下看。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邱吉爾在議會裏說：

「講到目前在全世界進行的各種戰役時，我還沒有講到顯然是最重要的事實，這就是：在給予德軍以致命的打擊上，蘇軍是達成了最主要的工作的。……」

「我向偉大的戰士斯大林大元帥致敬，我深信，在維護歐洲的和平、良好的秩序及進步方面，我們和蘇聯簽訂的二十年條約，將會證明是最持久和最經得起考驗的因素之一。」（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第一四七四欄）

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的。當我們權衡此後所發生的事情時，對這種人能夠說些什麼呢？

對於長期以所謂極端「左派」社會主義者的面貌招搖撞騙的克利浦斯，應該怎麼說呢？「哪裏有高山能遮住我的罪惡，哪裏有急流能洗去我的羞慚？」你也許會認爲我不喜歡克利浦斯。如果你這樣猜想，那你就猜對了。我不喜歡他。我十分清楚地記得他在工黨黨外以及在他被邱吉爾掌握之前的情形。

現在，當他和美國億萬富豪的反共運動勾結在一起時，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經想到過去的日子。假如他現在能過着這種奢華的生活的話，那麼，他應該受到良心的譴責。

現在來談談非凡的斯特拉撒吧。當我寫到這裏時，「標準晚報」正在藉已經成爲帝國主義者戰爭準備的重要部分的「間諜恐怖」製造聳人聽聞的捉人的事。「標準晚報」攻擊的目的是在誣衊共產黨人。斯特拉撒在這方面是很起勁的。他現在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敵人。他準備爲反對共產主義說出或作出任何事情。還有比這更卑鄙的事情嗎？我敢打賭，假如「標準晚報」責難他，要他把過去所寫的書收集起來，在「特拉法加廣場」付之一炬，他一定會同意這樣做的。

他曾經爲「工人日報」寫過一系列冒牌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一度裝作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權威。但是，我總不能相信他。據我的看法，他太不堅定，太不可靠了。

後來的事件，鮮明地表明了他的不堅定和軟弱。他的不堅定和軟弱，使他能從一個立場跳到另一個立場。對於在我黨周圍活動的這種「人物」，我們已有過很多的經驗和麻煩了。

東倫達的議員曼瓦林就是一個例子。他曾當過倫敦「勞工學院」的導師。我有一次被請去向學生講課。曼瓦林和我的老友格拉斯哥人孫迪·羅伯遜在那裏當主任導師。我講的是「論革命政治」。當我講完時，學生們提出了一些問題，但是他們始終望着那個馬克思主義者（？）曼瓦林，看他會說什麼。他很猶豫了一番以後發言了。他開始時這樣說：「加拉赫同志知道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他會同意我的意見；一個共產主義者在共產黨之外，比在黨內，能做更好的工作。」他這樣地胡說了很久，然後又說出了可以算是結論的話：「當共產黨值得參加的時候，我將是第一個參加的人。」這就對了。他就是這麼地說出了真相。

我望着學生，問他們：「你們是否曾在什麼地方聽見過這樣一類的話？他說我知道他是一個

共產主義者。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不知道，他在這裏所說的話，沒有一句能使我相信他。想想看，你們曾經聽過任何這樣狂妄無禮的話嗎？假如哈里·波立特和我們其他的人艱苦奮鬥，終於建立了一個黨，強大得足以吸引曼瓦林先生，他就願意慷慨地屈就來參加我們的黨。那末，讓我告訴曼瓦林先生：假如我們的黨強大得足以吸引他，我希望它也強大得足以把他排斥在黨外。」

這就是我當時所說的話。學生們的喝采和大笑，證明了究竟是我的話還是曼瓦林的話得人心。

講到礦工的代表時，使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礦工工會主席，受封的勞瑟，不折不扣的「威廉爵士」。嘿，看看他所吹的牛吧。決沒有什麼力量能使他反對蘇聯，決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反對共產黨。下面是他在被封爵以前，在一次工黨大會上不得不那樣講的話：

「我們坦白地說：在我們要求增加工資的運動中，共產黨幫助我們的——不是他們的——宣傳品的散發工作，他們到我們決不能去散發宣傳品的地方去。……」

「因此，我們堅信並決定：不管怎麼樣考慮，我們決不應在我們的規章中加入什麼決議，規定把那些思想和大多數人的思想稍有不同或稍微敏銳一些的人，排斥於工黨之外。」

對於這樣一些人，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們大家，隨着年歲的增加，回顧過去，對於我們的錯誤和失敗都不勝悲嘆。誰都不免有錯誤和失敗。但是，只要我們知道一點，也就是一種安慰了。這就是：我們一直在獻身於一個偉大的事業，我們始終忠實於那些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人，這些人像我們一樣，心裏也只有這種事業。但是，當我想到這幫人中的某些人時，我能說的一切只是：我不願再記起他們了。

第六章 人民肩負重担

早在美國製造的危機襲擊英國以前，工黨政府就已經在走着保守黨的道路了。在工黨議員的隊伍中，對貝文的外交政策是很有反感的。批評者很多，擁護者却寥寥無幾——在保守黨的座位上，情形剛好相反。在這些工黨議員當中，有許多人想用這種奇怪的矛盾來自慰自解：雖然政府在外交方面奉行的是保守黨的政策，它却在內政方面奉行着社會主義的政策。

我常常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談話，竭力想使他們清醒一點。可是，他們自欺的本領實在是無懈可擊，這種自欺的本領是在工人中散播幻想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凡是他們不願看見的，他們就不看。然而他們都應該清楚外交政策一定要和內政政策相協調，或是內政政策一定要和外交政策的方針相吻合。內政政策與外交政策背道而馳的情況是絕不可能存在的。

那些「靠左分子」以為他們可以用主張中間路線的外交政策來混過這種情況。一邊是共產主義的俄國，另一邊是掠奪成性的美帝國主義。而在這些非常聰明的紳士們看來，根據他們的意見，中間路線就是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

「社會主義是介乎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路線！」你們可曾聽見過這一類的話麼？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與空想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締造者。他們是社會主義者。誰敢否認呢？他們又是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就曾經說過：「社會主義是工人們唯一的希望，其他一切都是幻想。」在「共產黨宣言」最後幾段中，我們還讀到這樣的話：

「共產黨人認爲隱秘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件可鄙的事情。」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工黨曾出版過「共產黨宣言」的「一百週年紀念版」，我們從裏面可以看到以下的話：

「在奉獻有拉斯基教授有價值的、有歷史意義的緒言的「共產黨宣言」一百週年紀念冊之際，工黨向馬克思和恩格斯致謝，認爲他們兩個人曾經鼓舞了整個工人運動。」

恩格斯在他給一八九〇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中，說明他們所以不叫它社會黨宣言的理由。不是因爲它的內容不是社會主義的，而完全是因爲其他的原因。讓恩格斯自己說罷。

他說：在一八四七年，有兩種人被認爲是社會主義者：

「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種空想學說的分子……另一方面便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庸醫，他們想用各種萬應藥方和各種補綴辦法來消弭社會災難而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

就是爲了要使「宣言」和這一類空談區別開來，所以必須賦予它一種明晰的工人階級的特性，那樣便不會有任何混淆是非的解釋的餘地了。正是因爲這樣，它才以「共產黨宣言」爲名出而問世。因爲，正如恩格斯所補充說明的：「要求根本改造社會的那一部分工人，……自稱爲共產主義者。」

但是，我們總該了解：「共產黨宣言」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同時也是共產主義的。除非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我們永遠不能希望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是替代資本主義經

濟的經濟形態。它一反私有制和私有利潤而實現土地和生產手段以及分配和交換機構的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新的社會關係將予以建立。沒有地主階級，也沒有資產階級。沒有上等人，也沒有下等人。所有一切男女彼此在經濟上地位平等。「再沒有人對別人的弟兄的失敗或不幸，幸災樂禍，去搶奪他的職業。」

如果把這些話應用到英國議會那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啊！

只要一個大臣或者一個次官看來似乎要丟掉官職的時候，議會議員們是怎樣貪婪地在虎視眈眈呵。只要那個給官職的人做一下手勢，他們又怎樣趕快地奔赴那個空缺呵。沒有什麼友誼、忠誠可以攔住他們的進路。我不相信記錄上有那樣的事，居然會有人肯以那種大丈夫的氣概說：「不，我不要那個官職，因為某人是我的朋友，我想他正在受到卑鄙的打擊。」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勞合·喬治十分專橫而且十分無理地把工會運動者喬治·尼·巴爾尼斯就馬上取而代之，閣中摔去——分明是以他為犧牲——的時候，工會運動者喬治·尼·巴爾尼斯就馬上取而代之，連一絲猶豫都沒有。這算什麼勾當啊！試把一個次官的位置給任何一個「靠左分子」，看看會有什麼後果吧。其實用不着別人給他們官職。只要運輸大廈（按即工黨總部——譯者）吹來一陣冷風，那些「靠左分子」就都飛跑到右邊去了。

現在，再也沒有人談什麼中間路線，什麼社會主義了，現在談的是「福利國家」。還是再引用恩格斯的話吧：

「社會庸醫，他們想用各種萬應藥方和各種補綴辦法來消弭社會災難而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工黨政府目前的樣子。危機如果來到，就是個考驗。誰來肩負重擔？是

資本和利潤，還是人民呢？達爾頓之削減資本支出只是個開始，他的後繼者對資本支出的削減就一不做二不休了。不管人民要付出什麼代價，利潤却非保護不可。

我、菲爾、普里特和幾個工黨黨員對這些削減提出猛烈的反對，但是，在這些事情上常常是保守黨和工黨一聯合，提案就通過了。

立刻就來個對房屋建築計劃的大大削減。大選時曾保證要把這個重要問題當作「軍事行動」來處理，現在，這個信誓旦旦的諾言，已被忘得一乾二淨了。比萬在大選後頭幾個月曾經宣佈：在本屆議會結束以前，房屋建築的主要問題一定要解決，這個宣言也已被忘得一乾二淨了。在蘇格蘭，地方當局已計劃好一九四八年要建築六萬所房屋。這個計劃後來削減到二萬四千所。

五月初，布克海芬——麥塞爾的地方當局邀我到那裏去，和他們商談房屋建築問題。他們原已設計好了一百六十所房子，而且已有了地基，但是，後來却被削減為六十五所。他們早已建築好很多的房屋了。五月間我在那兒時，已有五十所房子蓋好了房頂。這麼一來本年只剩下十五所房屋還待建築了。他們本來有一批很好的建築工人，這樣一來，這批建築工人就有散夥的危險。當地的市政委員全是工黨黨員，只有一個是共產黨員。他們對這件事情感到非常憤怒，決定派代表團去愛丁堡聖安德烈大廈蘇格蘭公署，說明情況，請求多撥給一些錢。

我是跟代表團一起去的，蘇格蘭大臣的次官羅伯遜先生接見了代表團。代表們猛烈攻擊對房屋建築計劃的削減，隨後，這位次官發表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又長又含混，毫不着邊際，只是不斷重複這句話：「我們沒有木材。」當人家提醒他：利斯碼頭有許多作短工的碼頭工人，只是沒有一艘船把木料從波羅的海運來時，他含糊地說些甚麼政府的政策不是他所能管得了的話，似乎他從來不覺得，他應該努力去改變政府的政策，以便保證木材够用。整個下午白白浪費了。我們

都這樣想。

在蘇格蘭，使我們感慨系之的另一個和房屋建築有關的問題，是由蘇格蘭特種房屋建築協會的活動所引起的。這個機關是鮑爾溫政府建立來作為地方當局的輔助機關的。其原意是要使它在那些地方當局建築房屋真有困難的地區興建房屋。現在，這種機關已隨處都是，因而街的這一邊可能是地方當局所造的房屋，那一邊却是特種房屋建築協會所造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很快就發生了麻煩。特種房屋收的租金要比市政委員會造的房子高得多。這就打亂了地方當局的租金積點制。輪到他們該得到房子的租戶，不肯搬到那些租金高昂的房子裏去，這麼一來，這些房子就得租給那些能够繳得起房租的人，而這些人往往是還沒有輪上應該得到房子的。

許多地區都因此怨聲載道。克萊德班克市政委員會召集各有關地方當局舉行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也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去蘇格蘭公署。因為在參加會議的人當中，只有戴維·寇爾克武德和我是蘇格蘭選出來的議會議員，我們就被指定要和代表團一道前往。這樣一來，我們又要和羅伯遜先生打交道了，他是主管房屋建築事務的次官。

戴維·寇爾克武德陳述了地方當局的處境，有幾個代表還作了補充。羅伯遜先生作答時又拐彎抹角地談了約摸半個鐘頭，最後談到跑狗場和當地的酒店。是的，他告訴我們：他不懂人們為什麼繳不起規定的租金。他說：「我住的那個地方有一個跑狗場，他們似乎有錢買跑狗票，也有錢租公共房屋。」

我從桌子的這一頭打斷了他的話。我說：「唉，你是怎麼一回事？你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可是，你給我們的貨色竟和四十年前保守黨常常拿來給我們的一模一樣。」

他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話，然後結束了這個會談，完全沒有使在場的任何人感到些微的

滿足。

蘇格蘭的房屋建築問題是特別嚴重的。不論衛生事業在其他方面有什麼可以說的，事實是：患結核病以及因這種可怕的疾病而致死的事例却越來越多了。一九一二年國民保險還剛剛推行的時候，我被派參加我的故鄉培斯利市的療養院委員會。從此以後，我就定期訪問國內各地的療養院。我和好幾百個病人談過話，百分之九十九的患者都是從城市或鄉村的貧民窟裏來的，這些地方的居住條件和排除污水的情形從幼年起就侵蝕了他們的健康。

結核病的根源是惡劣的住所和隨着惡劣的住所而俱來的惡濁空氣。蘇格蘭每年有二萬四千人無法解決可怕的居住問題，因此，他們也就無法抵抗正在腐蝕着我國人民肌體的這種摧人的疾病。清除貧民窟——建築房屋——結核病是能够戰勝的。

削減資本支出已經使我國許多人註定要慢慢死去。「虔誠的」克利浦斯爵士應該想一想這一點。接着再看看教育問題吧。一九四四年，我們通過了教育法。我們決定贊成把義務教育的離校年齡提高到十六歲，可是，我們並沒有規定從什麼時候開始實行。不過，我們還是規定了把離校年齡提高到十五歲的實行日期。當然，我們預期政府會作一切必要的部署來適應將要形成的新的情況的：新的學校啦、充足的教學設備啦和必要的教員等。

規定的日子到了，於是離校年齡自動提高。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許多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兒童和那些從十三歲到十四歲的孩子們在同一級受同樣的教育，白白浪費了一年的光陰。同時，因為不能把他們推出去，他們就堵住了後來的兒童們的進路。要騰出空位來收五歲的兒童入學，竟變得越發困難了。

蘇格蘭的學校發生了一種危機。我們找不到高等教育的教師——學科學和數學的畢業生都不

去教書，而跑到工業界去了，他們在那兒獲得很高的薪金。我們曾經在蘇格蘭最高委員會和蘇格蘭教育大臣伍德柏恩先生討論過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討論中，一個保守黨員提出了一種愚昧的看法，他說：教師們受到社會的尊敬，他希望他們不要因為對增加薪金提出過分的要求而喪失了這種尊敬。對於這種說法，我回答說：跑到工業界去的青年們並不在乎尊敬——他們要優厚的薪金。我繼續說，爲孩子們着想，我們一定要有最優秀的教師。可是，我們只有給他們最優厚的薪金，才有希望聘請到他們。

伍德柏恩先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常常周遊蘇格蘭各地宣講馬克思主義。可是他卻提出了一種驚人的意見說：我們只能希望工業方面遲早會有人滿之患，這樣，他們(那些畢業生)就得進學校去工作了。換句話說，我們只能希望：那些報酬優厚的職位遲早會全部滿額，這樣，他們就只能被迫担任報酬菲薄的工作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永遠無法談我們的教育問題的。可是，人們不正視這一點，却要求學校實行新的節約。對資本支出的削減妨礙了房屋的建築，也阻滯了教育的發展。

至於衛生事業，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比萬先生有一次曾說：「衛生事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方面的經費絕不容有所削減。」在公共講台上有點愛誇誇其談的比萬先生，總是輕易忘掉衛生經費已經有過大量的削減，他曾經屢次相當輕率地宣佈英國的衛生事業是世界第一的。而工黨黨員們也拾比萬之唾餘，大吹大擂。我但願這種說法是真的。可是，我們且請比萬先生來對他自己的宣言作首席見證人罷。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當衛生法案開始在議會提出時，他曾說：要使衛生事業卓著成效，有三個因素。第一是醫院——我們早就有了。第二是醫生——他們也早就在行醫了。他接着說下

去——這可是他說的話，不是我說的：

「關係着衛生事業的第三個工具，就是衛生站，我們對之實在非常重視。……全科醫生在他自己的診所裏不能備有進行正確的診斷所必需的器械；而這些器械卻可以在衛生站得到。……衛生站有各種各樣的，有大衛生站，它能作牙科診療，照顧婦嬰福利，充當全科醫藥顧問；也有小衛生站，就是醫生可以在那兒看病的診所……」

「小衛生站是必要的，因為有些衛生站可能和人民的住宅距離相當遠。這就需要有些設備比較簡單的衛生站，和他們的住宅離得近一點，並且和大衛生站相連結成一個星座。」（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第五七——五八欄）

連結成一個星座。這位大臣大概曾經在一個星光燦爛的晚上出外遊逛過。他大概曾經凝視天空而受到了獵戶星和大熊星的催眠，也許還曾經沿銀河漫遊了一番；因此，當他回到地球上時，在他腦海裏閃爍着的那幅壯麗的圖畫，激發了他的靈感。可是，這仍然不過是一幅圖畫罷了。英國什麼地方都沒有一個星座，甚至連一個孤零零的衛生站都沒有。請看他怎樣結束他的演說罷：

「我可以這樣想：英國能夠開始施行規模如此浩大的計劃，這該使下院所有議員都能引以自豪。這個計劃一旦實行，就會使這個國家在醫藥事業方面置身於全世界一切國家的最前列……」（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第六三欄）

「這個計劃一旦實行」。其實這個計劃從來都沒有實行過，可是，衛生大臣還在談下去，就像這個計劃已經實行了一樣；而同時，全科醫生們却仍然得不到「進行正確的診斷所必需的器

械」。

有一天，我在下院問這位大臣：他是不是要學一學他偉大的同胞、故首相勞合·喬治的榜樣。勞合·喬治在制定他的失業保險計劃時曾經訪問了一下德國，現在，他要不要也訪問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去看看衛生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但是，我並沒有因為這個建議而得到什麼感謝。恰恰相反，我得到了狠狠的一眼。

在捷克斯洛伐克，他們不但有衛生站，而且有休養地。我不是指那些療養所，而是指休養地。我的妻子和我曾經有機會去訪問過卡羅維·發利（喀爾斯巴德）和馬利安斯克·拉茲尼（馬利恩巴德），這是專為帝王而設的，歐洲最好的兩處休養地，現在，破題兒第一遭，普通工人都到這些有名的礦泉「洗澡」去了。馬利安斯克·拉茲尼甚至比卡羅維·發利更中人意。當你驅車到達礦泉時，就看見街道的一邊全是豪華的旅館，另一邊就是樹木茂盛的花園。山頂上有一個十字路，那裏有更加豪華的旅館。周圍山上還有更多的旅館，其中有許多以英文命名，諸如「黃金旅館」、「亞斯托里亞旅館」、「泰坦旅館」等，還有一處實在堂皇的地方叫作「英王」。現在，這些旅館大抵都由工會代替國家衛生部門經管。

在全國各地，不論是在摩拉維亞還是在斯洛伐克，都有同樣的休養地為工人服務。我的妻子和我住在馬利安斯克·拉茲尼的太平洋旅館，一個舊時的管理人員和我們談起過去英王愛德華七世如何經常光臨此地，他也和我們談起那些除皇族以外誰也不能參加的宴會。

我告訴他：現在是工人們在設宴了。但是，我看出來他喜愛那些皇親國戚。他已經習慣了在浮華與禮法面前鞠躬，他不能愛好現在流行的那種自由和輕鬆的樣子。

有一天，我正站在旅館外面，一對青年夫婦到我跟前來。男的是個高大、漂亮的青年，是青

年工人中一個很好的典型。女的有一點羞怯，似乎有點拘謹。也許他們是新婚夫婦。我不知道。他對我講捷克話。我搖搖頭，並且說：「英語」，於是他就以足能使人聽得懂意思的英語和我講話。他想知道怎樣到喝泉水的地方去。我在這裏補說一下：這些「泉水」是從地裏噴出來的，它流到特製的壺裏，當人們在那幽美的散步場所漫步的時候，就悠然喝着這些泉水。我替那個青年帶路。他抱歉地說：「我是頭一次到這兒來的。」我回答說：「我也是頭一次。」

「是的，」他說，「可是我是捷克人。」

「頭一次」，很多工人都可以這樣說。因為在現在以前，這樣的地方一直都是少數特權者的禁地。現在，據那位大臣說，要使衛生事業辦理得卓著成效，衛生站是必須的。但是，資本支出的削減已把它們取消了。重担一定要由人民去肩負。

第七章 馬歇爾援助（？）

經濟削減或者削減資本支出是無補於事的。這並不能使英國擺脫它的困難。增加出口也是無補於事的。危機不是一個生產危機，也不是一個出口危機。上面已經說過，這是一個美元危機——美元赤字，全世界所有的輸出都不能解決這個危機，除非這種輸出能帶來如許美元，足以填滿美國壟斷資本家的無底的慾壑。所以，我們要就是另找進口貨供應的來源，要就是每況愈下。

當馬歇爾將軍插足進來時，事情就是這個樣子。馬歇爾將軍是將軍們和銀行家們的美國政府的一員。事實上，他是國務卿（等於我們的外交大臣）。但是，讓一個武人作為外交大臣而四出招搖，看起來總不大好。如果所有那一套關於「民主制度」的牛皮都由一個帶兵的頭子的嘴裏曬出來，總未免聽不下去。所以「將軍」兩個字取消了，並且為了順利地執行美帝國主義的政策，他變成了普通的馬歇爾先生。

但是，取消了這個頭銜，他是不是就不再是一個武人，不再是一個組成政府的銀行家和將軍們的朋友和夥伴了呢？當然不是。他由於清楚地理解到資本主義在英國和西歐所面臨的危險，因此發表了一篇演說提議美國應該拿出一筆可觀的美元使這些國家（這些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站住脚跟。這個聲明發表之後引起了多大的反響啊！貝文對於馬歇爾和他的建議簡直感動得要哭了。每一個西歐的資本家和資本家的走狗都參加了這個合唱。馬歇爾援助——美元——變成了文明的、最靈驗的救星。

從來沒有一件這樣奸詐欺人的勾當竟會這樣廣泛、這樣持久地受人歌頌的。它用一套處心積慮的政策制止我們的貿易向另外的方向發展，而向那些方向進行貿易，美元就完全不必要了。爲了要證明這樣一種貿易並不存在，戰爭恐怖的宣傳已進行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靠着這種宣傳的力量，許多貨物還被禁止輸出到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去。我們落入了一個金元的牢籠，美國人決心要把我們一直關在裏面。

我們在這裏面，跑來跑去却總碰到欄柵。但是看啊！那個角上有一個出口，讓我們跑出去吧。什麼！跑出去嗎？你不知道你要是從那個出口跑出去，共產黨不是正等着抓你嗎？啊呀，天！那真是太糟了。那麼只有呆在這裏不動了。這才聰明呀，你就呆在這個籠子裏，餓了的時候，自會給你一口飯吃的。但是千萬不要把你的鼻子伸到外頭去，不然共產黨準會把它擰掉的。

我們繼續呆在籠子裏。克利浦斯跑來跑去，嘗試着一個又一個的計策，總把工人作爲犧牲品。經費一減再減。利潤增加了，物價上漲了，但是工資却江河日下。所有這些都表明背棄了勞工運動之所以產生而要達到的一切目標。工黨、工會運動或是合作運動的任何一個先驅者會想到有這樣的可能嗎，想到這些運動的領袖竟會不領導工人前進和向上，却反而拖住他們，壓住他們嗎？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這却就是我們在下院所必須面對而且必須竭盡所能來與之鬥爭的事實。

在所有這一切的後面，並且要對這一切負責的，是從美國來的壓力。但是爲什麼政府不抵抗這個壓力呢？這是因爲它的領袖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他們已經與保守黨結成了聯盟來維持英國的帝國主義。他們需要美國的援助就是爲了這個目的。這樣美國就抓住了一個可以左右我國經濟命脈的把柄，而且能够把華爾街的意志強加在我們身上。

在美國，有一種秘密的結社，新入社的人必須讓人把一根繩子套在他頸子上牽着走。據入社指南的小冊子說，這是一種活結，所以，要是他表現得不够馴順的話，那麼，只要輕輕拉一下，這個活結就可以使他理智起來。這是種很妙的說法。英國現在正像是那個新入社的人一樣，頸子上套了一根打了活結的繩子，美國國會的一篇演說，或是霍夫曼的一篇訓誡，就不時在輕輕地拉着這根繩子。

這個曾經一度十分自豪的國家到底已經淪落到什麼樣的悲慘境地了呢？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在談到這個題目時，我曾經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名句：

「英格蘭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
匍匐在一個征服者的傲慢的腳下。」

也許不會，我接着說；但是，在當前這個時刻，它却又恰恰很像這麼一回事。當我想到正在進行的這些事情時，我不禁想套勃雷克的詩句：

把你的金元給我吧，快些把它們給我，

把你的炸彈給我吧，那些殺人害命的東西，

把你的士兵給我吧，這樣，最後呵，

我可以從叛徒的心底高喊：

我不想領導那工人們的鬥爭，

也不想高舉他們所擁護的大旗！

不過我想把英格蘭綠色可愛的田地，

變成美國佬的一個基地。

我要把這些詩句奉獻給那些號稱「社會主義者」的人們，他們與謀背叛和出賣他們的祖國給那些貪得無厭、愛財若命的美國資本案。同時，既然已經這麼做了，我不妨也套幾句吉伯齡的詩，描寫一下馬歇爾計劃：

如果你能夠工作到腰斷背折，

而你忠實的手還捏着那份凍結的工錢，

如果你能夠咒罵那些叛逆的邪說，

不論是來自普拉茨——米爾斯還是共產黨，

如果你能夠使生產多而又多，

而不要什麼使自己生活愉快的事物，

如果你能夠替英國貨找到一個顧客，

可又不讓你焦躁的老婆光顧，

如果你能夠少用一些從別的國家來的東西，

他們發生什麼事情只當與你無干，

如果你能够賣給他們更多你造的東西，
而一任你自己的老櫃子空空蕩蕩，

如果你能够使世界市場的價格堅挺而平穩，

這事可實在有點兒難辦；

如果你總是準備要參加原子戰爭，

一點也不想自己會不會完蛋；

如果你能够把這個國家送給美國佬，

事事都表現得低聲下氣；

如果你能够信得過馬歇爾耍的那一套，

那你就再也不能保持自立。

一句話，如果你竟然相信老克利浦斯，

相信你要得到自由可以靠他的那種辦法，

那你就最好還是到泰晤士河裏去洗個澡，我的孩子，

因為你只是他媽的一個大傻瓜！

不，依靠美國的資本家是永遠不能贏得自由的，這一條道路只有引向屈服和災難。

這是一種多麼可悲的景象，聽到像比萬這樣一個從被剝削的南威爾士礦區山谷中出身的人，

居然在工黨的會議上說：如果不是「馬歇爾援助」（這是來自工人的敵人，美國的保守黨——用他自己不大文雅的話來說是來自「害蟲」——的援助）的話，英國將要有一百五十萬人失業。而從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莫里遜那裏，我們除了聽說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就可能有大规模失業之外，還聽說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我們的配給就可能要大大削減。據赫伯特（按係莫里遜之名——譯者）說，是「我們慷慨的美國朋友」把我們救出了這種可能。這些只不過是一堆謊話而已。如果我們和蘇聯以及各新民主國家建立起了貿易與友誼的關係，我們會有足够的工作維持我們的工廠開工幾輩子。

但是？他們說：啊！我們需要從美國取得某些貨物。好，我們可以買它們，只要按照我們的條件。因為，請明瞭，如果說我們迫切地需要買進這些貨物的話，美國也一樣迫切地需要賣出這些貨物。而且，如果由於和蘇聯建立友誼的結果而使戰爭危機消除了的話，那麼，美國就將不得不在任何條件下出賣它的貨物，不然的話，它就要面臨一個經濟的總崩潰。在目前，美國僅僅是靠了大規模的擴軍生產，才得以使一個全面的經濟危機免於爆發，而我們現在正在幫它支出這筆軍事生產的費用。

美國資本家最害怕的一件東西就是和平。如果擴軍生產有所削減，他們就要真的拚命尋找市場了。那樣就不會再有美元短缺和物價過高的問題了。我們可以用英鎊來買貨，而我們對別的家輸出也會使我們有能力這樣做。在這個國家中，爲了英國的經濟獨立而努力地、真誠地進行鬥爭的唯一政黨，就是共產黨。

是的，讓我們的敵人，工人階級的敵人，咆哮和叫聲，說謊和誣蔑吧，事實明擺在這裏。要就是對美國臣服，要就是同蘇聯友好而完全保持經濟和政治上的獨立。

有一天晚上，屬於在政治上斜視的，看不到自己往哪裏走也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那種人中間的一個小伙子對我說：「我們不要俄國的政治委員到這裏來！」我反駁他說：「現在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有俄國政治委員到這裏來的問題。就是他們真的要來，美國委員在這裏也不會讓他們來的。」

噢，和蘇聯建立友誼和進行貿易嗎！貿易大臣說，我們是準備與蘇聯和東歐的國家進行貿易的。我們正在盡一切可能增加我們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其他的大臣們，包括首相在內，有時也用這種同樣廉價的謊話來欺騙人。然而，當我們奉美國主子的命令拒絕供給這些國家以正是它們所需要——而又是我們所能够供給它們的貨物時，怎麼可能建立得起貿易關係來呢，除非只是最有限的一點點貿易。

談到這一個問題，我曾向貿易大臣挑戰過一次。那時候正在與波蘭談判簽訂一個有限的貿易協定。我曾提醒這位大臣和出席談判的人員說，他們習慣於把波蘭稱做蘇聯的衛星國。好吧，現在貿易大臣正在和波蘭政府的代表進行談判。任何他所提出來想要買的貨物——無論是農業品、手工業品或工業品——波蘭政府都可以自由地賣給它們，而不受任何性質的外來干涉。我問：貿易大臣能够否認這一點嗎？貿易大臣不能否認。我於是接着說，但是，這樣的情形反過來是不是也能同樣適用呢？英國能不能自由地賣出一切波蘭政府可能要求購買的貨物呢？回答是不能。波蘭政府能够自由地出賣它自己國境以內的一切產品，而英國政府不能。我問道：到底誰是衛星國呢？

下面是英國所不能賣給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的貨物的一小部分——這是從一個很長的單子中挑出來的一小部分：

工作母機；立式車鏢床；鉗床；大於三噸半的各種類型的鍛錘；容量大於一千噸的鍛機；切齒、磨齒和刮齒機床；凸輪軸，曲柄軸和移合凸輪軸，曲柄銷與曲柄軸的研磨機，無心外圓磨床，內圓磨床；車凸輪軸的車床；車曲柄軸的車床；中心高在十吋以上的鏤面與鏤孔車床；能車直徑在三吋以上的桿料和用卡盤車直徑在二十四吋以上的六角車床；工作壓力在一百噸以上的液壓及機械壓機；海船和飛機用螺旋槳成型機。

這些都是這些國家爲了進行他們的重新建設而迫切需要的工業設備。此外還有拖拉機、客貨運輸車輛和其他各種車輛，對於實行粗耕法的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也被禁止輸出了。

如果不是因爲在報紙、電影和廣播中都在以無恥的宣傳的洪流蒙蔽着我們的思想的話，這個事實定然會使每一個英國人大吃一驚。很明顯地，我們已經到了一種甘於抱住我們的鎖鏈不放的地步了。下面是盧茨企業聯營公司的威廉·盧茨爵士爲私營企業所說的幾句話，從這裏可以看到我們已經走到什麼地步了。請看吧：

「我所說的我還知道一點。我曾經以一個英國工業特使的身份，代表克文特萊地方的自由企業，差不多到過全世界每一個有有輪子的車子駛行的國家和地區——只是蘇聯的領土除外，因爲政府禁止我們不得在那裏出賣貨物。」

「不得在那裏出賣貨物！」爲了拯救腐朽的資本主義免於歷史已替它準備好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已被拖到了多麼下賤的境地了呵。我們的國家出賣貨物就爲了好使那些寄生蟲可以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得更長久一些。

但是，儘管他們怎麼辦，他們決不能夠阻擋住工人階級的前進。混亂、恐怖、挫敗——是的，他們暫時可以散佈這一切，因而好像是阻擋住了前進的步伐一樣。但只是好像如此。實際上，工

人階級的一切力量正在繼續不斷地聚集起來，而他們要求算賬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今天，一世紀多以前所寫的、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詩句已經震響了：

像睡醒的獅子一樣站起來！

你們人數衆多、不可征服。

擺脫你們身上的鎖鏈，

像搖落沉睡時落在你們身上的露珠！

你們是多數；他們是少數。

第八章 給南尼的電報

在一九四五年年初，艾登先生發表了——對我來說——驚人的聲明，說有二十個共產黨人（不算菲爾和我本人）坐在工黨的議席上。他們被稱為隱匿的共產黨人。「隱匿」者即暗藏的意義。

如果艾登是對的，那麼，他們真是個中老手了。他們藏得那麼深，以至於我從來沒有能發現他們。一月復一月，一年又一年，而他們也把自己藏得越來越深。他們真是「暗藏者」。但是，有一個時期，特別是在一九四七年，曾有一個頗為活躍的集團；在工黨政府中很左而又與「靠左派」有別，後者就像指路標一樣，指明路途但從不向那裏走。這個比譬是有缺點的，因為指路標停留不動，而「靠左派」指着這條路却走向另一條路。

在這個活躍的集團中有兩個人，一個是艾木里士·休士，他是一個定居在蘇格蘭的威爾士人；另一個是湯姆·斯考蘭，他像我一樣是生長在培斯利的。艾木里士是個徹頭徹尾的太平主義者，並且基本上忠實於他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他從不放過一個反對軍事支出和徵兵的機會。矮矮胖胖的湯姆·斯考蘭慣常喜歡在下院和蘇格蘭最高委員會中站起來用他自己直截了當的態度對各種問題發表他的意見，使他的蘇格蘭工黨同事惱怒。但是，他也是反對徵兵的人。他是一個堅強和精力充沛的戰士，非常不願意接受運輸大廈關於各種原則問題的嚴峻的訓令。

他與艾木里士兩人 and 一般蘇格蘭工黨議員有着顯著的不同。後者私下議論他們，把他們當作、

一種工黨的「害羣之馬」。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星期二，議會復活節休會的一週，重新確定國民服役法的問題就要提出來了。許多工黨議員準備投票反對這個法案，我答應和他們一起去。我當時特別感到痛心的是正在馬來亞發生的事情。當倫敦舉行勝利遊行的時候，有一隊馬來亞游擊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戰士——參加。慶祝節目終了後，他們跑來看我，告訴我他們家鄉的情況。貪求利潤的橡膠與錫的壟斷資本家，一心要恢復戰前的狀況。好的工作都給白種人做，對當地人民則殘酷剝削。

他們打算和馬來亞總督馬可姆·麥克唐納先生談一談，但是他們見不到他。他們要求我給他們寫一封信，因為這樣或許能助他們一臂之力。他們有使他們國家向前發展的完全可取的建議，他們相信麥克唐納會予以考慮。

我告訴他們他是個很可憐的傢伙。他跟他父親進了工黨，又照樣服服貼貼地跟他父親進了保守黨。他倒是錫與橡膠大王們的理想人物。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仍覺得還值得一試。

麥克唐納是否接到這封信我不知道，因為當這些馬來亞小孩子們回國時，他和他所代表的反動力量已經展開對共產黨、職工聯盟和游擊隊的進攻，顯然打算犧牲人民利益，摧毀任何妨礙壟斷資本家謀利的人或東西。這是一種卑鄙醜惡的事。從我們這個國家派去的剛從學校出來不過一兩年的孩子們，用轟炸機、大砲、機關槍以及一切最足以致人死命的戰爭武器來對付當地人民。可怕，可怕而且可恥，一個工黨政府——這些一度會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們（他們會真正是信仰的嗎？）——竟讓自己擔負這樣的事情的。

當莫里遜先生還在兵役年齡的時候，他是一個太平主義者，曾在「新領袖」上寫文章。他當時說：關於民主的談論只是一個假面具，在這後邊隱藏着帝國主義的兇惡面孔，然後宣告說：無

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國際主義完整無損」。應該派他到馬來亞去向那些現在正被利用來進行錫與橡膠戰爭的孩子們宣讀當年他適合服役時他所寫的那些文章。

話得說回來，就在那個星期二早晨，我從王街向下院走去，準備在晚間投我第一次反對工黨政府的票。一張反對不斷徵兵的票。我一直穿進聖馬丁巷，站了一會兒，往一家書店裏面望望，然後轉身走上大街，迎頭遇上一輛開得很快的汽車。我縱身一躍打算躲開，但汽車却撞在我的右腿和背上，把我拋向空中。如果我留在空中，我原可以平安無事，但是我頭朝下地跌了下來。血便從我的臉上往下直流。當有兩個人扶着我站起來的時候，我的樣子一定很可怕。我坐進撞了我的那輛車子，被送到查靈克羅斯醫院。

一個護士動手包紮我的頭，這時，來了一個警察。我不願意麻煩，不願他們知道我是誰，否則報上又會登出一篇聳人聽聞的故事，而且我也不願引起在培斯利家裏的我的妻子的不必要的不安。因此，當那個警察問我的名字時，我一口氣告訴他說：「我是加拉赫先生，從培斯利來看朋友的。都是我自己的錯。我沒有注意，司機會竭力閃開我，但是我一跳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正好撞上。」

這位警察非常同情我。他對我說：「到倫敦這個地方必須小心，街上來往車輛很多。」

接着來了一個醫生。還有其他傷處嗎？沒有。頭痛嗎？不。我走出醫院並設法到了白聖園，睡到床上。那天晚上我沒有投反對工黨政府的票。直到復活節休會後，我才再露面。

以後我遇到工黨的議會督導人威爾·惠特萊。我對他說：「下次你不想讓我投票時，不要那麼粗暴。在我的茶裏放點輕微的毒藥就行了。」當我把事情經過告訴他時，他感到這場玩笑很有趣。這當然是對我的一個玩笑。

但是，很大一部分的票是反對政府的。足以引起工黨機器的掌管人相當大的憂慮。後來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來了一個給南尼先生的電報，祝南尼和他的黨在即將舉行的意大利選舉中獲得勝利。

在戰爭期間，意大利共產黨和社會黨會聯合起來對德、意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戰爭結束後，它們決定仍然團結一致。工黨派去了一些它的幹才去勸說在南尼領導下的意大利社會黨和共產黨分裂。在這方面，他們失敗了。但是，他們順利地使一個曾經做過短時期銀行家的、名字叫薩拉蓋特的人所領導的一個小集團從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當左派集團（包括普拉茨—米爾斯、李斯里·索萊、萊斯特·胡金遜、齊里亞庫斯以及其他很多的人）拍電報給南尼和意大利社會黨時，他們給自己招來了工黨領袖們的暴怒與積憤，工黨領袖們聲稱他們破壞工黨政策，這種政策已表現於對薩拉蓋特的支持。所有在電報上簽名的人都接到命令要受黨的「訊問」。他們受到關於他們行爲的警告，並且被給予機會，叫他們在一篇宣言上簽名，表示他們將來願意做「好孩子」。爲討論這個問題，曾舉行了一次會議。有幾個人主張拒絕這種「訊問」。他們被壓下去了。宣言簽了字，而且除了普拉茨—米爾斯之外，全都給予再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普拉茨—米爾斯另作特殊處理。他被開除出黨。此後，他即和普里特一道留在黨外，普里特是因在假戰爭[●]期間

● 該人在一九五二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魯道夫·斯蘭斯基叛國案中已暴露爲美英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就和斯蘭斯基建立聯繫，想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復資本主義和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本書第十八章對他另有論述。——譯者

● 假戰爭(phony war)，指二次大戰初期美法與德國在西方對峙時，雙方都未進行正式戰鬥，而只互相進行宣傳戰的一段時期。——譯者

寫了親蘇文章和發表了親蘇言論而被開除出黨的。

普拉茨——米爾斯是下院中最直言不諱、最倔強和最勇敢的議員之一。當他起而攻擊美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時，他時常要受到不只是保守黨方面的攻擊，而且也要受到工黨議員的攻擊。但是，不論反對方面是多麼窮兇極惡，他從不畏縮。無論是保守黨的咆哮還是主席的呵斥都奈何他不得。我常坐着聽，並且自言自語說：「這傢伙了不起，真有勇氣。」

但是，這羣人的屈服對整個工黨來說，發生了一種爲害很大的影響。「靠左派」唯恐不及地倒到右邊，其他的人則開始移向中間。只有一兩個人保持着一种類似批評的態度，而他們後來又受到了處理。再沒有人支持南尼了。薩拉蓋特是工黨所屬意的人。

但是，美國人垂涎着意大利，就像他們垂涎歐洲其他地方一樣。美國有一種意在全世界建立金元霸權的外交政策。美國人絕不會想到在歐洲任何地方或是爲着這件事情而在全世界鼓勵一種會使英國強大起來的政策。不，先生，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甚至於英國奴性十足的美元奴僕也決不可能使他自己或是其他任何人相信這樣一件事情的。

因此，美國人在意大利忙於活動，並且，如果所有報道都是確實的話，他們俘擄了薩拉蓋特。他們在意大利俘擄了許多人。我的一個老朋友，一個意大利人，到他的家鄉去度假日。他遇到了兩個工會的職員，是從職工聯盟遊蕩出來的一小部分無足輕重的人。他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恬不知耻。他們說：「我們過够苦日子了，這些人（指美國和英國的工會領袖們——加拉赫註）有錢要化，既然這樣，我們也就分它一份。」

這真是一樁妙事。我們向我們自己的工會繳納會費，我們繳納我們的政治費，而這些錢却被用來津貼那些實際上只代表他們自己的寡廉鮮耻的冒險家。美元和英鎊正被用來敗壞和摧毀其他

國家的工人運動。

美國人抓住了薩拉蓋特之後，必須有辦法對付他，因此又製造了另一次分裂，這一次是從薩拉蓋特集團分裂出意大利工人社會黨（簡稱P. S. I. I.）來，而由一個叫做羅米塔的小伙子領導。這裏不妨向議會的工黨議員們發出一個警告：「別打電報給薩拉蓋特了，他已經不再是寵兒了。」

在意大利那邊，發生了你罵我，我罵你的情形。羅米塔罵薩拉蓋特奉美國人的命令，而薩拉蓋特罵羅米塔是英國人的走狗。事情發展到這樣程度：薩拉蓋特在他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封致萊翁·勃魯姆的公開信，要求他干涉英國工黨，使它停止支持羅米塔。我根據這一點給赫伯特·莫里遜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親愛的赫伯特：

身爲一個老社會黨人和一個一心想望儘早在這個國家，像在其他國家一樣，結束資本主義的強盜統治的人，我感到我必須請你注意一椿一定會使你大吃一驚的事情。

我知道你是怎樣看待一個國家干涉另一國內政的事情的，我也知道你對於那些接受「外國津貼」的人們所抱的高尙的態度。

我收到了一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人道報」，這是薩拉蓋特——我想他是你的老朋友——手下的意大利社會民主黨人辦的報紙。

在這份報紙裏，薩拉蓋特用一封致萊翁·勃魯姆的公開信的形式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我知道英國同志們的同情心轉向這個新組織。這個組織的誕生是他們所喜歡的，這個組織，在它所處的情況下看來，並不表示走向團結，而是表示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新的分裂。」

「英國同志們的態度，雖然使我們感到痛苦，但並未使我們驚奇。我們因他們的態度而沉痛地辭職的原因已經寫在白解放以來直至今日的我國的歷史上了。不僅如此，還應當承認，英國同志們是奉行了一種合乎邏輯的行動方針的，因為他們「容忍」意大利逐步地參加到西方民主國家的系統中來，但是他們從不扶助或促進這件事情。他們盡可能阻撓意大利工人社會黨的誕生，雖然他們曉得南尼的目的是把意大利連在東方國家的系統上。他們試圖惡化我們，在他們的報紙上說我們出於要把意大利從一種新的極權主義的暴政中挽救出來的意志——一種幾乎盡全力掙扎的意志——的行動是受美國外交人員所鼓動的。他們長久以來反對將我們吸收進社會黨的大家庭，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選舉前夕，當時這個決定關係到年青的意大利民主的命運；而只在你向我們伸出手來的時候，他們才決定和你一道幫助我們。」

「但是不久以後，英國同志們對我們採取了他們慣常的態度，並且開始寵愛那以對意大利工人社會黨——它的過錯祇是支持了大西洋公約——進行鬥爭為號召而成立起來的新黨……接受或是拒絕大西洋公約就是接受或是拒絕美國的友誼，這對意大利來說是一個生死的問題……」

「你知道，勃魯姆同志，英國直至最後一刹那都是反對意大利參加大西洋公約的。而那個新政黨正在以聯合一切反對大西洋公約或是不接受該公約的人們為號召發展着，因此，英國同志們對這個新政黨的態度是合乎邏輯的。」

你將由此看出：羅米塔在罵薩拉蓋特是美國人的走狗（你能聞到金元的氣味嗎？）而薩拉蓋特在罵羅米塔是英國人的走狗（一個英鎊角色）。

我相信，你會儘早駁斥薩拉蓋特的這些謬言的。

你決不會參預這種事情的。那像什麼話！

你忠實的威廉·加拉赫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

赫伯特的覆信是滑頭的，很滑頭，而且很含糊的。顯然在意大利國內有什麼東西腐爛了——有什麼東西敗壞和發臭了，而下面就是赫伯特對這件事所要說的一切：

親愛的加拉赫：

謝謝你在十二月一日寄來的附有「人道報」摘錄的信。我已經注意到你所說的事情。

你忠實的赫伯特·莫里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

倫敦西南第十一郵區喬治大街樞密院

可是，左派集團却受到制裁，而普拉茨—米爾斯因為對忠誠的社會主義戰士南尼先生致意而被開除了。在意大利以外的什麼地方有些東西腐爛了。各工會分會應該要求算一下賬。有多少他們交納的會費，有多少他們的政治捐正花在維持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不肖之徒的身上了呢？

第九章 達特模爾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我接到一封由萬士華斯監獄的一個犯人寄來的信。接到這種信並不稀奇。我之關心監獄和犯人是盡人皆知的，因之有許多犯人當他們打算發洩發洩的時候就給我寫信，並且把他們的全部積怨都告訴我。我時常把這些問題拿去請內政大臣處理，有時結果很好。

但是，這位萬士華斯監獄中情況特殊的犯人的要求迫切得要去看他。他需要別人的意見，也需要別人的幫助。我向內政部申請訪問證，領到後就走向那二十多年前我會被迫住過的地方。這個犯人是個長得漂亮、身體結實、頭腦很清楚的小伙子。像一般敏感的犯人一樣，他處在一種高度神經過敏的狀態之中。實際上他原是在達特模爾監獄服役的，但是，因為關於他的一件案件正在老培累等待定案，所以他被帶到萬士華斯來。他想見我就是爲了這個案件。

太屬於個人私事了，太複雜了，不必在這裏細談；不過我會盡我最大的力量去幫助他。在我和他會面以後，我和獄裏的醫生談了談他的情形。我建議給他特殊的照料，因為他的神經在高度緊張狀態之中，並且已使他有些難以管教了。他在達特模爾和萬士華斯兩地，曾因各種的罪名，其中包括對官長態度傲慢，而受到一整套的處罰。醫生認爲，他很聰明，有些故意做作。使我無法瞭解的是：多犯一次錯就要多受懲罰並且失去減刑的機會——對於一個聰明的演員來說，這是很壞的報酬。

但是，當該案在倫敦判決以後，他又回到達特模爾去。從那裏他又寫信給我，要求我再去看

他一次。他曾經和其他一兩個犯人談過這次訪問的可能性，這些犯人也寫信給我，並且要求我萬一到達特模爾的時候，也去看看他們。我決定抽一天時間去看看這些青年。我看了一下地圖，曉得塔維斯托克是離那個監獄最近的市鎮——越過曠野，七哩路就到那個監獄。我就去塔維斯托克，晚上就到了。我打算第二天早晨坐公共汽車到普林斯唐去，好讓我能够在十點鐘，也就是指定讓我訪問的時間，到達那個監獄。我在塔維斯托克的一家旅館裏住下，然後出去打聽公共汽車的情形。沒有公共汽車！那麼，火車呢？我可以坐火車到耶爾維頓，然後轉乘從普利穆斯來的火車，經耶爾維頓到達普林斯唐。這將使我在十二點鐘才能到達普林斯唐。太晚了。剩下的辦法就只有步行。

我讓人家一早就把我叫起來，吃了兩口早點，大約在七點四十五分就出發了。這是怎麼樣的一次徒步旅行呵！你開始上坡，並繼續上坡。你登上一個山崗，而在那裏你又看到一條漫長的道路，通到另一個山崗。在平坦的路上，七哩路算不了什麼，可是，從塔維斯托克出發的徒步旅行實在可怕。這一天是這個市鎮趕集的日子，各種各樣的車輛從我身邊經過，都是朝市集走去的，沒有一輛是往外走的。回來的時候我就比較幸運，我只步行了約摸一哩路，就碰到一個青年駕着一輛大篷車，停下來把我帶上了。他告訴我，這一帶的人總說從普林斯唐到塔維斯托克只七哩路，可是，從塔維斯托克到普林斯唐却有十四哩。這句話可真有點兒道理。

當我向內政部報告我這次訪問的情形時，我會說：「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藍姆賽·麥克唐納的名句：『前進，前進再前進，往上，往上再往上。』」

通訊繼續着，越來越多的囚犯都寫起信來了。在達特模爾，大家的情緒當時都很高。我決定再作一次訪問。這一次我要會見十二個囚犯。我不難從內政部取得訪問證，因為，據內政大臣看

來，我的訪問似乎對有關各方都有好處。

在這一次，有一個囚犯寫信給他的母親，告訴她我要去訪問他。接着，這件事為報界所知道了。有人打電話到王街，打聽到我已經到普利穆斯去了，並在第二天早晨，我要從那兒坐火車到普林斯唐去。話傳到了普利穆斯，於是，一羣新聞記者開始到各個旅館去搜索，直到他們找到了我。我從他們那裏覺察到大家非常關切監獄裏的情形。各種各樣的謠言在飛傳着，可是報界却得不到獄吏的合作。每逢有什麼謠言傳播出來，報界就打電話給監獄；但是，守門人拒絕讓他們和典獄長通話。「如果你要消息，打電話到內政部去要。」這就是他們從他那兒所能得到的一切。

他們不願聽我說要去趕火車的辦法。「明天早上我們都來，用一輛汽車送你去。這是很愜意的一次出遊，包你滿意。」果然是很愜意的出遊，我也的確滿意了。可是，並不是只有一輛汽車，而是五輛，報界人士大舉出動了。因此，我是帶着一隊護送者一道去的，這使獄吏們大為不滿。既然我在裏面至少要逗留三個鐘頭，他們就走開了，可是答應等我出來。

他們的確在那兒，拿着照相機，準備在我走出來的時候給我拍照。這被獄吏制止了。不准把監獄照在像片裏面。那些新聞記者說：你看，人家就是這樣對待我們的。然而，全國人却早已看過一部名叫「逃亡」的電影，裏面有從一切角度去拍攝達特模爾監獄的鏡頭。多蠢！無論如何，他們總算讓我站在路邊石頭上，給我拍了幾張照片。這些照片倒拍得挺不錯。接着，報紙上大事宣傳了一陣，使得內政大臣和內政部的官員們非常不高興。

在監牢裏，我會見了我要見的那十二個囚犯，還和他們每個人談了十五分鐘。他們每個人各有其特有的痛苦，可是有一樣是大家共同的。這種情形，我在前些日子的訪問中就已經遇到了。這就是很久以來，飯食都做得很壞，而且常常無法下咽。向典獄長和內政部都提過抗議了，可是

毫無結果。因此，囚犯們決定來一次示威。有一天，他們在院子裏做完體操後，排好了隊，可是拒絕走進獄室。沒有暴力的行動，也沒有任何在公認意義上可稱為暴動的行為，但是却被當作暴動處置了。

某些被稱為帶頭作亂的人被挑出來懲罰了。他們有很多天只吃麵包和喝白水，有很多天失去了活動的機會（就是失去了某種權利），有幾個人失去了十二個月減刑的權利，有些人失去六個月減刑的權利。內政部已把這些人被剝奪去的減刑期限各恢復了三個月。在我向內政部提出的報告中，我會提出有待改善的好幾件事；但是，我的報告主要還是集中在審訊和處罰的問題上面。

如果一個囚犯有小小的犯規行為，他就得被帶到典獄長的面前。一個獄吏或者幾個獄吏對這種所謂犯規行為提出一個報告。典獄長在他的辦公桌後面坐着，副典獄長和牢頭都在他旁邊。囚犯面對着典獄長立正。控訴完畢，典獄長就問那個囚犯：「你有話要說麼？」囚犯往往是說不出話來的。他在周圍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難看的臉孔而已。他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話，或者如果他是個「難對付」的囚犯的話，那他就要反駁那些獄吏的控訴辭。典獄長打斷了他的話，就給他個宣判了事。

如果囚犯被控有重大的犯規情事，典獄長就把他交給調查委員會來處理。訴訟程序還是照樣。囚犯立正，面對着調查委員們、典獄長、副典獄長及幾個獄吏。他有什麼機會嗎？完全沒有。雖然如此，他却可能被判處徒刑十二個月。這就是所謂失去十二個月減刑權利的真正意思。

試想，在外面誰會在這種情況之下受審、受罰。我在報告裏和在下院的辯論中，都堅持：那些受到調查委員會審問並要受到這樣的懲罰的囚犯們，都應該有權利獲得法律顧問，而且，如果有必要，還應該有權利獲得法律上的代理人。我為倫敦「明星報」寫了一篇談這個問題的文章，

使得這個問題大受注意，我並且相信：我已經設法使得內政部的官員們用更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這個建議了。

關於在達特模爾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的消息，一直傳到派克賀斯特。從威地島的監牢裏也寄信來了，這樣，不久，和我通信的人就大大增加起來。當然，每一個寫信給我的囚犯，我都給他寫回信。不久，人家就約我去訪問派克賀斯特監獄。這些信總是很有趣的，有時這些信真使人感動，它們常常表現出一種堅決不向他們認為是和他們作對的力量「屈服」。這就是我們的監牢裏的大困難和大問題之一。囚犯和獄吏之間會產生強烈的惡感。現在，情況有些好轉；可是，在情況真正改變過來之前，我們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就是在這種情緒之下，我從達特模爾回來後寫了幾首詩。我把這些詩和其他的詩一齊送給我的一好朋友，議員詹姆士·赫德遜。無論如何，他和我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厭惡那「該死的酒精」。詹姆士從來不放棄一個機會去和酒精作鬥爭。後來，他把我的詩交給教友會的一些朋友，而被登在「教友」周刊上。我把它抄在這裏，向那些愛詩的人請教。

達特模爾

靜寂的黃昏悄悄地越過大地，

西天殘留着紅霞燦爛，

我多麼平靜地站在高聳的山崗上，

矚目四望，看白晝從身邊慢慢消逝。

不久，不久黑夜就要來到茫茫的荒野，

只留下星光引導我蹣跚的脚步，

但我心中確信：經過靜寂的夜，

我將迎接光明與自由的破曉。

在那陰森高牆裏面的人們，感覺却完全兩樣，

高牆破壞了美景，使人人充滿了恐懼，

不幸的人們啊，躑躅在達特模爾的牢房，

監牢裏關住了活着的死人。

黎明不過給他們帶來另一個

痛苦的日子——悶人地渴望得以自由；

不管他們犯什麼罪，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

總不把他們當作人來對待。

誰也不會壞得沒有一點善心，

只要我們去尋找，把它培養，

挽救他們——讓我們拿出力量來，

慷慨地給予幫助和希望。

推倒這些可憎的高牆，把它們踏成平地，

給這些人有機會重新改造，

讓他們的心中也萌發生命的歡樂，

能夠和我們一道迎接破曉。

現在，在撇開這個問題之前，我願意從一封監牢來信裏引一兩句話。這是對自己的技術感到自豪的表現，雖然，我還是真誠希望這個青年會把他的才能用在更值得費心的事業上。我在派克賀斯特訪問過他和其他好幾個人，我很喜歡他。下面是他的話：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我只是又一個對於那種要用暴力、飢餓或是用目前獄吏與監獄制度的其他不人道的辦法來使我屈服的企圖表示憤怒的囚犯。

我是從別人、從報紙、從議會記錄那兒認識你的。我發現你的行動和言論中藏有巨大的力量。我很高興地說：我有很多想法恰好和你的一樣。最近你在下院關於軍費預算等等問題的演說，還沒有得到你所反對的那些人的答覆，尤其不幸的是，還沒有得到那些應該首先支持你的人的理睬。

我是以偷竊爲生的，對這一行，我的本領很強……

很不壞的一個小伙子，他聰明、快活，老是笑咪咪的，可是却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懲罰。不，這不是一個好制度——差得遠了。

在我談到囚犯的時候，有一個人我想介紹一下。前面提到的那個詹姆士·赫德遜和我都很尊

重他。他對囚犯——國家的囚犯以及魔鬼的囚犯——也很有興趣，他就是「救世軍」的軍官大衛·蘭姆。

有一天晚上，我去中國大使館參加一個集會。我本來不想去，可是覺得需要接受邀請。我去了。會場是兩個大房間。我在靠近第一個房間盡頭的地方站着。各種各樣的人物都來了，他們和我握手後，就擠進第二個房間去。我注意到有兩個「救世軍」的軍官坐在那邊角落的一張長椅上。一個頭髮已白，老態龍鍾；另一個皮膚黝黑，體格魁偉健壯。過了一會兒，他們站起來，走到我身邊。

年紀比較大的那一個爽直得叫人非常高興，他對我說：「我已經很用心地看了你好一會，我喜歡你的臉。你願意告訴我你是誰嗎？」

我對他微笑，回答說：「哦，我不過是從培斯利來的一個青年罷了。」

「從培斯利來的」，他說。「對於培斯利，我有很愉快的記憶。我的妻子和我在我們結婚後不久曾經到那兒去過。」

我們談了好一會，談到培斯利，也談到大家都認識的朋友。接着，他突然記起來了；他說：「可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是誰哩。」

「威利·加拉赫就是我的名字」，我回答說。

他注視着我。那個高大、黝黑的人笑了。他說，「這一下可打中目標了」。那個軍官（我該順便提一下，他是個蘇格蘭人）很高興認識我，立刻滿口答應找一天到我家裏來，大家在陽台上喝喝茶。

他果然來了，我找了好多人來陪他。其中有議會議員喬治·馬塞斯，他是教會聯合會的高級

專員；還有蘇格蘭事務大臣瓊·維斯特伍德，他早年原來是「救世軍」的一員。他和軍官蘭姆談得非常投機。

對於所有的人，那都是個愉快的下午。那個軍官原來已經八十歲了，但精神却很年青，腦筋很清楚，是個和別人很合得來的伙伴。後來，瓊和他的妻子駕駛汽車去赴約會時因汽車失事而遇難，這對於他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對於我們大家，也是這樣。我寫了兩首詩紀念小瓊，並且把這兩首詩寄給那個軍官。過了幾天，修道院花園附近的皇家蘇格蘭教堂舉行了一個追悼會，許許多多蘇格蘭籍的會議員都參加了。上院和下院都有許多人參加。主持追悼會的牧師請軍官大衛·蘭姆講述瓊生平的業績。他在那篇動人的演說快要結束時說：「現在，我要向大家朗誦幾行詩，這是瓊的同事威利·加拉赫寫的。」

他的朗誦使得這幾行詩顯得比實際上要好一些。這幾行詩表示了我對小瓊的看法。他是個好的事務大臣。努力工作、認真，經常在摸索改進工作的方法。詩句如下：

他關心蘇格蘭，那人口一天天減小的蘇格蘭；

他的眼睛明亮，像智慧的古代先知一樣，

他看見了蘇格蘭的每一個山谷，在將來重新給人住滿，

他充滿着那樣頑強的精神，這種精神永不會死亡；

雖然他從此長眠，再也不醒，

他播下的種子，蘇格蘭的子孫會得到收成。

所以暫時，在悲哀籠罩了的墓地，我們分享了他親朋戚友的哀傷；

對他所作的貢獻，我們表示敬意；

想起我們失去了他，就一任淚流成行。

我們要再一次宣誓，為他的事業而奮鬥，

因為，這正是小瓊對我們的要求。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談在中國大使館所碰到的另一件事。「救世軍」朋友離去後，現已去世的「工人日報」編輯比爾·魯斯特就進來和我交談。當我們正站在那兒談天的時候，門口發生了騷動。我們往外一看：原來是歐尼·貝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全想和他談話，可是他顯得有點厭煩。他在人堆中擠開一條路，眼睛看到了我。他走過來了。就歐尼來說，儘管他可能是多麼自大，儘管他當了一個外交大臣而多麼危險，可是他却一向保持着無產階級的那種親熱與直率的作風，這是他的大部分同事們所完全沒有的。

「你在這兒幹嗎？」他這樣開了頭。

我回答說：「這正是我自己正在捉摸的問題，可是，命令是命令，我一向遵守的。」

我們開了一兩句玩笑之後，我說：「我要給你介紹一個你的敵人。事實上，是你唯一的敵人。」他看着魯斯特。我對他說：「這位是比爾·魯斯特，『工人日報』的編輯。」

「哦，你好嗎？」歐尼說，使勁和他握手。「我十分高興見到你。」

「我很高興見到你」，比爾回答得像歐尼一樣彬彬有禮。在講了幾句話之後，他就問歐尼：

「你覺得那部影片怎樣？」原來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天，影片「盛名即鼓舞力」首次放映，工黨政府全體人員都會被請去看了。

這部影片中的主人翁可以很容易、十分容易地被人認出來是影射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的。那確是個人野心勃勃的工黨領袖的一個醜惡的樣本。聽到這個問題，歐尼的臉立刻一沉。

他答道：「我不喜歡那部影片，我不贊成這種翻舊賬或者是攻擊個人的東西。」對這句話魯斯特馬上回嘴說：「你當然不贊成這種東西，除非是針對我們的。」

歐尼說：「你們可不一樣，你們是個黨。」他接着又說：「是我使你們活躍起來的。」

我警告他說：「小心點，歐尼，小心點，有一天克利浦斯說：邱吉爾每發表一次演說，就等於替工黨招來更多的擁護者。你是不是想告訴我們：你也用同樣的方式替共產黨招來更多的擁護者？」

歐尼連忙改口。「不，我說顛倒了。是你們使我活躍起來的。」

魯斯特頂過去：「請相信我，這不是有意這樣說的。」

我必須說：歐尼用很好的態度忍受了這句話。他對我們說：「這使我記起一個老碼頭工人，他對我說過：『唔，你死的時候，基督在上，我們一定好好給你出殯。』」我們笑了。這時，我們都沒有想到：就在短短的差不多一年內，我會參加我的同志比爾·魯斯特的殯儀。

當菲爾·皮拉丁在下院的公共休息室裏告訴我下面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是怎樣感到震驚啊！他說：比爾·魯斯特在王街十六號病倒，不久之後，就在人家把他匆忙送進去的那個醫院裏逝世

了。他和他的妻子塔馬拉住在白堊園一間房子的樓下，我在那兒有一個房間。我們早上一同出門，他上王街去，我到下院去。從他的少年時代起，我們就來往得那樣親密：一個是小比爾，一個是老比爾。

作爲一個黨內的同志來說，他是優秀的，埋頭苦幹，全心全意爲黨工作，忠心耿耿。作爲「工人日報」的編輯來說，他受到每個同志的尊敬和每個新聞記者的尊重。他死得那麼早是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是工人階級的損失，也是純潔、正直的新聞事業的損失。但是，他有過那麼大貢獻的那張報紙，已經在它的各欄裏貫徹着他的精神。他雖然去世了，可是，他和我們一道向着他已經把他的心寄託在那個偉大的目標——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前進。這個共產主義社會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之上，也只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保證給全人類帶來和平、幸福和希望。

第十章 共產主義和宗教

在一個晴朗的星期六下午，我到東維密斯去參加一個在邁考爾煤礦新近落成的酒店的開幕禮。當我和一羣礦工站着談話的時候，當時任煤礦經理的貝爾德先生走過來請我去見幾個「士紳」。「士紳」是屈萊普蘭勳爵夫婦（現在是倍爾福夫人），維密斯上尉夫婦——一對彬彬有禮的親密的夫婦，貝爾德夫人和其他一些人。在閒談中，提到了下星期三的一個音樂會。

維密斯夫人問我：「你會去參加嗎？」

我回答說：「不！我要做我的工作。」

她有點驚異地看着我。她說：「哦，你有工作嗎？」

我告訴她：「我是你的議會議員。」

她叫道：「哦，是這樣的！」她聲音中的輕蔑，只有親耳聽到時才能相信。

她是不大瞧得起議會議員的。然而，這對我却是一個煞費功夫的艱難的職務。實際上我的全部時間都要花在那裏：每星期天都有種種的宣傳會，中間還得在工會的分會、婦女合作協會、領養老金者的聯合會、大學、中學、俱樂部和其他地方演說。在這些演說中最有趣味的一次是在帝國軍事學院的演說。

當我接到邀請，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去講關於「共產黨及其當前政策與未來目標」的問題後，我着手準備一篇對有資格被任命為軍官的青年們的講話。隨後，一個空軍少將約好了到

下院來看我，商談關於演講的事。這時我才驚訝地得知，所謂「學生」都是一些將軍們、空軍元帥們和海軍上將們，他們來聽課，準備將來參加帝國總參謀部。艾登、克萊姆·戴維斯和艾德禮已經向他們演講過了，所以決定也請我去演講，以完成他們的政治教育。他告訴我若干美國軍官已被當作「客人」請來旁聽。有鑒於此，我擬定了我的演講，說明工人階級活動的重要性的它在國內外政治中所能起的重要作用。在這方面，我提到了美國的內戰。

我在演說中指出：固然這應該歸功於亞伯拉罕·林肯和北方的軍隊，但是，仍然是英國工人在政治上的堅持不屈才把北美合衆國救出了災難。北方封鎖了南方。貨物不能運進去，棉花不能運出來。在英國國內發生廣大的失業和驚人的苦難。政府想要承認南方，並用海軍去打破封鎖。只有工人們獨力地阻止了他們。下面是馬克思描寫當時情況的話：

「對各奴隸州的封鎖所引起的工廠停工與工時縮短，在北部產業地區工人中造成的艱難是難以相信的並且是日益增長的。……英國的干涉美國，對工人階級來說，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生計問題，而且，那些「天生優越的人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來煽動反對美國的憤怒情緒。他們特別收買了現在還存在的唯一銷路很廣的工人的大報紙「雷諾新聞週報」，讓它每星期都用狂暴的罵口吻來重複英國有神聖權利來進行干涉的論調，這樣一直繼續了六個月。」

「工人階級充分地意識到政府只是在等待來自下面的要求干涉的呼聲，等待所謂外來的壓力，以便終止美國的封鎖和英國的苦難。在這種情形下，工人階級以頑強的精神保持沉默，或者僅僅是以打破沉默來反對干涉並支持美國，這種頑強的精神是可佩的。這就是英國人民羣衆不可摧毀的優秀品質的新的光輝的證明，這種優秀品質正是英國之偉大性的秘密之所在。」

這是對於這個國家的工人，從來沒有過的最崇高的頌揚。很奇怪地，在我作了這次講演以後，

我在阿普敦·辛克萊的一本書中讀到與此相類似的讚揚。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美國人，認為拯救北美合衆國的是英國工人。

當我講完後，聽講者提出了一些問題，於是我們便休息喝一杯茶，然後回到講堂來討論。有一個美國人要知道共產黨人是否信仰民主。對這個問題，我回答說：是的，並且沒有對有色人種的歧視。這使他和他的同伴非常憤怒，他們想爲他們自己對美國的黑人公民的態度作辯解。我狠狠地抨擊了他們，並且要求知道在場的人們是不是誰都覺得自己比美國傑出的公民之一保羅·羅伯遜這樣的人高出一等。

我繼續說道：「民主嗎！在蘇聯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麼膚色，彼此都是平等的。在蘇聯，有黑人、白人、紅人、黃人。」我停下來，看着他們然後加一句：「但是，沒有綠人。」綠人是在這裏。」

聽衆中有些英國人笑了，並且喝采，但是美國佬不這樣。他們幾乎要用一支衝鋒槍來出氣了。

在討論後的交談中，人們和我談起我在其他許多場合所聽到的話，那就是另外三個講演人，雖然在不同的商標下兜售貨色，但講的却是同一樣東西，表現的也是同樣的情緒，沒有任何不同。所有聽衆，除了美國佬以外，都對這一次演講和討論感到滿意高興，他們希望在下一年再和我會面。但是，這再也沒有成爲事實，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爲我自己對這次講演也很高興。

在所有這些活動中間，黨的不倦的宣傳組織家愛密爾·柏恩斯，想出來一個主意，要讓我在

閒空的時間也不斷地工作。議會議員約翰·派克爲企鵝叢書寫了一本關於工黨及其政策的書。議會議員昆丁·霍吉爲企鵝叢書寫了上下兩冊關於保守主義的書。愛密爾認爲我應該寫信給企鵝叢書的編者，建議爲他們寫一本關於共產主義的書。我寫了這封信，經過一些磋商，簽訂了一份合同，規定由我寫一本六萬字的書，企鵝叢書公司把它印行六萬冊。我開始做這個工作，但是，這裏讓我說明一下，如果沒有現在英蘇友好協會工作的比爾·溫萊特的幫助，我是決不可能完成這個工作的。

他收集並分門別類地整理出我所需的全部材料，而且做得這樣好，使撰寫這本書成爲一種愉快。

當我寫完這本書以後，發生了擱淺的情況。企鵝叢書發行人想要規避出版這本書的責任。以下是我收到的企鵝叢書有限公司董事蘭恩先生的一封信：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幾乎無須多說，我和我們編輯部的同事們一樣，以最大的興趣來閱讀你的關於共產主義的書的稿子，但是，我像他們一樣感到很難過，我不得不指出：這本書不是我們原來希望你寫給我們的書。

正像我在我們先前關於這本書的通信中所說過的，我們所希望的是一本介紹一般的共產主義問題的書，成爲可以和巴巴拉·瓦德與道格拉斯·伍德羅夫正在寫的關於天主教政治哲學的書相提並論的一部著作。在我看來，一面是國際共產主義，另一面是國際天主教運動，廣泛地說來，這就是爭奪在最近的將來塑造歷史的機會的兩大力量，而在你的那方面所缺少的是：關於共產主義如何成長爲一個世界的力量，共產主義背後的哲學和政治理論以及爲什麼它以爲歷史是站在它那一邊的解釋。

我以爲你寫的那本書，並不像共產主義哲學理論上的辯解，而解釋共產黨在這個國家裏要做什麼和它

如你感覺到共產黨——而不是工黨，才是工人階級的真正代表。換句話說，我不禁認為你寫的書多半着眼於當前的宣傳價值；當然，它似乎就關心目前政治中的暫時問題更多於關心我們這個時代的更寬廣與更深刻的趨向了。

在巴巴拉·瓦德的書能够出版之前還要有一些時間，我們希望把這兩本書一起出版，你所提出的若干點，看來到那個時候就會失掉它們當前的趣味。

經過再三考慮以後，我很抱歉，我必須這樣說：這本書並不包括當你向我們接洽時我們所預期的那些內容。

你誠摯的亞倫·蘭恩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

當這本書正懸而未決的時候，另一個同志，黨中央的議會部●部長希美·法根促使我注意約克大主教的一篇演講的新聞，並建議我為此寫一封信給「泰晤士報」。總有人找出一些事情來給我做。偶而我也會反對，但是沒有用，他們總比我強。

這樣，我就寫信給「泰晤士報」討論「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義」。這引起了一場非常熱烈的討論，持續了幾星期之久。各種人都捲入這個討論，顯然共產主義是一個有極大趣味的題目。我不知道是否因此而影響了企鵝叢書的編者，但是，不久以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收到了企鵝叢書編輯部的格羅佛爾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蘭恩先生已在今天早上單獨寫了一封信給你。我們準備立即把你的書付印，希望儘早把它印出來。

在同一批信件裏，我收到了下面蘭恩先生的信：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在此，謹答覆你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來信。事實上，我一直很希望你會像你在十一月九日來函中最後一句所提到的那樣，打電話給我，對我們來說，過去了的時間終究不是白費的，我們曾經在這裏將你的書討論了好幾次，因此，我非常希望你見見我們編輯部的格羅佛爾先生，他不但自己讀了那本書，並且和所有看過那本書的人都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他對於全部爭論點都非常熟悉。

假使你同意，你可以打電話到這裏來找他以便約定一個時間在倫敦跟他碰頭。我希望這件事能儘快地實現，因為我們希望儘儘早在新年出版這本書。

你誠摯的

亞倫·蘭恩

書實際上印了十萬冊，企鵝叢書方面對於這本書銷售之快，感到驚奇。

但是，對於宗教問題，還必須說一兩句話。歷史上明顯地寫着各種各樣的惡棍們的名字，他們利用宗教作為掩蓋他們的欺詐和罪行的外衣。

簡單地，可以這樣說：不管在那裏，只要有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欺詐、盜竊或剝削，就會有這一種或那一種宗教來掩蓋或者模糊這種事實。在哈利特·比徹爾·斯都威著的「湯姆叔叔木屋的鑰匙」中，對於這個問題有過傑出的說明。當北方的教會支持林肯和自由的工資勞動者

時，南方的教會則支持戴維斯和奴隸制。雙方都任意運用聖經來證明他們所贊同的特定的剝削方式是上帝所制定的。

共產黨人主張結束一切形式的剝削。共產主義的簡單的但是最主要的基礎就是一切土地和一切財富、生產和分配的手段都應該是人民所共有的財產。這並不需要宗教的批准或掩飾。這是建立在社會正義的高級概念，亦即自由的社會關係的高級概念之上的。然而，鑒於這樣的事實：基督教義主要是一些和天堂及地獄的神話相結合的道德箴言的組合，那些接受基督教義的人們就有可能把這些應用於地球上的「天堂」而不應用於死後的神話的天堂。

但是，在我們討論這個宗教問題時，那些自稱為宗教的戰士的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所知之少，是令人吃驚的。因此，那本最美麗的令人神往的書「耶穌的一生」竟是一個非教徒厄奈斯特·里南所寫的是不足為奇的。根據聖經，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選來幹嗎呢？把上帝的誡條帶給世上的人們。這些誡條涉及品行、社會關係、衛生與健康。許多正統的猶太人會相信並且仍舊相信這個使命。正如一個猶太作家所說的，偉大的耶和華允許這些世代發生無休止的可怕的苦痛和災難，如果目的不是在使猶太人和他們所傳達的天命永遠呈現在世人的眼前，那又是爲了什麼呢？另一個作家寫道：「從最高的觀點來考察他們的宗教，他們今天的信條與最新的科學理論是一致的，它宣告創造力的統一。」（愛瑪·拉查羅斯）

耶穌是一個猶太人，摩西和猶太教的堅定的信徒。誰不瞭解這一點，誰就永遠不能瞭解——無法瞭解——聖經。他誕生和生活在猶太人中間，並且向猶太人傳教。沒有一個外邦人和他合作或者參加他的教派內。

當迦南的婦人跟在他後面，「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罷。」

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三——二四節）

在他被釘上十字架之後，他的門徒繼續他的工作。在這個教派——因為這是一個教派，一個猶太人的教派——中，最突出的人是聖彼得。彼得也是一個堅定信仰猶太人的使命的人，在任何情形下，他都不和猶太人合作，不和外邦人合作。

讓我們再次強調這一點：耶穌的每一個直接的隨從者，男的或女的，都是猶太人，如果在彼得的領導下，這個教派一成不變地下去，它將在一個極短的時間中趨於消滅。當然，它就決不能變成「基督」教。但是，一個新的力量出現了。大舒地方的掃羅，他似乎理解辯證的道理，他原來是一個迫害非正統的猶太教派的人，開始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宗教。當主叫一個門徒接待他時，門徒回答說：

「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聖徒。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柄捆綁一切求告你的人。」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使徒行傳第九章，第二三——二五節）

這就插進來一個全新的成份。在一個聰明的煽動家——新約中的保羅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手中，新的宗教吸引了大量的羣衆，而有了許多皈依的人。

但是可以理解的，這在原有的教派中引起了很大的騷亂。於是，在耶路撒冷召集了一次會議來商量怎樣應付這種情況。若干門徒反對外邦人入教。但是對於彼得來說，新的宗教顯然必將存

在下去。可是，他被人們視爲這個教派的忠誠的與不可動搖的戰士，這是基督給人們的遺言。因此，他必須迅速採取一些措施。

彼得做了一個夢，在夢中，他餓了。一籃子食物自高處降下。在看見了這些食物之後，他大爲驚愕。其中有一些是潔淨的（合於猶太人戒律的），有一些是不潔淨的。作爲一個宗教性很強的猶太人，他拒絕了。但是，一個聲音向他說道：「彼得，起來，宰了喫。彼得却說，主啊，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喫過。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上帝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一三—一五節）

彼得憑着這一點，「改變了他的路綫」，並轉向保羅的新教。這並不是爲當時統治階級所嘉許的一個宗教。事實上，它是一種反抗羅馬侵略者的宗教，同時也是反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宗教上的形式主義和偽善態度。它實質上又是苦行的。當少年人問應該怎樣做才能得救時，人家告訴他要遵守誠條。對於這一點，他回答說，他從小就一直遵守着誠條。耶穌隨後說：「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爲他的產業很多。」有錢的少年人什麼也沒有得到。隨後，在使徒行傳第四章第三十四節與第三十五節，我們讀到：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爲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這是真實的，它是自願的共產主義的一種粗糙的形式。然而，這表明了在追求某些不同的、某些比他們周圍所有的更好的事物。這給他們帶來了當時統治階級的仇恨，帶來了一切像今天向共產黨人所發出的同樣的無恥的誣衊和惡毒的詈罵。只要看一看保羅在他給哥林多人的前書中所

說的話：

「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這些話適用於誰呢？不適用於那些假裝虔誠的先生們，他們藏身在宗教的外衣後面，把他們自己變作強盜資本主義的卑順的工具。因為，那些早期的基督徒是並不追求「金元」的。他們不是為壓迫人民的人服務的。他們還沒有被捧入「高等社會」而當統治階級的怯懦的侍從。不是的，彼得被投進牢獄，不是被引入皇宮。

當我們看到他的那些追隨者，或者自稱為他的追隨者的人們，準備為一個有價值的事業進監牢時，我們可以注意一下他們所說的話。

紅衣主教明曾蒂是怎樣的呢？一個背叛他的祖國——他自己的人民的叛徒。那裏，匈牙利的人民經受了數世紀的壓迫，終於得到了自由，正以他們的英雄的努力，重建他們為戰爭所損傷的破碎的被摧毀的國家。而這個身居高位的傳教士却勾結美國資本家，陰謀破壞與摧毀他們的努力。即使僅僅只有那一封美國大使的信，沒有別的東西——而那裏有多得多的證據——就已經足夠定他的罪了。美國大使的那封信，我們在後面將要引用，這封信上清清楚楚地簽了名，這個簽名是無法抵賴的。美國大使在信裏感謝紅衣主教送給大使館的情報，這些情報，他當大使的已經轉送給華盛頓的國務院了。他隨後告訴大主教，在匈牙利進行干涉以變更匈牙利政體的做法，對美國來說，是下策。這說明了大主教與他的同謀犯埃斯戴爾哈齊公爵正指望著美國會採取這樣的行動。當然，假使大使是誠實的話，他會這樣說：「美國不能公開干涉，但是我們將用其他方法來狠狠地幹。」

在下院，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對於紅衣主教明曾蒂事件發出可怕的狂吠。他們是這樣的「神聖的」人。我知道他們並且知道他們是怎樣地「神聖」的。但是，日復一日，這樣的事情繼續着。這個紅衣主教被叛處無期徒刑。埃斯戴爾哈齊公爵也受到同樣的判決。我實在聽够了他們的叫囂，因此站起來問道：「在下院，難道沒有人準備為大地主埃斯戴爾哈齊公爵講一句話的嗎？或者難道我們認為對俗人有一種法律，對教士又有另一種法律的嗎？」真是一羣混賬的偽君子！

當我和我的妻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我們訪問了皮爾森，那是出產著名的皮爾森啤酒和斯科達鍊鋼廠的所在地。我們被引導去參觀在一處山上的城堡，這個地方已用來開設了一所工人學校。這個城堡和附近一片地產的原主，在工人掌握政權時逃走了。他現在仍然逃亡在外邊，而他是希望能重新回到他的城堡和他的地產上去的。但是，他會到處談論這些真心話嗎？不大可能。如果他這樣做，不論天主教工人或是基督教工人都不會理睬他的。因此，他有興趣的，不是他的城堡，不是他的地產，不是這些，而是宗教。他此生的整個目的是希望看到現在有土地的農民把土地交還給他，這樣保證他們將來死後會進天堂。儘管他們活着的時候，忍受貧窮、無文化、疾病，但是，假使他們甘心忍受他們的領主和主人的掠奪，「珠寶的門」就會為他們而大開。

這種腐朽的、不道德的說教與早年的基督徒毫無共同之處。偉大的新教福音傳道者保羅，是什麼樣的一種人呢？他適於和大主教和紅衣主教們為伍嗎？他能夠側身於擁有土地的「上等人」之列，並且成爲時髦的客廳中一個合宜的裝飾品嗎？讀一讀這段文字，再看看你的主教們和傳教士們，然後問問你自己，他們是爲誰服務的——上帝呢？還是財神？

「他們是希伯來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以色列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麼？我也是。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

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着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第二十一——二十七節）

那是一張包含着勞苦、堅忍和苦難的沉重的單子。他一定是一個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有決心的少年。現在的傳教士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願意與保羅站在一起，並承受像保羅給他自己所帶來的那種野蠻的仇恨與不受歡迎。今天，我們不要期望「基督」教會中會有像保羅這樣的人，我們必須期望共產黨。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葛立芬紅衣主教願意就此提出挑戰嗎？

我們永遠也不會像當時的統治階級那樣來迫害保羅與他的夥伴；我們將永遠不會進行像今天共產黨人所受到的那樣的迫害與誣蔑。我們一直主張宗教自由。這是我在「共產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過的：

「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作為決定我們政策的指導原則。但是，我們的政策是指向有利於人民的社會關係的改變的。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反對人民的。所以，無視於人民一般都有宗教信仰的事實，或者用任何方法來干涉這種信仰，都是愚蠢的。我們將不給任何宗教團體以國家的協助，但是，我們將給予願意參與宗教活動者（不論他們的信條是什麼）以最大的信仰自由。」

第十一章 「說謊——再說謊——他們仍然在說謊」

這些引自布朗寧的「懺悔壇」的詩句，正好適用於正在進行的反對蘇聯和反對共產主義的宣傳。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和這種宣傳相匹敵。統治階級也從來沒有掌握過這樣一種強有力的手段：虛偽不實的、肆無忌憚的、毫無羞惡之心的爲百萬富翁們所控制的新聞報紙，還有無線電和電影。這些東西不分早晨、中午和夜晚地被用來大量散佈誹謗、歪曲事實的言論和直截了當的徹頭徹尾的謊言。

政府、反對黨、外交部、內政部，各個大臣都來搞這一套。教會欣然充當幫手。在這種情形之下，思想是不被重視的。根本就不需要思想。不僅如此，而且思想是危險的。

曾經有一個時期只有教會禁止思想。「不要思想，只要信仰。」羅伯特·英格索爾曾經說：「他們告訴我說：如果我不信，我將落入地獄；而我告訴他們說：如果我信，那我就要落入地獄呢。」但是現在政界領袖和教會站在一起了。誰還敢抗拒它們？

「相信呢還是落入地獄呢！」。兩黨制度——工黨在一邊，保守黨在另外一邊——這就是政治進程的絕對界限。「相信呢還是落入地獄呢！」。停止思想。你已經到達了政治思想的終極點。假使你想再前進一些，那麼你就要倒退了。

然而，兩黨制度是一種欺騙。處在不斷的危機之中的資本主義，必須有一種把全部負擔壓在人民身上的政策。兩黨必須同意這個政策，否則就要面臨這樣的後果——一場激烈的爭奪權力的

鬥爭，一方是爲了資本家，另外一方是爲了工人。但是，任何人一秒鐘也不能想像小資產階級的艾德禮和他的知己們會聯合起來進行這樣的一種鬥爭。在所有重要問題上，他們都是與保守黨完全一致的。在下院中，一個保守黨人會常常站起來說：「各黨都同意這件事。」這件事也許是「大西洋戰爭公約」，「西方聯盟」或是「削減資本支出」。

舉例來說，在奧利維·史丹萊提出這樣一種說法而我插嘴道：「喂，喂，不對」的時候，他會很溫雅地微笑說：「抱歉得很，我應當把共產黨人除外。」

但是，當邱吉爾用一套細心準備好的辭令把持着或者試圖把持下院時，他聽到「喂，喂，不對」這類不敬的插話時，他會停下來，像一頭憤怒的牛那樣睜目而視，咆哮說：「我們不要共產黨人」。

對此，明顯的反駁是：「你知道你挾制不了他們」。

他們在基本問題上是聯合一致的，只不過時常會像煞有介事地串演一些詭辯的下等滑稽劇，完全比不上有一柄時期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串演的戲劇那樣逼真。他們之中哪裏有一個有勞合·喬治那樣的辯才，能夠用他的話像鋒利的短劍那樣地激怒那些寄生蟲呢。然而勞合·喬治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相反地，他是一個現存制度的維護者。另外一個威爾士人就不同了。安諾林·比萬模仿着勞合·喬治，但是以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姿態出現，表演了一套驚人的「在養鴨的池塘裏打水」的把戲。不錯，他是一個很「左」的社會主義者。甚麼也制止不了他，除非保守黨「害蟲」被消滅掉和資產階級被打倒。現在請看他到了甚麼地步了，他的良心像莫里遜的良心一樣，竟容許他在艾森豪威爾將軍——這個美國佬保守黨——的指揮之下，爲資本主義而戰鬥。他和辛威爾與斯特拉徹合在一起湊成了財閥的三位一體的死神。甚麼樣的命運啊，多麼悲慘憂鬱的命運啊！向來有一種笑話說：「救世軍」絕對少不了「魔鬼」。但是，沒有比工黨的領袖們更少不了保

守黨的了。

假定工黨政府實行一種贏得本國廣大人民羣衆擁護的政策，這種政策使資本家破產而提高工人與專業階級的一般生活水平。那麼保守黨將怎麼樣呢？由於沒有大資本家供給它基金和沒有人民大眾的支持，它將趨於滅亡，結果只剩下一個政黨——一個人民的政黨。假如過去有人追求着這樣一種政策的話，共產黨就是追求此種政策的一股力量。

工黨領袖們是不敢面對這種可能性的，所以保守黨必須繼續存在，資本家也必須存在以便供給他們基金，因此，工黨領袖們必須支持和保全資本主義。這個道理像代數學中的一個簡單方程式一樣的簡單。

因此虛偽的戰鬥繼續着，雙方都惡毒地反對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資本家，結果也就要消滅資產階級的政黨——保守黨。因而謊言和誹謗就滾滾而來，一直到成百萬人民的思想中了它們的毒素爲止，這是不足爲奇的。

中毒！這使我想起來，有一天晚上我曾對一個合作社公會談過這一個問題——思想問題。我指出：觀念是由一些人一再反覆地、詭詐狡黠地製造出來和千方百計地灌輸進來的，因此，對許多人來說，思想已經變成不必要的了。他們翻開報紙，他們看到一件事，他們扭開無線電，他們聽到同一件事，他們走進電影院，那裏出現的又是這件事。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了：共產黨人一定是——一羣壞蛋。

我說道：譬如，我們常常聽到工黨領袖們宣稱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相同的，它們兩者都是極權主義。現在，除了「極權主義」是一個有幾分醜惡的字眼這個事實以外，它只能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一切權力和一切資財都掌握在一個特殊階級的手中。我繼續說：但是，假使我

說水和氫氟酸是相同的，它們都是液體，會有人就這樣相信嗎？他們可能去喝水，却不會去喝氫氟酸。任何一個化學家都會告訴他們，雖然它們兩者都是液體，內容却完全不同；一個是給予生命的，另一個則是致死的。

所以在考慮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時，我們必須研究內容。共產主義意味着權力，國家的一切權力和一切資源都掌握在工人之手，而法西斯主義則是壟斷資本主義統治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殘暴的力量。

像我時常問的一樣，我在那個會上問道：「可有這樣一個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他說工人不應該掌握一切權力和一切資源而應當讓一部分權力和一部分資源保留在資產階級的手裏嗎？」我還從來沒有發現有人準備對這個問題作公開的肯定的回答。

譬如反對約翰·安德生爵士的事情，我也曾參與其事，當討論削減資本的時候，他說政府應該等到國家的經濟平衡之後，再來進行像增加養老金和家庭補助金這一類的改革。聽聽工黨議席中的吼聲吧。「那你當你的保守黨去吧。」「你已經放棄了鬥爭。」「現在人民可以看清楚你是一個甚麼人！」了不起的一個示威！這個可憐的「傢伙」只能站在那裏，為他所無意激起的怒潮而驚恐。

很好。工黨沒有被安德生爵士所迷惑。然而，經過了短短的時間，僅僅在幾個月以後，克利浦斯爵士帶來了他的限制個人收入的政策。利潤在增長，物價在增長，生產在增長，工資怎樣呢？噢，克利浦斯爵士說，等我們平衡了我們的經濟，然後我們再來考慮工資。

工黨議席上有任何吼聲嗎？只有共產黨議員和另外一兩個議員抗議過。工黨議員最初坐在那兒又陰沉又緘默，但是經過一次黨的會議，用分裂的威脅使他們心中產生了「敬畏上帝」一樣的恐懼之後，他們俯首就範了。同樣一碟菜，當它被安德生爵士端出來時，它是如何地臭氣沖天，

而當它被克利浦斯爵士端出來時，却變得十分味美可口了。

當一個年青的工黨議員和哈里·波立特坐在同一節火車上時，他對波立特說：「我們被嚇住了。我們不敢開口。」告訴我這兩句話的，不是哈里，而是那個年青的工黨議員本人。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會議上，貝文先生發表了一篇演說。和平常一樣，這是對蘇聯的一個猛烈的攻擊。根據貝文的演說，沒有人知道一點在「鐵幕」後面所發生的事情。在那裏每一件事情都被隱藏起來了——是祕密的、不可窺測的。報紙、無線電和電影都這樣說，而貝文呢，則大吹大擂地來了一套。一般人都接受了這種說法。但究竟如何呢？沒有人知道。貝文既然這樣說，那就一定是真實的了。他繼續說，至於民主國家呢，我們發表有關我們武裝力量的全部的情報。我們沒有甚麼東西要隱藏。

那是他的演說的前一半。在後半，他「充分透露」了蘇聯武裝力量的實力。同樣地，這一點也被大事宣揚，而這一點，也就被接受了。「我們不知道任何事情」，「我們知道每一件事情」。兩種說法都拿出來了，兩種說法都被人們接受了。我走進茶室去喝杯茶，工黨議員們就釘住了我。「爲甚麼在俄國每一件事情都是祕密的？」在我想回答以前，另外一個人又插進來了。「爲甚麼俄國要保持這樣一支強大的軍隊？」不許思想，只要相信——這就是答案。

但是只能相信一邊……蘇聯和我們一樣公佈它的預算。任何人都能夠看到它並且得到一個關於那個偉大的國家所進行的巨大建設的概念。但是——相信貝文，相信邱吉爾，相信美國人，但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要相信俄國人。

這樣，戰爭販子們想塑造人民的思想。在貝文的這篇演說發表不久以後，我們在下院舉行了一次關於陸軍預算的辯論。工黨議員和保守黨議員懇求政府提供一點關於英國武裝力量的情報。

有多少個師？甚麼類型的裝備？在各個特定方面的進展如何？但那位大臣却守口如瓶。沒有情報。爲了公衆的利益不能發表。

議員們起而抗議。他們所要求提供的情報不可能產生任何損害。不管怎樣——沒有情報。我對於英國武裝力量的實力毫無所知。每一個議會議員都和我一樣。當然，我看到預算我就知道花費款項的總額和人員的數目，但是，假如我看看蘇聯公佈的預算我也能够知道這些。

「民主國家」把一切事情都加以公佈。這並不是事實。「民主國家」並不公佈有任何真正價值的東西，即使對人民的代表也是如此。另外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告訴它的有色公民和貧窮的白色公民吧），有許多原子彈。有多少？請貝文來講講，我們都在聽着呢。你是組成美國政府的將軍們和銀行家們的大夥伴。他們怎樣命令，你就怎樣做。他們真正把你當作他們的心腹了嗎？「民主國家」公佈每一件事情。那麼告訴我們美國有多少原子彈，他們用怎樣的速率和多少錢來製造它們？

我不願停下來等候答覆，因爲我知道這要使貝文花費很長的時間去準備。我們要繼續談下去。他還說：「我們沒有甚麼東西要隱藏」。哦，我的天，「沒有什麼東西要隱藏」。在保安機關沒有排除異己，也沒有「間諜的恐嚇」。我記得有一次在下院我跟在他的後面問起關於軍事情報局第五處所做的某件事情。我最後說：「外交大臣所知道的關於軍事情報局第五處的事情就和我所知道的一樣多，他媽的就是這樣。」沒有甚麼東西要隱藏！我不能不想起希萊爾·貝洛克在下院度過大約一年之後所寫的幾行詩：

「我愛想起麥爾斯先生，

我愛想起賓先生，

我愛想起所有的說謊者，

那一類事情，使我快樂。」

但是，我必須說，這並不使我快樂。完全相反。有一次有人曾經重新替兩黨起了個名字：愚弄黨和欺騙黨。我們可以說，貝文先生是在進行一種「聯合軍事行動」。

我們時常聽說，世界上一切麻煩的根源是「蘇維埃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是一個愛用的字眼。這是極其明顯的胡說，但是，蘇聯的敵人却再三重複這個字眼，從未停止下去考察或者解釋它的含意，一直重複到普通男女都被弄得昏頭昏腦，開始接受它，把它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下院，我曾經反擊這種惡意的撒謊的宣傳。我發表了一篇關於帝國主義的演說。我提出這個問題：「什麼是帝國主義？」然後下了一個定義。

帝國主義是進入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這個時期，資本輸出變成維持它的經濟的絕對要素。在十九世紀，英國變成了「世界的工廠」。它生產貨物，並且到各地銷售。但是在那個世紀的下半葉，壟斷的情況已開始出現。積累起來的資本再也不能夠在國內找到適當的投資機會，資本輸出變成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資本輸出是和貨物輸出完全不同的事。資本到那裏，士兵就必須和它一起去保護它。在初期，英國有所謂「小英格蘭主義者」，那些人反對殖民地擴張——反對帝國主義的發展。這些人的利益在於銷售貨物，這就是他們與那些和資本輸出有利害關係的人們所不同的地方。用士兵去保護資本就需要增稅，而他們不喜歡捐稅。因此在主張擴充帝國的人們和

「小英格蘭主義者」之間展開了鬥爭，結果後者歸於失敗。

在兩次世界戰爭之間，在美國也有「小英格蘭主義者」，這就是所謂「孤立主義者」。那時有整個的美洲大陸來吸收資本的投資。然而，甚至在戰前，雖然他們的力量是相對地強大的，他們仍然戰敗了。美國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吸收的限度，而投資資本却依然不斷增加。接着，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隨着來的是，美國投資資本的積累遠遠超過資本主義歷史中以往所出現的或夢想到的任何事情。這就扼殺了美國的「孤立主義」。

聽到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談論着美國的政策中「可歡迎的改變」的這種空話，令人感到有些可憐。伊里奧特·羅斯福在他所寫的關於他父親的書「羅斯福見聞錄」中談到他的父親和邱吉爾的一段談話，在談話中羅斯福把他的觀點講得十分清楚和坦率：

「逐漸地，極其緩慢地，並且極其平靜地，領導權已從英國的肩上移到美國的肩上了……邱吉爾已站起來在房裏走來走去，喋喋不休，裝模作樣，最後他在我父親的面前停下來。……他叫道，總統先生，我相信你正在試圖消滅不列顛帝國。你所考慮的關於戰後世界結構的每一個觀念都顯示出這一點。……你知道我們曉得沒有美國，帝國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他也寫到他的父親和摩洛哥的蘇丹的談話。羅斯福告訴蘇丹說，英國人所關心的一切只是剝削落後的國家和落後的人民：

「……當談話在進行時，邱吉爾變得越來越不高興了。有甚麼可惱的呢？父親和蘇丹正在興高采烈地談論着法屬摩洛哥的自然資源的財富和開發它們的很多的可能性。……父親偶然提到法國和英國金融家之間過去的關係，他們聯合起來以榨取殖民地財富爲目的而結成只顧延續自己生命的辛迪加。他接着又提到

摩洛哥可能有的石油礦藏問題……

「蘇丹熱心地抓住這個問題，聲明他自己絕對贊成開發任何這些富藏，並且要保留從這方面得到的收入……」

「父親發揮了他的觀點……他說，蘇丹能够很容易做到和公司——美國的公司——在以出酬勞費或按百分比分利的基礎上訂立合同，來實現他心中的開發計劃。他說，這樣的一種辦法，能使自主的法屬摩洛哥政府對它自己的資源保有很大的控制權，獲得這些資源所提供的任何收入的大部分，並且在最後還可以把它們完全接收過來。」

「邱吉爾鼻子裏哼了一聲，故意想不聽。」

這就是美國政策改變的含意。犧牲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以便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資本投資。這就是帝國主義。英國在香港有投資，英國就有士兵在那裏。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有投資，那裏也有它的士兵——現在將為一個傀儡政府所代替。法國在印度支那有投資，它的軍隊正在那裏與解放軍作戰，和我們的軍隊正在馬來亞與解放軍作戰一樣。美國有資本在英國，而——但是我們最好不要再順着講下去了。這是挑動思想的，而思想是危險的。我們必須避免思想。

在蘇聯，不可能像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會發生積累的資本找不到投資出路的事情。生產愈多，工人的報酬愈大。在那裏，沒有犧牲人民而聚集鉅額利潤，然後拚命在世界上尋求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的壟斷資本家。因此，不可能有蘇維埃帝國主義——那裏沒有「輸出資本」的煩惱。

但是在美國却多麼不同啊。它的資本家的貪婪的眼睛注視着世界所有的角落。看一看地圖吧，從冰島和格陵蘭一直到南海一帶，從世界的另一邊到阿留申羣島，然後越過遠東，經過中東、近東，越過北非到英國，在這些地方，都有美國的基地和陸海空軍部隊。整個世界被包圍起

來了。這說明了帝國主義到達了它的最高、最狠和最後的階段了。世界決不會向金元統治屈服。那些認爲世界會服從金元統治的人們應該學習和體會中國的教訓。

在礦工的歷史中，費柔斯東和湯尼潘迪●案件是用血寫成的。這是英國歷史上的可恥的插曲。但是，槍殺爲了要求增加他們可憐的工資而罷工的尼日利亞礦工的事件，自然也是同樣可恥的。殖民大臣陳述了對這類事情的顛倒的說法——發生了暴動，但是我們迫使他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警察受傷，即使是最輕微的受傷。這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暴動，居然沒有一個人受傷。二十一個礦工被槍殺，然而沒有一個在工黨政府中任職的礦工準備辭職以表示抗議。

在工黨政府統治之下，國際間兄弟般的友誼遭到了厄運。不但如此，在馬來亞戰爭問題上，還有比這個更壞的情形。恰恰是辛威爾，他竟然說解放軍不是馬來亞人而是中國人，試圖用這種手段來激起對解放軍的偏見。竟是這樣一種利用種族歧視的卑鄙的企圖。不錯，在馬來亞是有許多中國人；他們在那裏已經居住了好幾代，受着錫和橡膠的壟斷資本家們的剝削。

在戰前的議會裏，一個保守黨議員曾向辛威爾吆喝：「滾回波蘭去吧」，辛威爾走過去重重地打了他一個耳光。我離開我的座位和辛威爾站在一起。我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保護他。我和他一同走出去，在走下臺階時，我盡我所能地給他以安慰和鼓勵。

現在我也這麼狠地站在馬來亞的中國人的一邊來反對辛威爾。他現在正好處於他曾經打過的保守黨人的地位。他和工黨政府的其他分子是和帝國主義者站在一起的，而我則和工人站在一起，爲自由而鬥爭——爲解放而鬥爭——和資產階級及其工黨僕從們的說謊宣傳進行鬥爭。

● 費柔斯東和湯尼潘迪是地名。前者發生礦工事件，後者發生鐵路工人事件。——譯者

第十二章 英鎊貶值

但是，所有的說謊宣傳對於解決經濟危機都無能爲力。各種各樣的削減也無能爲力。我們對蘇聯的態度愈壞——危機也就愈惡化。當艾德禮的身價在美國上昇的時候，英國的股票却在下降。這就是自作聰明者在考慮艾德禮被寵信的理由時需要想一想的事情。

早在一九四八年，我在一篇談外交的演說裏，就喚起聽衆們注意這一點。我說：

「但是讓我們看一看這件事情的主要方面。我們僅僅需要提到幾天以前首相所廣播的那篇令人驚心的卑躬屈膝的演說。我用的字句是得當的。我這裏引證『每日郵報』的專欄作家唐·伊頓從美國發來的文章裏的一兩段話。這裏是其中的一部分：

『艾德禮先生和莫里遜先生在這裏的聲望競賽中通常是拖在「第三流」人物的後頭的，現在他們被提昇了。當然，在這個資本主義的衛城裏，社會主義的理論依然是被詛咒的東西，但是，現在甚至聯合同盟俱樂部（美國的卡爾登）……

「議員先生們知道那是多麼糟糕的一個團體——

「都認爲英國的內閣大臣們終於對於蘇聯獲得了正確的觀念。因此，兩年半以來美國對白廳（按係英國政府所在地——譯者）和威斯特敏斯特（按係英國國會所在地——譯者）的粉紅色的「社會主義者」們的厭惡和不信任現在已一變而成爲微笑和招手了。華爾街也勉強有禮貌地點頭示意，中西部資本家也嘗試着向他們親暱地睜眼。假如要求更親密的姿態，那麼，首相和他的同事只要再度猛烈抨

擊蘇聯就行了。這是百試百靈，萬無一失的。」

「關於這件事我要說：『可恥，萬分可恥，那些把社會主義神聖的名字和社會主義的紅旗帶進美國資本主義污穢的泥坑的人們真可恥。』」（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八〇欄）

當然，這種話不會得到那些領袖們或者工黨議員們的贊同，他們想對正在進行着的罪惡裝聾作啞。然而，事實是這樣的明顯。工黨領袖們愈受這裏的保守黨和美國的保守黨的歡迎，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就愈惡劣。

我們「美國的慷慨朋友」——莫里遜是這樣稱呼他們的——總是熱衷於抓住任何機會把英國更深地推進泥坑，當時他們便要求英鎊貶值。了不起的「朋友們」！儘管他們掌握着世界上的所有財富，但是，他們不僅不幫忙把英國救出來，反而堅持把我們推下去。

議員們開始感到不安了。他們已經聽到美元的粗厲的聲音，感受到它無情的壓力了，可是他們要反抗。政府對這件事怎麼說呢？他們不斷向財政大臣提出問題，這位大臣在一九四九年八月斷然宣佈：「本政府無意貶低英鎊的價值。」那時候，整個議院發出了多麼強烈的歡呼聲。沒有一個議員——沒有一個「握有主權的人民」的代表——贊成貶值。當下，克利浦斯成了他們的英雄——別政府可能做的事情，「本政府」絕對不做。下院的空氣又輕鬆起來了。我們的這些自詡為民主的信徒竟是這樣容易受騙的。

這種英國民主是一種特別的東西。按照理論家的說法，所有的權力都屬於人民。人民爲了特殊的目的可以把他們的權力委託給一個政黨。那個政黨可以組成一個政府，把人民的希望制成法律。假如他們不想幹了，或者假如他們不能勝任，他們就把權力歸還給人民。

據說就是如此。

但是考慮一下實際發生的事情吧。愛爾蘭共和國決定和不列顛王國斷絕聯繫，這是它完全有權利採取的步驟。工黨政府却提出了一個直接否定民主的法案。他們通過這個法案取得了這個國家的人民所委託給他們的權力，並且把它轉交給北愛爾蘭的保守黨少數派。現在，權力不在這裏的人民手裏，因此他們無法用停止割裂愛爾蘭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權力却在一個小小的、但很有勢力的保守黨集團的手裏。

這是一個例子，它說明這些「西方民主」的崇拜者怎樣愚弄人民的願望和任意出賣正是他們說得如此響亮而總是欺世惑人地談論着的事情。

但是更壞的事情還在後面。在八月，克利浦斯在整個議院的支持下宣佈他反對貶值。但是，在九月，貶值變成了一件既成事實。

在他的八月聲明之後，克利浦斯到瑞士去治病。當時我說了一次笑話，那是在費夫演講的時候。我說：「克利浦斯病了，英國也病了。克利浦斯已經去治療了——如果他好起來，英國將會惡化下去。」當他在國外的時候，斯奈德先生——美國百萬富翁壟斷巨頭的代表——來到英國。他堅持要英鎊貶值，政府投降了。這時候，克利浦斯不在。等到克利浦斯回來發現這個既成事實之後，爲了不讓他辭職，他們曾煞費苦心。但是辭職在當時會攪亂整個局面，因此，「在家裏納悶」了兩天之後，他同意繼續幹下去。

他和貝文跑到華盛頓去。他們在那裏接受了兩項建議：（一）英鎊貶值，（二）美國資本家有權購買在英國和英國殖民地的工業財產。這些建議說明了英國政治領袖的信譽和英國的經濟地位已經低落到什麼程度了。

這兩項決定意味着出賣英國——而且是廉價出賣。貶值不能拯救英國——唯有傻子才會相信

這樣荒謬的事情——但是，這對購買英國或英國殖民地的工業財產的美國資本家却確實有極大的利益。這就是貶值的真正意義和原因。

這些決定是在一個外國政府的代表的支配下，在一個外國的首都做出的。從來沒有和英國人民商量過。這些對國家極其重要的事情，也從來沒有和下院的人民代表們商量過。「這就是你的上帝」，啊，英國的民主主義者！

貝文和克利浦斯一回來之後，工黨議員照例秘密舉行的會議發表了關於改變政策的聲明。後來當我們討論貶值的時候，我們纔知道克利浦斯用來撫慰他的支持者的破碎的心情的說法。他說，貶值是對付大規模失業的唯一的辦法，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決心維持全部就業。

這就是這些傢伙們要說的東西，這也就是後座議員們會相信的東西！在我所有的經驗中，從來沒有聽說過比這種說法更荒謬的事情。

在取得美元以償付我們的美國債務時，我們遭遇到困難，日益增長的困難。假如我們不能夠取得美元去購買我們所需要的原料，我們的工業將要倒閉，大批失業將代替充分就業。在八月裏，還沒有一個下院議員知道貶值的事情，但是到了九月，大多數却變成「點頭稱是的人」了。我們沒有足夠的美元來償付我們所需要的貨物的價款——因此我們決定對我們所買進的東西付以更高的代價，而對我們所賣出的東西索取更低的代價。這是要真正聰明的小伙子才想得通的。

假定你是做生意的人。怎麼樣？你不是做生意的人，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原來如此。是這些叛徒中的一個。是的，我知道你，你是那些贊成共產主義者的青年中間的一個，但是你覺得你却不得不支持工黨。

對了，你賺不到很多的工錢。你的妻子在抱怨。她說當她買了糧食和衣服時，就再也沒有足

够的餘錢去付房租了。你說，「不要担心，瑪吉」，「我馬上就安排這件事。我去要求老闆減低我的工資，我再要求房東增加房租。」當她拿起紙牌摔到你的頭上時，你可以想像在瑪吉的眼裏有怎樣一種愛的閃光。

這就是貶值。它被用來作為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的辦法；這個問題將一天一天地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在下院進行了三天的辯論。從來沒有過像這樣的滑稽劇。政府提出了下列動議：

「下院贊成陛下政府所採取的關於英鎊的外匯價值的行動，支持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三國部長在華盛頓所同意的措施，這些措施是爲了幫助恢復英鎊—美元貿易差額的平衡，其目的在於使英鎊區的經濟能够不依靠外援而保持穩定；下院並號召人民與政府充分合作以達到這個目的，同時並保持充分就業和保證社會福利事業。」（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三〇九欄）

我和菲爾提出了一個修正案，修正案如下：

「本議院斥責陛下政府所採取的把英鎊貶值的行動——這個行動是陛下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直接後果——，因爲貶值的後果就是使糧食、物品和原料的價格上漲，因而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減低了工資、年金、失業和保健補助金的購買力；本議院尤其要斥責麵包價格的加價，這種加價不利地影響了工人階級中工資最低的一部分人；本議院認爲政府用增加生活費用、延緩社會福利事業（尤其是延緩建築房屋和學校）的辦法來減少人民的消費，將使經濟危機更快地到來，而其結果，將如一九三一年一樣，發生大規模的失業，這種政策不但是背叛了工人階級，而且也是把英國出賣給美國；爲了消除這種政策的後果，本議院要求完全改變政府的那種奉承美國和向美國投降的政策；本議院要求立即增加工資、年金、失業和保

健補助金，增建房屋和學校，加速發展社會福利事業；辦法是大大削減付給業已國有化的工業股東的巨額賠償和高額利率；削減工業的巨大利潤，尤其重要的是大大減少軍費，以使政府可以設法用富人的錢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本議院進一步宣佈：爲了減少對於美元的依賴性，政府應該及早與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東歐民主國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力擴充貿易。」

如果這個修正案被提出了，那麼我們還可能進行一次真正的辯論，並有機會透徹地說明若干大家非常需要知道的國內的真情實事。可是當菲爾去問議長（我已於一九四七年初與那位議長斷絕「外交關係」了）時，他說我們的修正案將不予提出，他即將提出保守黨的修正案。

試看一下保守黨的修正案吧：

「本議院歡迎在華盛頓所達成協議的那些措施，但是感到遺憾的是：由於四年來的財政管理的不善，陛下政府現在不得不和財政大臣所作的一切保證相反地實行果斷的英鎊貶值措施；本議院認爲在現行的策略之下，恢復國家繁榮，維持充分就業和保護社會福利，是永遠沒有保證的。現行的策略不但不能提出醫治我們的經濟病症的根本辦法，反而只能一再採取臨時的權宜之計。」（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三〇九欄）

事實就是這樣。雙方都同意主要的問題——在華盛頓所達成的極端不民主的決定。那麼在三天的討論中到底討論些什麼內容呢？克利浦斯已經承認英鎊貶值意味着利潤的大大增加。爲了造成他正對此採取某種行動的印象，並作爲他拒絕增加工資的藉口，他提議略爲增加利得稅。儘管這對於牟利商人只是很小的數目或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保守黨，像往時一樣，却對這件事大吵大鬧一番。

工黨議席中的一個聰明的財政專家站起來，用詳細的數目字來證明這種利得稅對於利潤的影響竟不如滄海之一粟。

他說：「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站起來告訴他。我說：「就是爲了無事而大驚小怪。假如他們不爲無事而大驚小怪，那麼工人們就會變得聰明起來，而他們就得爲了某些事情而大驚小怪了。」

這就是辯論英鎊貶值時的實際情形。迄今爲止，就主要政黨的任何分歧意見而言，就只是爲了無事而大驚小怪。

在辯論的第二天，邱吉爾就開始以他的全部重砲的火力開火了。他演講的主題是：「我們在沒落而且沒落得很快」。我們比西歐任何其他國家都沒落得快得多。第二天，衛生大臣（比萬——譯者）繼之以迅速發射的機關槍火力反擊。事實，他要提出事實。聽聽工黨議員們的歡呼吧。事實！他不斷地向對方開火，直到保守黨議員們瞠目結舌。他的事實究竟證明了什麼呢？與邱吉爾的論點相反，那些事實證明：西歐其他接受馬歇爾援助的國家，都比英國沒落得更快更深。兩黨都同意得到馬歇爾援助的每一個國家都在沒落，唯一的分歧意見在於不能同意究竟是哪一個國家陷入泥淖最深。

當有人指責他所說的馬歇爾援助使我國免遭一百五十萬人失業時，比萬和工黨的其他領袖們就說：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等國都接受馬歇爾援助，但是看吧，它們並不能維持充分就業。當然，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比萬先生和莫里遜先生都把英國的充分就業，歸功於他們「美國的慷慨朋友」。可是，就像他們的其他說法一樣，這種說法是毫不真實的。

充分就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了戰前的大競爭者德國在和我們競爭。我們的鍊鋼爐

和造船廠一直在全力生產，而魯爾絕大多數的鍊鋼爐却冷了，停頓了，德國的造船廠也像死屍一樣，躺着不動。現在美元正在支持魯爾的鍊鋼業，並已決定增加它的產量，並使德國造船廠重新開始生產，這樣，英國的前景將比過去益發黯淡了。因此，美國將利用德國來對抗英國，雖然它也利用英國對抗蘇聯和東歐國家。他們將無情地、殘酷地利用他們一切的工具，來拚命地追逐美元的投資市場。在遠東、近東和西歐，他們陰險的觸鬚在伸展。這種對於美元和美元投資市場的瘋狂追逐，迫使英國實行英鎊貶值。這不但是英鎊的貶值，同時也是英國的貶值。

在下院中，我和菲爾以及其他少數幾個人進行「逆流」的戰鬥，想引起議員們的注意，但並沒有多少效果。出於我的意料，在辯論中，議長叫到我的名字，因而我能够指出：英鎊貶值即等於一般地削減工資，把生活水準降低。我又說：

「我們聽說貶值本身不是一個解決辦法。我也應該說，這不是辦法。財政大臣說，假如我們團結在一起，互相不佔便宜，那麼一切就會是順利的。這種話我們從前也聽過好多次。在財政大臣廣播演說後的那個早晨，就發生了首相會含蓄地所指的「士洛格莫頓街的不愉快情景」。街上擠滿了狂熱地追求利潤的人。假如士洛格莫頓街是擠滿了因要求足夠生活的工資而示威的鐵路工人，那麼一定會調來一大批警察對付他們。一天之間就賺了一億五千萬鎊，而且聽說錫礦的股票上漲了十先令。近來的利潤本來就是空前地高的，由於貶值，現在就變得更高了。英國的工人現在必須生產更多的東西，而消費更少的東西，以便不但使英國資本家，而且連美國資本家都可獲取更大的利潤。

「有沒有哪一位工黨領袖或是工會領袖能否認這種說法？根據上述情形，我們應該考慮在布立林頓出賣工人的事情。礦工們會要求實行一種新的工資制度，以改善礦業中的整個情況，可是礦工的代表却在布立林頓投票贊成工資照舊。鐵路工人要求每週增薪十先令，技師要求每週增薪一鎊，但是代表們在布立林

頓却投票贊成工資照舊。我們反對在布立林頓的出賣行爲，共產黨將支持工人關於增加工資的每一個要求，支持將危機的負擔放在那些應當負責的人們的身上的每一個要求。

「如果把首相對於士洛格莫頓街賭徒們的溫和口氣，和他對於共產黨和工人所表示的惡毒憎恨對比一下，是很有趣味的。在週末，他警告所有的人說，共產黨壞蛋將會要求增加工資。有些人就叫『好，好』，可是，究竟誰是領頭的壞蛋呢？要求增加工資的是工人啊！共產黨只能在工人先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後，才能參加這種要求。如果工人不提出這種要求，我們怎麼能支持增加工資呢？如果攻擊共產黨，那就是攻擊了工人階級。」

「如果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就算是搗蛋的話，那麼我寧願承認罪過：四十五年來我一直是個壞蛋，並在這四十五年中會有過很多伙伴，其中有幾個現在還各自舒適地坐在執政黨重要議員的席位中。他們現在已被美國的『大亨』看作是西歐資本主義機器中有用的輪牙了。我只能說，他們以他們曾經自稱信仰的事實來攻擊共產黨，其厚顏無恥的程度，只有他們對於工人的偽善態度，差可相比。」（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二六——二二七欄）

我繼續指出：這些情形都是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敦所發表的那次臭名遠揚的演說的必然結果：

「當討論大西洋公約時，反對黨領袖可以站起來說，大西洋公約是他在密蘇里州富爾敦所確定的政策的結果。……坐在前座的議員當中，有誰敢對這句話表示疑問嗎？沒有，他們都知道這是真實的，在本議院的每個人也都知道這是真實的。當那篇演說在富爾敦發表時，我們說那是提議把英國和英國人民賣給美國資本家，以換取對歐洲的社會主義作戰，因為反對黨領袖（指邱吉爾——譯者）一向是社會主義惡名昭彰的敵人。」

「現在，英鎊貶值的決定，證明了我們當時對富爾敦演說所說的話，反對黨領袖今天大可站起來說：『英

鎊貶值就是我於一九四六年在密蘇里州富爾敦所講的話的必然結果。」政府企圖造成這樣的印象，好像這次貶值是政府自行決定的。有誰真正相信這點嗎？貶值的要求是從哪兒來的呢？來自工黨嗎？來自職工大會嗎？不，這是來自美國而且是美國加以堅持的，美國大資本家的一個典型代表斯奈德先生曾來倫敦進行鞭策，直到英國內閣屈服為止。這是真實的事情。」（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二八——二二九欄）

我繼續說：

「除非到了我們能向美國說：『我們要和你們進行貿易，買你們的貨，但只是買到和你們向我們所買的等量的程度』；英國在經濟上將永遠不能自由獨立。我們只消說，如果我們去找另外的供應來源的話，那麼這種來源是近在咫尺的。我們可以無需美元而自蘇聯、東歐、解放了的中國和各個自治領購得供應品。和蘇聯以及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其他國家友好和進行貿易，就是我們自救的道路。」（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三二欄）

在這以前，優秀的戰士、堅實的議會同事、機智有力的演說家普里特，曾經給予他們若干有成效的打擊。他說：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和政府之間的真正爭執是一個影響遠大的問題：我國是否將繼續由世界上的資本家——我們自己的資本家或是其他國家的資本家——統治，或者是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完全改變我們的制度，由本議院控制對於本國人民的生活具有極大權力的金融和工業勢力。如果有人認為我上面所用的英語比我平常所講的更好些，那我就立刻說明，這些話是從十八年前的一篇演說中幾乎照原文引出來的，而那篇演說就是正直可敬的紳士，目前的財政大臣在討論一九三一年保守黨聯合政府的「國民經濟法案」時所發表的。那時候他還沒有得到正直可敬的頭銜，但是他當時的確還是正直而可敬的。他是在他

信仰社會主義的時代發表那篇演說的，那個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
日，第六一欄）

國內的工人們都傾聽我們所說的話並表示很有興趣。但是，他們仍然爲他們對於工黨的忠誠所拖住了，這個政黨是由他們的政治捐款和幾十年來一直增長的政治支持所建立起來的。對於他們，它不是另外的一個政黨，——它是他們的黨。它是從職工運動中誕生的，而且是從幼撫養長大的。儘管他們有時也想到麥克唐納、斯諾登和湯瑪斯等人的短處，但要工人們認識並相信「他們的」黨的領袖會隨便把他們出賣，是不容易的。然而出賣行爲已經發生了，不但出賣了工人，而且還出賣了國家。英鎊貶值，不過是自邱吉爾富爾敦演說以來就在進行的一種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較高階段而已。英國不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了。在華盛頓所作出的決定，是一個凶兆和警告。英國變成了美元狂賭徒手中的一筆賭注——他們準備在適合他們的賭博目的時，隨時犧牲這筆賭注。

這就是在美國命令下實行的貶值這件事所給予我們的教訓——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記取的教訓。

第十三章 關於麻醉

我已經提到過在明曾蒂紅衣主教被逮捕和起訴之後突然掀起的說謊宣傳。教會的巨頭常是和世俗的巨頭聯合在一起而變成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總是「舊政權」的支持者，反對新的、革命力量的進展。

這個道理適用於在所有歷史階段中的一切國家。天主教徒們知道有過「壞教皇」，非常壞的教皇和非常壞的紅衣主教。博吉亞家族（意大利家族——譯者）就提供過這樣的一些人。但是他們不願這個常識，當一項實際事件引起他們的注意時，他們却極其不願承認教會中的一個高貴人物也可能是一個卑鄙的、普通的罪犯。因此，他們容易為宣傳所左右，這種宣傳旨在促使他們反對他們自己的階級，並使他們向他們本國的統治階級屈服。

成千的優秀的工會會員、天主教徒、非天主教徒可以在佛朗哥的監獄或者希臘的恐怖的囚牢中輾轉憔悴，但是他們對這些壞傢伙卻沒有片言隻字的抱怨。這些在牢中輾轉憔悴的人是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敵人。我們的統治者並不關懷這樣的一些人。但是一個紅衣主教——不管他的罪惡已經多麼明顯——却提供了一個破壞工人階級的好機會，並且這樣的機會被極充分地加以利用。

在匈牙利，不僅遭受過可怕的戰爭破壞，因此需要英勇的努力來重建這個國家；而且還有教育驚人地落後的障礙必須克服。學校又少又落後，教育水平極低。因此人民的國家有必要對它

的公民的教育問題採取積極的關心態度。於是決定接管舊有學校，建立新學校，整頓整個教育制度。在爲實現這個目的而採取的措施中，製訂了充分的條款，保障天主教義的傳授。

但是，這個辦法一宣佈，爲梵蒂岡的反動政治勢力所支持的明曾蒂，立即出來表示最激烈的反對。他說這是對天主教會的攻擊。在我們這裏，也有我們自己的大大小小的明曾蒂，他們都粗暴地破口大叫，說人民政府爲了對匈牙利人民施行教育而採取必要步驟的決定，造成了對教會的威脅。

然而，匈牙利所提出的而現在正在實行的建議，和蘇格蘭所實行的實際上是同樣的東西。在匈牙利制度和一般所熟知的蘇格蘭制度之間很少有差別。假如有所差別，那就是匈牙利的教會比蘇格蘭的教會得到更多的照顧。但是這對反動的天主教徒和其他的宣傳家們並沒有意義。驚天動地的叫喊聲反對這種接管天主教學校的瀆神行爲。但是，在短短的一年左右之後，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教區，遭到危機和馬歇爾「援助」的嚴重後果，碰到不可能繼續維持他們的學校或者建設新的學校了，於是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這個爲法律所規定的基督教新國家來接管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部天主教學校。他們對匈牙利所詛咒的，却正是他們在英國所準備讚頌的。還有比這更偽善、更假仁假義、更騙人的嗎？

而且當明曾蒂試圖在匈牙利的天主教徒農民中煽動擾亂的時候，他還使用其他詭計，例如進行間諜活動，做黑市買賣，聚衆密謀，希望獲得國外援助以推翻人民政府，恢復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他的主要的共謀犯是埃斯戴爾哈齊公爵。一個是「宗教上的」王子，一個是「世俗的」王子。多漂亮的一對。

當他們被捕的時候，發現一隻大的金屬箱子埋在明曾蒂的花園裏，箱子裏藏有一大堆文件和

信件。當這些罪犯站在審判官的面前時，所有的文件都在那裏。要抵賴他們的罪惡是不可能的。罪證都擺在他們的眼前。這就是他們所以認罪的原因。他們的罪惡無法隱藏了。

假如沒有別的東西（實際上却有很多東西），美國大使給明曾蒂的信就够定他的罪了。我把那封信抄錄在下面：

發自美國公使館

紅衣主教閣下：

我榮幸地接奉你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來函，其中提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對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數民族所採取的某些行動，也接奉關於匈牙利公務機關裁減計劃的十二月十二日的尊函，以及包括閣下對目前匈牙利有政治意義的一般事務的見解的十二月十六日的尊函。

尊函的副本業已送往國務院。

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二月十六日的尊函，談到匈牙利的內政問題，並要求美國政府協助改變某些爲閣下所痛心的情況。關於此事，你當然知道我國政府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持久不渝的政策。這個政策長時期並經歷許多困難的處境，證明是自發的，有力的，真正的民主發展的最好的保證。閣下一定清楚地知道：這種政策不可避免地制止本公使館採取任何可以被解釋爲干涉匈牙利內政，或被解釋爲超越外交使團正常職務之外的行動。

我願在此向閣下保證：我將繼續歡迎你表明你要我注意的任何事情的意見。
敬祝閣下假期快樂，並藉此機會重申我最高的敬意。

美國公使 阿瑟·維菲爾德（簽字）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匈牙利布達佩斯

匈牙利 埃茲特高姆

匈牙利大主教

約瑟夫·明曾蒂紅衣主教閣下

從這封信——這封信的真實性是不可能有所懷疑的——可以看出：明曾蒂向華盛頓國務院供給情報，他還要求美國干涉匈牙利的內政——爲的是推翻匈牙利政府。在這個國家，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僅僅那一封信就可以對收信人定罪，以叛國行爲而判處死刑。

而且還有做黑市買賣的勾當。明曾蒂拿來美元，埃斯戴爾哈齊公爵拿去兌換。聖彼得說：「銀子和金子，我都沒有」，但明曾蒂是另一路人。他有銀子和金子——還有美元。崇奉聖彼得的天主教徒工人竟被煽動起偏愛像明曾蒂這樣一個傢伙。

我到西費夫的包希爾去，在一個公衆集會上演講。天主教徒礦工在那裏抗議人民政府處理這個罪犯和對他處以應得的刑罰。我告訴他們說：我將在下星期日再來，舉行一次關於明曾蒂事件的特別集會。這個集會如期舉行。包希爾的會場擠滿了人。有一大羣天主教徒參加。在我講了大約一點鐘，把紅衣主教的案子概略地介紹了一下之後，我們用兩個鐘點回答問題。我一直讓問題提完和我自己精疲力盡才停止。他們的問題不外是：他是一個天主教會的紅衣主教，不管有怎樣的歷史的教訓，他總是一個「聖」人，而「聖」人是不會做錯事的。這就是大多數天主教徒工人的態度。天主教徒知識分子懂得比較多些。他們知道：我們這個時代的若干大惡棍和以前一樣，在宗教和敬神的外衣的掩護之下，幹他們罪惡的勾當。我們的詩人彭斯在很久以前就說過：

上帝知道我不是我應該做到的那種人，

我也不是我能够做到的那種人。

但是我再三思慮我寧願做一個潔淨的無神論者。

而不願藏在福音的旗子下用宅來掩護。

在這裏我願舉出一個實例來說明彭斯的意思。這是從「星期日快報」的一篇社論裏摘下來的。首先讓我們想像一下那個寫這篇文章的小伙子的自鳴得意的面孔吧：

「對於文明和它的自由的最嚴重的威脅也許就在於共產主義對宗教的迫害。克里姆林宮中的十三個人知道：除非他們能够從人類的心目中驅除他們對上帝的信仰，並且代之以像高加索一樣寒冷和像西伯利亞荒原一樣貧瘠的唯物論的幻象，他們是不可能獲得世界霸權的。」

「在歐洲遭受猛烈攻擊的是羅馬天主教會。爲了援助這個教會，所有自認和自稱爲基督教徒者，所有認識到信仰是抵抗唯物主義和人類精神衰敗的唯一墳牌的人們，必須起來挽回頹勢。明會帶紅衣主教的審訊在我們的腦海中記憶猶新。諾爾頓克公爵稱之爲演神之罪。信仰其他一切宗教的人都同意他的話。」

第十四章 原子彈

像我已經說過的，我們和蘇聯的關係愈壞，我們的經濟情形也就愈壞。但是，我能够使議會議員們認識這一點嗎？我提問題，我演說、插話、爭辯、勸說，一切都沒有用。有一個看不見的蛛網，是我無法克服也無法突破的。總有一個合唱隊在歌唱，像某些宗教團體實驗自我催眠一樣，「美國人無論做什麼或者說什麼總是對的，俄國人無論做什麼或者說什麼總是錯的。」儘管我竭盡所能，都無法在這中間打開我的道路。

傑克·勞遜，由於他的功勞現在已得到獎賞——「擢升」(?)爲貴族——在一篇討論這個題目的演說中問道：「俄國人究竟要什麼？」我隨後接着說：

「他問，俄國人究竟要什麼？我將要告訴他。他應該到倫敦東區被炸彈摧毀的區域去，問問那裏的人民，他們要什麼；那些人民要告訴他的也就是俄國人所要告訴他的。他們要和平。關於一黨政府已經有過不少無聊的談論。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黨政府。(大笑聲)好的。坐在下院這一邊的正在大笑的議員先生們是不是相信社會主義將要成功？(議員先生們說：『是的。』)很好，那末，資本家和資本家的黨將會怎樣呢？是不是說當我們實現了社會主義時，保守黨還會存在呢？下院領袖在自己的腦子裏碰到了這個難題，有一天他在發言時建議英國實行政治上的分割。他說：『不論做什麼，不要取得百分之二十的勝利。最理想的是三分之二工黨，三分之一保守黨。』我從聖經中讀到，耶和華曾經命令太陽和月亮停止不動，但是下院領袖有一個更妙的想法。他命令歷史發展停止不動。這是多麼無稽之談！議員先生們能够嘲笑這件事情嗎？」(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七七欄)

我隨後談到外交大臣開場辯論的演說。我儘我所能地說得強烈有力：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像今天外交大臣所作的這樣充滿着譁囂和歪曲的惡劣的演說。很抱歉，我不能討論那篇演說的詳細內容，我沒有時間來談論希臘的悲慘的情況，那裏的工人們正與最可怕的障礙作鬥爭，這是反對黨領袖所發動的，工黨政府的外交大臣所繼續的，現在移交給兇暴的美國太上皇來進行的干涉的結果。現在，我只想舉出那種譁囂和歪曲的兩個典型事例。

「外交大臣說——這是我們全都記得的——俄國正在組織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集團』，並把它們從歐洲的其餘部分割裂開來。讓外交大臣去問一問貿易大臣吧！他已經和波蘭訂立了貿易協定。這是把它從歐洲割裂開來嗎？這難道也是一種自給自足『集團』該做的事嗎？他和蘇聯訂立了一個貿易協定。這是『從歐洲的其餘部分割裂開來嗎？』他正在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討論訂立貿易協定，他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訂立了貿易協定。這也是從歐洲的其餘部分『割裂』開來嗎？

「像這樣粗魯的譁囂過去曾經有過嗎？在記錄中唯一遭受外來干涉的例子是英國的例子。這與外交大臣所提到的國家裏的任何一國都不相干，這些國家是能夠和任何別的国家自由談判的。拿英國和美國的情形看一下。唯一的外來干涉的例子正是馬歇爾先生所宣佈的他曾經在我國和蘇聯訂立貿易協定的時候被英國諮詢過；而他同意了這個協定。如果他不同意，那麼會發生什麼事情呢？」（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七七——四七八欄）

他們都嘲笑莫洛托夫和他在安全理事會上所採取的立場。在那個理事會裏有英國、法國和中國（指國民黨集團——譯者）。他們全都收受美國的金元。我們不是時常聽到「吃誰的飯聽誰使喚」這句話嗎？這些國家中有沒有那一國會經敢於站起來反對美國呢？沒有的，金元施主在安全理事會裏有一個機械的多數。貝文或者麥克奈爾從來沒有一次反對過他們的恩人的意志。唯一的堅強

地站起來反對美國的一切金元威力的人，是莫洛托夫。

在前面引述過的那一篇演說中，我也談到反對黨的副領袖艾登。

「這位議員先生談了很多關於俄國反對我們的宣傳。我們自己國家的宣傳又怎樣呢？看看每天的報紙吧。想一想正在製造出來的反對莫洛托夫先生的情緒吧。由於我們已經有了這種製造出來的反對莫洛托夫先生的惡毒的偏見，遲早有一天，每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物都會異口同聲地叫喊說：『莫洛托夫先生說：

「不」。』然而，莫洛托夫先生却始終是一個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鬥士。他不應該爲『社會主義者』所嘲笑，而應該爲他們所尊敬，這是理當如此的。他們應該以他爲驕傲，因爲他是堅強的，他能够站起來反對金元大王的代表們。『社會主義者』連成一氣來嘲笑莫洛托夫，這是一個政治墮落的標誌。我願意提醒下院，莫洛托夫先生有一個很好的榜樣，因爲我曾經讀到過：在二千年前，有一個人被馬歇爾先生——請原諒我——被撒旦引導到一座高山上，他把世界各國指給那個人看，他而且願意給那個人要多少就給多少的金元，只要那個人肯爲他服務。回答是什麼呢？一個斷然的「不」字。跟着還是一個斷然的「不」字。」（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七九——四八〇欄）

還有一次，我不得不對這同一位議員先生說出下面的話：

「我認識這位議員先生已有很多年了。他昨天的演說是一篇悲哀和憂鬱的作品，那是一個行乞者所說的話。金元外交能這麼快地改變一個人的信仰，這是令人驚奇的。這位議員先生和別的一些人常常說英國站在兩個極端之間——一邊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另一邊是西半球無拘束的私人企業。但是現在，這位議員先生也參加了非美委員會瘋狂的妖魔鬼般的舞蹈，它令人想起克羅爾歌劇院（希特勒匪徒集會場所——譯者）式地在舞台燈光的照耀下，把言論自由，寬容和民主一齊都展覽出來了。

「按照這位議員先生的看法：一個人如果不反對共產黨人，就一定是共產黨人。他是這樣講的——蘇

俄和東歐的共產黨人反對西歐和美洲的民主。如果裏面真有點真理的話，這樣說是很巧妙的。他，一個保守黨人；一個強盜式的地主和資本家的保衛者。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而我，一個無產者，一生都在爲結束剝削他的同伴們的制度而戰鬥的，倒是民主的敵人。不！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東歐的國家正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復興它們的國家，它們受到腐朽的資本主義殘餘的有偏見而又恨心切骨的攻擊，這些資本主義殘餘力量的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從美國壟斷資本家那裏拿到的金元。我敢向他或者下院中別的任何一個人挑戰；誰敢站起來說，如果從整個畫面中把美國除去，歐洲的資本主義還會繼續存在下去。從畫面中除去美國，那末，六個月之內，資本主義就會在每一個國家裏死亡，包括本國在內。

「俄國，或者歐洲任何一國現存的任何一種觀念，一個革命口號或者一種革命象徵，最初，都是由本國輸出去的。只要強盜式的地主和資本家剝削人們的現象存在一天，我們就要爲共產主義的實現而戰鬥一天。即使畫面中沒有俄國，我仍舊要爲共產主義而奮鬥；而且越來越多的工人羣衆將會聽信我支持共產主義的呼籲。如果畫面中沒有美國，資本主義將從西歐消失。我要求在這一邊的議員先生們不要有任何幻想，因爲非美委員會已經規定反對資本主義和私人企業的意思就是非美主義。」

「以德國爲例，我們發現英美在德國的佔領區是聯合在一起的。另外有蘇佔區。那裏的問題是什麼呢？是蘇佔區的共產主義對英佔區和美佔區的民主嗎？有沒有哪一位議員先生說是呢？不是的，在蘇佔區是社會主義經濟，在英佔區和美佔區是資本主義經濟。這就是區別之所在。這位議員先生能否認這一點嗎？……」

「但是，這位議員先生說：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用同樣的語言來反對馬歇爾計劃。這是一個可怕的控訴。他忘記提到：英國和西歐的其他國家用同樣的語言來支持馬歇爾計劃，而這還是美國的語言。這位議員先生，或者任何其他馬歇爾計劃的擁護者，有沒有提到過美國已經對我們實行生活資料檢查這個事實呢？若干實行生活資料檢查的視察員——官方的以及非官方的——已被派遣到本國和歐洲的其他國家，來考察我們的情況，並且要看一看我們是否有任何並非必需而我們又可以出賣的家當，這樣的事實他有沒有

提到過呢？整個巴黎會議是以生活資料檢查爲基礎的，美國對我們的整個態度是生活資料檢查官的態度。本國被放到一個可憎的地位上去了。這位議員先生的演說中貫穿了一個主題——就像它貫穿在我們所聽到的許多演說中一樣。這首歌曲大致是這樣的：

「我們曾經一度是偉大、有力和堅強，

我們創造了遍及全世界的帝國。

現在我們跌倒了，站不起來。

好朋友，你能不能賞賜一毛錢？」

「難道我們必須得忍受這種恥辱嗎？不！不是的！每個人都應當知道我們註定了要面臨貿易上的逆差，因爲我們所需要的貨物大部分必須從美國運來，而美國則不需要我們的貨物。因此，我們必須多方尋找別的供應來源，而以以貨易貨作爲基礎。中加的夫的議員先生（湯瑪斯先生）說得對：『貿易對貿易，貨物換貨物』。這就是如何解決危機，如何堵塞招致危機的漏洞的辦法。」（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七年十月

二十二日，第一七九——一八二欄）

但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最可悲的事實還不是下院精神和道德上的癱瘓。那是一件很老很久的事情了。我記得一九二一年，在凱爾非利舉行補選之後，我在「前進報」回答當選的工黨候選人所作的聲明時說：「去吧，坐上你在議會中的席位，如果你能夠的話；安安逸逸地坐在那裏；而在你的周圍則滿是死一樣的希望。」

死一樣的希望！在我自己的經驗中，我曾經無數次看到它。不，真正的悲劇是全國各地的勞

動男女、工黨黨員和合作社社員——勞動男女所組成的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被社會主義的敵人所利用，在忠於勞工運動的名義下，無孔不入地到處散播最惡毒的反社會主義的宣傳。

運輸大廈會出版一本小冊子，印得彩色精美，但是內容却遠不像印刷那樣漂亮。這是我所看到過的似是而非的反社會主義宣傳中最惡劣的一種，許多勞動男女把這種毒素散遍了各個地區。這本小冊子的大意是說：我們和全世界所遭受的每一件災禍和煩惱都是由蘇聯引起的。

讓我來舉出其中一點——事實上我可以把它們全部舉出來，但是舉一個就足够了——來說明這本小冊子和它的作者的面目。在這以前，我願意再套一下吉伯齡的詩句：

那是伏爾泰漁人的住處，

那裏居住着水手們，

那裏的人來自各個海港，

從密士失必到克萊德，

他們像帝王一樣抽煙喝酒，

他們恐懼地說着謊，

他們的謊話說到紅色的海洋，

其實它只給他們很少的食糧，

他們的謊話說到腳下的土地，

他們的謊話說到頭上的青天，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說謊說得像運輸大廈那樣，

反共反得如此瘋狂。

這本極端虛偽的小冊子告訴我們，美國人是願意把原子彈管制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的——是俄國人反對這件事。那些了不起的、好心腸的美國億萬富翁們，那些曾經是非常可憎和不堪入目的「大肚子的資本家們」，現在變成了漂亮的、肌膚白皙的、人類中最可愛的人們。匍匐爬行吧，弟兄們，匍匐爬行吧。在你們新的美國佬主人面前搖尾乞憐。他們付出了金元，自然必須得到勞役。

當我在西費夫地方談論這個原子彈的問題時，我說過：貝文先生到處噉噉喳喳，像一個訓練到家的美國人一樣，說什麼國際觀察事宜正受到俄國人的阻撓。總是俄國人搗蛋。

他究竟說的是什麼呢？他所指的是所謂巴魯區計劃。巴魯區先生是美國真正的大頭子中間的一個，是邱吉爾的密友，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向聯合國提出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照他的說法——建議觀察和管制原子原料。主旨在觀察。美國在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全世界知道它有原子彈。巴魯區計劃允許美國保有已有的原子彈，並允許它製造更多的原子彈，能製造多少就製造多少。在巴魯區計劃中，對美國沒有任何一種干涉。美國甚至不願意把原子彈的祕密告訴它在大西洋這邊的卑屈的盟友和附庸，更何況讓它放棄原子彈呢，儘管作為製造原子彈基礎的主要的物理事學上的發現却是在英國這個國家裏完成的。當美國壟斷着原子彈的時候，美國報紙上天天都在煽動着反蘇戰爭。

在下院，惡毒地痛恨社會主義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邱吉爾，心懷惡意地——啊，那麼惡意地主張：「當我們壟斷原子彈的時候，我們應當和蘇聯攤牌。」他還是一位基督徒的紳士！我

們有一枝手槍，而另外一個人沒有。拿出我們的手槍對準他的頭，逼迫他讓步。既然有這種出於我們願意稱之為政治家的口中的話，和像我們從美國所得到的這種淫虐狂的影片，誰應該受到犯了暴行之罪（對這種罪行的叫聲得多厲害）的譴責呢？

然而讓我們想一想那個「我們」吧。「當『我們』壟斷的時候」。這使我們成了美國的一部分：第四十九州。賣國賊是誰呢？可是，問題又不斷地頑強地盤旋在他們的心中：「我們是不是壟斷了呢？」蘇聯是「未知數」。在所有這一類的盤算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能不能冒一下險呢？蘇聯在這方面究竟有多少進展？只要我們知道這一點就好了——這樣，就出現了巴魯區計劃。

撲克在美國是一種流行的遊戲。現在假設你在玩撲克，你的對方有很好的牌。他看看手上的牌，他看看他的籌碼，他猶豫起來。他是不是要把它們推到桌子中間——來「攤牌」？他猶豫不決。他看一看你，但是你坐在那裏一聲不響，你的手緊貼着你的胸口。他再一次看看他的牌，他的手伸下去要推他的籌碼，接着他停下來，以極其文雅和溫和的態度說道：「你願意讓我稍微看一看你手裏的牌嗎？」

這就是巴魯區計劃。這正是貝文和艾德禮想要替美國老闆辦的事。對於這件事，蘇聯正當地和非常果斷地答覆說：「不行。」

無論如何，他們並不反對視察。說他們反對視察是存心誣毀。

在聯合國巴黎會議中，維辛斯基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唯一清楚的、明確的和切實可行的建議。他建議進行國際管制和視察，並且同時要決議銷毀所有的原子武器。有許多次，當他提出這個建議時，美國總是回答說：「不，」英國也勢所必然地說：「不。」

對這個問題的盲目無知是令人吃驚的。俄國人受到指責，說他們阻撓對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人類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作出決議。這明明白白不是事實。阻撓作出會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和平與慰藉的決議的，是美國的壟斷資本家。

議會的工黨議員對這件事一無所知。他們全部接受外交部和報紙及無線電廣播爲他們所準備好的宣傳。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受到什麼樣的影響。但是，當大臣們受到他們自己的宣傳的影響並使他們自己陷入是非不分的境地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聯合國正在成功湖開會的時候，我在下院說：

「這裏我要談一談反對黨領袖所說的關於原子彈的問題。有人談論要增加我們的防禦開支。這簡直是發瘋。對原子彈的唯一的真正的防禦是銷毀原子武器並實行國際管制。」

（比萬先生表示同意）

「我看到這位部長同意這個建議——銷毀原子武器並實行國際管制。」

（比萬先生表示同意）

「約翰·路易士先生（布爾頓）說：閣下不是說「視察」嗎？」

「加拉赫先生：是的，那是非常重要的。明天我將要打一個電報給成功湖，表示政府派前座議員支持維辛斯基先生關於銷毀原子武器並實行國際管制和視察的建議。（話被打斷）外交大臣不支持這個建議。」

（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三二欄）

不錯，當我在下院提出那個建議時，衛生大臣和其他大臣們以及每一個出席的後座議員都表示贊成。但是，衛生大臣和其他的人打斷我的話，他們否認這個建議是蘇聯提出來的。就是這樣，他們全都支持這個建議，然而他們却不知道他們的「美國朋友」和他們自己的外交大臣正在竭力

反對它。

兩次表示同意的比萬先生，有沒有這樣的政治勇氣——我還要加一句——和政治智慧，敢於公開出來主張他和我一樣所相信的銷毀所有原子武器並實行國際管制和視察是唯一的真正的防禦辦法呢？

我用下面的話來結束我的演說：

「假使我們能夠對此作出決定，並使它付諸實行，那麼，全世界的人民就能夠真心寬慰地鬆一口氣，而我們也就能夠對我們的軍備開支加以巨額的削減，這種軍費的削減和對利潤的大量削減，將使得我們能夠增加工資，擴大我們的建造房屋計劃，增加建築學校和醫院，並且滿足領養老金的老年人的要求。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會反對這些嗎？」（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三二欄）

現在，問題仍然是這樣。

第十五章 影片和醜劇

在電影院裏，不僅有反蘇宣傳，而且有反對征稅的宣傳。在觀眾休息室裏或銀幕上，你可以看到一幅佈告告訴觀眾說，劇院、音樂廳或是球場的一張一先令六辨士的票只抽一辨士的稅，而電影院裏一先令六辨士的一個座位要抽七辨士的稅。這顯然是過高的課稅。它給電影工業加上了沉重的負擔，使電影院正愈來愈難以支持。看來好像電影最吸引人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不論怎樣，許多電影院的賣座有相當的下降，而隨着電視的出現，這種下降可能更加顯著。

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就要抗議被認為是不公平的課稅了。

蘇格蘭電影放映者協會主席亞歷山大·金爵士樹起了「火十字架」，並且在報刊上及電影院裏領導着一個要求大大減稅的運動。

於是乎便規定了放映的定額。這是一個援助英國製片商並保證他們的影片能在英國電影院放映的措施，但是，這幾乎已經完全失敗了。影院老闆很容易逃避他放映一定數額的英國影片的義務。除了這一點，或者說，其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好的英國影片實在寥寥無幾。我曾經屢次主張加強定額辦法，影院老闆總是向我說：「來，看一看我的記錄，看看當我們完全放映英國影片時，觀眾減少得多厲害。」這是糟糕的事，很糟糕。該負責的不僅是一般人所公認的，因為片子不好。有時，一張很可以的片子却為過分做作，為一種沒有人（我可以特別替蘇格蘭說這樣的話）能懂得的「有教養的」、完全裝腔作勢的音調所破壞了。

英國電影製造事業光榮地出產了一部到現在為止還是最好的影片「哈姆萊特」。當我有一天晚上在下院講到這部影片時，我說它技術上很完善，人物的塑造很成功，演技更是讚不勝讚。這時，另一個議員平靜地插話說：「是的，而且劇本也不壞。」有的時候，別人說了你願意自己講的話，這就是這樣的一次。

英國電影製片業的歷史是一連串可悲的苟安和倒毒的投機。在許多場合，我曾建議與這工業有關的各方面——製片商、影院老闆、技術人員和其他的工會舉行一個會議，來製訂出一個建設和維持這一工業的全盤計劃，但是從沒有能使他們聚在一起。這會是貿易大臣所訴說的苦衷之一。但是，當他們第一次真的聚集在一起，並且協議通過提出減稅的要求時，他却指這是一種「邪惡的陰謀」。

當麵粉業的百萬富翁奧瑟·蘭克闖進這工業時，這工業的運氣有些不佳。他是要來為電影生產做大事情的。但是，他不但不能使它蒸蒸日上，反而引它去碰壁。他不但不能為製作能滿足定額、滿足英國影院老闆的好的和受歡迎的影片奠定鞏固的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發展，反而開始攝製奪取美國市場的「歷史片」。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此固執地追求這樣一個幻想。時間、精力、佈景和金錢揮霍無度地花費在這純粹是一種空想的事情上。

我已經說過，美國沒有任何一點使大不列顛再強大一些的意思，這句話適用於影片生產，一如適用於我們經濟生活的一切其他方面一樣。美國只要能夠，就將把英國影片逐出世界上的每一個市場，包括英國本國市場在內。美國不會做任何事情來鼓舞或加強英國影片的。這些「歷史片」佔用製片場的時間最長，而在技術方面要雇用的人最少。化在攝製「凱撒和克麗奧派特拉」的時間和金錢，至少可以攝成半打真正好的影片，從而提供使更多的技師和其他工人就業的機會。

「歷史片」在美國並沒有獲得市場，却大大地阻礙適合英國市場的影片的生產，以至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蘭克先生不得不向影片業作了一個關於情況的慘淡的報告，其中完全缺乏自我批評，把所有搞得不妙的事情都歸罪於過重的娛樂稅。但是，當一九四八年財政法案在下院討論時，我提出一個關於電影稅的修正案，建議大量削減影院每一座位的稅額時，我並沒有從電影製片者或放映者那裏得到支持。相反地，他們的代表們曾來找我，他們說，我的修正案會危害他們的修正案，他們的修正案是要求只削減最便宜的一種座位的稅額。所以在蘭克先生報告公佈以後，我給了他一封信，並將這信抄了一份給英國演員協會。以下就是這封信，以及兩處來的回信。

親愛的蘭克先生：

我樂於讀到你的報告，看看你對於電影稅所要說的話。

我認識到這種稅已經對我國極其重要的工業形成嚴重的妨礙。當然在娛樂稅以外還有原因，還有基本原因，使得這工業淪於目前可悲的地步，並受到日益增長的、被美國吞併的威脅。

但是，我目前寫信給你並不是爲了要討論這些問題。我想就娛樂稅以及當我試圖對娛樂稅進行鬥爭時所碰到的情況講一兩句話。

在一九四八年，當財政法案在下院討論的時候，我提出一項對電影娛樂稅的果斷的修正案。那時本是一切利害關係的人都應該投入這個爭取真正而有效的減稅的鬥爭的時機。如果他們當時願意這樣做，並且來找我，我會很願意把我的名字從修正案上撤銷，並且讓這修正案在其他「更受尊敬的」後盾下提出的。

但是，不但不是這樣，我還受到各方面（包括蘭克機構的一個代表在內）的抨擊，把我說成是損害電

影工業的發展的人，因為我的修正案，如果我堅持通過了它，會妨礙正在以電影業的名義提出的修正案。我當時就告訴這些人，他們的修正案不值一笑，它對電影業不會有任何幫助。

我現在願意建議我當時所曾經建議過的：這工業的所有部門應該聚集起來舉行一個會議，作出關於保證英國影片生產、銷行和放映的最全面的發展計劃，並採取必要的步驟使娛樂稅的削減真正得以實現。

我希望你和那些與這工業有關的人認真考慮這個提議。

你誠摯的威廉·加拉赫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非常感謝你十一月十日的來信，並向我提起你在一九四八年如此出力地提出過的意見。你無疑地有充分的理由，說電影業應該比已往更多多地注意你當時所發表的意見。但是，自然沒有一個人那時能夠預見隨後發生的事情，他們也不可能精確地作出預測。

我相信，有必要對我們所有的問題作一次新的處理，這現在已為這一工業的每一部門所廣泛了解了；你將樂意知道電影放映者協會和英國電影製片者協會現在已經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來處理我們問題中最緊迫的問題——娛樂稅。我深信這樣合作的結果只會有好處的。

非常感謝你寫信給我的好意。

你誠摯的奧瑟·蘭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英國演員協會的回信，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非常感謝你十一月十四日附有你寫給蘭克先生一信的抄件的來信。

你將樂於知道，代表電影業中六個工會中的五個的影片業僱員委員會正在計劃舉行一個會議以擬出計劃，保證充分地推進組織工作……影片業僱員委員會的建議，目前正提交組成該會的各工會的執行委員會，並已經得到我們執行委員會的支持。

你誠摯的

秘書長 高爾登·杉底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從英國演員協會的信中可以看到，使這工業的代表們聚集起來的努力正在進行。如果他們不趕緊，他們就會太遲了。英國能够製作好的影片，這是已經證明了的。我們有許多好的男女演員，只要他們能改進「影幕聲音」。這特別適用於女子，雖然有些男子的嗓子也是可怕的。去掉矯飾，去掉做作的教養；

「懇求你像我向你講話時一樣的音調說話，在舌上輕快地發音；但是，假使你高聲大氣地說，如你們許多演員所做的一樣，我就寧願讓鎖上叫賣的人來說我的話了；但也不要太柔順，而應自己斟酌情形，使動作適應語言，語言適應動作；特別注意你不要不得體。」

哈姆萊特的這個忠告應該為所有與影片生產有關的人所遵循。

一天晚上，當我走過議員休息室與來賓休息室之間的走廊時，我碰到一個從好萊塢來的電影演員，這個人會使哈姆萊特滿心歡喜的。我想，他是美國銀幕上最好的演員。我看他坐在那裏，我就驚呼：「天哪，原來如此。」

我只能把他稱爲某先生。「你等候什麼人嗎？」我問他。

他告訴我：「是的。」他是來見空軍准將哈維的，他們曾在一個宴會上遇見過，但是哈維並不像會出現的樣子。

他接着說：「我想到裏邊去。」

我告訴他：「我給你弄一張票。」我就走開去弄了一張。

當我帶他走向下院時，我說：「你是一個很不幸運的人。你來這裏是爲看一個很和藹、很有趣、並十分受人尊敬和歡迎的保守黨員，而你却落入一個共產黨員的手中了。」

「天曉得，」他說，「在我們經過了這樣一些事情之後。」然後他笑了，很熱烈而可愛的笑，他問我，「能够給我弄一張明天的票嗎？」

這是爲期三天的關於英鎊貶值辯論的第二天。次日得由衛生大臣首先發言，各色各樣的訪問者都嚷着要進去，票已經發完了。我對他說：「我將盡力設法，並將在早晨給你回音。」

他告訴我他住的旅館。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到旅館找他。接綫室把我的電話接到他的房間。一個男子的聲音和我講話，可能是秘書或經理或其他人，他問我是誰。我回答說：「我是下院的侍役，請你告訴某先生，在這裏的貴賓席中有一個座位留給他。」

如果我說出了我的名字，非美委員會便可能在他回到好萊塢時找到他。在將軍和銀行家的政府統治下，像他們在美國的情形那樣（這裏在工（？）黨政府統治下，情況也一樣壞），是僥倖不得的。

我一向客人很多。一天下午，有兩個青年從格拉斯哥來看我。兩個老朋友。他們在旁聽席上坐了兩個鐘點，然後我在樓下遇見他們。他們中的一個憂鬱地望着我說：「我的天，威利，我替

你難過。你在那裏沒有發瘋真是奇怪。」

我俯身向他，聲音不高不低地說：「不要告訴別人，我要瘋了。」

這很自然地使我想起我對索多先生的一句話所引起的一件意外的事情來。索多先生可以稱爲一個不合理的唯理主義者。這些年輕人——唯理主義者喜歡引用伏爾泰的話：「我憎恨他的意見，但是我將爲他發表他的意見的權利而竭力鬥爭」；或者同樣意思的話。但是，這不適用於對共產黨的意見，無論如何，不適用於索多先生的情形。給他一個機會，他就惡狠狠地露出牙齒，向他所痛恨的赤色分子開火。

當他提出一個他的典型的問題時，我講了一句原只是自言自語的、不須記錄的話。但次日，這句話竟出現在議會議事錄上，並得到下列結果：

「個人發言

「索多先生：議長先生，我想作爲一個規則問題向你提出一個我曾經告知過你的問題。昨天，我在質問時間內問及一項補充意見，我想其目的是在支持議長的權威。西費夫區議員先生（加拉赫先生）插話說：

「這位議員先生是『瘋子』。」（『正式報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

「他是指我。我當時就聽到這種下等人的語言，但是我認爲這是自言自語，不會記在報告裏，我準備以它應得的蔑視來對待它。但是現在我發現它印在『正式報告』中，介於我的一個問題及你的一項裁決之間，我就必須加以重視。因此，我請求你給我補償，在二種辦法中任擇其一：或者是把這些侮辱的語言從『正式報告』中塗去（議員們：『哦』），或者是叫西費夫區議員先生道歉。你，閣下是議員能够向之請求保護，免受鄙野地侮辱人的攻擊的唯一的人，的確，請求只能向你提出。議長先生，我滿懷信心地指望你答

應我的請求。

「加拉赫先生：如這位議員先生所說，我說了那句沒有意義的自言自語的話。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會在議會議事錄上看到它。我深切同情這位議員先生，因為當我有一次週末在家時，有些事情弄得不對頭，我就對我的妻子說，『我想我要瘋了』，她很了解我，說道：『喔，你只是想你是這樣』。」

「索多先生：我認為這是有道歉性質的話，所以我無意使用我在其他情況下打算使用的語言，而說這位議員先生是一個說謊者。」

「議長先生：議員先生不可以把另一個議員稱爲說謊者。他一定不能這樣做。」

「索多先生：因爲這位議員先生指我神經錯亂，他就是一個說謊者。」

「議長先生：我很抱歉，但是議員先生一定不能稱另一個議員爲說謊者，不論他怎樣說。他可以說他弄錯了，或者他有謬誤，或者他不對，但是他一定不能稱他爲一個說謊者。假使議員先生說另一個議員弄錯了或是不對，那就完全要得，而且也完全一樣清楚明瞭。」

「索多先生：議長先生，你知道，我對議長很尊重，我並且經常表現了這種尊重，但是我更尊重真理。我將不把這位議員先生稱爲一個說謊者，假如你禁止我這樣說，但是我要說這位議員先生所說的是謊話。」

「議員們：哦。」

「議長先生：我不希望在這件事情上引起爭吵，但這確是一件嚴重的事情。議員先生一定不能說另一個議員先生說了謊，因爲這就是說另一議員先生故意說假話。任何人可以說，某議員先生有謬誤，或者不對，或者傳錯了——任何表達這一意思的話——但是他一定不能稱他爲一個說謊者，他必須不說這位議員先生說了謊。我必須以我所有的權力命令這位議員先生收場，我可並不希望引起爭吵。」

「邱吉爾先生：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在過去幾年中議長會裁決，「謊話」這個字限和「這是一句謊話」這句話並不是違反規則的，雖然「說謊者」的稱呼自然是違反規則的。我當時本想要說，把「謊話」這字眼用到我們合法的、有秩序的討論完全是別開生面，「謊話」及「說謊者」都應該禁止在下院使用。」

「議長先生：這就是我所說的，也就是我的意思。」

「溫特吞伯爵：進一步就規則來說，正是爲了下院的尊嚴，我們應該把這事情弄清楚。正如我那位保守黨的朋友所指出的，曾經不止一次裁決過——我想，先生，是你自己裁決的——「謊話」這字眼是合乎規則的。我們現在要得到你的一個裁決，究竟「謊話」這字眼是合乎規則的呢，還是違反規則的呢？」

「議長先生：這位高貴的勳爵說，我會經裁決「謊話」這字眼是合乎規則的。我可一點也不記得。」

「加拉赫先生：議長先生，我想向你，向蘇爾底許區議員先生（索多先生），向下院，爲了使用了這個引起這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的字眼一事表示歉意。」

「索多先生：議長先生，我十分滿意。」

「一些議員起立。」

「議長先生：我實在認爲我們現在可以在和諧一致的情況下結束這件事情，而不再說什麼了。」

「邱吉爾先生：我希望我們能從這討論中得到另外有永久性的好處。議長先生，是否我們可以認爲，你的裁決就是規定把一個發言稱爲「說謊」，或者侮辱一個議員先生說他是「說謊者」，都是完全違反下院的規則的。」

「議長先生：我想，下院向來就是這樣做法的。我的意思就是：應該這樣。」

「邱吉爾先生：我僅想知道辯論的界限何在。」（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第四三八——

四四〇欄）

是的，先生，這裏到處都是大量對於英國影片有用的材料。

但是，不開玩笑，假如從事影片業的人能聚到一起並作出必要的計劃，英國影片目前是有大好機會的。好萊塢在走下坡路。它正從內外受到破壞。內部是親法西斯主義者，外部是非美委員會。後者造成的禍害是無法估計的。它會依憑很重的罰金和監禁的判決，力圖堵住美國一切的進

步思想。我已經說過，工黨領袖們在英國執行着同一任務。他們竭力用清洗、開除及恫嚇的辦法，想堵住工黨及工會運動中的一切進步思想。

只想到金元，不想任何其他東西，這代表着美國的法律和先知者。各界的著名人士被傳到這個集無知、惡毒、恐懼及新發的癲狂病之大成的委員會來。它擁有美國國會授予的權力，扼殺思想——殺害人們的靈魂的權力。它僱用了說謊者、偽證人、罪犯（甚至它的主席已證明是一個罪犯），這般人不管被問到什麼或要他們做什麼，都對天發誓。

在對付過共產黨員、共產黨嫌疑犯、進步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政府僱員和各色各樣的人民以後，它把它的注意力轉向了好萊塢。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景象。滑稽劇，粗野的和魯莽的，但也是黯淡的悲劇。導演們、劇作者們、演員們被勞勃·泰勒及勞勃·蒙高茂萊折磨和侮辱，這兩人敗壞他們自己的職業，而出席並稱讚和贊同針對着他們同事的邪惡的訊問。十二個好萊塢卓越人士由於拒絕在為非作歹的頭子湯瑪斯和他的半癲狂的委員會（半癲狂可能還是說得過輕了）跟前貶謫自己，被判監禁一年。「硬傢伙」亨弗萊·鮑嘉因受到與左翼有關係的控訴，被強迫在這些卑鄙的傢伙面前屈辱自己。沒有頭腦的琴速·羅吉絲控訴說：在一部影片中，導演要她說一句美國某些事情不民主的話。她斷言這是赤色宣傳，而癲狂的委員會同意她的斷言。然後，蒙高茂萊和泰勒發誓要終身從事消滅赤色分子，他們兩人都認識不到，他們和委員會的行為，更可能會滅絕好萊塢的影片事業。

我這裏有「蘇格蘭每日快報」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一份剪報。該報要我們讀一個電報——但是，我最好是讓這個摘錄自己來說話吧：

「請先讀這個電報……」

「……它先一星期邀請快報影評家評論一部克拉克·蓋博的影片。」

「請你出席明天四點半在利茲招待報界的電影放映會，放映的是克拉克·蓋博、洛麗泰·楊、佛蘭克·毛根、馬利萊·麥克斯惠爾、詹姆士·葛里遜、路易·史東、雷蒙特·華爾本主演的「城市之鎖鑰」。

「城市之鎖鑰」將於星期日在帝國影院代替「埋伏」上映，但是舞臺將上演「戲船時代」。」

「這表明勞勃·泰勒現在已不能使電影院滿座了。」

「假如你今天下午站在倫敦一個最大的電影院的外面，向空中豎起機靈的耳朵，你將聽到華格納所作的「神們和巨人鬥爭所造成的世界的滅亡」的曲詞在微風中飄蕩。」

「因為裏面正在演奏「神們和巨人鬥爭所造成的世界的滅亡」，以替代好萊塢的兩個最大的明星——勞勃·泰勒和克拉克·蓋博的作品。」

「勞勃·泰勒的名字一度可以吸引人羣去看任何影片。這是一個使賣票房的收入大增的明星。」

「但是，昨日，泰勒黯然失色了。他最新的影片「埋伏」原定放映一個月，但還不到時間就從帝國影院換掉了。」

「他吸引影迷的電影明星的聲譽，已經為蓋博先生所替代。在一個沒有內容的劇本中，泰勒的側面像已經失敗了，蓋博著名的微笑就能夠獲得成功嗎？」

正在失去他們的魅力

「好萊塢好容易終於意識到，它的有效驗的、老牌大明星正在喪失他們對大眾的魅力。華納兄弟公司企圖出售它與埃洛·弗林和亨弗萊·鮑嘉的長期合同，但迄今沒有買主。」

「像瓊·克勞馥、琴迷·羅吉絲、梅娜·洛埃、羅那德·考爾門或威廉·鮑惠爾之流的名字能夠保證一部影片賣座的時日已經過去了。電影界的元老們已在脫去他們頭上的假髮，放鬆他們的下顎肌肉，並（換

個譬喻法)準備退隱了。

「誰將代替他們在世界上電影院的銀幕中的地位呢？坦白地說，我想不出一個年輕的、戰後出現的明星來，他的名字會使電影觀眾站隊。他們缺乏那種能够一舉成名的性格。男的是漂亮的，女的是豐滿的，他們之中有一些人也還能演戲。」

「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具有曾經是好萊塢生存基礎的那種品格。」

作者然後進而想找衰落的原因。他和他的同行的其他人一樣，會找出二十個錯誤的原因來，但是害怕提到真正的原因。急劇衰落的原因不是電影明星——而是由於政治迫害。在好萊塢現在的情況下，如何可能出產影片呢？每一個人都害怕他的鄰人。誰敢表示一個與金元信仰相反的意見呢？誰敢介紹一種新的思想，而第二天就可能發現自己被戴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呢？

最近幾年在美國和英國最賣座的影片是「黃金時代」。這部影片是受到非美委員會斥責的。

這影片的開端是，一個復員的飛行員想定一張飛機票，回他的故鄉。人家告訴他，那裏沒有飛機，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當他正在失望地沉思時，一個大概是富有的資本家走到賣票處的櫃台前，付錢定票。櫃台裏的女子告訴他他的過重的行李要付多少錢。這已使非美委員會受不了。這是共產黨宣傳。這是對私人企業的打擊，是必須從好萊塢滅絕的一類東西。

在這種調查之下，一個劇作家或一個製片者怎樣能做工作呢？每一個新的故事都必須有「金元標記」。每一個劇本都必須經過仔細審查，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必須經過查驗，證明沒有受「赤毒」。這樣，積極性受到一連串恐懼的束縛，創造性為猜疑的氣氛和監獄牆壁的陰影所窒息。

非美委員會所規定的「不要有思想」是美國一切思想的界限。但是，所有的美國人並沒有屈服於這個毀滅靈魂的制度。面對着有組織的暴行、迫害和監禁，英勇的男女們向這個新式的法西

斯主義作鬥爭，這個法西斯主義像醜惡的怪物一般地伸展至全美國，帶來墮落和腐敗。但是，好萊塢在泰勒和蒙高茂萊的認可下，屈服了，其結果現在已在它的影片中表現出來。假造的奇景，殘暴的淫虐，媚人的眼色，性的誘惑，這就是好萊塢由於政治迫害的結果而墮落到的地步。腐敗的影片絕不能吸引人們，不管是哪個明星或哪些明星們主演的。

對於英國電影業，這教訓是清楚的，容易懂得的。攝製好的影片，像避免「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陰惡的瘟疫」一樣避免非美委員會和英國工黨領袖的政治迫害。積極性，創造性，新的和永遠新的思想，這些是影片業生命的血液。扼殺這些，衰敗和死亡必然就會隨之而來。

第十六章 碼頭工人是偉大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加拿大海員工會由於與船主對工資問題發生爭執而號召罷工。在我國的加拿大海員響應了這個號召。兩隻加拿大船停泊在阿芳茅斯，另外兩隻停泊在倫敦碼頭。碼頭工人把這幾隻船當作「黑」船。

停泊在阿芳茅斯的船幾天沒有人管，之後，碼頭工人被通知去卸貨。他們拒絕這樣做，結果阿芳茅斯的碼頭從五月十六日到六月十五日陷於停頓狀態。與這同時，「比佛貝瑞號」和「阿哥蒙號」這兩隻船停泊在倫敦碼頭，據信有着一個默契，倫敦碼頭工人將不被召去卸貨。

在阿芳茅斯爭執期間，並沒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談起共產黨煽動者。罷工委員會在性質上大體與此差不多恰恰相反。阿芳茅斯的碼頭工人曾設法想取得倫敦碼頭工人的支持，但是由於倫敦碼頭工人並沒有被召去處理這兩隻「黑」船，所以無可支持。在工黨領袖和工會領袖對他們的不斷攻擊之下，阿芳茅斯的碼頭工人經過艱苦的鬥爭之後，被迫——由於出動了士兵——屈服。

碼頭管理局在處理了停泊在阿芳茅斯的兩隻加拿大船以後，現在就把它們的注意力轉向倫敦了。

六月二十日，倫敦碼頭工人在報到上工時，被派到「阿哥蒙號」上去。他們不肯去。他們然後又被拒絕給予別的船上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工人不久就被帶動了，在開過一次羣衆大會之後，

別的工人也決定停止工作，表示同情。不久，下院一片喧嘩，狂怒叫罵這是「共產黨的陰謀」。勞工大臣和內政大臣在這方面特別突出。他們盡其所能地往火上澆油。

照勞工大臣的說法，和加拿大伙伴緊密團結的碼頭工人，是共產黨的「受騙者」。一個跟着一個的呼籲向他們發出，要求他們恢復工作。每天在下院都有新的聲明，但是勞工大臣總是不得不宣佈被帶動的工人的數目正在增加，而不是減少。這次事件被稱為罷工，但是事實上這是停雇。每天早晨，碼頭工人都報到工作。

假如把這兩隻船開出這個地區，並且在加拿大海員的爭執結束以前不再來，在倫敦碼頭就不會發生任何事件。但是正是在這兩隻船停泊的碼頭上，他們發出最後通牒：「到這兩隻船上去工作，否則你們就索性不必工作了。」

據碼頭管理局、勞工大臣和工黨政府說，必需先卸清這兩隻船，然後任何別的船隻才能够卸貨。但是，當政府決定派士兵去碼頭工作後，這兩隻船不但不最先卸貨，反而是在最後。在下院，雪尼·錫爾佛注意到這種特異的並非緊急的情形，起立質問首相為什麼他們不先卸清這兩隻船，從而消除碼頭爭執事件的原因？首相避開這個問題，照舊呼籲碼頭工人不要被引入歧途而結束這次爭議。

我的同事菲爾·皮拉丁跳起來質問首相，假如他是這樣急於結束這次爭議，為什麼他不考慮錫爾佛的建議。次日，另外一兩名工黨議員認為他們有了一個打擊共產黨人的好把柄。他們抓住提出補充問題的機會，暗示說皮拉丁要士兵到「黑」船上去工作。他們太聰明了。他們忘記了，對士兵們來說，並無所謂「黑」船，但是對碼頭工人來說，不僅這兩隻加拿大船，而且所有被這次事件牽連在內的船隻都是「黑」船。

從來沒有人受到過像倫敦碼頭工人所受到的這樣集中的攻擊。也沒有人像倫敦碼頭工人保持這樣的堅定不屈。在我作為工人階級運動者的生活中，我經常目睹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每當工業中發生鬥爭時，對不同部分的工人大發雷霆，但是工黨和工會領袖們在這次反對倫敦碼頭工人的運動中，其所作所為更超過我過去所見所聞的一切。

兩位工黨會議員米立希先生和德恩斯先生——後者是國際合作上的一個黯淡無光甚至可以說是熄滅了的名家——特別活躍。他們跑到加拿大船隻上去，看到一兩名脫離罷工的水手，搜尋了各種「好萊塢」式的故事，他們就根據這種故事作了一個關於「共產黨的陰謀」的報告。這個報告，有人告訴我們說被交給了軍事情報局第五處。

在我周圍，我能夠聽到工黨會議員，自命是社會主義者的人申述理由，慫恿使用軍事情報局第五處去對付倫敦碼頭工人。鬥爭的時日一過去——對於他們說來——人是多麼容易變啊。倫敦東區的共產黨人在無黨派的工人支持之下，給予了罷工的加拿大海員以出色的幫助是事實，他們曾為他們募捐，供給他們食物和住所。這是他們的光榮。他們是忠誠的黨內同志，是忠於工人階級的成員。但是當搜集了犯罪調查局、軍事情報局第五處、米立希和德恩斯那裏來的所有報告時，內政大臣却不得不宣佈沒有足以控告任何人的證據。這就是所謂「巨大的共產黨的陰謀」。

但是，在工黨議員比保守黨人還要做得保守的情形下，政府便沒有任何困難地實施了「緊急權力」，這項權力給予專設的執行機關以獨裁全權。如我已經講過的，每天，儘管有陰謀的「暴露」和要求碼頭工人復工的呼籲，「支援」碼頭工人的數目始終一直上昇。這樣，呼籲是失敗了，必須用強力迫使他們復工。

這就是「緊急權力」的意思。首相、勞工大臣和內政大臣都以為，只要暗示一下，說這些權

力將付諸實行，這就會使碼頭工人奔回去工作的。他們對倫敦碼頭工人的瞭解太少了！在簽署這項公告的次日，罷工的人數從一萬二千人一躍至一萬五千人。「緊急權力」的宣佈是一個失敗，完全的失敗。這項公告不得不以上英王書的形式提到下院。首相用這樣的話將它提出：

「謹上書陛下，感謝陛下的聖諭，聖諭通知本下院，陛下認爲按照一九二〇年緊急權力法，定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發佈公告，宣佈緊急狀態的存在是合宜的。」（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第四一欄）

首相重彈了一遍我們自勞工大臣與內政大臣聽到的種種濫調。在他之後，艾登先生代表保守黨、克萊門·戴維斯先生代表自由黨、麥克萊先生代表國家自由黨接着發言支持。然後輪到了我。由於我認爲碼頭工人的這次鬥爭是戰後工人階級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並且由於我在我的發言中曾接觸到這次鬥爭的許多方面，我希望能原諒我引錄一些我的發言如下：

「加拉赫先生（西費夫區）：我起而反對接受這項上陛下書。我的意見是政府和碼頭管理局應對現存局勢負責，並且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就可以澄清局勢，而完全無須將英王陛下牽連進來。

「在我接下去陳述我的總的見解之前，我要糾正首相所說的一些話。在提到關於要士兵卸清這兩隻船的意見時，他說這意見是共產黨人及其「追隨者」提出的。這是不真實的。這意見是納爾遜與科恩區上議員（錫爾佛先生）在本下院提出的，並且隨後不久我的可敬的朋友、邁爾區議員（皮拉丁先生）就質問首相，假如他像他所顯得的那樣急於提議結束這次罷工，爲什麼他不接受納爾遜與科恩區議員的意見。把這意見說成是共產黨人和「追隨者」提出的，顯然是大大言過其實的，雖然還沒有到司法大臣所做的那種程度。」

「我肯定地說，四年以前，下院這一邊的正要排除保守黨人而現在已得勝了的這些議員，當時沒有一個曾經夢想到他們會在這種事情上與保守黨人聯合一起。反對黨副首領一度在下院中談到過的『紅旗』，較之那四十位隱匿的共產黨人更深地埋藏於地下了。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和詩人一起背誦：

「我的頭沒有流血，

安全、無疤而完好；

為保持它繼續如此，

我出賣了我的靈魂。」

「據說——並且有許多議員先生在這裏談到過——共產黨與碼頭工人的這次大示威有關。（一位議員說：『他們是說過的。』）情形是怎樣的呢？當布利斯托爾（西部港口，阿芳茅斯是它的深水碼頭——譯者）工人罷工時，倫敦碼頭工人是否行動了呢？……有兩隻船停泊在碼頭上，但是有人使碼頭工人們了解他們不必去卸貨，也沒有人叫他們去卸貨。當布利斯托爾工人罷了工並要求倫敦碼頭工人予以支持時，他們說，『這不是我們的事。』首相能否認這點嗎？之後，當布利斯托爾工人失敗了，壓力就轉加到倫敦碼頭工人身上。這是不是真實的呢？

「倫敦碼頭工人面對着這樣的事實，即碼頭管理局實行了『分而治之』的狡猾政策。他們擊敗了布利斯托爾工人，然後他們對倫敦碼頭工人施用壓力，以迫使倫敦碼頭工人陷於布利斯托爾工人被迫陷入的同樣境地。但是碼頭管理局打算盤時未考慮到倫敦碼頭工人的勇氣與堅韌，而且，不管怎樣說，這些人可敬地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忠誠與堅決。現在，在擊敗他們的最後努力中，我

們得到這項可憎的建議——對於任何一個由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苦難中出而掌權的人所組成的政府說來，是一個恥辱。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罷工都是經工會批准的。只是自我們有了工黨政府以後，未經工會批准的罷工才被說成叛國。

「當這些緊急條例最初被一夥在『聯票選舉』之後湧進下院的臭名遠揚、扳起面孔的人提出的時候，工黨會竭力反對它們，當時的工黨領袖還曾說過：

「我們不能授予這個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以這種永久性的立法，不論它是目前的這一種類型的還是一個工黨政府。」（官報，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三三卷，第一四〇七章）

「埃里斯·史密斯先生：這是威利·亞丹姆遜。

「加拉赫先生：工黨議員投票反對過這些條例，但是在一九二四年工黨政府治下，却有人提議援用這些條例去對付碼頭工人，不僅在倫敦而且在全國。當時國家正在竭力設法站住腳跟，經濟情況惡劣，碼頭工人的罷工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害——這是當時保守黨論調的要點，正像它今天是工黨與保守黨論調的要點一樣。但是，要對一九二四年國家經濟生活大規模破壞負責的是共產黨嗎？（議員：『是的。』）不是的，要對之負責的是一位名為貝文先生的紳士，他是領袖。國家命運不是他所掛慮之事，他所掛慮的是碼頭工人和他們所提出的要求，而他們是完全有權提這樣的要求的。我當時支持他們，並且在下院這一邊的每一個有一點知識的人當時都支持他們。

「與罷工有關的兩件事影響到目前的局勢，一件是主要的原則。工人階級最好的傳統之一是仇恨破壞罷工的行爲。而今天激怒了碼頭工人的，就是那種想迫使他們破壞罷工的企圖。每天早晨他們都到碼頭大門處等候並且願意工作，這應該是看得到的事。在一個碼頭上要招一批人去「比

佛貝瑞號」工作，在另一個碼頭上招一批人去「阿哥蒙號」工作。沒有人響應，因此碼頭大門繼續關着不開，而碼頭工人被剝奪在其他船隻上工作的權利。每天早晨都是這樣情況。當我們有一個政府和一個碼頭管理局去處理這類問題時，施行緊急立法的需要在哪裏？

「假如加拿大海員的罷工與碼頭工人無關，爲什麼當採取結束加拿大爭執事件的措施時，不允許碼頭工人到其他船隻上去工作？假如它與碼頭工人無關，爲什麼不將這兩隻船開出這個區域？爲什麼不允許碼頭工人繼續其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的罷工中，罷工委員會曾向各碼頭委員會發出一項簡短的通知。通知儘管簡短，却兩次提到罪惡的破壞罷工的勾當。通知中的一小段——從今天碼頭工人的態度來看，這是重要的——這樣寫道：

「負責安全的人員可以留在裏面，但只有在沒有派遣破壞罷工的人在內的情況下，才可以這樣做。」

「另外一段寫道：

「委員會讚揚鐵路工人工會在他們決定阻止破壞罷工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歡迎他們的合作。」

「這項對每個碼頭委員會發出的通知是由貝文簽署的。假如有一件事在我國的工會運動中比別的事情更一再強調說明的，那就是反對破壞罷工。這一點必須估計在內。

「這裏不妨提到，當時的最高委員會的倫敦區委員們曾經通過決議支持碼頭工人。這項決議中有一兩句話表述了我今天的觀點。它說：

「我們也有直接與事件有關的工人們的那種自然而然的、由於雇主們的頑固態度而產生的憤恨之氣。」

「這同樣適用於今天，一如它適用於發出那個通知之時。但是當罷工正在進行時，藍姆賽·麥克唐納先生並不是無所事事的。他在佈置對付罷工，正和今天在進行佈置的情形一樣。一九二四年的罷工是經工會批准的，這事實並未使情況有所不同；進行佈置是完全一樣的。當時身爲首相的麥克唐納先生，在向下院申述情況之後說：

「……假如有需要的話，我希望下院將使我們能得到我們所要求的緊急立法。」

「密契爾·湯姆遜爵士：是否這些議案將按緊急權方法提出……？」

「首相：這是在探索的事情並正抓緊時間考慮進行的最好辦法。」（官報，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第一六九卷，第一七五三章）

「一九二四年的罷工是工會批准的，可是還是作了這種佈置，但是，它們沒有付諸行動，因爲罷工的領袖們很焦急不要使這樣一種行動施諸勞工運動，他們作出了妥協的協議而結束了罷工。但是知道這次罷工的領袖貝文先生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對首相和他的主要副手——現在的下院領袖——的狂怒的，就爲了這件事，貝文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工黨會議上站起來對麥克唐納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攻擊，但是他被代表們喝倒了。當時我湊巧也是在那裏的代表，我就跑過去對他表示同情。」

「就當時他的態度而論，他怎能成爲今天所正在發生的事的參與者呢？實在的，他曾爲碼頭工人很好地盡過力，但是同時應該記住，是碼頭工人——這些受盡詆毀的碼頭工人——把他提拔起來，並且給他機會使他成爲工會運動的一個首要人物的。（擾亂）我已經說過，他曾爲碼頭工人很好地盡過力——這總是記得的，被遺忘了的是，碼頭工人提拔了貝文先生，並且給他機會使他

成爲工會運動的一個首要人物。

「阿伯里先生（布利斯托爾中央區）起立。

「加拉赫先生：和其他的人的主要任務本應該是保護工人們，現在竟準備去毀滅他們，這是多麼可恥的事。（議員們：胡說八道。）我並不認識這些牽涉在內的工人中的任何人，但是，作爲無產者，我謹對他們的忠誠與堅決表示讚揚。當我們有着這樣的人時，工人階級的事業，儘管其他任何人會背叛它，却是保險的。」

「有人告訴我們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共產黨願意要混亂。再也沒有像這樣虛假、這樣缺乏甚至最起碼的真實性的話了。共產黨有一個政策。它是唯一能使國家脫出金元的牢籠並使它解除目前有混亂之勢的威脅的政策。議員先生們一定能夠了解，假如我們願意要混亂，我們只需要靜坐旁觀，聽任大臣照他所做的那樣幹下去就行了。美國人稱之爲『污辱』運動的辦法，現在已變爲工黨和保守黨領袖們大夥兒最後的卑鄙手段了。這種手段的最近和最可笑的一次表現，是檢察總長的矛盾百出、不負責任和極度狂亂的演說。他要不是準備跳窗，就是在想繼承希特勒和戈培爾的衣鉢。但是我要提醒他，這類謊言的誹謗並不是新的東西。當一種舊的社會制度衰敗，同時新生力量正在設法取而代之的時候，總是有這種事情的。」

「我將引一兩段話，以表明這類運動怎樣能夠搞起來以及它能作些什麼惡。在布拉克浦宗教復興（指工黨在布拉克浦所舉行的年會——譯者）之後，我可以肯定工黨領袖們會欣賞這些引語的。在這以前，我早先已經在下院引用過一句了。保羅在寫信給哥林多人時可以說，

「……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檢察總長忙於追逐保羅及其他諸人。在使徒行傳中（話語被打斷）。新約是利物浦蘇格蘭區議員（羅根先生）永不會讀的。在使徒行傳中，我們知道在爲人民効力的司提反——宣傳就在這裏——作了見證之後，

「衆人大聲喊叫……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

「那就是當時的檢察總長——」

「羅根先生（利物浦蘇格蘭區）：道地的共黨。」

「加拉赫先生：不。這位議員先生應該記得，當時負責這種宣傳的是大祭司。那是當時的檢察總長之流，才使這樣的事情有發生的可能。在約翰福音中有關於謊言宣傳的作用的突出事例：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說了這話，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王麼。他們又喊着說，不要這人，要巴拉巴。現在……斯奈德，我請求原諒……巴拉巴是個強盜。」

「羅根先生：就體統說，像這樣一個無賴，在不列顛的下院中蔑視和全不在意人們所有的宗教信仰，這是應該的嗎？」

「議長先生：我不認爲有什麼規則規定這是犯規的，但是我必須說這使我滿心厭惡。」

「加拉赫先生：我是在引用英國文學中認爲是最經典的著作之一。」

「溫特吞伯爵（郝夏姆）：我們不能引證基督教救世主的話語來支持政治的攻擊，先生，你的許多位前任者曾經多次地這樣裁決過，我提議命令這位西費夫區的議員（加拉赫先生）收回他

所提到的基督教的話。

「議長先生：我找不到這樣的規章，然而，我必須說我厭惡它，並且我希望西費夫區的議員先生（加拉赫先生）不再繼續進行這種爭辯。」

「加拉赫先生：我的發言已近結束，我只想再作一次引證。這認爲是英國語文的最美好的文學，我不明白爲什麼議員先生們對我作引證另眼看待。我作引證是爲表明罪惡的謊言宣傳能够和已經作了什麼樣的惡。對那些紳士，對那些如此欣然願意——不，是如此熱心地作偽證、竭力使用這種恐怖方法去反對工人階級的議員先生們——他們自己對工人實行最殘酷的極權主義却譴責東歐人民實行極權主義，因爲東歐人民結束了資本家們和地主們的掠奪——我要說的是，而我再引證一下，這次是引自馬太福音的：『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呵，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這個說法，勝過我所能希冀做到的，表示了我對於那些爲了一小撮污穢骯髒的金錢就會背叛他們的國家、背叛他們的階級的人的意見。」（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第四五六——四六五欄）

現在我要做的事是引一封我給內政大臣的信。這封信寫得很清楚：

親愛的儲特·伊迪：

昨天我去見議長的秘書和錄事，爲的是請求准許提醒注意你在辯論碼頭爭論事件中所作的聲明。

我沒有被准許提出這件事，但是我仍舊覺得必須對這事有所行動。你在你的發言快結束時，以令人想

起羅森堡——希特勒的種族專家——的語言說：

「我不妨提出三位外國血統的先生，他們之中顯然沒有一個人有一點兒英國人的家世——因爲有些有

外國血統的人，有英國人的家世，他們一般對這些事情的意見，和下院中一般所有的相同。」

這似乎是出於這樣的論據，那些屬於「外國血統」，但是他們的「外國血統」已經由你稱之為英國人的家世的東西所檢定的人，「一般地」可以說是中意的。

我們僅能這樣來理解，即那些屬於「外國血統」而沒有英國家世無法估計的優越性的人是不在話下的。由於這適用於我——我在父系方面有愛爾蘭血統，並且我沒有任何英國家世——由於這適用於若干屬於「外國血統」而又沒有英國家世的政府要員，由於這同樣也適用於很大一部分議會議員，並且，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適用於現在的愛丁堡公爵，我想你應該趁早完全收回這種話，並且因此很謙遜地表示道歉。

你應該了解，這些話是會，而且很可能被摩斯萊（按保英國法西斯組織的首領——譯者）及其黨羽所利用，而招致真正不幸的後果。

我希望你很認真地考慮這件事，並從你身上永久清除這種荒謬的納粹血統理論。

你忠實的威廉·加拉赫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然後，同志們，團結起來，

讓我們面對最後的鬥爭，

英特納新納爾

要團結全人類。

但是假如伊迪先生能加以阻止的話，那就不可能了。

第十七章 盟 約

昔日（是的，這幾乎是一個神話；它發生在很久以前），議會中的蘇格蘭議員得到一個審查一座公路橋樑計劃的機會，這座橋要在羅瑟斯和通稱爲馬新托斯山岩的現有鐵路橋樑之間跨越福斯河。於是乎不久以後，我們得到另一項向我們提出的計劃。這是愛爾金爵士計劃，這項計劃要在鐵路橋樑的另一邊，或東邊，建築一條公路橋樑。兩項美好的計劃。各有各的優點，各有各的走法和通向北方的路綫。在經過工程專家和土地測量家等等的徹底研究之後，選定了前一座橋的計劃，這座橋樑將使蘇格蘭的公路運輸得到巨大的發展。

我們所得到的就此而已。這對蘇格蘭和蘇格蘭的工程師們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人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成敗的關鍵。這似乎成了每一個失敗、每一個缺點的藉口。但是，克服成敗關鍵的方法是從各方面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一座將爲蘇格蘭運輸事業提供新的、巨大發展機會的橋樑，一定會是鼓勵它的經濟發展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嗎？一些情況看來比蘇格蘭尚且不如的國家，尙能從事巨大的工程建設。爲什麼我們就爲難呢？

以匈牙利這個大部分爲農民的小國家爲例。匈牙利的一個大工業中心是首都布達佩斯。大家知道，這是兩個城組成的都市——在多瑙河一邊的布達和另一邊的佩施。布達佩施或普通所稱的布達佩斯曾被德國人佔領，直至一九四五年紅軍將他們逐出爲止。當德國人被逐出佩施之時，他們跨越多瑙河逃至布達，順路毀掉所有的橋樑。五座大橋——其中一座是吊橋——都被炸毀。那

座吊橋的鐵索全被割斷，橋樑沉於多瑙河底。由於紅軍從佩施砲轟布達的德國人，而德國人的大砲向佩施還擊，可以想見該城的大部分都免不了戰爭的破壞。但是當一九四八年我的妻子與我在布達佩斯時，不僅全城的建築已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建——雖然還有巨大數量的建築尚待重建——而且五座橋樑中的四座也已經完全重建起來了。其中的一座名叫聖瑪格里特的橋樑有一條寬道由城中心直達聖瑪格里特島，這個島是河中心的一處引人入勝的風景區。在戰前，橋樑的通路上有關卡阻止「流氓」（普通的男女工人）進去。聖瑪格里特島當時是闊人的遊覽場所。現在橋上沒有關卡了，工人們和他們的家屬成千地到島上去玩。有一條大路直穿島的中央。在公路右手約五十碼處，有一所華麗的、名叫卡新諾的旅館，設有一處寬闊的花園飯店。在公路的左邊，有幾處有醫療作用的泉浴場。在島的另端路旁有一所大旅館，也有花園飯店，在另一邊則是一處兒童遊戲場。在這兒童遊戲場的一端是一家兒童飯店，另一端則是一家兒童劇院。應該提到，這處遊戲場已在一九四九年開放。

我們是在那年回來的，並且曾經參加了這處兒童遊戲場的開幕典禮。在遊戲場上有各式各樣的亭台，給老幼遊客供應各種食品、點心。不僅遊戲場是在一九四九年開放的，並且當我們到達並沿多瑙河遊歷時，我們驚喜地看到那座吊橋已從河底撈起，而又安放定當了，工人們正忙於為它安置新的鐵索。

更重要的是，在聖瑪格里特島的另一端、多瑙河的最寬部分，一座新的橋樑，真正的大橋，正在興建中。

有一天我在下院的圖書館中，偶然翻閱了一下本工程技術的雜誌。其中有一篇關於匈牙利橋樑建築的專文，並附有一幅已部分完成的新橋樑的圖片，這座橋樑是現在正在歐洲進行的偉大

工程建設之一。假如像匈牙利那樣小而多半是農民的國家能够從事這樣的工作，爲什麼蘇格蘭不能呢？什麼使我們落後的呢？

請看，布達佩斯爲羣山所環繞。在這些山脈之一的平坦處，他們建築了一條「兒童鐵路」。我希望蘇格蘭的小學生能够看到它。它是成爲現實的小學生們的夢想。每一個車站——共有七個車站——是一處美麗的場所。每一個車站有它的飯店，還有舉行野餐的理想的环境。它是歐洲最忙碌的鐵路。許多家庭在假日、星期六和星期日到那裏去，舉行野餐。每天傍晚你看到他們乘着電車或者私人車輛蜂擁而來。車站站長和機車司機是僅有的成年人，所有其他都是年青學生。副站長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售票員、會計員、列車員是十二、十三、十四歲大小的男孩和女孩。他們在一定日期從學校到那裏去受一個時期的訓練，之後就輪流到鐵路上工作。不像我們的國有化的鐵路，那條鐵路是贏利的事業。所得贏利用之於改進和發展其他形式的兒童教育活動。無論何時兒童們都被鼓勵去表現其創造性和擔當責任。他們像他們的長者一樣，感覺到他們正在參與國家的重建。「未成年罪」是聽不到的。

在蘇格蘭，我們應該有能力做他們所正在做的事。

我們一般工業的發展遠走在他們的前面。我們所缺少的是只有新人民民主制度才能賦予的力量和社會的自覺性。力量！啊，就請聽聽伍德柏恩先生答辯那爾·麥克佛森先生關於爭論紛紛的「盟約」問題的發言吧！他說，你們需要一個蘇格蘭議會，小心些，發起「盟約」的人羣中有一位保守黨公爵。你們這些善良的工黨小夥子，你們想要使自己和一位保守黨公爵搞在一起嗎？

伍德柏恩應該更清醒些。他應該已經知道，爲跑去參加在聖路德舉行的遊園會而幾乎折斷腿的工黨男女黨員們，巴不得能與一位公爵爲伍，不管他的政治見解如何。他似乎認識到了這一點。

於是他急忙撇開了這位公爵。他目露懼色、聲音顫抖地告訴他們，有共產黨人與這個「盟約」有關係。假如你不欲使共產黨人抓到你——就避開這個「盟約」。

伍德柏恩的話使人憶及蘇格蘭的母親們從前撫慰她們的幼兒時所哼的曲子：「不要吵，不要鬧，小寶寶，『紅妖怪』（黑道格拉斯）永遠抓你不到。」伍德柏恩所作的是一次可悲的發言，結束時竟極荒謬地斷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像我們自己的小國家所有的發展經濟的機會。」

我們有一位國務大臣，我們有一個衛生部，一個農漁部，還有一個教育部，但是我們對蘇格蘭工業却沒有任何性質的管理，並且沒有勞工部——經濟發展的兩件極關緊要的事情。我們沒有預算。當我們的財務完全不是蘇格蘭人所能控制的時候，誰會愚蠢到提出這樣的要求來呢？

我本人曾有機會提出過一兩種可以證實的論斷。例如，蘇格蘭是世界上唯一未能（不論原因是什麼）按照它的造船能力發展碼頭設備的國家。我們建造世界上最大的船隻。它們乘漲潮時駛下克萊德河，而這也就是蘇格蘭對它們最後的一瞥。它們在英格蘭的南部找到停泊所和家。但是多少年前就可以也應該在克萊德河口有停泊所。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呢？

蘇格蘭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的工程傳統、有極高的工程技術而沒有飛機工業的國家。蘇格蘭建造和航駛船隻，對海洋運輸有巨大的貢獻。假如允許它製造和行駛飛機，它對新的運輸方式也能有巨大的貢獻。當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伍德柏恩先生發表幾乎令人不能置信的聲明，說蘇格蘭太小，不能建設飛機工業。不談像荷蘭這樣小的國家都有一座歐洲最好的飛機工廠，難道我們能相信，一個能够建造世界上最大船隻的國家還不够大得能建造飛機嗎？

在蘇格蘭，我們正發展着許多輕工業，大多數是已經建立的英格蘭工業的分支，但是從來沒有提起過建設汽車工業。在一九四八年七月關於蘇格蘭的貿易與工業的辯論中，我發表了下列

意見：

「對蘇格蘭來說，計劃是絕對和急迫需要的，而我向蘇格蘭的國務大臣說，在這份白皮書中，沒有一點急迫的感覺而只有滿足的傾向。沒有建設不列顛的計劃，顯然也沒有建設蘇格蘭的計劃。我們有一大堆雜七雜八的委員會和許多會議組織——咨詢會議、計劃會議、經濟會議——這些本來都正該做些事情，但是什麼也不做。它們對這點那點或別的提出建議，但是很少有結果。」

「一位議員在論及蘇格蘭高級委員會新召開的會議時，說這些會議是有價值的革新。它們不是，實際上它們是阻撓革新的手段，這種革新——給予蘇格蘭人民以更多的權力——早就應該有了。蘇格蘭人民應該有遠較目前為多的權力，以決定他們自己的事務，但這正受到最近所採取的措施的阻礙。我們必須達到這樣的局面：在那裏，蘇格蘭人民有其地位。在這些咨詢會議中，蘇格蘭人民在那裏真正能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嗎？有一兩名工會職員，一兩名合作社員和壓在它們上面的一整套政府組織人員，但是我們在收支平衡的經濟方針上發展蘇格蘭的想法中，却沒有一處考慮到了蘇格蘭人民羣衆、技師、鐵路員工、運輸工人及其他等人的地位。」

「部長表示得很清楚，他反對任何以更多權力給予蘇格蘭人民的事情，或任何使蘇格蘭得以獨立的事情。」

「爲什麼我們在掌握世界上最優良的工程技術的蘇格蘭沒有飛機工廠呢？爲什麼蘇格蘭被禁止對這種新的運輸方式有所貢獻呢？我時常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毫無結果。」

「過去曾經有過各種的努力。汽車工業曾在蘇格蘭、在格拉斯哥創建起來，並且傳到了英格蘭，在那裏財政家們攔住了它，並且使它成爲有利可圖的工業。他們在英格蘭將它建設起來，並

且擁有這樣大的力量，使任何汽車工業不可能在蘇格蘭繼續下去。飛機工業的情形也是一樣。假若我們有一個建設蘇格蘭的計劃，那就會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的。假若蘇格蘭已經獨立了的話，我們早就運自發展起汽車工業和飛機工業來了。

「自然，像別種工業一樣，飛機工業應歸國有，應這樣地組織起來，使製造飛機和發展航空業務的最高技術得以全部利用。蘇格蘭因建造和行駛船隻，對海洋運輸已有這樣了不起的貢獻，假如它製造和行駛飛機，它對空中運輸也能有同樣的貢獻的。」

「當我們要建設新工業時，建設我們的基本工業也是必要的。鋼鐵工業在蘇格蘭尚未盡量發展。在蘇格蘭，鋼鐵生產量完全不足蘇格蘭實際的需要。在鋼鐵方面還需要做很多事情。在兩次大戰之間，蘇格蘭的鋼鐵工業關閉了；它全部被南移至考爾貝。我們現在需要在蘇格蘭大大地發展鋼鐵工業。」

「由於鋼鐵分配額的削減，由於克萊德造船業中發展着的失業現象，目前存在着危險。今晨的『格拉斯哥先驅報』在一篇觸目驚心的談這個問題的論文中，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即在不久的將來克萊德將有可觀的失業現象。」

「我對大臣說，讓我們作一個建設蘇格蘭的計劃，好的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計劃經濟。當我們試行平衡我們的經濟時，讓我們弄清楚較大的工業必須獲得所需的鋼鐵，並得到有利於鼓舞這些工業中的工人們的安適的生活環境。然後我們就能夠增加就業，並且在蘇格蘭建立能為蘇格蘭人民確保全部就業和繁榮的經濟。」（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五〇八——五一一欄）

從這次辯論以來，情況一直沒有變化。蘇格蘭的經濟仍然受到阻滯。對於工人階級說來，這

是頭等重要的事。哈狄了解這點，所以他曾主張蘇格蘭自治。一個強盛、健全、進步的蘇格蘭並不意味着削弱聯邦。只有爲偏見所矇蔽的人才看不到：蘇格蘭愈強盛，它對聯邦就是一宗愈大的資產，而它愈孱弱，它就愈成爲一個負擔。

由於這種原因，我支持盟約——成立蘇格蘭議會，給蘇格蘭人民以決定他們自己的經濟、社會生活和進步的權力。這有什麼不對呢？哈狄當時並沒有認爲這有什麼不對。相反地，他完全擁護。早在一八八八年，如我已說過的，他，肯寧漢·格蘭恒和另外幾個人聚會並組成了蘇格蘭工黨。蘇格蘭自治，以及不列顛帝國的所有其他國家和領地的自治，列在他們最初的綱領上，並且自那時起一直是公認的蘇格蘭工黨政策的特色。

我記得在一九一九年，一位名叫亨利·薩拉的年輕人——在當時倫敦無政府主義者中很著名——來訪問格拉斯哥。他在一次集會上得到一張由一批蘇格蘭的首要的工黨代表署名的傳單，在這些代表中間有威利·加拉赫的名字。那是一張要求建立蘇格蘭議會的傳單，薩拉大模大樣地來找我。

他說，「加拉赫這個人，自稱爲革命者。但是請看他的這一幫人吧。」

當有人告訴他說傳單上署名的威利·加拉赫根本是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他有些狼狽。是的，有兩個威利·加拉赫，並且我們時常不得不相互承擔別個的短處。另外的那個威利·加拉赫到他在幾年前退休時爲止，一直是一位極有名望而且很受人尊敬的蘇格蘭合作批發協會的理事。很多次他的朋友責備他粗野的言談和甚至更粗野的行爲，像報章多次報道的那樣。笑話多極了，我們常常交互知照這一無休止的混淆。

但這是閒話。如我所說過的，這張傳單是要求建立一個蘇格蘭議會，並且是蘇格蘭的工黨領

袖人物的產物和政策。直到一九四五年工黨政府成立時為止，情況一直是這樣的；然後，像工黨那麼多的其他政策一樣，就束之高閣了。保守黨，蘇格蘭進步的假擁護者，覺察到在發生甚麼事了，它便出面竭力支持蘇格蘭。正因為如此，馬爾可姆·麥克米蘭頗有道理地譏嘲他們「自從大選以後」已變為蘇格蘭的民族主義者了。自然，不能期望他會再加一句：從同一時期起，他和他的同夥已不再是蘇格蘭的民族主義者了。

現在，在背棄了六十年來一直是他們綱領的一部分的事業之後，爲了掩飾他們的厚顏無恥，他們把這盟約說成是「保守黨的詭計」，變個說法就成爲「共產黨的把戲」。什麼都行，就是不正視這個事實：握在蘇格蘭人民手中的權力，將意味着蘇格蘭人民進步與繁榮的一個巨大的新進展。

第十八章 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分子」

一九四九年是「左翼分子」的一個倒楣年。不久即將舉行選舉，選舉來臨時將發生什麼呢？這估據了他們大部分的心思。他們開始尋求掩蔽。只剩下少數幾個人仍然堅持反對政府所奉行的美國戰爭政策，忠實於和平的事業。艾木里士·休士、湯姆·布拉多克和利阿·曼寧被命令出席「訊問」會，經過嚴厲的、絕非同志態度的詢問以後，受到警告，說如果他們不改變他們的態度就將產生怎樣後果。萊斯特·胡金遜、李斯里·索萊和齊里亞庫斯被工黨開除黨籍。在審問李斯里·索萊的過程中，他被控以說他稱保守黨員為「戰爭販子」。他問道：「這有什麼不對呢？」主要的訊問人對此嚴厲地回答道：「這是共產黨的說法。」

這表明了：自從「戰爭販子」是工黨領袖的口頭禪那些日子以來，這些人已經向保守黨帝國主義陣營走了多遠了。開除了這三個人，加上普里特和約翰·普拉茨米爾斯，這就給了我們五個獨立的工黨議會議員。在有些場合中，他們在普里特的領導下成爲一個集團行動，在下院持不同的意見並得到菲爾和我的支持，這樣投票廳裏就有兩個投票檢查員和五個議員。

但是，雖然普里特及別的人竭盡努力，他們却發現愈來愈難於和齊里亞庫斯合作了。根據他的意見，他的情況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他曾是和貝文外交政策鬥爭的人。普里特、普拉茨米爾斯、索萊和胡金遜好多次在外交辯論中很好地說明了他們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齊里亞庫斯看來只有他自己的演說才了不起。由於他在國際聯盟中有過長期的和多樣的經驗，他知道國際棋盤

上所有的活動。因此，他能够很有力地批評貝文親美的和由美國支配的外交政策。貝文不喜歡他，工黨領袖們不喜歡他，保守黨員也不喜歡他。他唯一的支持是來自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進步團體。而這正是他所害怕的。這會把他在革命鬥爭的道路上帶得太遠的。他實際上相信貝文將要去職，而貝文離去後，外交部的政策可能有改變，那時他將被歡迎回工黨的一夥。關於貝文的健康的各種謠言，在某種程度上促成這樣的想法。不論貝文到哪裏都有一個醫藥專家跟着他。公平的担負——一個病人、一個醫生。所以，儘管齊里亞庫斯的個別演說可能很苛刻、甚至有抨擊的性質，但是總有些東西摻雜在內使他和共產黨員有所區別，並且留着他自己的後路！

在一天晚上，我聽他發表演說，有保守黨議員和卑躬屈節的工黨議員在場，他們紛紛打斷他的話，這當中有許多是具有極端攻擊性質的。我自然而然地支持他。我歡呼他講下去。然後，使我極其驚異（且不說是厭惡）的是，他竟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從攻擊一變而為一個民主的西歐議會辯護起來。乾脆把他自己列入邱吉爾、貝文和克羅斯曼的陣營中。唯一使我感到比這還不舒服——我真作嘔了——的當兒，是當安諾林·比萬的妻子珍妮·李，可能是因為急於要對消「毒害」演說的壞影響，給議會辯論的精彩節目作了下列貢獻的時候：

「……我要請求所有的議員先生記住，我們偉大的出口之一是：世界其他部分都知道大不列顛一貫從各處把她最好的血液送進下院。真的，這不是這個議會中的議員先生沾污他們自己的地位的時候。假如他們並不相信這是這個國家中最高的地位，那末他們就應該不參加競選。他們既進入這個議會，他們來時就應該有這樣的知識和信念：他們在這裏要奉獻他們最好的東西，並且往往是更貼本，而不是會發財的。這適用於議會的所有部分。」（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六〇〇欄）

我不得不站起來走了出去，免得自己因為作某種行動而受到命令退出會場的處分。但是，齊里亞庫斯所作的這種向他的反對者和解的努力，並沒有成功。他們笑他。他們看到他的弱點是害怕與其他被開除的議會議員和共產黨太接近。他們知道他對他們的權力和特權沒有危險。

就齊里亞庫斯說，他必須替西歐尋找一些比民主議會更好的東西。他看到在東歐那邊有個鐵托元帥，像他一樣，曾有一個時期被拋棄而現在轉了回來，很快地重又受到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寵愛。他就啓程到南斯拉夫去。與鐵托談了話，他發現了克羅斯曼和「靠左派」已經失掉的東西——一條「中間路綫」。幻想永不死滅。在這假定上，他將試圖使這個國家的工人相信：鐵托有一種政策，與貝文的政策不同，也是不同於而又反對蘇聯和東歐新民主國家的。

我並不以為齊里亞庫斯對列寧曉得很多而知道這個革命戰略的偉大天才在一九二〇年會非常斷然地、不加任何條件地說過：「從現在起，每一個人要求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就將受到他對蘇聯的態度的考驗。」誰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誰就是擁護蘇聯的——不是因為蘇聯的人民是俄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首先衝斷和擺脫資本主義鎖鍊的工人。誰反對蘇聯，不管是邱吉爾、貝文、鐵托或齊里亞庫斯，誰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鐵托反對了列寧，現在他和這裏的叛徒一樣，正為美元而出賣他的國家。如果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和我一樣的一個共產黨員，他所想、所說就會和我一樣。但是不是這樣，他說的是貝文和艾奇遜的反蘇語言。他們樂於聽他、或者讀他所說的。這給予他們很大的歡樂。他們從他們所讀的東西裏面知道，他所想的和他們所想的一樣。而他們是共產主義的敵人——社會主義的敵人。

這就是齊里亞庫斯現在所走的悲哀的道路。退入金元資本主義的泥坑。退入虛偽的「左派」

的一夥，假如他們要他的話。這些經常是資本家欺騙工人階級的方法中有一部分，在某些情況下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工黨領袖們要使工人接受特別有臭味的資本主義政策，預料將遭到批評或困難時，虛偽的「左派」就靠得住會提供感人的香料，來取消臭味。

在我的「雷聲隆隆」一書中，我以相當長的篇幅述及一個虛偽的「左派」萊翁·托洛茨基的典範的例子。這裏，我將再度敘述問題在俄國發生時的情況，以及各個政黨怎樣答辯的情況。作爲一個「典範」，可不能時常重演。它提供了了解鬥爭是如何進行的鑰匙。在俄國，工人取得了政權。他們拿着它做些什麼呢？建設社會主義，還是讓資本家接收去呢？

孟什維克說：

「我們不能在像俄國這樣一個落後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必須等待一直到資本主義發展了工業。」

布爾什維克說：

「我們能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有物質資源，我們有人民，而且我們有政權。」

托洛茨基集團——那虛偽的「左派」是怎樣的呢？讀讀這句話，並思量一番吧。只要你看清這句話所包含的詭計，你就再也不會被托洛茨基派所欺騙。

「我們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必須等待一直到歐洲大多數先進國家的工人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

哦，托洛茨基要世界革命！不是的，他所要的是孟什維克所要的。爭論的問題是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個問題正是必須立即答覆的。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派反對建設

社會主義。二者都說：「我們必須等待。」他們所提出的理由是毫不相干的，雖然托洛茨基派比孟什維克更具有蠱惑性。

總要把爭論點弄清楚——這種問題要求一個答覆，撕破它鍍金的外衣，虛偽的「左派」就將暴露其面目。這樣，我們就能夠考慮西歐聯盟的問題，以及克羅斯曼、富特一夥在建立這個聯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了。關於首先倡議這個資本主義國家聯盟的究竟是邱吉爾還是貝文一事，在下院中曾有過一些爭執。邱吉爾說它是他的產兒。貝文說他在許多年以前就把它生出來了，邱吉爾實際上是把他的嬰孩誘拐了去的。不管怎樣，它是擺在我們面前了。西歐聯盟是美國外交政策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它漸漸地導致了大西洋戰爭公約以及重整軍備的凶惡的重担，這種重担使我國陷於危機的劇痛中。西歐所有的國家，不管它們政府的狀況如何，過去是，現在也是資本主義國家。西歐聯盟意味着一羣資本主義國家的結合，其明確的目的則在犧牲工人階級以鞏固資本主義。邱吉爾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出來竭力主張西歐聯盟。艾德禮小心翼翼地跟着邱吉爾行動。他之所以小心翼翼，因為必須考慮到工人。

擁護還是反對西歐聯盟呢？共產黨員是反對的。他們和「工人日報」一道，揭露了這個提議的真正意義及其反工人階級的性質。而虛偽的「左派」，他們是擁護西歐聯盟的，但是這就必須有一個社會主義基礎。這個「社會主義基礎」，和托洛茨基的「在其他先進國家的革命」一樣，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但是這使他們能夠和邱吉爾與保守黨徒站在一起，而又顯得是非常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一個十分虛偽的外貌——因此稱為虛偽的「左派」。然而攤牌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歐聯盟，全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跡象，他們在那裏只是參與建立這種聯盟的反動集團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已經幹了資本主義卑鄙的勾當。他們在工人中散佈了混亂和誤解。他們在向社會主義前進一步的虛偽的掩飾之下宣傳了西歐聯盟，這樣就窒息了工人階級對美帝國主義這一新的進攻的反對心理。

他們把革命說得很輕易。像在舒適的陽光普照的花園中漫步一般。但是，革命是一個新階級爭取政權的令人恐怖的高潮。對於舊秩序是恐怖的。革命剝奪他們所有的豪華、特權和濫用的權力。他們將用一切手段，不道德的、殘暴的、破壞的手段，來阻止革命的實現。

常言道，歷史是一個偉大的老師。但是，它對於被虛偽的「左派」所欺騙的那些人却沒有教訓。在西歐每一個國家，金元像水一樣地傾瀉出去，白費精力地企圖使時鐘倒走。因為想作最後的拚命的掙扎以阻擋無產階級前進的浪潮——革命的浪潮，人民幸福所極需的資源正被浪費在不堪承受的軍備的重担上，這還帶來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成爲對人類進步的經常存在的危險。

但是，就世事的諸般現象來看，我們却有克羅斯曼先生笑咪咪地閒聊着「我們的社會革命」。這裏就是，讀吧：

「假如政府要保持充分就業，假如他們要保持社會主義的結構，他們就萬萬不能重複財政大臣所說的：不可能削減防禦費用……我從社會利益上來說，假使我們利用貶值及其已贏得的良機，使我們在過去四年中已開始進行的房屋建設成爲一個永久性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的起點，這些負擔必須客觀地加以估量。」（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七一欄）

軍備支出急劇增加，利潤空前增高，物價上漲，房租騰貴，而工資仍然菲薄。問題在——和平和工資。要給收入低微的礦工，給技師，給鐵路工人，給學校教師，給各種行業和各種處境的

工人增加工資。但是虛偽的「左派」避開這些，而企圖把工人導入一個陰暗的領域中，在那裏不知道有現實。好勇敢的話，「我們的社會革命」；但是當它離開，而又用作一種工具來規避，需要立即行動的實際問題的時候，這話就毫無意義，毫無價值了。

這應該永遠是試金石。什麼是實際問題，他們又如何答覆？假如他們不能給予直截了當的、清清楚楚的答覆，那末他們的話不論是如何的「社會主義」，也就沒有意義了。為爭取和平而反對戰爭製造者，為提高工資而反對利潤。這些是問題之所在。假如他們不能在鬥爭中站在這方面，他們就是虛偽的「左派」，因而就應該受到工人階級毫不容情的打擊。

第十九章 藉誌謝意

訪問下院的人大都喜歡找「大彭」並和他談談。「大彭」的聲譽是誰都知道的。我談的是什麼？不，我並不是談時鐘，而是談那在通往庭園的走廊上站崗的警士彭·斯特賓斯。他很讚賞蘇格蘭機智的喜劇演員菲夫。這位老好的演員有時常順便來看看我們。我們和他在一起好玩得很。彭很喜歡講蘇格蘭故事，喜歡捲起舌頭，操蘇格蘭口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參加倫敦蘇格蘭兵團，他經常說，那個兵團的口號就是「他媽的」。他的身材頗大，當我在庭園中接待客人，並且告訴客人說他是「老大」、我是「老么」的時候，他便感到着着實實的歡樂了。

是的，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彭和我。而且我和全體軍官及隨從們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很要好的朋友的關係。在大戰期間，彭曾患過一次重病。我給他寫過一封安慰和鼓勵他的信。議員中只有我一個人這樣作，「大彭」分外珍視我這份努力。所有這些弟兄和我談話時也都好像和自己人談話一樣。他們沒有保留，他們從不害怕會錯信我。有時他們不得不忍受傲慢的議員或訪客們盛氣凌人的對待，而且往往是要恭順周到地忍受的。這種時候，的確也不多，他們便向我發洩一番，而且他們關於動輒生氣的人所談的事一定是令他們傷心的。

有一個時期，我們那裏有一位軍官很受到下屬和議員們的尊敬，受到高度的尊敬。怎能不這樣呢？——他是一個蘇格蘭人。這位軍官被提升到倫敦的一個區裏去工作。一位很好的人，他是當之無愧的。有一天早晨我到下院去，突然有一位常常喜歡跟我取鬧的青年警士抓住我。他經常做

些革命的宣傳，並且總慫恿我幹各種粗暴不當的行爲。我們常常作善意的笑談。但是這天早晨，他却極端嚴肅。我必須辦一件事，而且不能拖延。那位已從下院調走的軍官犯了一點技術上的過錯，而白廳裏的一小撮「空談家」却不分青紅皂白便十分專橫地決定降他的級，使得他除接受降級或退伍之外無路可走。我馬上發覺那些會做過他的部下的警士們都感到憤憤不平。這位軍官本人曾和蘇格蘭保守黨有過接觸，他不願牽扯他人。可是下院的警士不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來找我。

他們說，「你能辦這件事，你必須使這些白廳的官僚清醒過來。」我馬上辦了這件事，一星期之內，這位軍官恢復了他的官階。這些官僚早就注意到了。

但是一談到警士，特別是談到「大彭」的時候，就使我想起，赫伯特曾寫過一個用這個名字作題目的劇本。我沒有看過這個劇本，可是聽說寫得很好。赫伯特和我在政治上是兩個敵對派，可是我們的關係却很好。有一天晚上當我在下院發言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完全忘記了，後來有些訪客參觀下院時，赫伯特提到它我才記起來。事情是我那時口裏的假牙托出了毛病。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這種脆弱的代用品代替最尊貴的天賦之物的滋味。我中斷了我的發言，對議長說，「請原諒」，接着轉過身掏出手帕，把這假牙托取下來，再轉過身來繼續發言。他說，他那時對這件事着實笑過好幾次。

我還記得，當我在紐約的時候，寬丁·雷諾曾向我提起他去倫敦參觀下院時的一件事情。那時他很想喝一盅酒，於是就建議我們一道去酒吧間。我驚奇地看着他——上酒吧間——而且還是我去！接着我想他是遠方來客，就壓住了我生來厭惡這種地方、厭惡這種氣氛的心情，帶他去了。那時赫伯特和幾個朋友在那裏安靜地休息。當他看到我們進去的時候，他盯着我們，好像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接着他走過來，拍着我的同伴的背叫道，「寬了，你造了一個奇蹟，把威利弄到這裏來了。」奇蹟是暫時的，因為我一發現寬了有朋友湊熱鬧的時候，便匆匆退出了這酒肉之場，回到議會接待室保險之處來了。

當遊客來參觀下院的時候，我很高興請他們注意建立在聖司提芬大廳入口處左邊的查理士·詹姆斯·福克斯的雕像。他的形象，或者說他的姿態是：作一個「緊握拳頭」的敬禮——這是對歐洲暴君的一個挑戰，對美國殖民地革命性的起義的一種歡迎。他是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的真正朋友。但是，假若他回到人間而且錯誤地在美國登陸，那末他就會給攔阻在艾里斯島，作為一個著名法國和美國革命家的同路人，逐回他所啓行的「不知名的王國」去。事實上，當工黨政府按着聒耳的美元音樂跳舞的時候，他在自己的英國是否能夠安全也成問題。也許最好還是留在他現在所在的地方。

我與下院職員們的關係，正如我與警士和隨從們的關係一樣，是最和諧的。下院的職員——其中有三個祕書——是處理事務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困難時，人們就可以看到議長向他們請教究竟應該採取那一種行動方針。議員們提出的一切問題都要通過這些人，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列到程序單上。

議員們得到請柬被邀去見某一位祕書談談他們所提出的某些問題，是一樁很平常的事。我本身就接到過許多次這樣的邀請。有時候我的問題是很難使人接受的。有時候是某些部分難接受，那時那位職員便告訴我哪些應該去掉，哪些應該保留。

這裏我可以提一下，我從來就不大考慮議員在下院行動的程序規章。我記得當威廉·達林頭一次在愛丁堡補缺選舉中當選的時候，他曾找我問這類事情。

他說：「你是個中老手，因此你大概能夠給我談談下院的規則。」

我告訴他，「我不行，我一點也不知道。你要知道規則幹嗎？」我問他，「你要把自己束縛起來嗎？知道規則是議長的事。你的事情就是說你覺得應該說的話。站起來就說。假若你犯了規，議長會告訴你，可是到那時候，你已經講出你所要講的話了。」

威廉以爲這是一個很好的忠告。而且有時候我感覺他照着這話做了。這些職員還要辦一件經常要辦的事務，那就是把我的問題加以分類，並且用適當的措辭來整頓一番。

因此，事情就來了；當我寫一些關於某些議員的詩的時候，這些祕書便提出要求了，他們說「爲什麼不寫一點關於我們的事情呢？」我就我自己的經驗，向他們獻出下列的詩篇：

呵，希望的星星，你使我立穩脚跟，

懷着不顧一切的衝勁要求議長准許發言，

讓天神的火燄摧毀那些競爭的人，

使我昂昂然地站在勝利的峯巔，

雖然，竭盡我平生的本領

我也只能依靠下院的那些祕書，

關於他們我要說，而我的話可真老實，

如果沒有他們明智穩健的導引，

我們將成爲悲哀、不幸的一羣

無法提出所有的疑問

來撫慰全國各地人民的不平，

他們是我們議會的救星。

現在，我得到了他們的恩寵

我打算請那蘇格蘭國家的青年舵手

（青年啊，願他大大地成功）

告訴下院我們需要等候多久，

才能滿足那永無休止的如訴如哭，

而讓古老的蘇格蘭有它需要的房屋。

當鮑爾溫爵士逝世的時候，首相、反對派的領袖、自由黨領袖、國家自由黨領袖都先後對他們死去的伙伴發出一些應景的讚詞。那時，像平常一樣，大家都注視着我，共產黨的領袖。這是一個左右為難的時刻，這種時候很容易說錯話，與其說話倒不如不說話還明智些。但是在他到上院之前，即他還在下院的時候，有時常和我交談。他對我的蘇格蘭口音很感興趣。他曾告訴我，他的母親是蘇格蘭人。他和我對這一點都非常感興趣，因為我的母親也是蘇格蘭人，雖然我的父親却是愛爾蘭人。因此我也講了幾句關於我們之間的普通交誼的話。第二天我便接到了一位秘書的來信：

親愛的加拉赫：

我相信鮑爾溫先生一定對你給他的讚詞感到欣慰。你的話可以說是昨天所有發言中最好的。說是我一生中所聽到的最好的發言。

當我大數到來的一天，如果能得到像你這樣仁慈的人，給我想出或說出像你後三句話那樣美銘式讚詩，我將含笑九泉了。

我很希望你交個朋友，

你誠懇的

我回了他一封信，並附寄了一首我認為適合他的情況的預擬的墓誌銘。幾天之後，一本附有許多圖片的描述下院情況的書，並來信說：

親愛的加拉赫：

願你在你生日的時候得到很多幸福的報償，你能接受這本精緻的小書麼？它廣泛地收集了右圖片。但我希望照像機不要永遠照得像三十九頁的那張照片那樣逼真。沒有人會告訴過我應該在
一張照片。

我不知道，你一生是否因為人家只在聖誕節的時候給你送禮而不在你自己生日的時候給你送
苦惱。我甚至在聖誕節三個星期之內都常常因此感到苦惱的！

此外，我感謝你可愛的來信，它使我滿心快樂。我真希望我的腦力能記住其中的詩句或立誓
我的朋友們聽，甚至讓他們也分享來信所給予我的快樂於什一。我必定嘗試，而且盡力以赴。

祝你百事如意，萬事幸福。

永遠是你的誠懇的

.....

一年多以後，我送了他一本詩集「快意集」，這本詩集是我的秘書巴利希以很大的耐心和驚人的手法收集起來，而裝訂成的美麗的重寫本。他接到這本詩集後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他談到了而且引述了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送給他的墓誌銘：

親愛的加拉赫：

我終於找到了時間來道出我最熱烈的謝意：感謝你送給我一本詩集，這使我感到榮幸，我感謝你的美麗的辭句。它們使我很高興閱讀，的確它們給予我的快意不下於你在寫它們時所感到的。

我非常羨慕你這種出口成章的才華。這是一種寶貴的才能，並且你可以使別人因而得到極大的愉快。使我欽愛若狂的幾首詩是：「魯斯特」和「威斯特渥」（兩首都都是美妙動人的讚詩），「查里斯」和「菲爾法案」。我也很欣賞「加爾文主義」，還有「財神」雖然它使我頗為驚駭，因為，當你語氣激昂的時候，我便感到可怕。「地圖室謀殺案」是很有趣的。

我仍然極端珍視一天早上你送我的詩句：

「忠誠服務，從不誤事，從不怨恨，

他的生平——將這樣蓋棺論定，

要摺指數數他的功過，

就我們所知——他無可恐懼。」

你還寫，「恭祝聖誕節，並祝新年」。

當我沮喪疲憊的時候，那首詩給我的慰藉是你所想像不到的。永遠感謝你，這我將永誌不忘。

永遠是你的

.....

我很記得下院的一些事情，可是對促使我們通訊的豁達大度的精神却淡忘了。願他長壽，願他永遠快樂。

談到下院和它的職員的時候，最後我不能不談談警衛員和他的副手們。他們掌管特別席的入場券。我和他們相處得多麼好呵！我經常都在找入場券。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句話，說在別人沒法得到入場券的時候，我却能夠得到。這一傳說並不完全真確，可是很多人都相信它。我接二連三地老要搞入場券。就算糾查員和他的副手們並不特別考慮我，可是我確實受到他們充分的照顧。當我幾乎不好意思問他們的時候——幾乎，而不是十分——他們一再幫過我的忙。掌管上院入場券的黑棒侍衛也跟他們一樣。任何時候我去找他（我是常常找他的），他都使我感覺到，他因為能夠幫我的忙而感到極大的愉快。他確實是一個好朋友的人。因此我得向他們所有的人，下院職員、警士、侍從等，表示衷心的謝意，並祝他們都好。

第二十章 命令

有一天我接到費夫一個商人的來信，信中談他要求政府某部作的一件小事。我馬上和有關的那位部長接頭，在最短的時間內推動了這件事。後來他又寫信給我，對這事情推動的迅速表示驚異，並且邀我在路過他那裏的時候去看他。後來我確實和我的老朋友與老同事艾畢·莫法特去看過他，他對我講了一大段經歷。

三個月來他曾寫信給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委員會，盡極大的努力想辦這件事，可是終於不得不放棄。一天早晨他在頓菲萊茵保守黨俱樂部中奔走於官樣文章和官僚之間，他的時間和精神都花於鑽門路。但結果心勞力拙，他只得作罷了。想推動政府衙門辦事是件毫無希望的事。後來另一個著名保守黨人去找他，很偶然地問他說，「你給加拉赫寫過信嗎？」那時他簡直奇怪極了。

當他鎮靜下來時他便喊道，「寫信給加拉赫，我寫給他！」

「對呀，爲什麼不呢？」那位著名保守黨人說，「你希望事情辦起來。你寫信給加拉赫，你的事情就能辦起來。」

可是他很固執。「我不寫，」他答道，「即使我永遠辦不了這件事，我也不願寫信給一個共產黨人，請他來幫助我。」

「隨你吧，」那位保守黨人說，「可是我認爲，你摸了三個月的錯路，現在你得走正路了。」

當天晚上他回家時心裏很亂，可是他決意不寫信給加拉赫。這樣，他懷着混亂的心情過了一夜，但第二天早上，他却寫信給我，而且幾天以後他便看到別人開始辦起事情來了。事後，他曾寫過幾封信給我，談當地和他個人的困難，並對那件事的結果表示很爲滿意。

後來，他以頓菲萊茵自治市議會議員的資格發表相當激烈的演說，反對把馬加雷特大廳租給共產黨開會，那次會議將由我講話。他主要的反對理由就是那種陳辭濫言，說我們接受外國的命令。但後來我們還是使用了那座大廳，而且我講了話。

我講話的時候很誠懇地說，在我當議員的全部時期內，我所接受的命令只有選民的命令。當然，這些命令都是用要求的形式發出的。可是選民們的一個要求却等於一個命令。

我說，「正是這位議員常常給我『命令』，而且他無法抱怨這些命令執行的情況。但我要求他，要求任何其他的人，說明我在哪裏接到過，且莫說接受吧，什麼外國人的『命令』。」

這一席話使他和「加拉赫」斷絕了聯繫。

全國各地的人民都寫信給我談談他們的不平和他們的問題。在我家鄉的城市裏，人民不斷地到我家裏來。我常常設法勸他們去找他們自己的議員，可是勸也沒有用。他們說，「我們寧願找你，我們要向你談。」

有許多天主教徒寫信給我，或者來看我。我不知道這是由於我那愛爾蘭的名字吸引人還是因爲就工人來說，不論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我都像是他們的自己人一樣。我記得有一次（這是在美國把我國拖入反共運動以前），有一個教士勸一個心有重憂的貧苦天主教徒「去找加拉赫談談」。

我經手辦過的最淒慘的一件事情就是關於考頓畢斯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孩的事情——這個孩子在鐵路上軋斷了兩條腿。當我路過我的選區的時候，我的駐費夫的代理人約翰·費爾尼告訴我這

件事。我錯誤地以爲，這件事發生在西費夫的鮑希爾村。這件事情發生了六個月之後我才知道，並且聽說，根據一八八三年左右的一個法令，鐵路局對這件事情完全不負法律上的責任。我把這件事情向運輸大臣提出來，他告訴我鐵路局應該負責。我於是寫信給鐵路局，要他們注意一事情，就是即使他們說他們沒有法律上的責任，他們也有道義上的責任。我對這事追了些時，接着通知它說我要盡早在下院提出這件事情。我把這事申述如下：

「我必須提出一件傷心慘目的火車肇事的問題。這是我請運輸大臣加以考慮的問題。這件事情於去年四月一日發生在一個年方五歲的活潑可愛的小孩子身上。在他家房子對過有一道保護鐵路路的柵欄，這道柵欄是用豎立的枕木排成的。有一條枕木倒了，留下一個缺口可以直通到鐵路綫上。這條枕木在那裏躺了將近有三個星期等人去修理，可是怎麼也不去修理柵欄的缺口。一個五歲的孩子爬了過去，結果兩條腿從膝蓋上面被軋斷了。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早上八點鐘，那條枕木才還了原。在這事隔數月的時候我不願花很多時間來敘述，我以爲我只要唸一兩封和此案有關的信件，議員先生們和運輸部代表便會更清楚地了解全部情況了。這個小孩和他的父母現在沒有權利要求任何賠償。他的母親來信說：

「這缺了口的柵欄離第一個門階只有三呎六吋，而且正好在這周圍（街市）兒童們的唯一遊戲場中心，然而在事情發生以前缺口一直有三星期之久沒有修理，到事情發生之後的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才修好，想起這種情況，真是駭人聽聞。」

「這孩子的父母屬於貧苦的普通工人階級，他們請一位辯護士與愛丁堡的一位律師提出這個案子，這位律師勸阻辯護士，辯護士接着勸阻這孩子的父母。這位律師的名字叫亨忒，辯護士寫

信給孩子的父母說：

「亨志先生說，根據法律，亞歷山大——這個孩子的名字叫亞歷山大·懷特——完全是一個非法的侵犯者，鐵路公司對他應負的責任在於避免故意的傷害。他說，並沒有一條法律規定，鐵路公司有責任建築一道穿不過、爬不過、或能防止小孩的柵欄。在一八八三年有一個判例是這樣決定的，那個案子中柵欄有缺口達幾個月，而本案缺口却只有將近兩個星期。」

「這就是給那位辯護士的勸告，同時也就是辯護士給孩子父母的勸告：就是說，要訴諸法律是沒有用處的。這就是說，根據將近六十年前的判例決定，這孩子不可能要求賠償。我曾寫信給運輸大臣提出這件人家請我注意的案子，我說：

「我附上我的駐費夫代理人的一封信，一封辯護士事務所的和有關信內所說案件的相片。」

「這是件可怕的事情。一個五歲幼兒的腿從膝蓋上面被軋斷，可是國有化的鐵路却不給予任何賠償。」

這張照片說明那道保護鐵路的柵欄，因一條枕木的脫落而形成了缺口。圖中上面打有×號的枕木就是在事件發生以後的第二天用以修補缺口的枕木。

「昨天在辯論煤炭工業法案的時候，諾曼頓議員西維斯特發言時急於想在下院造成一種印象，就是：煤炭工業自從國有化以後，入道的程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了。在這方面，他說：

「在我家鄉城市的街道上散步，路上我碰到一個去年九月間失去了下臂的人。由於我是他的老同事，我便很自然地問他現在生活怎樣。首先他告訴我他在醫院受到很好的待遇，並且說還有使他驚異的是，竟有一位襄理去探望過他。過了兩天又有兩位代表去看他。我問他還有什麼值得驚異。他回答說，在過去，這些人連作夢都不會想到要去探視受了傷的礦工的。」

「他還順便談了些有關賠償的事。可是他在談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在那一週末在費夫聽到的那個幼兒

亞歷山大·懷特的事情。我要求你和鐵道委員會處理這件事，要他們不要以一八八三年的判例的眼光來審查這樁事，而要以偉大的國有化工業的人道觀點來審查這件事。」

「運輸大臣給我來信說：

「感謝你在十一月三十日由克蒂奧克非街費爾尼大廈西費夫選民委員會寄來的一封關於考頓畢斯東公爾街九號亞歷山大·懷特事件的信。我聽到這件事後，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這一問題應由運輸委員會考慮，我今天已將你的來信直接轉送給他們。如果你想與他們接觸，你可以與南威爾士第一區百老匯五十五號運輸委員會主席西摩爾·赫利姆聯系。」

「我與運輸委員會接觸，可是大臣已經把信轉送給他們了。十二月十五日運輸委員會給我的來信說：

「我這封信談的是關於你送給班士先生那封附函的事。我仔細地考慮了這件事，很可憐這位慘受傷害的孩子。有人對我提出意見說，鐵路局對這件事並沒有任何責任，正如約瑟夫·懷特先生所請的律師所說的那樣。事情既是這樣，我只得很遺憾地說明，運輸委員會對補償問題無法採取任何步驟。」

「這就是鐵路局方面的意見。我要向大臣提出兩個鐵路局早就應該考慮的建議。第一，我請他注意報上發表的照片。那孩子必須要送到紐卡蘇裝上假腳，並受訓練。他的母親送他去了，在紐卡蘇，另外一個母親也有一個孩子，他和那個孩子同年，也失去了一隻腿。這孩子受了訓練，已經能用假腿奔跑了，因此便要他教小亞歷山大·懷特怎樣用假腿。假如駐議會次官看一下這張照片，他就看得到另外一個小孩如何在教這個活潑可愛的小孩亞歷山大·懷特了。另外那個小孩大衛·約翰遜的兩腿是因公共汽車肇事而失去的。他得到了一千五百鎊賠償費。現在懷特夫人和她的孩子

正在紐卡蘇與約翰遜夫人住在一道，可是懷特夫人的孩子却自運輸委員會那裏得不到任何賠償。

「我認爲，鐵路局的信是毫無惻隱之心的。他們的確可以考慮這孩子的問題，可以考慮他所遭到的悲慘事件和他現在所面臨的可怕的困難。的確鐵路局可以考慮給予撫卹金。現在，朋友們都組織音樂會、跳舞會來幫助這孩子和他的父母。的確，即使鐵路局根據一八八三年的判例沒有賠償責任，也可以考慮給予撫卹金的可能。除了撫卹金以外，的確鐵路局也可以說明他們深深關切這孩子和他的父母，並且認爲這件事對於這孩子的將來是一個可怕的災難，因此他們要保證當這孩子成人的時候給他找一個適當的職業，使他的父母和他對於前途的事不懷任何憂懼之心。」

「我要求運輸部駐議會次官要他的正直的尊貴的朋友辦理這件事。在接到鐵路局的信以後我曾回信給他們說，早在我寫信給他們的時候，我便知道根據一八八三年的判例他們沒有法律上的責任，可是我認爲他們有道義上的責任。我對議會次官說，運輸大臣對這小孩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我希望他和鐵路局辦理這件事，看是否能給予撫卹金，並且由鐵路局對這遭到這樣可怕災禍的孩子的前途給予某些保證。」

這位大臣回答的時候仔細地避免承認他的部或鐵路局應負法律上的責任，可是他的話又使一切有關的人都感到極爲滿意，他說：

「我認爲，就剛才所談到的事實來看，這樁事情當然是一種我應該要求鐵路當局再加考慮的事。顯然鐵路當局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牽累的，沒有人否認這一點，而且假若他們重新考慮這件事的話，也必須先有這種諒解。我將要求他們考慮能否用撫卹金來幫助這小孩子較好地生活下去。這位可敬的議員先生說這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我完全不認爲這是一種責任。我認爲這只是一般的人道問題。我的正直的可敬的朋友衛生大臣曾經說過，爲大事者切忌小善舉。我認爲，他的意思似乎是，大機關處理個人的事件應該

鐵面無私明法正紀。這是我們所應該盡力做到的。我希望不久以後，鐵路當局能使我正直可欽的朋友看到，一個大機關不僅能有冷靜的頭腦，而且還有熱情的心腸。我希望這位可敬的議員先生同意這個保證。」

(議會諸事錄，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七〇五——七一二欄)

但是我一直堅持辦這件事，直到差不多了結之時為止，我一直都誤以為這小孩是屬於我的選區內的鮑希爾村的。後來還是這位大臣告訴我這件事並不是發生在鮑希爾，而是發生在考頓畢斯的。當然，即使我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我還是會同樣努力的，不過那時我將堅持頓菲萊茵自治市的工黨議員應該對這事表示關心。

但是那時勞工運動有着一種嚴重的癱瘓，大多數工黨議員都受到了感染。造成這種病態的病菌便是所謂「不要為難工黨政府」，這句話你到處可以聽到。不要要求增加津貼以減輕租金負擔。不要要求增加養老金。不要作任何事情！不要要求任何東西！「不要為難工黨政府」。一個五歲的孩子因為防護不周在鐵路上軋斷了兩條腿而應該受到補償，像這樣緊急重大的問題議員們都不處理，唯一可能的解釋便是這種癱瘓症的結果。

「不要為難工黨政府」。這句話使勞工運動的一切活動陷於停頓，癱瘓了工黨議員，但它却刺激了、鼓舞了保守黨人。工黨議員越被迫退縮，保守黨就越發得寸進尺。勞工運動應該認清，活動就是生命，沒有活動就是衰落和死亡。

例如，有一天晚上我在馬金奇演說的時候，有一位經常聽我演說的婦人說共產黨特別，老是談什麼「鬥爭」，她還說這是不合基督教的教義的。我告訴她，她錯了。聖經上有很多地方是猛烈地斥責罪惡的。其猛烈程度為共產黨所望塵莫及。她多少還是個地主，因此她知道我會反對她。她很高興聽我的講演，其程度比我歡迎她的程度還厲害。但是她是一個基督徒，因此反對共產主義。

我告訴她，這要看你認爲什麼是基督教的教義爲轉移。假若我們提出關於綿羊和山羊的比喻，那末的確就沒有什麼話能爲資本主義和資本家辯護了，於是我給她找出了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三至四十五節：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國。」

「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義人就回答說：主呵，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爲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因爲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呵，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今天人民都病了，病了而且在監裏了——被禁錮在我們城鎮中罪惡的陋巷之中，而房屋建築費却被削減以維持擴張軍備運動——「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這句話所指的決不是共產黨人。

第二十一章 這是帝國議會嗎？

現在且讓我們看一下下院本身，看看我們是否可以發現那裏有甚麼特別有趣的事情，或者有甚麼與工人階級極有關係的事情。

下院的頂端放着一張椅子，一張有篷的椅子。議長先生或者他的代理人在下院開會時就坐在上面。每一個議員進入或離開下院時必需對着椅子鞠躬——這不是向坐在椅子上的人鞠躬，因為有時椅子是空着的，但是議員們照樣要鞠躬。椅子前面擺着一張放滿書籍的長桌，桌邊坐着下院的三位秘書，桌子的另一端（面對着秘書的）頭上有着兩個架子，它的下面，即桌腳下面也有兩個同樣的架子。當下院開會時，議長先生或者他的代理人坐在椅子上，議長的職杖就放在桌上面的架子上。當下院開委員會會議椅子空着的時候，一位秘書就離開他的座位，讓給財政委員會主席或他的代理人，職杖就從上面的架子上拿下來，放到下面的架子上。

十足像演戲一樣。下院在開小組委員會會議時，椅子空着，但是我們在那裏仍舊鞠躬。有些議員把它當作一種了不起的儀式。他們慢慢地從下院的末端圍欄所在的地方，沿着地板一本正經地走來，走到他們自己的位置以後，轉向空椅子，立正，然後裝模作樣彎腰鞠躬。當他們出去的時候，他們把程序倒過來，他們慢慢地從自己的位置上走到下院的圍欄邊（那裏的地板鋪着一條黃色的油氈），然後又轉過來向着椅子照樣演戲。當別的議員或者有時到下院來參觀的人們碰到我，問起我爲什麼我進下院從來不鞠躬，我老是這樣說：「我的背痛啊。」

放在桌子上的書是成卷成卷的，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冊，裏面包括調查報告、決議和判例。總之，是能解答有關於在下院辯論的安排、程序和行動的每一個問題的書。歐斯金·梅是編纂者的名字，發生任何困難時，有任何關於程序和行動方面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歐斯金·梅就被找來，他所寫下的東西就是最後的定論。如果歐斯金·梅的話被引用來反對你——你也只能服輸。我在選入下院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關於這位先生的事情，以後我對他的認識也只是從議長這裏間或聽到一些引證的話，或者聽一位特別好學的議員從圖書館裏帶一些書進來，企圖使下院大吃一驚地說他已發現什麼事情的前例了。我總是在相當遠的地方看這些書的；從來不想把我們的一問隔縮短」。

老實說，我以為絕大多數的程序和前例都應該撕掉，這些東西顯然只投紳士們之所好，這些紳士們儘管在解決問題的意見上有所不同，但把羣衆踏在腳下面這一點却是一致的，而對於要從下面翻到上面來的羣衆就不合適了。

狄更斯在他的小說「小杜麗」中，對繁文縟節的官場作了很大的戲謔，在那裏，「如何不辦事」的伎倆成了最好的藝術。狄更斯有很長時間是下院旁聽席的採訪員，這種想法他一定是從議會裏得來的。議會是「不辦事」的最理想的地方。六百個選出來的男女們，浪費他們的生命，絕大部分時間只做了一點事情，或者什麼也沒有做，他們如果偶而碰上機會得到議長允許時也往往發表一通演說，但大部分是坐在吸煙室或茶室裏等待分組表決的鈴聲，然後進去投一票。

議員們時常爲此訴苦，當新的大羣工黨黨員隨着一九四五年選舉的勝利進入下院，渴望完成他們的任務（他們就是因爲這樣的任務才當選的）的時候，工黨領袖所有的工作就在愚弄他們，讓他們知道他們就要忙碌起來了。按照地區或者按照政策的某些方面，大批的委員會成立起來

了。什麼蘇格蘭工黨議員委員會啦，蘭開夏工黨議員委員會啦等等，然後又有什麼財政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啦等等。但是，人們馬上明白，這些委員會一點也影響不了政府的政策。對於議員來說，這些委員會不但是影響政府政策的工具，相反地，政府却用它們去壓制那些有很有理由的意見並期望把它們表達出來的個別議員。這樣，便使得在任何一個委員會中都容易得到多數，去採取莫里遜和他的同伴所要他們採取的方針。決議做出之後，任何一個抱怨政府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都接到勸告，說他們必須要接受多數人的決議。這樣，這些委員會不但沒有鼓勵議員們去辦事情，反而變成了一個新的並且更進一步的工具：來保證使「不辦事」這套老戲法依舊可以繼續下去。

注意這點是很有趣的：早在一八八七年，基爾·哈狄出版了「礦工」月刊，在一篇講到「自由黨——工黨議員」的文章中，他作過這樣的觀察：

「假使說實話的話，工人階級的代表在議會中迄今還沒有多大的成就。一般地說他怕觸犯有產階級而被認為走了極端。他對自己在下院衆人眼中的名譽，比他在工廠和礦場裏受苦受難的同伴們的利益還看得重。他期望能够被看作一個紳士，配得上作為『世界上最好的俱樂部』中的一員。」

我想不出哈狄看到了今天的情形之後，他會說些什麼，或者他會怎樣來評論這個我相當討厭的名叫諾雷的傢伙呢。這個傢伙在某天晚上爬起來，很莫名其妙地報告保守黨和一般人說：「我們是新的中產階級」。

那裏還有這樣的人，還多得很。他們的怪念頭是出乎人類理解力之外的。哈狄想着這種人時才寫道：「還有比工人選進議會去更值得嚮往的事情呢，這就是給已經進入議會的工人們一個用

來戰鬥的明確的綱領，並且警告他們，假使他們沒有勇氣在下院站起來說他們會在礦工大會上所說的話，他們一定得讓位給另一些願意這樣作的人。」

一個「礦工大會」那樣的事情和中產階級毫無關係，有關係的倒是莫里遜、狄金及其同夥。「我蔑視那些人，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做，但他們却不敢在需要的時候站在議會講台上宣佈它。正是因為現在的領袖們的半心半意，我們的事業才得不到進展。」就是我們這些「現在的領袖們」，他們正在破壞我們的事業，使我們的事業為美國資本家所玩弄。基爾·哈狄在中拉納克地方的選舉中（他是那裏第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的候選人），他向選民發表這樣的演說：

「我和另外一些你們已經知道他們姓名的紳士們之間，有着一個主要的不同點。他們不管對或者錯總是跟着他們的領袖走，而我却不同；我要在議會堅持人民的要求。」

基爾·哈狄這樣說的時候，他的做法是一個令人稱羨的行動，而今天這種行動同樣還是令人稱羨的，假使工黨議員們能把它記在心上並加以實行，那麼議會的性質便馬上要有所改變了。但是，他們却是「不管對或者錯總是跟着他們的領袖走」，不僅這樣，他們有時還努力「請求議長准許他們發言」。

這常常還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它可以使不幸的議員磨耗掉他們的胆量和血氣。請想一想吧！譬如說，議會舉行一次關於外交或其他同樣重要的問題的重要辯論。這個辯論就要化去兩天的時間。議會在下午兩點半開始舉行，有一小時用來提問題，接着辯論便由一個議會政黨領袖開始，他的發言決不會少於一小時，他發言之後就由另一方的一個議會政黨領袖發言，他也喜歡來上一小時。過去幾年來大臣們通常總是逐字逐句地唸演講稿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共同的感覺，就

是這些講詞應該發給議員們，這樣可以省下用在發表演說的時間。就一般情況說，議會政黨領袖發言了兩小時以後，下院會議已經開到五點半了。於是由後座議員們發言，一直到八點半或八點三刻，這時議會政黨領袖再發言一通來作所謂「結束」。

辯論的第二天，程序還是一樣。兩天中有七到八小時分配給後座的議員們，每一個發言者平均發言二十分鐘的話，這樣有機會發言的不過二十一到二十四個議員，但是要想在辯論中發言的，也許有一百人而且實際上還要多些。一宣佈開始辯論，議員們就找議長，告訴議長說，他們極願參加辯論，並且提出了那些他們認為是應當准許他們發言的正常理由，請議長考慮考慮。他們的名字列上了名單，列在名單上的名字很多，但「被挑選上的沒有幾個」。也有去找政黨的議會領袖的，他們間或也替個別議員施一點壓力。運氣好一點的議員在特定的時間可以依靠舉手示意來「要求議長准許發言」，但是通常他們只好再站起來希望自己會被挑中，而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就請設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吧。議會政黨領袖的演說完畢了。第二個議會政黨領袖又發言了。全體想發言的議員都站起來。有人點中了，其餘的人便都坐下去，要忍耐到他發言完畢。於是，大家再站起來。又有人點中了，大家又坐下去，他發言完了，再站起來，再坐下去，就像這樣地進行兩天，有時要三天，像英鎊貶值的一次辯論那樣，而發言的機會却一點也得不到。

當你想到時間白白地虛度過去，連聽都不想聽別人的發言，只是等他們發言完畢，好讓你再有一次爭取發言機會的時候，憤懣、激怒、失望，每一種情緒都湧上來了。

有一次，我覺得我和菲爾受到了凶狠的處置。我在議會政黨領袖正在作結束發言的時候，就插進去辯論，替必須在這裏姑隱其名的某些人發表了公正的意見。我在議長有機會命令我退席之

前便走了出去。但是即使我走出下院之後，議長還是決定下令要我離開下院。直到下院的職員來找我，並且告訴我他要送我出去的時候，我才知道這回事。

我受到這樣的懲一警百的處分，這並不是第一次。但是，我想我自己走出議院實際上就避開了這回事情。

那是一九四七年議會夏季休會以前不久的事情，從那天晚上起，我和議長先生就沒有交換過一句好好壞壞、或者可有可無的話。不過這是閒話。

這裏所發生的問題是怎麼樣才能使下院成爲更有用的機構，在那裏，議員們可以有所作爲，而不像現在那樣，在這麼多事情要做的時候，却把時間浪費在惡性的政治貧血症的悲哀的情況中。

第一件事就是要結束兩大黨的把持。這就要改變選舉制度。

當議長召集專門委員會考慮選舉改革的時候，我提出一個聲明，這個聲明，以一連串選舉的結果來證明由於當前選舉方式所產生的那種可笑舞弊代表權的情事。這使得現在兩個主要政黨的任何一個政黨，雖然在全國大選中得票很少，但在下院中他們却得到了過半數的甚至是壓倒多數的席位。除此之外，現在的選舉制度極有利於那些有基礎的大黨，而極不利於那些爲目前尚不能爲大家所歡迎的政見而鬥爭的人們。

這裏必須指出，上面這種情形在很長一段時間是適用於自由黨人和保守黨人的，自由黨一直到它的基本羣衆——獨立的和沒有參加工會的產業家——爲大壟斷資本家所鯨吞以後，才被大家所忘掉。隨着自由黨的沒落，一個新的政黨起來了，這個政黨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保證要在資本家的剝削下解放工人階級，但是在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下，這個政黨日益變成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

化身。這樣，雖然成立這個自命爲工人階級的政黨本來是爲了要完全改變當時所存在的黨派關係的局面，但是，我們實際上看到，今天的情形正和從前自由黨和保守黨兩黨時代的情形一模一樣。

就像我已經指出的，只有兩黨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獲得了協議的情況下，兩黨制度才能繼續下去。有了那樣的協議，他們能够無限制地玩一套「一進一出」的把戲，有時在這個、那個或其他的問題上要一下花槍，對這些問題如果他們「在野」，他們就拚命加以反對；如果「在朝」，又同樣拚命地加以支持。

在勞工運動的初期，我們的發言人時常提醒人們注意：自由黨和保守黨之間所玩的那一套把戲。他們會說：「看，他們是怎樣鬥爭的，看一看他們所用的語言，你就會以爲他們是死不妥協的敵人。但碰到影響他們利益和特權的問題時，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爲了對付工人階級是團結得多麼緊密。這樣你們就會看到真正的鬥爭和真正的敵人——別的都只是裝腔作勢罷了。」

拿往後的情形說吧，保守黨和工黨有時可以彼此怒罵，在徵稅和撥付津貼的某些形式上吵得「面紅耳赤」。但是當碼頭工人罷工——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時，你就可以看到他們又怎樣地走在一起了。保守黨領袖們，工黨領袖們，保守黨的後座議員們，工黨的後座議員們，他們哪裏還有什麼不和呢？這些人不再互相敵對，而是聯合起來對付工人們——碼頭工人是他們的敵人。

只有兩個共產黨議員和一些無黨派的議員——普里特、普拉茨、米爾斯、李斯里、索萊、萊斯特·胡金遜——在艱苦地和聯合的力量作鬥爭。但是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在那裏了，所以沒有人發出反對工黨和保守黨聯合力量的聲音了。

議：

在我送給議長召集的專門委員會會議的聲明中，我曾提出單一的、不限地區的投票法的建

「在將來所有的議會選舉中，應該運用比例代表制的單一的、不限地區的投票法。

「這個建議是英國民主的基本機關將來發展的基石。

「這個原則——在下院的代表權所根據的就是這個原則——有兩層意義：每一個議員有「同等的代表地位」，這就是說，他大體上代表同等數目的人或者選民；「所投的每一張票將儘可能地在下院享有同樣一份代表權。」

這就是要取消現在的這樣一種制度：一個選區只產生一個議員，幾個選區合在一起選民有權在投了這個候選人的票之後，又轉而投另一地區另一個候選人的票。取消了這種制度之後，將產生一個公正得多的代議制，並將保證兩大黨以外的人也大致一定能當選。例如，當某些工黨支持者會把他的票投給保守黨的時候，大多數工人就不必再擔心「讓保守黨上台」，而把他們的票投給共產黨人和左翼獨立分子。

但是，一九五〇年下院選舉結果，沒有一個共產黨和左翼獨立分子的代表當選，儘管他們所代表的觀點得到人民越來越多的支持。事實上，下院越是反映工黨領袖和保守黨領袖的聯合趨向，它的性質越發和德意志帝國議會相同。

美國人不論做什麼事情，那就是對的，不應該有什麼問題。只要大家知道：在重要的事情上不加批評、不加反對，那麼，議員們是容許有時彼此嘲罵一番，以便使人保持這樣一種錯覺：他們的黨所代表的利益是有些不同的。

真的，必須改變選舉制度和下院辯論的性質（至於上院，那就應該取消）。不是艾德禮或貝文站起來發表演說，然後邱吉爾或艾登發表同樣的演說；而是讓任何真正有反對意見的人發言，每一個黨派可以提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發言人的名字，但是無論如何要說明他們對於正在討論的題目是支持還是反對。當你看到工黨、保守黨、自由黨議員，一個接着一個地站起來發言，都是支持政府，都講同樣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很少，而且並不是意見上的不同，只是語調和口氣上的不同——這是多麼使人厭倦的事情呵。

我也是在下院裏浪費了許多時間的議員當中的一個，而且也嚐過個中的苦頭。現在是結束這種情況的時候了。一個新的下院是必需的，在新的議會裏，人們再不知道什麼是虛偽的鬥爭了，議員們可以為那些創造國家財富的人做事情，很久以來人們一直容忍着的寄生階級，連同他們的榮華和特權，都將像一場惡夢似地消逝。

但是，儘管工黨右翼領袖要對工黨議員進行「紀律」處分，並威脅要把任何為工人階級的政策而鬥爭的人開除出黨，但是國內外政策所具有的反對工人階級的特性，已表現得這樣露骨，以致甚至在下院中也有一些工黨議員要設法對它進行鬥爭了。但是，如果沒有勞工運動的組織的積極幫助，他們就不可能做出什麼事情來。因為終究只有勞工運動才能決定：政府該為資本家服務還是為工人階級服務。

第二十二章 巴勒斯坦

正像愛爾蘭人民會相信有了工黨政府愛爾蘭被分割的情況將要告終、愛爾蘭在受了幾百年的苦難以後將成爲自由和統一的國家一樣，猶太人民中的復國運動者也曾確信工黨政府上台將使他們的希望得以實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

愛爾蘭人民在工黨政府處理愛爾蘭分割問題上所獲得的經驗，對於所有竭力想爭取統一和獨立的人民是一個教訓。一九四九年六月愛爾蘭法案的通過，使得人們對於工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再沒有任何懷疑了，工黨政府就是要使愛爾蘭永久分裂下去。

當工黨是反對黨的時候，它曾對愛爾蘭人民爲統一愛爾蘭而進行的鬥爭表示過最大的同情。而現在莫里遜和伊迪在愛爾蘭法案辯論時，代表政府贊成愛爾蘭的分裂，這件事情使人回憶起在從前自治問題辯論最激烈的日子，卡遜和俾金海特在談到英愛合併案件時所作的猛烈的帝國主義式的攻擊。

工黨急進分子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的全部特色已由莫里遜表明出來，他說政府決心把北愛爾蘭包括在聯合王國之內。他說：「我希望沒有人在從事分裂行動，來分裂這個聯合王國。」他接着強調說：假使都柏林（按係愛爾蘭自由邦的首府——譯者）和培爾法斯特（按係北愛爾蘭的首府——譯者）的議會「自行成立一個協議，那便將得到英國政府的考慮」。這是什麼意思呢？當下院辯論時，我曾指出如下：

「……這就是說，工黨政府放棄他們的責任，不去處理和決定這件事情，而把權力讓給北愛爾蘭的保守黨議會，讓他們去決定愛爾蘭的命運和前途，於是我們將受到通知——議會中工黨議員將受到通知——他們的責任就是支持北愛爾蘭的保守黨議會去反對南愛爾蘭人民。」

但是回頭來看看巴勒斯坦吧。許多年來我都是反對猶太復國運動者的，從我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初的日子起，「猶太問題」就引起我的注意。將近五十年以前，我頭幾次向培斯利的聽衆發表演說有了成績以後，我被邀請到格拉斯哥的一個會議上發表演說。當我走到了開會的地方時，我覺得自己是頭一次到了哥爾巴斯區。負責大會的同志都是非常年輕、非常熱心、非常熱情，而且還都是猶太青年。他們非常喜歡我，正像我非常喜歡他們一樣。我時常和他們在一起，在他們家裏我碰到許多老年人（他們多半是沙皇制度下的流亡者），聽他們談自己的經歷。這些恐怖和災難的事幾乎超出人類忍耐力之外，給我一個恐怖的感覺。

這樣，我非常關心猶太復國運動者的宣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向英國帝國主義担保：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將是英國在中東的忠實可靠的前哨，他們想藉此來完成他們的事業。

我曾在無數次的猶太人的集會上發表演說，並會和若干猶太復國運動的領導人辯論，但是我得不到一點收穫。當我和已故的霍羅維茲先生在皮開特雷的英——巴（巴勒斯坦）俱樂部辯論時，我有過有趣的經驗。那時俱樂部的大廳擠滿了人，他們大都是非常優秀的猶太青年男女。辯論結束以後（有時辯論是很熱烈的），我被秘書邀進一間側屋裏去喝茶。他說：「加拉赫先生，你要知道你的話使我開了眼界，假使這裏舉行一次投票，我相信你一定贏得多數。」

我自己很難這樣想像，因為在二十世紀初期，猶太復國運動者仍舊是憑藉着貝爾福宣言的。在這時候，工黨領袖們對猶太復國運動事業的狂熱正在互爭雄長。不僅在猶太復國運動者組織的

公共集會上，而且在由已故的赫羅特·拉斯基所主持的工黨的會議上，工黨分子對這個問題都發表過冠冕堂皇的論調，在猶太復國運動者的集會上演說者常常一個接着一個地嘲弄我。

他們說：「你給人們做什麼事情了？你不能替我們做什麼事情，我們有工黨的支持，而這就

是我們所期待的。」

對於這樣的話，我回答說：「是的，你們曾有『貝爾福宣言』作為憑藉，但是這使你們究竟怎麼樣了呢？現在你們說工黨支持你們，但是請告訴我，你們是否得到過些微的表示，表明外交部不會出賣你們？」

他們含糊地說：「當工黨政府成立，有了工黨的外交大臣，事情就會完全兩樣了。」

這就是在英國的猶太復國運動者的普遍的想法，也可以說是英國大部分猶太人的想法。工黨領袖特別是拉斯基是要對此負責的。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英國舉行了大選，工黨得到了壓倒的勝利。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希望高入雲霄。在多年等待、多年經受了希特勒統治歐洲時的恐怖，幾百萬猶太人因酷刑和飢餓致死之後，較好的日子終於要來了，猶太人將從歐洲的墳場中走出來，開始新的生活，建立一個同民族的國家，使他們得到自由，永遠脫離一千多年來的不幸和艱難。他們祈求了。打開你的大門，啊！天國！渴望的眼睛向你注視着，熱切的心渴念着你的愛，邁進的脚步雖然由於長時期的苦難顯出疲乏和倦困，但是還是果斷的和有決心的向着你走來。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們，我們不是現在已有了工黨政府，它的領袖們曾保證過，它的黨的會議曾保證過，要使我們的道路平坦而且筆直麼？

這是艾德禮政府剛成立時的情況，但是等待着他們的却是多大的打擊啊！

外交大臣貝文先生馬上清楚地表示他擁護繼續保守黨的外交政策。外交部沒有任何改變。雖然議會前座中添了一羣新的議員，但是還是「老的一幫」穩固地把持着外交部。他們對猶太復國運動者表示關心嗎？不是的，先生，他們只關心石油。他們完全把他們在一九四五年選舉前由休·達爾頓提出並經工黨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所作的保證置諸腦後了。這個決議曾呼籲在以色列成立猶太國家，而把阿拉伯人遷移到別的阿拉伯國家去。

這裏必須指出，由於戰爭的結果有二十萬以上的猶太人被拘留在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的各個集中營裏。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家庭已被毀滅了，連一個親戚都沒有留下來。可以理解，經過了如此可怖的災難，他們要求生活，而且他們覺得只有和其他猶太人住在一起才能感到安全。不僅如此，別的國家都不歡迎他們。自然，人們一致要求給這些無家可歸和六親無靠的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猶太復國運動者竭誠信任地盼望着工黨政府實現它對他們的保證。但是，使他們驚奇的是，貝文先生代表政府發言說：一九三九年發表的只准七萬五千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白皮書現在仍繼續有效。

外交部正援助着在中東日漸成長起來的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想把這個運動導向有利於英國利益（在石油方面的利益）的路綫發展。一九四五到四六年，羣衆運動在中東有了驚人的高漲。一九四六年三月開羅和亞歷山大港都有大規模的羣衆示威。敘利亞人民和黎巴嫩人民每天都舉行示威，要求所有駐軍從他們的國土撤走。貝文先生和外交部的想法與張伯倫先生和馬可姆·麥克唐納的想法完全一樣。工黨政府無恥地背棄了他們對猶太復國運動的諾言。工黨會議的決議沉到石油政策的大海裏去了。

但是，猶太人關於遷入巴勒斯坦的要求繼續在歐洲和美國高漲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英國

政府實施了等於在中東政治上破產的主張。它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的歷史上第一次決定把另一個強國引進他自己的領地來。結果成立了一個巴勒斯坦英美聯合調查委員會。這是英國帝國主義者趨於衰微的新的階段，是英國準備變自己為美國僕從國家的公開的宣告。同時，永遠唐突的貝文先生在下院却輕率地告訴我們說：「我以我的政治前途打賭，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英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曾通過了下列決議：

「大會深信惟有取消託管，承認巴勒斯坦在保證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的民主政權下的獨立，才能達成巴勒斯坦問題的公正和民主的解決。」

當英美調查委員會在倫敦成立的時候，共產黨決定提出證據並揭發在巴勒斯坦的現行的壓迫制度。我的同志，菲爾·皮拉丁和傑克·加斯特代表共產黨提出證據，並再度公開提出結束託管，允許巴勒斯坦獨立的要求。這個提交委員會的聲明，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是最現實的而且在政治上完美無誤的，但是，委員會絲毫沒有加以考慮，巴勒斯坦的局勢不斷地惡化了。

英國政府在巴勒斯坦加強壓迫，少數猶太復國運動者的過激分子在巴勒斯坦便以恐怖主義作為回答。一九四六年七月，耶路撒冷的大衛國王飯店發生爆炸，有九十一人身死，四十五人受傷。英國行政當局利用這個事件作為藉口，在巴勒斯坦大舉逮捕猶太居民，完全不管他們究竟無罪或有罪。有幾千猶太人被捕。宵禁宣佈了，而且很殘酷地在和平的居民區進行軍事搜查。此外，巴勒斯坦英軍總司令巴克爾將軍，當日給英軍頒佈一個命令，這個命令很有納粹的口吻。這裏，我從我的同伴皮拉丁在當時所寫的小冊子中摘引一些話，讓大家知道一下究竟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和以後的幾天中，將近有三千猶太公民領袖被捕，並拘押起來，四周佈以鐵絲網。被捕的不僅是猶太人社的會員，而且還有重要的工會會員、合作社社員和市議員。對他們提不出任何罪狀。大約一星期以後，當局開始釋放他們，有幾百人現在已獲釋放。」

「從巴勒斯坦來的消息，表明猶太人方面沒有，或者只有輕微的反抗。三個猶太人身死，八十多人受傷。沒有一個英國兵在衝突中爲猶太人殺害。雖然如此，但在許多場合下，軍隊在執行他們的任務時，他們的舉動和軍隊應有的品德標準是不相合的。有時故意破壞，在許多場合下進行了搶劫，有些建築物被畫上卍字。」

「這次對猶太人民的攻擊，是在英國政府的命令下進行的，由最高當局決定的。在英國帝國主義的歷史上，這種對付殖民地反抗的方法並不是新的。但是，一個政府（它一方面表示願意把像巴勒斯坦那樣的委任統治的國家移交給聯合國託管，一方面又稱自己爲社會主義者），竟採取這種行動倒是很奇怪的。」

那些作出了這樣的諾言，提出這樣的希望的人們，居然作出了這種「奇怪的行動」。因此，我就寫了這樣一封信給首相：

致 南威爾士第一區唐寧街十號

樞密院艾德禮先生

親愛的首相：

茲寄上我在昨天收到的抗議在巴勒斯坦所發生的事情的三封電報和一封信。我覺得我不能不就這件事寫信給你，並表示我的意見。這些意見，假使有可能，我還準備在下院辯論時說出來。

我想談談作爲這次襲擊的藉口的恐怖運動。由於嚴重的挫折，這些青年男女已被驅使走上了這條道路。他們之所以遭受挫折，是由於他們被我國的政治領袖們鼓勵去實行和追求絕不可能實現的政策和目標所致。

在一九三八年下院討論的時候，我就乘機指出這一點來。我曾經在猶太復國運動者在我國許多地方舉行的集會上發表演說，竭力想使他們改變政策。但是他們時常自負於他們已得到了我國政治領袖的支持，相信這些人是能够實現他們虛妄的目標的。

這些青年人全部身心都集中到使巴勒斯坦成爲「猶太民族之家」的目標，而不接受其他思想，他們竟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以爲他們的目標已快要實現了；然而他們發現在他們的路上却擺着沉重的大石，這是一件悲慘的事。儘管這是極可悲哀的事，而不足爲怪的却是：他們當中有些人有這樣的思想，以爲經過最後的不顧死活的努力，他們可以掀開這些大石，開闢道路，實現他們終身的願望。假使我國有勢力的政治領袖提出一個政策來代替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政策的話，所有這種恐怖和災難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那些鼓勵這些青年男女走這條道路而使他們陷入絕境的人，是沒有權利責備這些青年的。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時常被提出來的指責，那就是巴勒斯坦的行政當局不斷地歧視猶太人，在許多場合下表現了非常強烈的反猶太偏見。人們會一再要求對行政當局的行爲進行調查，但是從來沒有進行過調查。行政當局上週末的搜捕是一種極端的行動，像安息日那天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帶有蓄意挑釁的性質；現在有人提出了關於蓄意挑釁的指責，那麼我們必須相信這種指責。

不論遲早——我希望早一點——我們將看到公正的解決，並且猶太人民謀求和平與擺脫罪惡的排猶毒害的危險的這個畢生願望得以實現。

我向首相並且通過你向政府說：那些用絕不會被信守的諾言把年輕的猶太復國運動者引入歧途的人，在那些長期受苦受難的猶太人的面前，應該感到慚愧。政府務必要放棄現在正在追求的危險的不名譽的方針。釋放猶太人社領袖、社會主義者和工會工作者，向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提出惟一的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辦法，使巴勒斯坦獨立，把那裏的英國軍隊和英國的干涉完全撤除；這樣，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定會在那裏合作，共同締造繁榮和進步。我知道要使這樣一個政策被接受是一個艱難的任務，然而平易的道路已經引向了毀滅的邊緣。讓我們回過頭來，並且充滿對於美好事物的希望，面向艱難的道路吧。

你誠摯的威廉·加拉赫（簽字）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於下院

這個建議沒有受到注意，外交部是主宰一切的，而貝文就是它的心甘情願的工具。煽動阿拉伯人反對猶太人，煽動猶太人反對阿拉伯人這種災難性的政策繼續下去，直到情況壞到不可收拾。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惡劣，而猶太復國運動者方面的反英情緒也變得更加厲害了。

許多工黨議員對於政府所實行的對巴勒斯坦的政策表示反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的辯論中，許多工黨議員對政府在巴勒斯坦的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同意。這是政府內部對貝文政策頭一次重大的意見不合。

巴勒斯坦日益增長的抗議浪潮和世界的輿論，迫使英國政府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蘇聯政府大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完全獨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團長安德列·葛羅米柯，非常清楚地說明了蘇聯關於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政策，他說：

「上述一切使蘇聯代表團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只有成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阿拉伯—猶太國家，才能適當地保護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法利益。」

他接着說出了猶太人之所以願意回到巴勒斯坦的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表明：沒有一個西歐國家證明能夠給猶太人以必要的幫助，使他們能保護自己的權利和生存，不受希特勒及其同盟國的侵害。這是一個嚴重的事實，但是應該加以承認，就像所有的事

實都應該得到承認一樣。

「沒有一個西歐國家證明能够確保猶太人的基本權利，能够保護它不受法西斯統刑吏的侵害，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猶太人爲什麼渴望創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了。」

他繼續說：巴勒斯坦問題有兩個解決辦法——或者成立一個阿拉伯——猶太國家，或者分治。貝文和工黨政府爲了阻礙聯合國達成任何決議，曾猛烈地進行收拾敗局的鬥爭。由於各帝國主義強國間的矛盾，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上，當聯合國大會決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的時候，美國政府支持了蘇聯的提議。

貝文先生繼續他的「游擊」戰術，阻礙這個決議的實行。一九四八年三月，他就使美國人收回以前對於分治的支持，轉而支持在巴勒斯坦實行託管。然而蘇聯政府要求實行原先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通過的決議：建立兩個國家——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

這時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展開了強烈的解放運動，這個運動暴露了貝文和工黨政府的破產。一九四八年五月，當工黨代表會議在斯卡巴羅開會的時候，工黨前任主席、已故的赫羅特·拉斯基曾在格拉斯哥的「前進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評述貝文在巴勒斯坦的政策，他在這篇文章裏說：

「這個星期使我們看到貝文的災難性的巴勒斯坦政策已到了最後的階段……這是一個可怕的失敗。他已以他的可惡的行動和言詞，污辱了英國在全世界的偉大聲譽，他在談判中一直是表現粗魯和野蠻的。他企圖棒擊批評者使之保持沉默。他不可能爲他的態度找出任何論據，而這種態度並沒有使他的艾德禮政府的的朋友們感到爲難，但却使全世界發生疑惑：到底傳統的英國的政治智慧是不是枯竭了。」（一九四八年

五月十五日）

但是巴勒斯坦的情況對英國政府來說太緊急了，一個突然撤退的決定作出來了。這是一個可恥的撤退。甚至當他們撤退的時候，他們惹下了極度的紛擾和混亂，這樣就使得建立阿拉伯和猶太國家的事情變得萬分困難。

巴勒斯坦猶太人的鬥爭引起各地猶太人的最大的關心和同情，特別是在美國的，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已深深地陷於和英國爭奪石油的鬥爭中了。美國的猶太復國運動者特別活躍。

當我和我的妻子在紐約的時候，我們曾到一個靠近五馬路的劇院去看一齣猶太戲：「一面旗幟誕生了」。這個劇本是非·海克脫寫的，由露柴·亞特勒導演，亞特勒並在戲中扮演主角。雖然這個劇本充滿了很強烈的猶太復國運動的宣傳，但它却深深地感動了我，因為我很清楚猶太人的深切的期望。一個年老的猶太人和他的妻子在歐洲各處漂泊，想設法去巴勒斯坦。開幕的時候，他們正在一個墳場上休息。她死了，剩下他一個人。一個青年出來了，他也是到巴勒斯坦去的。老年人心頭回想到猶太人的歷史，後台亮了，他看到巴勒斯坦昔日的光榮，接着一景便描述巴·柯克勃最後的英勇的鬥爭。然後，後台的燈光再亮的時候，我們看到聯合國在討論猶太問題。這一景是強烈反英的，而且在我國引起了一陣抨擊，特別是對劇作者非·海克脫和戲劇解釋員寬丁·雷諾。當然，這就是說沒有一個英國戲院會演出這個戲的。

不久以後，我就寫了下面的詩句，來表達我的感情：

一面旗幟誕生了

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奇怪的悽慘的夢，

一個痛恨和恐怖的夢。

一個年老的猶太人，眼睛發着光，

他休息在死人叢中，

和他在一起的，是比生命還寶貴的

他的衰弱、疲乏、和藹的妻子。

無家可歸，因為敵人掠奪了他們，

這些不人道的野獸蹂躪了土地，

他們的身體因受打擊而留下創痕，

但是却沒有人伸手幫助他們，

他喊道，唉！亞伯拉罕父親呀，

什麼地方有人來引導我們？

哪兒啊，哪兒啊，可以找得到和平，

我們在哪兒找得到開着的門？

她說，看吧，小土堆裏是一個朋友，

在那遙遠遙遠的約旦河旁邊，

我們注定了要在全世界流浪，

而找得到家的，只有那種地方。

夜晚又冷又黑得奇怪，

她的頭靠在他的懷裏，

她嘆息着——而後生命之火熄了。

這個疲憊的靈魂終於安息，

而後在那片墓地裏，消失，被遺忘了，

在他的心靈裏，「一面旗幟誕生了」。

現在，在遙遠的約旦河邊，

他們向巨大的力量挑戰，

前進的隊伍越來越壯大，

他們是猶太國的保護人。

「一面旗幟誕生了」，啊，年老的猶太人！

就在那裏，以色列爲你而生存。

貝文先生解決不了巴勒斯坦問題，但是他却在巴勒斯坦順利地造成一種情況，除了分治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第二十三章 凍結工資

二十五年前（約在一九二五年），一個名叫布萊斯福德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年（那時他是獨立工黨領袖和工黨辯護人）有了一個驚人的，也可以說是駭人聽聞的發現，就是：亨利·福特一世根本推翻了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可以指出，這一類的發現對各式各樣的社會民主黨人來說是常有的事。他們經常來一套像煞有介事的誇誇其談，說階級鬥爭是不必要的，並且證明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分析是錯誤的。接着，他們便去尋找各種「靈丹妙藥」，然而歷史的進程却一直使他們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四處碰壁。

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利用工人階級來抬高自己在資本家——統治階級——面前的身價。「你們必須答應我們，」他們直率地說，「只有我們才能使工人平靜下來，才能約束極端分子，必要時還可以孤立、分化他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唐尼曾寫過一本名為「貪得無厭的社會」的書，他在書中給這種貪慾的態度賦以冒牌的理論根據。籠統說來，根據唐尼的意見，資本家都是橫暴貪婪的。他們對工人的殘酷剝削是無法約束的。另一方面，工人們又不懂社會科學，拚命地堅持要達到他們的目的，結果便很可能把制度弄得支離破碎、分崩離析。唯一能防止這種災禍的力量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既不追求利潤，也不是靠工資為生，他們能够不偏不倚，保持兩個鬥爭階級間的平衡。他們可以對工人說：「放心吧。不要採取過激措施，我們可以跟資本家談判，迫使他們退讓。」對

資本家呢，他們又可以說：「你們看看在你們面前的是什麼吧。假若你們不讓步，工人們便會『拆台』，你們便會和他們同歸於盡。」但是唐尼先生還會很溫和地說，也許有時還必須放縱工人幾次，讓資本家們知道一旦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保護他們時，他們會有怎樣的遭遇。

這就是他們的任務；他們是資本主義的維護者，他們要保護資本主義不因工人階級的憎恨而受到損害。

而在一九二五年呢，布萊斯福德就與亨利·福特同調了。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不需要社會主義，甚至不需要工會，因為那時福特公司已成了一個實行開門制度的工廠，收容各色工人，有大隊打手、軍人留來對付工會鼓動者。當時，利用輸送裝置、提高生產和提高工資，解決了底特律及其附近地方的社會問題，而且底特律的情況也將會擴展到整個資本主義領域中去，直到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會變成富裕、滿足的工人階級，一切都會變得像歌舞昇平一樣地幸福愉快。這個新的黃金時代將由美國跨過遼闊的大西洋，在英吉利的海岸上受到殷勤的歡迎。

現在請看二十五年後我們到了什麼田地吧。輸送裝置、提高生產、提高物價和凍結工資。呵，布萊斯福德先生，布萊斯福德先生，你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呢？歌舞昇平已經變成了悲嘆節約。

我記得一九四八年三月我有一次站在下院的休息室裏。有一位著名的工會領袖（他也是議員）愁眉苦臉地走進來。他到我跟前說：

「威利，工會運動沒有領導。」

我笑着說：「我不願跟你爭辯這件事。」

他接着說：「我剛才參加過威斯特敏斯特大廳的特別大會。我一生沒有見過這樣的會議。主

持會議的人完全無能，代表們都煩厭死了。這是我平生參加過的最死氣沉沉的一次會議。」

這就是他對這次討論克利浦斯所建議的職工大會特別代表大會的評價，克利浦斯建議「限制私人收入」——限制工資，不限制利潤，不限制物價。壓制工人，保護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這次特別大會的任務。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另一位過路的人插了進來。

「呃，湯姆，」我說，「你參加過喪儀嗎？」

「你說什麼？」他挨次地看看我們兩人。

「工會運動的喪儀，」我說，「傑克剛才對我說，主持會議的人一籌莫展，大會是冷清清死沉沉的。」

「呵，並不糟到那種程度，」他說，「主持會議的人作出了決定。這倒是重要的。」

「也許是這樣吧，」傑克答道，「可是我懷疑，假若陶遜不談物價已經要跌的話，是否會通得過呢。但是陶遜那兒得來這樣的消息呢？我們從來沒有聽到克利浦斯說什麼話來證實這種假定。」

「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湯姆說，「克利浦斯現在必須對物價有所行動了。」

另外有兩三個工黨議員對我們這種顯然是「公開的議論」感到興趣，可是當他們走過來的時候，傑克和湯姆却鬆勁了。他們不願有太多的人聽。另外的人問我爭的是什麼問題，我告訴了他們。同時我說明我完全反對「工資凍結」。其中有一個人企圖說凍結是有理由的，並且搜索一切在對工人進攻時所找出來的一大堆理由，他說，「假若我們要維護『福利國家』，就必需這樣做。」

我叫道，「天呵，你還沒有受到過這種花言巧語的騙麼？」

「這不是花言巧語，」他斷言，「這是事實。」

真的，就是他說的，「這是事實。」按照唐尼所說，工人不懂社會科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過高深的教育，懂得一切應該懂的東西。他們懂得拉丁文，有的還懂得希臘文，而且現在他們還懂得我們在英國有一個「福利國家」。不僅在英國有福利國家，而且假若我們相信他們的話，這個福利國家正在橫渡狂濤駭浪的大西洋呢。（「咳，你已經說過這話了。」對的，兄弟，我說過，可是那時是那邊往這邊來，而現在則是這邊往那邊去，而且受到美國銀行家和將軍們的政府的歡迎。）不要擔心規殺、酷刑、迫害黑人、虐待狂和電影及文學中的色情，這個福利國家也將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半瘋人院中繁榮滋長。我們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努力要我們這樣相信。不要馬克思主義，不要階級鬥爭。接受上帝和克利浦斯（也許我應該把次序倒過來）所安排的命運作為你們的命運。看，「福利國家」便將成為你們可靠和適當的報償。

「我們就在休息室這裏談起工資凍結和「福利國家」了。」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嗎？「我以發問的形式對一個工黨議員說。

他答道，「是的，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可是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我告訴他，「呃，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曾讀過奴隸之國、封建之國、我自出生以來便一直生活在這兒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在蘇聯和東歐國家，我見過工人的國家。不論過去或現在，凡是以其名為國家之名的階級就是統治階級——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或工人。但是「福利國家」是怎樣一種國家呢？利潤上升、工資下降。誰在上層，誰在底層？倫敦、北明翰、利物浦或戈巴爾貧民窟的居民是屬於還是不屬於「福利國家」的呢？」

我又說：「兄弟，沒有這樣一種東西。這是一種偽造和欺詐。假如你從來沒有聽到過或讀到過這句名言，我要提醒你注意，馬克思說：『社會主義是工人的唯一希望，其他一切都是幻想。』」幻想這個字很恰當地說明了這個所謂「福利國家」。

有一個時期這種臨時發生的討論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到後來工黨議員們開始謹慎小心了。工黨領袖對討論下了一道禁令。停止談話，停止思想。政治思想現在已達到了最後的定論。不能再有所推進了。全國各地的工黨的力量和聲勢，中央及許多地區的工會領袖的力量和聲勢常常使工人俯首聽命。可是許多工人雖然過去由於憎恨保守黨而錯誤地相信工黨及其小資產階級領袖，現在他們却已開始認識到他們的階級利益，拒絕順從工資凍結政策了。

現在布萊斯福德的老花樣又有人推陳出新了。他們不公開擁護福特的資本主義，而想用號召「愛國」和侈談「我國的危險」來掩飾其同樣的動機；不講減低工資而談「限制工資」；不利用勞工運動中的小派別，而拉攏工人的羣衆組織職工大會的整個領導機構，以勳號爵位收買這些領袖，來欺騙整個工人階級，使他們屈服並接受不足餬口的工資。

這一最新的企圖和它的失敗，便是教我們如何在現代問題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教訓。結果我們碰到一種驚人的情況。一九四七年，全國鐵路工人工會提出了每週增資一鎊的要求。勞工大臣便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考慮這種要求。正在等待決定的時候，一九四七年職工大會却在討論「凍結工資」。當時曾諮詢工資委員會的決定可能是有利於鐵路工人的。於是全國鐵路工人工會代表（大部分是工黨黨員）以多數票決定：他們的全國總書記紀姆·費金斯應該不反對「凍結工資」，而是贊成「凍結工資」。根據這一決定，費金斯就照辦。兩小時後報告發出來了。特別委員會提出了一個一致通過的報告說：四鎊十二先令六辨士的工資已無須增加。在被任命為這一委員

會委員的人中間，有一個是前蘇格蘭職工大會的書記查理士·莫都琦。這傢伙是一個臭名昭彰的反共分子。幾乎跟他的繼承人同樣糟糕，他一度當過共產黨的幹部，現在則傾全力背道而馳。

莫都琦也是一個「工資凍結論者」——對工人來說。他充當蘇格蘭職工大會書記每星期收入十五鎊，同時在蘇格蘭煤氣局裏兼差，每星期又淨得六鎊。這並不能使他不攻擊艾畢·莫法特和礦工代表們，說他們為礦工和全體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太鹵莽了。後來他升為煤氣局的專職人員，一年工資達三千鎊。這位先生就是那些在一致反對鐵路工人增加工資的報告上簽名人之一。他就是工資凍結擁護者的一個活榜樣。他們所有的人，毫無例外，每星期賺二十鎊，而且還有逐漸提高的外快。講到厚顏無恥，他們是無可匹敵的。

的確，雖然參加職工大會的某些代表團中工會官僚佔統治地位，可是也有幾個代表團裏有工廠和礦場的工人參加。而這些工人，至少他們中有一部分，也是工黨黨員，他們讓自己相信，他們首先該忠實於克利浦斯、莫里遜和他們的同夥，而不是忠實於工會會員。害怕保守黨的恐懼心理「愚弄」着他們（工黨領袖們其實每天都在與保守黨勾勾搭搭），使他們「投票贊成工資凍結來挽救工黨政府」，可是他們誰都不願意站起來替它辯護。發言都由「財閥的僕從們」包辦了。

礦工聯盟執行委員會不顧莫法特和其他一兩個人的猛烈反對，決議支持「工資凍結」。接着便召開了代表會議，會上儘管蘇格蘭代表們激烈反對，還是通過了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以後，這決議便必須傳到分會裏去。在蘇格蘭，所有的分會都投票反對。各分會的投票完全一致，這在蘇格蘭礦工史上還是第一遭。蘇格蘭和南威爾士投票反對是意料中事。而約克郡以絕大多數票、達拉漢和諾森伯蘭也以大多數票反對工資凍結，這件事實是右翼領導機構所遭到的最重大的打擊。這一點毫無疑問地證實了阿瑟·霍爾納在礦工聯盟投票時的聲明（後面還要談到它），並且使這一

政策在同年一九五〇年布來頓職工大會上，走上最後失敗的道路。這政策在投票時以二二二、〇〇〇票的差額而遭到否決；贊成這一提案的只有三、七二七、〇〇〇票，反對的有三、九四九、〇〇〇票。決議說，在目前利潤和物價上昇的時候，「沒有理由限制工資的要求」。

技師們要求每星期增加工資一鎊。全國鐵路工人工會也要求增加工資，特別要增加工資收入較低的鐵路工人的工資。電氣工人、製模工人、所有真正民主的工會都提出反對意見。多方設法阻撓運動發展的主力是運輸與各業工人工會和普通與市政工人工會。這些工會的一幫職員都不是選舉出來的，像其他工會一樣，而是委任的，這些工會一直是阻礙工人的主要障礙。但是即使在這些工會裏，只要分會得到表決的機會，幾乎可以肯定，決定都會和它們那些領袖相反的。雖然普通與市政工人工會或許還會有點問題。因為，正如我在「雷聲隆隆」一書中談到的，在一九二八年發出「秘密通告」以後，這個工會的一個職員薛渥德曾作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大會的兄弟代表，被派往美國去。他在以兄弟代表資格發言時曾說：

「我們在倫敦的分會擁有一萬五千名以上的會員。它們如果拒絕聽從最高委員會的命令，呃，主席先生，我們便打爛這些分會。」

這就是他們的民主觀念。「打爛這些分會」。在我的故鄉城市培斯利，也有這個工會的一個分會，擁有六百個會員。這分會通過了一件最高委員會所不高興的決議。分會就被封閉了。沒有討論。不容分說，它越軌——「打爛它」。

但是，不管「工資凍結」的頭子怎樣努力，反對的浪潮仍繼續增長。由於英鎊貶值和因貶值而起的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的運動更得到了新的刺激。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感覺事情不

妙。必須作新的努力，來「挽救工黨政府」，挽救英國和美國的資本主義。

因此，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召開了職工大會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這時，克利浦斯案和麻痺工人階級的事便交由文森·陶遜辦理。勞瑟爵士擔任主席。陶遜先生現在變成了文森爵士。像勞瑟一樣，他贏得了優裕生活的報償。但請不要問我這是什麼緣故。陶遜先生開始鼓動他的生花妙舌時說：

「有人說，爲非作歹的人是沒有安寧的；但作爲一個工會分子，同時相信工會分子都是善良的人，想到過去兩年各人所經歷的期間，你們可能同意：善良的人也得不到安寧。在我們大會閉幕後幾天中，最高委員會接到通知要在幾小時內瞭解政府認爲必需宣佈英鎊貶值的嚴重情勢時，它就是這樣想的。」

正如他所希望的，他用這段迷惑人心的開場白使每一個人都欣然接受他的話，於是他便會儘力完成他的任務了。瞧瞧下面這段話吧：

「假若大會任命一個最高委員會作爲它的執行機構，而這個機構啞口無言，不能認識我們人民的福利是與本國經濟的穩固聯繫在一起的，那末這便是大會的耻辱。正如這一文件中所強調的，這次討論中最高委員會一直在設法謀取他們所代表的人們的利益。不論我們是甚麼黨派關係——這與我發言以前的討論有關——只要我們要對我們自己的人大公無私，我們便需要把它作爲一個經濟和工業的問題來處理；這就是最高委員會處理它的情形。這不是容易的事。我完全坦白地說，有些時候，特別經濟委員會亟欲知道能對所轄工會提什麼意見。他們說，『但是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假若我們還沒有可行的肯定的政策；假若沒有辦法穩定局勢，那末我們最好設想一下：假若不宜佈貶值，假若局勢混亂，我們將要作些什麼。我們最好設想一下：假若工會運動不能幫忙穩定局勢，我們將怎樣來應付那種後果。」

我必須說明，當我讀完這些話以後，我斷然覺得，我們有足够的理由爲「大會羞耻」。想想「假若局勢混亂」這句話吧。什麼局勢呢？他談的是什麼呢？他恰恰是告訴他的聽衆：他們的職責本來在增進會員們的利益，但是假若他們履行這種職責，那末資本主義制度便完全可能崩潰。因此，爲了防止這種不幸事件，他們必須不代表會員們的利益。

事實上，當我們生活在沒落的資本主義階段時，除了混亂以外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東西。我們現在有了「混亂」。正是混亂引起了貶值。的確，甚至莽撞不負責任的莫里遜也不會說這是「明智計劃」的產物。是的，現在是「混亂」，而且，假若工人無力阻止這種混亂，那末便會走向第三次原子世界大戰的最後混亂。只有有組織的工人的堅決而有計劃的行動，才能制止資本主義的「混亂」，並在社會主義穩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有秩序的進步的社會制度。走向這一目標的道路便是對戰爭政策和向美國出賣祖國的行爲作鬥爭，爲和平、爲工資而鬥爭。

陶遜先生重複了克利浦斯和下院許多議員的話以後，像開頭的幾句話一樣，很精彩地在結尾中說：

「總之，我只想說一句話。現在有兩條路。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裏，你們可以選擇你所願走的路。一條路是不舒服的，需要勇氣來走。我們認爲假若我們走這條路是有希望的，可是，老實說，這條路是長遠的。另外還有一條路。它很舒服，它很輕易，它走去不需要什麼勇氣。但是第一條路是長遠的道路，而舒服的路却是短的，非常的短，而它的盡頭是甚麼，在座的諸位都是知道的。我只要求你們應該有勇氣承認你們所知道的事。」

有兩條路是對的。一條舒服的路和一條不舒服的路。文森爵士和威廉爵士這些「財閥」的僕

從們所走的路，假若他們能够成功的話，倒是一條「舒服的路」。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工資鬥爭。他們就可以逢迎工黨領袖、保守黨領袖以及所有社會機構中的大財閥。他們將受到歡迎，而且步入「上層」階級。這條路延續下去的時候確是一條「舒服的路」。

文森爵士和威廉爵士，讓我告訴你們吧，這條路是不長遠的。因為鐵路工人每星期賺四鎊十二先令六辨士，礦工每星期賺五鎊，低的還要低——這些工人和其他工人及其眷屬並沒有走着「舒服的路」。恰恰相反。他們走的路是：在物價上漲租金增加的情況下，要收支平衡也是一個艱難困苦的路。

不過我還有所欣慰。那就是，不去管這個工會領袖的這一套可憐的、先後矛盾的辯解，而聽一聽那位曾經對工人階級有過多年卓越貢獻的人的話。那就是一位不怕出頭的工會領袖霍爾納。這裏且引他的一段典型的話吧，他曾經說：

「我願意強調說，全國礦工聯盟這次不僅和全國執行委員會和全國代表會議談這個問題，而且還和各地區討論這個問題。我還要說，一直到這次會議為止，我們的一切討論都得力於我們有威廉·勞瑟和波曼兩位代表參加職工大會特別經濟委員會，爲我們說話。因此，今天早上職工大會總書記在這裏所說的一切，全國礦工在投票的時候沒有不知道的。現在誰都知道，即使全國執行委員會和全國代表會議建議採納職工大會的工資政策，礦工們却以絕大多數的票數拒絕這種政策。於是，我們碰到了一種情況：庶民講話了，而且用毫不含糊的口吻講話了。因爲，受到這一工資政策影響的，大體上說來不是今天早晨出席這個會議的人，而是那些關切我們作何抉擇的產業工人。在礦場討論中，有人運用了一切力量來說服礦工採取不同的觀點。討論是在大選臨近的氣氛中進行的。沒有人能責備礦工，說他們缺乏政治覺悟。全國沒有一個地方表現過這樣痛恨保守黨和保守黨所擁護的東西。沒有一個地方有過這樣一致的決心要在二月二十三日大

選中建立另一個工黨政府。因此，要想把這些暫時的因說成礦工們應該改變看法的原因，不過是浪費時間，白費口舌罷了。每當勞工運動似乎要失敗的時候，礦工們幾度挽救了它。儘管這樣，礦工們（正如我所說的）却已經確定不移地回答說，他們反對職工大會的這種處心積慮的政策。」

你對了，阿瑟，「庶民講話了」，而且庶民將繼續以愈來愈強大的聲音講話，直到勞工運動變了質的領導機構撤換掉，而新的黎明的曙光照亮了長期被剝削的勞動者的道路的時候。

費金斯（全國鐵路工人工會）和伊沃爾·蒙塔古（電影及其有關技術人員協會）發言反對凍結工資，納斯密士（紡織工人聯合會）發言贊成凍結，接着，便有人高呼「表決」。但是主席又要求給陶遜一個機會，讓他最後說幾句話。這是一個策略錯誤。這是他們不懂得運動中增長的情緒的典型例子。陶遜又講話了並且末了向代表們發出絕望的呼籲：

「在沒有作出決定以前，我願說明一點：現在將要投票了，將要在我認為是職工大會歷史上最嚴肅的一次代表大會上舉行投票了。在大家反對最高委員會在考慮了一切困難後所決定的政策之前，請大家三思。」

他的目的是要求對最高委員會投信任票。但他沒有得到。的確，他們是得到了多數，可是是一個沒有決定意義的多數。最重要的工會都投票反對。開票情況如下：

贊成最高委員會報告票數……………四、二六二、〇〇〇
反對票數……………三、六〇六、〇〇〇
贊成票多……………六五七、〇〇〇

實質上，就種種情況來說，這是一次不信任投票。

這次會議之後，共產黨發了一份傳單，茲擇錄數段如下：

「在一月十二日工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有三、六〇六、〇〇〇人投票反對工資凍結政策。」

「工程師、礦工、鐵路工人、建築工人和其他許多工人——工會運動的核心——給雇主和保守黨以當頭棒喝。他們將堅持他們對工資的要求。」

「對那些推行這種可恥政策的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和政府的右翼領袖來說，這次投票也是一個打擊。」

「只有全國礦工聯盟徵求過會員的意見，結果是五一八、〇〇〇人反對工資凍結，贊成的只有一四七、〇〇〇人。」泰晤士報說。

「假若所有的工會都把問題交由全體會員決定的話，很可能這個政策會遭到失敗。」

「爲什麼工人們堅定不移？」

「因爲自從上次增加工資以後物價又上漲了，現在他們的錢所能買的東西更少了。」

「因爲英鎊貶值意味着物價還要上漲。」

「因爲企業主們正在攫取空前的巨額利潤。」

「因爲物價上漲和工資凍結，將使企業主們獲得更加龐大的利潤。現在愈來愈多的工人認識到，狄金、勞瑟、克利浦斯之流是要迷惑他們。要工人作更多的工作，拿更少的工資，聽從英、美企業主的指揮，加入貧困、萎頓、窘迫的行列。」

在法國和西德，「貧困、萎頓、窘迫的行列」已在工人羣衆中擴大着隊伍。德法煤鋼聯營的建議將使災禍蔓延到我國。但是，儘管大量的反對票已說明這種政策在表決中遭到了挫折，最高委員會仍然決定推行它的政策。可是接着在復活節召開的幾次工會代表會議顯示：許多工人階級的擁護大批會員的組織都準備反對最高委員會，並繼續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路局職員工會主席、議員莫里斯先生在其主席致詞中支持「工資凍

結」，但接着又說，「只要到了『適當的時機』，他們會堅決提出他們的要求。」

現在就是很好的的一個——『適當的時機』。現在當工人們強大而且有把握獲得勝利的時候，有比這更好的時機嗎？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最近最大的背叛。恰好在工人階級有力量永遠推翻和肅清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他們阻止他們，他們處心積慮地、計劃周密地阻止他們，鎮壓他們。在運動初期，社會民主黨的鼓動者不斷地譴責投票選舉自由黨或保守黨的工人。他們宣稱，「作為工會分子，你們對你們的企業主作鬥爭，等到選舉來的時候，你們又投票選舉他們。像這樣，你們永遠不會勝利的。這是一個艱苦的鬥爭，假若你們想打敗你們防備周密的敵人，你們必須運用議會和工業方面的兩隻手臂。」這話倒是很漂亮的。那時競技場上的領袖是傑克·約翰遜。「請想想約翰遜，」這位發言人會繼續說，「假若他上場時一隻手反綁着，那末他怎麼能與人競賽呢？」

我常聽到這樣的話。據說這是適合工人的情況的。他們用一隻手戰鬥，而議會這隻手則受到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束縛。「放開吧，——這成了經常聽到的呼聲。「不僅要運用你們工業方面的力量，同時也運用你們議會方面的力量。」現在呢，工業方面的手臂被綁得無法動彈，而議會方面的力量又被胆怯的懦夫和賣國賊出賣給美國去了。

但是回來談議員莫里斯吧，他使我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一件事。二十年代前期，混合機器工會曾提出了每小時增加工資六辨士——每週增加工資二十四先令的要求。這位無黨無派的主席在與企業主會談時，作了一通我們會員們聽說是「無法作答的」發言。可是企業主的代表們却找到了一個答案——不增加——減低工資，或者——。

在培斯利區，我們有一位組織家約翰·斯托雷，他非常熱情，非常正直，但是，呃，我們且

看看這件事吧。像別人一樣，他被召往倫敦去聽取一個代表執行委員會的聲明。他回到培斯利以後，中央大廳中特別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聽他作報告。這是件悲哀的事。大廳裏擠滿了憤怒的工會會員，而約翰又不得不建議他們接受企業主減低工資的要求。他非常狼狽。在一片呼應助威聲中，現任培斯利合作生產協會主席威利·費古遜站起來提出了一個非常切中要害的問題。

「親愛的主席，」他問道，「我願請問親愛的斯托雷，我們關於每小時增加工資六辨士的要求到底怎樣了？」

約翰立刻站了起來。「要求仍舊存在，」他極熱烈地叫道，「要求仍舊存在，一有機會便要爲這要求而鬥爭。」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那樣自然的哄堂大笑。

莫里斯和斯托雷是一流的人物。「當時機到來的時候」。不幸得很，會上的代表們都缺乏幽默感。可是，莫里斯先生可能發現，「時機來」的快，出乎了他的意料，因爲最高委員會不能堅持它的工資凍結的強硬政策，被迫有點兒動搖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它發表了一個新的聲明，修改了一月的政策。最高委員會承認強硬是不適當的，同時承認爲工資收入較低的工人提出的要求是對的。最高委員會所作的不過如此。這簡直是一團糟。

工資收入較低的工人是有理由的，毫無疑問，是很有理由的，可是技術人員也有理由。只要在工房裏有計件工和分紅制度，便有大批高度技術人員，作一些算不出件工或紅利的工作，非重複性的工作，或一些特殊的非大批生產性質的工作。

我記得在一九一七年，我便從事這類職業，按時計資每週賺二鎊十八先令。當時有一位在戰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未進過機械廠的近鄰，找到了一件在機器旁的容易做的重複性工作，

却賺五鎊一星期。今天要求增加工資也是同樣適用於很多技術人員的。不僅適用於工資較低的工人，而且適用於技術人員、公務員、店員、教師。事實上，在任何一種職業中都可以要求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增加工資和薪金。

假若最高委員會企圖把要求增加薪資的權利，限於某一類工作者，那末最高委員會將會發現它本身處在極端絕望和風雨飄搖的境地。「凍結工資」已經完蛋了。讓我把它好好地、或者草草地埋葬了吧。

第二十四章 殖民地

自從達爾頓在一九四七年復活節宣佈「美元危機」以來，工黨政府的口號雖然用關於「發展」、「關切殖民地人民」等詞藻加以掩飾，但實際上就是「掠奪殖民地」。搖搖欲墜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希望從殘酷地剝削殖民地人民中得到大量的輸血。

因此，向殖民地投資成了一時的風尚。但是從未說明其隱藏的動機。沒有，從來沒有說過一點點這樣的事。我們老聽說我們進了多少，就從來沒聽說我們拿出多少。如果我們信任艾德禮、克利浦斯及其夥伴們的話，那麼，英國資本主義早就是慈善事業了。但是它並沒有能够壟斷慈善事業。還差得遠。杜魯門和美國資本家們曾宣佈他們有意幫助開發落後地區。他們要求「打入」殖民地，而他們是太强大了，無法拒絕。

毫不關心它本國有色人種的公民的生活、幸福或人類的尊嚴的美國資本主義，現在竟要和英國資本主義一起來「關切」不幸的殖民地的有色人種的人民了。本書在後面將舉出一些它們怎樣表現這種「關切」的例子。目前最好指出：雖然工黨、保守黨和自由黨在下院的發言人，對於正在進行的掠奪的規模保持緘默，但是那些長篇累牘地鼓勵證券交易所賭客的報紙却沒有那麼謹慎。下面是從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的「金融時報」摘錄下來，並經「世界新聞與評論」予以引用過的語句：

「馬來亞統一公司股息提高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派格那河錫專利公司利潤增加了兩倍……卡孟丁採錫公司股息提高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利潤增加了二十萬英鎊。」

對於掠奪者來說，這是很不壞的，但對於被掠奪者來說，是太壞了。這些利潤怎麼得來的呢？北羅得西亞商會聯合會主席對我們洩露了秘密，他的話原登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的「新非洲」止，今轉錄如下：

「非洲人必須知道，如想得到和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只有他們自己多努一把力；如果他們想得到二十先令的工資，那麼他們必須做出價值二十五先令的工作。」

但是，儘管他們可能做出價值二十五先令的工作，並不是說他們準可得到二十先令的工資。事實上，在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和法尼亞，自從戰爭結束後，物價一直在飛漲，而工資却遠遠地落在後邊。自然，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並且打算通過他們的工會組織達到這一衷心渴望的目的。但是，資方採取了最殘酷的措施，以破壞罷工，分裂工會，而在這種方法失敗後，就索性一起連工會也禁止了。

例如在馬來亞，代表着百分之九十一有組織工人的全馬來亞工會聯合會就被作為無限制恢復錫與橡膠壟斷資本家威權的運動的一部分，而遭禁止了。下面是馬來亞亞逸依淡採錫公司董事長西姆斯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在該公司年會上所說的話：

「麻煩的發生，是由於控制並威嚇着我們工人的礦工工會地方分會實行了干涉。在工會停止了活動以後，工人們立即就復工，各種業務一直就無間歇地進行着……只是在實行了「緊急法令」而大多數工會因而停止了活動以後，工人們才得以不受威嚇而安定下來。」

在馬來亞，就像在殖民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爲了要求提高工資以應付日益增加的生活費用，曾經發生過多次罷工，但是，工人們的要求以及他們圖謀實現這些要求的努力，都遭到他們的剝削者無情的反對和對他們的組織的強制鎮壓。因此，西姆斯先生才能引用並推荐馬來亞探錫有限公司董事長霍普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該公司年會上所說的話，這段話會刊登在同月二十二日的「泰晤士報」上：

「如果馬來亞政府不立即採取堅決行動，來制止由於狂妄而不可能做到的要求而發生的同樣的停工與罷工的話，那麼你們的公司在馬來亞的利益，無疑地將嚴重地受到損害。」

這就差不多等於向政府下的一紙命令。不久以後，貝文在下院回答質詢時告訴我們說：「已有一百八十五名工會職員被逮捕，七千人被「拘留」。錫與橡膠的巨子，在工黨當朝的國家權力的支持下，在軍隊、警察和法院的力量支持下，準備不惜用一切手段來威嚇工人並鎮壓整個工人階級的活動。他們有飛機、大砲和坦克爲他們辦事，確是很勇敢。在這場對工人的戰爭中確是很勇敢，但在對日本人作戰時却沒有這麼勇敢了。因爲當日本人進攻時，他們是第一批倉皇逃出馬來亞的人。那裏原駐有一小部分英國軍隊，但是那個小部隊必須迅速撤退的經過，確實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在日本人侵入以前，種植園主始終反對武裝當地人民的任何建議。但是，只有這樣做才能進行叢林戰爭，才能把日本人和馬來亞人區別開來。應該指出：這種情形是英國軍隊的困難之一。日本人時常扮成馬來亞農民，因而就可能在英國軍隊中造成最大的混亂。在沒放槍前，英國士兵很難分辨出那些是朋友，那些是敵人。讓我們看下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每日快報」所說的

話：

「這就是馬來亞的大悲劇……我們可以有一支馬來亞當地人民組成的防禦部隊……但是一羣狂飲威士忌酒的種植園主和候鳥般的軍人，把這一部分人忘了。他們把這部分人連同電台和倉庫一起交給了日本人……。」

斯特拉徹和葛里菲斯的訪問馬來亞，也就是爲了這些「狂飲威士忌酒的」種植園主。想一想這兩個人，他們已墮落到什麼地步了。一個，就只幾年前還在吹噓他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現在則匍匐在一些徵調來的士兵後面，裝出「高視闊步」的樣子，準備殺害他會在路上發現的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另一個，曾一度當過礦工，現在則向馬來亞各礦山和橡膠園的英國老閩們保證：決以一切戰爭武器全力支援，以便鎮壓那些企圖從外國（英國）帝國主義的惡毒手掌中解放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階級的人們。葛里菲斯是礦工曾經鬥爭那麼激烈，受苦那麼大的南威爾士地方來的人。唏，奴顏婢膝的天性會使一個人做出多麼離奇的事來啊！

從報紙的字裏行間就可看出：他所奉承的那些種植園主們對他只有蔑視。如果他還有一點點無產階級的氣息，那他就會「唾他們一口」，回家去不幹了。因爲這些種植園主是非常優越的人。他們過着一種完全出於假想的生活：白種的種植園主是上帝，而有色人種只是爲了給他們製造利潤和替他們服務而存在的。關於這一點，大衛·拉蒙德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的「雷諾新聞」上也不得不這樣說：

「從馬來亞的橡膠和錫中謀利，只給中國和馬來亞勞工一天五分錢工資的白種人，把遠東的黃種人看得糞土不如。」

斯特拉微——不管他的履歷怎樣——一般是被公認為一個「公學」●出身的人的，而葛里菲斯則總有些被看成爲「糞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誰來做醜惡的工作呢？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逃兵來做，他們爲那些在戰爭剛一爆發時就逃之夭夭的「逃兵們」做了醜惡的工作。

這些「狂飲威士忌酒的種植園主們」匆匆不及地逃出馬來亞。他們留下馬來亞人去進行抗日戰爭。而馬來亞人英勇地承擔了這個任務。馬來亞游擊隊在日本人的野蠻佔領時期所表現的偉大的英勇精神，應該得到並且已經獲得了最崇高的稱譽。他們當時很少想到，隨着打敗日本人以後種植園主回來時，他們却會碰到一個甚至於更野蠻、更持久的打擊。

當倫敦舉行勝利大遊行時，馬來亞游擊戰士的代表曾被邀參加。他們在倫敦的大街上遊行，受到了大街兩旁羣衆的尊敬和歡呼。「海峽時報」對他們也說出這樣的話：

「他們代表着成千累萬的、會遭受難以置信的艱苦與折磨的他們的同志們。他們的同伴許多人作了最大的犧牲，希望馬來亞因而獲得自由。」

注意這句話。他們「作了最大的犧牲，希望馬來亞因而獲得自由」。但是，種植園主們有着不同的想法。馬來亞解放軍在一旦把日軍逐出他們的國土以後，立即接收了統治權並維持這種統治直至幾星期後英國軍隊登陸時爲止。他們之中有些人還得到蒙巴頓勳爵授與的勳章。蒙巴頓會說：

「我體會得到，你們對這些人以及他們所領導的抵抗運動感到多麼光榮。作爲聯合國的一個成員的我

們是很感動的。」

但是到了一九五〇年的現在，蒙巴頓、「每日快報」都一聲不響了；目前那家企圖倚靠過去的招牌謀生的報紙「雷諾新聞」，在它被迫聽命於外交部以來，也不吭聲了。解放軍要求馬來亞實行新政：提高工資、改善生活條件和通過民主方式選出各種機關。這就是他們所要求的——這就是在聽過英國報紙和英國代表所說的各種各樣的話以後，他們真正希望得到的東西。但是，那些種植園主們說：「不能改變，回到你們原來的位置上去。」

解放軍的代表們打算和麥克唐納見一次面，討論雙方的政策，希望達成一種諒解。在這個時候，種植園主增加了壓力，因而發生了罷工。出動了警察，出動了軍隊，出動了總督。工會被禁止了，同時，如貝文所承認的，許多領導者和成千其他的人被逮捕了。對所有的人都施以最野蠻的手段，直到他們被迫，被種植園主和行政當局所逼迫，不得不為保衛他們自己而鬥爭。於是我們就聽到了說甚麼「恐怖分子」，說甚麼針對着那些一心一意希望就他們的國家自由與幸福的男女而發的——「共產黨陰謀」的可怕的謊話。

你們這些「自由與民主」的使徒們啊，想一想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吧。這裏有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將使每一個心地正直的英國男女深為震驚。但是他們聽不到這件事情。「每日快報」是不說的，「雷諾新聞」和蒙巴頓也不說，甚至於他們還站在相反的一方面大聲叫囂。他們效法我們的社會主義叛徒，而把馬來亞解放軍說成是「恐怖分子」。恐怖的竟不是種植園主，也不是行政當局。請你看一看下面這段故事然後再說：「誰是『恐怖分子』？」

布萊鎮的鎮長董錦良（譯音）曾因該市在戰爭中的英勇事蹟而獲得「不列顛帝國獎章」。官方的獎詞說：

「不願敵人接二連三的、瘋狂的報復，他和該鎮居民在日本佔領期間，表現出偉大的英勇和忠誠，幫助並支持當時生活在叢林中的英國軍官們。」

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布萊鎮受到噴火式飛機的襲擊，全鎮夷為平地，而一千個被軍隊追趕並且受到空中機關槍掃射的男人、婦女和小孩子，逃到叢林中去了。許多美國雜誌曾刊登過一些躺在地上的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已經死去和奄奄一息的人們的可怕的照片，這些人身旁還站着他們的殘酷的敵人，顯然是在欣賞那種景象。讓我們從「生活」雜誌舉兩個例子來看：

「卡賓槍槍托的毒打，仍未能迫使被俘的一個一度曾在某馬來亞團當過上士的共產黨人吐露其他共產黨人的隱藏地點。」

是誰在用卡賓槍槍托？是你嗎，辛威爾先生？還是你的朋友斯特拉徹？

再來看一下「生活」雜誌——這個名字是個多麼大的諷刺啊！每一頁都代表着死亡——殖民地人民死在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的手裏。例如：

「躺在草叢中的人，是被打死的共產黨領袖劉堯（譯音），滿身血污。嬉笑的警察們正在驗看他的屍體。」

誰是劉堯呢？他就是曾經在倫敦街道上遊行，被倫敦居民當作一個英雄來歡呼，而且應該受到歡呼的馬來亞游擊隊的領袖。他就是蒙巴頓所說過的和「每日快報」所寫過的那些人們中的一個。但是種植園主們宣佈了他的死刑而行政當局執行了命令。

辛威爾對此是有份的，艾德禮和其餘的人們也是同謀者。他們保全了種植園主們的利潤，並

且以工人階級「濺滿血污」的屍體，供給美國的下流報刊作爲取笑的材料。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一個典型的工人代表，並曾一度不幸充當過傲慢的克利浦斯爵士的下屬的議會議員埃里斯·史米斯，在議會發表演說稱：

「我們的孩子們是可以被送到馬來亞去的。但我要問，這是爲了什麼？馬來亞人民的情況實在太可怕了。那裏的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遠高於世界其他各地。」

在史米斯發表他的演說以前，派特里克·杜諾萬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在每逢星期日出版的「觀察家報」上報道稱：

「有好幾次，有人以驕傲的心情招待我看種植園中苦力住的小房子，這種房子如在英國，一個養狗的人都不肯叫他的狗去住的。在僱主與僱員之間幾乎沒有私人關係，而僱主們極爲輕視工會運動……我們不斷聽到提倡採用鑽壓暴動的說法：『那些窮小子們只懂得這個。』很少人意識到這個國家存在着的貧困和居民不識字的情況。而且，太普遍了，這是一種饑饉、墮落、骯髒不堪的貧困，穿着破舊褪了色的破衣，吃着碎米屑，只因爲有太陽所以才能活下去。」

在馬來亞戰爭爆發以前（而現在向解放軍進行的戰爭已是一個全面的戰爭了），殖民大臣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下院宣讀了馬可姆·麥克唐納先生（一個沒出息父親的一個沒出息兒子）的一篇報告。這篇報告提出了「共產黨陰謀」，並且爲其後所發生的種種驚人事件開了道路。那個報告告訴我們說，共產黨已經被禁止了，繼而就列舉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聯的各種暴力行爲。那個報告也沒有打算要證明兩者間有這樣一種關聯。又是老把戲。這種把戲，資產階級對工人玩得太多了。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說，那末不善辨別的人就會以爲它們是有關係的。當這位大

臣講演完畢後，我發表聲明說：

「對於馬來亞工人階級的這種進攻，我認爲是一種惡意的誹謗。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我相信我是絕對正確的。我可不可以問一下，事實是不是這樣？在我們的國家裏，安分守己的公民被暗殺的要比在馬來亞更多一些；而且，事實是不是這樣：並沒有什麼陰謀，而只不過是馬來亞共產黨和其他組織方面一向非常公開地提出一個非常合法的要求，即要求馬來亞獨立，並從那些統治他們並且剝削馬來亞人民的帝國主義者手中，取回錫與橡膠之類的工業？這位大臣讀過拉斯基教授代表工黨發表的聲明嗎？聲明這樣說：

「這種粗野的痛罵就是爲了要揭開蒙在這些資產階級的現存秩序的基石上的帷幕，掩蓋這種基石是資本主義文明向那些它使之成爲它的奴隸的工人們，隱藏其真實目的各種方法之一。」

「這位大臣不肯注意這段話，並且連想一下這篇由一個背叛了工人階級而投靠保守黨的人所做的報告，並且把它當做資產階級用來對待本國以及各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叛逆行爲的顯而易見的證據呢？我不承認這篇報告中所說的種種謊話。」（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七九〇——七九一欄）

而這些馬來亞共產黨人是哪些人呢？下面是「倒懸的馬來亞」一書第一一八頁的一段摘錄。在一九四六年當過英國政府的華人事務顧問的維克托·泊爾塞爾上校會把這本書稱爲「關於日本佔領下的馬來亞的一篇最輝煌、完整的記錄」。

「馬來亞共產黨人是一股潛在的道德力量。羣衆尊稱他們爲他們制止人民壓迫者的「神軍」。大家公開承認：如果沒有共產黨人，警察早就使人民過着不可忍受的生活，特務和盜匪早就把社會弄成地獄一般了。把無辜的人民宣判死刑或送到憲兵隊刑房去的萬惡的特務；供給偽證的偵探；欺壓人民的警官；無理勒索商人與小販的政府官吏——所有這些人都怕共產黨人報仇。」

「日本人對共產黨的仇恨是那麽深，以至於把任何一個有一點點親盟國情緒的人，任何一個稍微批評一下軸心國家的人……任何一個抱怨缺乏日用必需品的的人，任何一個抱怨生活費用高昂的人……都認爲一定是一個共產黨人。」

這是日本人昨天說的話。也就是艾德禮政府今天在說着的話。這樣一個所謂的「工黨政府」正在爲一小撮非常富有的、在馬來亞擁有一億英鎊財產的（大多數是在橡膠和錫康采恩方面）英國人的金錢利益服務。這裏舉一些這種人爲例：

克萊夫·貝留爵士：他過去是最大的大企業組織「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主席。目前他是英國全國工業生產諮議委員會的政府諮議員之一。他是鄧祿普橡膠康采恩、許多錫公司和若干金融康采恩的董事。

彼得·瑞蘭茲爵士：他過去是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主席和英國鋼鐵業聯合會的主席。他目前是一家在馬來亞擁有鉅額資財的澳大利亞公司和英國若干鋼鐵金融保險康采恩的董事。

阿諾德·格里德雷爵士：他目前是英國商會聯合會的主席，並且是馬來亞錫有限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

埃里斯·史米斯曾提出一個問題，而他從勞工大臣那裏沒有得到回答。我願替他回答如下：

「英國政府不是爲了英國人民的利益，也不是爲了馬來亞人民的利益來進行馬來亞戰爭的。這個戰爭是爲了利潤——爲了橡膠園主和錫礦主——並且是爲了供給美國以賤價的橡膠和錫而進行的。」

但是，不單是在馬來亞，警察和軍隊才被用來對付人民。哪裏的殖民地人民企圖改善他們的悲慘的境遇，哪裏就對人民施行最暴戾的鎮壓。而他們的境遇以前是、現在仍然是、實在壞——

壞到不能再壞的程度。據尼日利亞勞工部「每季評論」稱：恩努谷礦坑採煤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是每月四鎊三先令七便士，即每日三先令四便士（按每月二十五天計算）；在地面上工作的工人每月三鎊一先令，即每日二先令五便士。在有些情形下，工資可能會稍高，但是，由於營養不良，礦工們是不能每天都做多耗體力的工作的，這是公認的事實。

自然，礦工們要堅持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他們要求麵包，而工黨政府給他們子彈。在進一步研究殖民地的這一方面的生活以前，讓我們先看一看黃金海岸的情形。

在那裏，除了工資低微和物價高昂、非常高昂而外，又加上有大量失業的人。代表絕大多數黃金海岸退伍軍人的「退伍軍人協會」——它是與政府支持的、由行政官員組織與把持的團體「黃金海岸退伍軍人團」對抗的團體——製就了一個要求就業的請願書，並且舉行了示威遊行，前往總督的官邸去呈遞這個請願書。示威遊行受到了警察的攻擊，而當他們抵抗時，警察就開槍了。隨後，軍隊也出動了。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而在三月一日殖民部次官李斯·威廉士先生——一個曾經聽過或讀過許多關於所謂南威爾士暴動的報告的威爾士人——宣讀了一篇他從「在場的人們」那裏得到的報告。但不是從那些受到棍棒與子彈苦頭的人們那裏得來的。不是，而是從那些應該對向手無寸鐵的人們進行令人心酸、可恥的進攻事件負責的人們那裏得到的一篇報告。就像對費柔斯東事件和湯尼潘迪事件所做的那些報告一樣。但是對於威廉士先生和工黨領袖們來說，他們已和未當政的時候不同了，殖民地總督的話就像上帝的話一樣。讓我們聽聽威廉士先生如何聽從他主人的話，讀出他們對這些事情所提出的報告，以及接着別人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吧：

「李斯·威廉士先生：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暴動在阿克拉發生。由「退伍軍人協會」（該會「黃

金海岸退伍軍人團」不予承認）所組織的一支遊行隊伍，在它前往輔政司署和勞工部向高級官員呈遞請願書的途中，秩序發生紊亂。遊行隊伍原應遵循警察總監所同意的路線前進，然後解散。但是，與約定的步驟相反，遊行隊伍摻雜了其他分子之後，企圖向總督官邸基督徒堡前進。該協會事先並未提出想見總督的要求，而且遊行隊伍的情緒非常惡劣，許多參加遊行的人都喝醉了。

「警察會兩度試圖令他們轉向或是停止前進，但是未能奏效，等到兩個警官受傷以後，就只好開槍了。一個暴動者被殺死，一個受傷。同時，在城中發生了大規模的暴動，城中商家受到很大損失，一條主要的商業街道遭到搶劫。軍隊被調來幫助鎮壓，在一個階段中還必要地使用了武器。到午夜時，整個城市已經在控制之下。黎明時，城裏又發生了騷亂，軍隊放了兩排槍，沒有人死傷。總督下令在阿克拉的某些地區實行宵禁，並定出了管制交通和封鎖道路的條例。現在，援軍已經到達，並且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步驟以保護居民。最後收到的報告表明，這個城市已經平靜得多了。

「李德先生：我可否請問我可敬的朋友，他能否解釋，在這整個經過之中是否包含有任何政治內容？」

「李斯·威廉士先生：是的。這裏面當然有政治內容，但是我還沒有從殖民地那裏得到一份關於政治內容的全面的報告。

「加拉赫先生：次官是否要考慮從我國派出一個由工會負責人員所組成的代表團，去調查這件在黃金海岸所發生的可恥的事件呢？他是否曉得，我們有一次曾在南威爾士發生開槍的事，後來每一個工黨的黨員都抗議這件事，而有關的官員都同樣地回答說，這件事應由南威爾士的礦工負責？我要問他，他是否要派遣一個由工會負責人員所組成的代表團去調查在黃金海岸所發生的

這件事呢？

「李斯·威廉士先生，我們不準備派遣這樣的一個代表團。我們將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政府進行的正式調查——這樣真相就可以搞清楚。我保證，當事情真正搞清楚的時候，西費夫區的可敬的議員（加拉赫先生）是不會喜歡這種真相的。」

「溫特吞伯爵：我們是否能知道，當對這件事的政治原因作出充分的調查以後，次官是否要放一個報告在圖書館中，好讓我們知道這件事是不是由於受共產黨第三國際煽惑的人——包括本國的共產黨——而產生的？」

「李斯·威廉士先生：在這次事件中，差不多可以說必定有共產黨的煽動。當報告來的時候，我會在圖書館中放一份全面的報告的。」（議會議事錄，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第三七——三九欄）

在「克萊德河畔的反叛」那本書中，我談到過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格拉斯哥的喬治廣場上發生的「騷亂」的經過。這裏我願把它扼要地說一說。我當時是站在格拉斯東紀念像的石基上，面對着市議會，向舉行示威大會的罷工工人演說。排在市議會前面和在示威羣衆的後面的，是一大夥緊張的警察。辛威爾、寇爾克武德、尼爾·麥克林和其他等人是工人的代表，他們正在市議會中等着會見市長。忽然，一個命令下來了，警察們抽出警棍，就對站在後面的示威羣衆進行野蠻的攻擊。那些從後面受到襲擊的罷工羣衆無法抵抗，就被趕過廣場去。在市議會中的代表團聽到了喧嚷的聲音，就跑了出來。寇爾克武德跑到市議會前面馬路的中間時，一個警官在他的頸背重重地打了一下，這就使他倒在路上失去了知覺。一個正在那裏的新聞記者把當時的情景照了一張真正的好相片。過了一會兒，拉納克郡的郡長，由市長和其他的人陪着，一起出來到了馬

路上。記者照了更多的相片。結果十一個罷工領袖被逮捕和交付審訊。

罷工者和警察會發生一場戰鬥，雙方都有許多人受傷。是誰先動手的呢？警察和市政官員都發誓證明是工人先開始扔石子、瓶子、鐵片以及其他種種東西的。他們說：「空中被投擲的東西遮黑了。」這是的確確確在見證人席上說出來的一句話。市議會的正面是一長列窗戶。就在市議會的大門前有四個燈架子，每一個架子上面都有一叢大弧光燈。沒有一扇窗子或一盞燈被震裂或打破，可是據警察說，它們是無罪的旁觀者，站在房子前面，却着實有一陣冰雹似的東西投向它們的。

但是相片是更準確的：寇爾克武德躺在地上，郡長和其他的人站在路上。就是這麼的，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路上乾淨得像一面鏡子，看不到有一塊石頭、一個瓶子或是一塊鐵片的影子。

我被判監禁三個月，罪名是毆打了警察隊長，但是事情發生在騷亂已經開始以後。辛威爾被判監禁五個月，只有上帝和法官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他當然沒有率先騷亂，因為當事件發生時，他還在市議會裏面。其他九個人被判「無罪」。

這就是工人被控告引起騷亂的一個例子。這和克里奇·瓊斯與李斯·威廉士對黃金海岸的退伍軍人所作的斷言是一樣的。但是，關於上述事件，在愛丁堡的高等法院中，事實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工人並沒有發動那一場騷亂。而是別人發動的。我們已經被證明是無罪的。但是，到底誰是有罪的，爲什麼這些犯罪的人始終沒有受審判呢？工黨領袖們在那時曾經因爲我在法院中所採取的立場而稱讚了我。但是，現在我的黃金海岸的工人階級同志們又是怎樣呢？他們有機會爲自己辯護嗎？沒有。由總督指定的人所作的正式調查，是決不可能公平地對待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工人的。

你從上面這些問題和答案中就可以看到：威廉士先生不僅對總督奴顏婢膝，他對保守黨竟更加奴顏婢膝。他沒有片言隻字談到折磨着退伍軍人和當地一般老百姓的可怕的貧困和飢餓——這是共產黨人引起的！溫特吞伯爵把球扔給威廉士，他接住了又把它扔回給溫特吞。真美的一對兒！擁護保守黨，打倒共產黨。這個威廉士，像他的上司克里奇、瓊斯一樣，是你在書本上讀到過的那種傢伙，他可以戴着一頂高帽子在蛇肚子下面爬着而不會驚動它。想想看當這個冒牌的社會主義者對保守黨說「我們在黃金海岸及其鄰近的殖民地中，都有足夠的軍隊」時的那種自滿態度！爲了什麼目的呢，威廉士先生？爲了社會主義嗎？你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無論是你或是你的同伴們，都不是的。

資本主義的奴僕——這應該是你們的稱號，也是你們的罪名。而爲了像你們這樣的人，正直的善良的工會會員竟還要付出政治費。不錯，我們共產黨人也出錢的，我們相信政治費這種辦法，我們贊成工會會員參加政治活動。但是，我們需要的是和資本家作鬥爭的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的、和資本主義的犧牲者作鬥爭的人。

在結束關於黃金海岸事件的討論之前，我必須提到我在那邊的一個用書信往來的朋友。這是在上述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從他那裏接到的一封航空信：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我很高興告訴你，我要把你當作在英國議會中的我的最好的朋友。我有四呎高，今年十歲。我是一個二年級學生。如果你收到這封信的話，請你寫信告訴我你的職業。我國的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我的母親也是。請問你的呢？在下一封信中我要把我的照片寄給你。我有三個兄弟和六個姊妹。我的父親有他自己的房間，我自己也有一間房間，因此我可以做我所想做的事。

我是從約翰·布耳那裏得到你的地址的。如果你收到這封信的話，請你寄給我你的照片並告訴我你的兄弟和姐妹叫什麼名字。

威廉，我必須停止了。不要忘記快回信給我。

你誠懇的

波騰（簽名）

回這封信時，我告訴了他一些我的事情，對他的上學提了一點勸告，還寄了一本書給他，那就是我從那時以後寄給他的幾本兒童書籍中的一本。

不久以後，我收到了這封信：

親愛的威廉：

非常感謝你給我的信和你送給我的書「阿拉丁」。我很好，先生，謝謝你的勸告。我告訴你我要寄給你虎殼果，但是我到阿克拉去要出口證時，他們說他們沒有，所以我現在只能把我的照片和「黃金海岸公報」寄給你。

現在我們在莫普萊索地方已經有了「習俗學院」，所以我要努力學習，好進去。加拉赫，我愛你。我將送給你我所說的那些東西。

你誠懇的

波騰（簽名）

從那時起我們就繼續通信，到現在他已經認我做「義父」了，並且請我寫給他兩個我的朋友的名字以和他的兩個朋友通信。這個要求我已照辦。讓我們希望到歐納斯特（指波騰——譯者）長大成人的時候，帝國主義剝削的罪惡日子已經結束了，黃金海岸的人民，像其他所有殖民地的人民一樣，能夠享受到過他們自己的生活和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的自由和權利。就是爲了這個最

值得想望的目的，我們在國內需要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以「紅旗」為恥而以它為榮，他們將要進行正義的鬥爭——爲了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工人的政權。

關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在尼日利亞的恩努谷地方所發生的事情，我所能做到的莫過於從一個尼日利亞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來信中摘錄一段：

「無疑地你已經聽到了在恩努谷發生的事件。礦工們在十二日以前幾個星期，會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增加工資。十四日，在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之後，他們決定舉行靜坐罷工。在這以前，他們會採取「磨洋工」的戰術，而從十四日起便實行靜坐罷工。

「工人們的妻子在十六日採取了表示同情的行動，去見主管當局，給他們看付給她們的丈夫的工資所可能買到的那種糧食。被訪問的礦山經理和他的妻子，一看到好幾百個僅僅爲了來給她們看她們所吃的那種沒有營養的食物的工人的妻子，就嚇慌了。經理和他的妻子跑到了東部各省輔政司那裏去請求派警察保護。那一天警察出動了，但是並沒有發生事件。

「十六日，增援的警察從拉格斯被空運來了，還開到了礦山，但是，沒有一個警察執行射擊的命令。十七日，礦山當局慌起來了，他們向尼日利亞北部請求派遣援兵。這些援兵在十八日到達，又開到了礦山，由於礦工們仍然堅持他們的要求並且拒絕動工，當局下令向他們射擊，打第一槍的是率領該警察部隊的歐洲籍警官。十八個人當場被打死了，四十多人受傷，其中還有幾個人後來在醫院中死去。

「工人們完全手無寸鐵，他們的妻子也一樣。工人的妻子們所做的，就只是要讓經理和他的妻子知道，由於她們的丈夫所得的工資和經理所得的工資有差別，她們吃的東西和經理的妻子所吃的那種東西有什麼不同。

「他們很正確地爭論，說這是由於他們是黑皮膚而經理是白皮膚的緣故。他們之中很有一些人，早在那個經理從學校畢業出來以前，就已經在礦中工作了，但是，他們的待遇呢，每週工作四十五小時，每天却還沒有超過三先令。在離恩努谷約一百二十哩的阿巴地方，也曾經發生事件，有三個或四個人受傷，但是沒有死人。在哈科特港和安尼沙也曾有過事件。現在在整個尼日利亞的東部已經宣佈了進入緊急狀態，在恩努谷並已實行宵禁。

「現在所有尼日利亞的人民已經懂得當殖民地人民是怎麼一回事。說歐洲籍的婦女和小孩受到監視的傳說是虛假的。當地人民連指也沒有指一下任何一個歐洲籍的婦女或小孩。從整個事件過程中，我們大家對於下面幾樁事實得以顯露出來，表示欣慰：

(一) 沒有一個尼日利亞南部的人遵守命令開槍。這說明了雖然伊波族人和約魯巴族人原有他們的小爭吵，但是他們不願服從要他們互相槍殺的命令。

(二) 拉各斯地方的互相吵嘴的領袖們現在已經建立了統一戰綫，準備為這個問題的合理解決而鬥爭。

(三) 當局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撒謊來替他們的不可人道的行為辯護。說是有人欺負了歐洲籍的婦女和小孩，這是謊話。這是在非歐洲的國家中，官方為集體屠殺行為辯護的通常使用的藉口。

(四) 在整個事件中，無論是礦工或是他們的妻子都不可能比木棍和石頭更厲害的武器，而警察則有備帶一切近代化武器的便利，包括用飛機調運增援部隊在內。那麼，警察方面需要自衛的理由在哪裏呢？

(五) 沒有一個警察被打死，但至少却有二十個礦工被開槍打死了。」

什麼樣的民主！「尼日利亞正在受洗禮。」這就是一個可靠的尼日利亞人所看到的。下面是

總督如何向威廉士報告，而威廉士又如何向下院轉達的話：

「在礦山中最近開始了一個『磨洋工』運動。十一月十六日這個運動發展爲『靜坐』罷工，並據報會有一種破壞的行爲。兩天之後，礦方當局爲了公眾的安全，決定搬走礦內的爆炸物。當一隊警察正在從愛瓦河谷的礦中搬出爆炸物時，他們爲一大羣拿着鐵槌、十字鎚、彎刀和矛的礦工們所包圍。礦工們襲擊警察，並想繳他們的械和奪取在那裏的爆炸物。」

「警察方面的帶隊長官曾力圖和礦工們說理，只是沒有成功。雖然警察方面一再發出警告，但是情勢很危險，警察竟不得不爲了自衛而開槍。我深深感到遺憾，有十八個人被打死了，三十一個人受了傷，我相信下院也將有此種情緒。」

你從這裏可以看到，根據威廉士的說法，礦工們有「鐵槌、十字鎚、彎刀和矛」作爲武器。現在請讀一讀同一議會議事錄中的一段吧：

「瓦爾比先生：有多少警察被打死和打傷？」

李斯·威廉士先生：一個也沒有。」

想想看，沒有一個警察，——我可以這樣說嗎——也沒有一個礦山職員受了傷。但是他們却竭盡全力製造一種印象，說曾經發生了一場暴動，還說亡命之徒正在他們的四周到處破壞。像通常發生這類事情後一樣，設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誰委派人員組織這個委員會呢？是總督。給他們一桶石灰水讓他們去進行粉飾。同時謹防有人帶了瀝青桶把髒東西攪了起來。請注意，我提出過下面的問題：

「加拉赫先生詢問殖民大臣：由約翰·麥克斐森爵士所委派的，去調查在尼日利亞的恩努谷地方愛瓦

河谷礦山中開槍射擊罷工者事件的委員會，是由哪些人組成的？這個委員會中有多少礦工的代表？

「李斯·威廉士先生：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現在還沒有決定，但是總督在和我的可敬的朋友殖民大臣商量之後，將在最短的可能期間內委派人選。」

「加拉赫先生：有鑒於這個開槍射擊四十個礦工的驚人事件，請問次官，能不能堅持讓一個英國的礦工和一個尼日利亞的礦工也參加到這個委員會中，因為否則的話這個委員會將只不過是一個從事粉飾的委員會而已？他是否能考慮這一點？」

「李斯·威廉士先生：我不能對我剛才所作的回答作任何的增加。整個事情目前正在考慮中。」

「加拉赫先生：但是，在現在這種情勢之下，當發生了這樣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的時候，這個調查委員會必須有最高的威信，這難道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嗎？讓一個英國的礦工和一個尼日利亞的礦工參加這個委員會，這難道不能使這種最高的威信建立起來嗎？爲什麼不讓他們參加這個委員會呢？」（議會議事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三五九——三六一欄）

在提出了上述第三個問題後，威廉士坐着啞口無言。我的同事菲爾·皮拉丁大聲喊道：「回答！」可是也沒有聽到更多的回答。既沒有一個英國礦工，也沒有一個尼日利亞礦工被委派參加這個委員會。但是，就是從這個一手選定的委員會那裏，政府也沒有得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報告。野蠻地槍殺尼日利亞礦工的事件是掩蓋不住的。就引該委員會自己的報告吧：

「我們感到必須說明：警察方面向調查委員會主任所提出的，並在後來加以發表的報告，所謂警察受到許多武裝礦工的襲擊的說法，並沒有得到事實的證明。」

說得明白點，就是：不列顛廣播公司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以後兩天，所廣播的情況而通過這個廣播全世界第一次聽到了關於恩谷開槍事件的說法，是一個有意編造出來

爲了掩蓋帝國主義警察的卑鄙行爲和欺騙世界輿論的謊話。

在一個工黨政府之下，工人爲了要求得到每天五先令十便士的工資而罷工，終於有二十一個工人被槍殺，許多人受傷。出賣工人階級的行爲有比這更厲害的嗎？

我們黨在幾天之後召開的會議中，通過了下面的決議：

「大會代表英國的工人，對於尼日利亞的恩努谷地方的礦工，爲了爭取足以維持生存的工資，舉行罷工而被殘酷殺害一事，表示驚駭與憤慨。這樣的恐怖行動就是否定了英國工人運動所主張的一切原則。大會要求殖民大臣立即把當地的總督和警察署長撤職，並指示擁有煤礦的尼日利亞政府，立即接受工資增加到每天五先令十便士的要求，作爲進一步增加工資的基礎，把所有在罷工時或在導向罷工的事件當中所解僱的人員復職，同時立即給予受傷者和死亡者的家屬以適當的賠償。

「大會進一步聲明：爲了英國和尼日利亞未來的和平與繁榮，尼日利亞人民應通過他們自己用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獨立政府，管理他們自己的經濟。大會要求撤退一切英國軍隊，取消一切反民主的和反對工人階級的立法，並在規定的幾個月內，在普選的基礎上，選舉出將全盤管理內外事務的尼日利亞制憲議會。

「大會重申它和生活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之下的尼日利亞人民團結一致的決心，並保證全力支持尼日利亞人民所作的每一個鬥爭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爭取他們的自由與獨立。」

這些話（無須我說）就是我的感想，也應該是每一個正直的英國工人的感想。

打倒帝國主義——保守黨也能，工黨也能，都要打倒！

所有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萬歲！

第二十五章 至聖的天使

在一九五〇年大選以前十二個月，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出來，工黨領袖們在努力製造僵局。他們並不設法草擬一個前進的綱領。他們發表了題爲「工黨信仰英國」的政策聲明，這個政策聲明倒不如叫作「工黨不信仰社會主義」。這個聲明表明：處心積慮而詭計多端的投降政策，已經進一步墮落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根本不去發動工人反對資產階級，也不發動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代表者保守黨。他們反而對蘇聯和共產黨進行了極其惡毒的誹謗扯謊的宣傳。

一九四五年，全國各地都有一種強烈的向左轉的趨勢。在工黨政府當政五年以後，全國顯然又有了向右轉的趨勢。保守黨已經從一九四五年的失敗中重新抬頭了，不斷地在增進自己的地位。大選快要到來的時候全國許多地方的人們都感覺保守黨可能「得勝」。對於在工廠中的大多數工人和工會來說，這是一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而予以抵制的威脅。「我們不希望保守黨上台，他們一上台一切就都完了。」這種意見，在工人階級中間是十分普遍的，這表明了說這種話的人們的深刻而痛切的情緒。他們有些人親身經歷過，有些人聽說過人民羣衆在保守黨政府之下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不希望再過這種生活。

於是選舉就變成了「擁護保守黨政府或反對保守黨政府」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使保守黨絕對不得上台，羣衆就只有支持工黨領袖了。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候選人就極難獲得支持和選票了。我們原來決定在這一（一九五

○年）選舉中提出一百個候選人來。我們瞭解所有的困難，我們知道我們所面對的一切阻礙，可是我們瞭解，重要的事情是，不管我們獲得多少選票，必須向工人們表明：除了狡詐的工黨小資產階級領導人物們的政策和領導以外，還有另外一種政策和領導。我們的確已經盡了一切力量去爭取工人，爭取選票，可是我們的同志們往往碰到人們這樣無可奈何地表明自己的心跡說：「我們只好投工黨的票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保守黨不得上台。」我們的同志們都會遇見投票支持工黨候選人的人們在街上或門前以友好的態度同他們談話，有時候這些人還捐錢幫助他們競選。我們的確也會指望我們會有一兩個候選人當選。在東倫達，我們有勝利的希望，在西費夫一般人都感覺我們有勝利的把握。在無黨派人士中間，人們感覺普里特在北漢麥斯密斯是有相當把握的，人們也感覺普拉茨——米爾斯將擊敗感傷的歸先遺傳論者索多。

在選舉以前，西費夫的情況使我不安。在大選以前幾個月舉行的郡選舉中，我們遭受了不小的失敗。我們從五個郡議員減到兩個。我們喪失了鮑希爾村和隆菲楠斯村的代表席位。這兩個村一向被認為是黨的「據點」。在議員選舉中，這兩個村子的確是保證我們有候選人當選的據點。我們在那選舉中喪失了這兩個村子的議席，這多少是一種不祥之兆。當然隆菲楠斯村本村是一定會以多數票支持我們的郡議會候選人拉伯·史密斯的——史密斯幾年來一直都是郡議會的一個議員，而且是最好的議員之一。可是選區中又包含另一個村子，就是巴陵格里村，這村子在羅却爾附近，大家認為我們所以在這個選區中失敗，原因就在這個村子。保留下來的兩個議席是桑頓村的喬治·夏普，一個積極而活躍的青年鐵路工人同志和麥西利爾村的我黨最傑出的同志之一，一個忠誠可靠而富有鬥爭性的同志瑪麗亞·司徒爾特夫人。

在競選運動開始以後，我們在各地的同志們都是積極而熱情的，可是不久事實就表明：我們

並沒有能够像在過去幾次選舉中那樣吸引那樣多的非黨人士參加我們的競選委員會。然而，同志們和選區以外的大多數人一樣，認爲我個人的威信足以勝過反共的和天主教的宣傳所造成的影響。隨着競選運動的開展，我就開始大大懷疑了。因爲我有長期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經驗，我對於工人的情緒的變化十分敏感。我已經感覺費夫地方的情況有了變化。我曾經幾次設法使我的同志們對於可能發生的事情有所準備。這是非常困難的。候選人自己先散佈失望的種子是不行的。我只得以愉快的態度暗示種種的可能性，可是這就沒有多大的效果。

在投票的那一天晚上，我在隆菲楠斯村福利會談到了落選的可能。他們都不相信。隨後在我與艾畢·莫法特的短短的談話中，我坦白地說出了我的感覺，並且發現他與我的意見相同。因此，次日我到正在統計選票的頓菲萊茵合作社大廳，我的競選助手約翰·費爾尼對我說情況對我不利，當時我並不感到驚奇。但是我的確沒有想到它竟會到這種地步的。

我們獲得的選票比較少，這是甚麼緣故呢？我認爲波立特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向我黨執行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已總結了種種原因。我黨在工人羣衆中間（特別是在工廠和工會中），還沒有真正根深蒂固得足以戰勝右翼工黨和保守黨領袖們的宣傳所造成的幻想和反共反蘇的偏見。工人們的思想受了報紙和廣播的毒害，所以他們就去投票支持大西洋戰爭公約；投票擁護向「美元上帝」屈服，投票擁護英鎊貶值和凍結工資。對保守黨的畏懼心理，使許多人不投共產黨的票而去投工黨的票。他們還認爲許多有利於工人的措施應歸功於工黨政府。

可是，我們在大選中最大的錯誤和弱點，在於沒有能够發動羣衆起來保衛和平並反對美國對英國和英國政策的控制。

後來的事實表明：這一點本來是應該作爲我們競選鬥爭中的中心內容的。

選舉結束一兩天以後，我的一個朋友寫給我一封信（我收到全國各地各界人民的來信），他在信中說：當無線電台廣播西費夫的選舉結果時，他的父親（一位領受養老金的人）大聲歎道：「現在再沒有人爲我們進行鬥爭了。」

我相信，我的老同伴、茵斯地方的議會議員湯姆·布朗一定會繼續爲老年人的養老金進行鬥爭的。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說，從很早的時候起，我就是那些領受養老金的老年人的發言人、宣傳家和戰士。工黨在戰前和戰爭期間的競選中，從來沒有給老年人以任何援助。工黨領袖們雖然不能公開把蘇格蘭養老金受領者協會和英格蘭養老金受領者協會歸入「被禁止的團體」的一類中，他們却阻撓工黨黨員和工黨地方組織給予這兩個團體以任何支持。

可是最近工黨議員們在「解釋」（？）財政情況如何困難並「解釋」假如情況許可，他們都是如何希望、如何願意幫助老年人，他們這樣作是要討好老年人的各種團體，以便削弱這些團體所進行的鬥爭。曾經是共產黨員而且直到「危機」到來以前還是支持老年人所提出的每人每週兩鎊養老金的要求的議員布拉多克夫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威斯特敏斯特中央大廳舉行的全國養老金受領者會議上，竟提出了克利浦斯和工黨領袖們的方針，結果受到了許多人的責難。

可是，他們在老年人中間也和在其他人間一樣，利用人們對保守黨的恐懼；他們暗示，如果工黨被擊敗，就會發生如何可怕的事情。於是他們又發出徹頭徹尾荒謬的論調，說蘇聯應對我們指撥龐大軍備費用這件事負責。正在陰謀發動戰爭以擊退向前挺進中的工人階級並在社會主義國家恢復資本主義的美國壟斷資本家倒不應該負責。他們說，該負責的不是這一羣瘋子，也不是類似的英國的瘋子，而是蘇聯；因爲蘇聯堅定不移地正確地不肯向美國的美元上帝低頭。

由於軍備費用龐大，養老金就不可能增加，因此，使老年人得不到更多的養老金的是蘇聯。

這是何等荒謬的言論！可是這正是他們在全國各地談到政策的各方面的時候所說的話。美國壟斷資本家是人類的新救主。如果有人胆敢批評他們的行動，工黨領袖們就說這是褻瀆神靈。

可是，儘管有些老年人，特別是天主教徒，受了這種拙劣的，却是危險而狡詐的謬論的欺騙，領受養老金的人們的鬥爭仍將繼續進行，並將揭露工黨領袖和美國資本家的辯護人的虛偽的品性。在目前的物價水平上，老年人所得的養老金是不足以維持生活的。老年人要求每人每週發給兩鎊，如果我們想一想那些吃飯不做事的人所拿到的錢，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要求是很低很低的。鬥爭將繼續下去，我和我黨將站在老年人這一邊，直到他們獲得他們因為對社會有過長期的、有價值的貢獻而使他們有權領受的東西為止。

投票結果揭曉以後，我在郡長公署門前向羣衆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那張很靠不住的報紙「每日快報」簡略地報道了這件事，說我神情沮喪，幾乎在哭，又說我沒有和在選舉中獲勝的人握手。後半倒是事實，前半却是廢話。我早就知道我的選票差得很遠。選票攤在桌上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而且，在各候選人離開合作大廳前往郡長公署以前，早已有人把實際的選舉結果小聲小氣地告訴候選人了。所以，即使我感到震驚，那也應該是在郡長公開宣讀選舉結果以前一些時候的事。到了那個時候，這對於我已經不是新聞了。

至於那個新議員，他是屬於納萊（工黨議員——譯者）類型的人。正是那位老兄在下院中所說的「新中等階級」的人物。他和捧他出來的那一幫人極盡誹謗之能事，把我和我黨罵得一塌糊塗。我決不會裝假。我不能心中不這樣想却裝出溫和親切、必恭必敬的樣子。可是在英國的政治中，有的是偽善和時髦話，如果有人不肯同流合污，自然要顯得有些特別了。但是選舉結束了，我就不再是議會議員了。

不僅是我的黨內同志們，而且還有其他許多人都都因為我的落選而感到遺憾。許多與我個人相識的工黨黨員也表示遺憾，其中有幾個人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對我說：「威利，你爲甚麼不加入工黨呢？你是不難當選爲議員的。」

接着有一個人就在「雷諾新聞」上談到了這一點。他的署名是伊安·穆爾。這個人的政治思想的發展在三四十年以前就停止了。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孩子」，他希望同所有的人作朋友，也希望大家互相友善。他不僅希望「獅子與羔羊」同穴，也希望華爾街惡狼和資本主義猛虎出來一同狂歡。資本主義的腐朽，兩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的興起，這一切事實以及它們所引起的一切劇烈鬥爭和日益尖銳的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甚麼宣傳，而是資本主義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活生生的事實。可是他對於這一切都是漠然的，好像這些事實根本沒有發生一樣。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他雖然見到了這一切事實，却沒有從這些事實獲得政治的教訓。他的文章中充滿了蘇格蘭式的閒話，可是一談到政治的時候就十分精明地恪守外交部所確立的路綫，不敢瞎扯了。他悲歎我和其他一些人沒有當選議員，悲歎我和其他一些人不是工黨黨員。所差的就是我們沒有妥協精神，他在這一點上大作文章，最後竟然把妥協說成了一種原則，而且是在政治方面值得考慮的唯一原則。

當然，假如我的志向和願望在於謀求議會中的「席位」，那末，我在一九二二年就能佔一個「席位」了。可是議會中的一個「席位」過去決不是、現在也不是足以誘使我放棄爭取和平與社會主義的鬥爭的誘餌。

伊安·穆爾說：「要妥協。」我只要與美英兩國的資本家站在一起來反對蘇聯和歐洲的工人階級，也就是說反對英國的工人就成了。另外我還得接受並擁護大西洋戰爭公約，支持反對馬來亞

人民獨立的戰爭，支持對一切殖民地人民進行剝削，支持在國內凍結工人的工資，擁護提高利潤，擁護物價上漲，擁護提高房租。可是，要是這樣的話，我又何必僅僅滿足於一個議會席位呢？我何必不謀求辛威爾那樣的職位而作大亨們的代言人呢？

凡是認識我的人，能够想像我會去作那種事情嗎？在某些問題上妥協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是可能的，而且有時還是可取的。可是在原則上妥協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爲工人階級而反對資產階級——爲社會主義奮鬥，這是我生平活動的根本的指針。在這一點上我決不妥協，儘管拿那些拚命爲資本主義尋找新的公式的人們所能調度的一切席位和職位來，都不能使我在這一點上妥協。

因爲不妨使他們瞭解：對於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說來，議會中的席位只是一種爲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爭取更多的利益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一種加強並發展階級鬥爭的工具。

但是在議會中謀得一個席位而像許多人那樣地虛度我的光陰，聽任那些作威作福的領導人物們出賣事業——我決不這樣作，凡是重視這種事業和他自己的人格的人，也決不這樣作的。試想我們竟得聆聽並且歌頌像莫里遜那樣在我國和美國資本家的面前匍匐膜拜的人的情況吧！當莫里遜在瑪門（即財神——譯者）的祭壇上獻祭的時候，說他「匍匐膜拜」真不爲過，他想要供奉的是社會主義的屍體，事實上如果不是有共產黨的話，社會主義也的確要被他們斷送了。

只要有我們在，他和他所侍奉的人們就不能殺害他們所屬意的祭品。對共產黨的仇恨就表明了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可是工黨領袖們却不敢公開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仇恨。他們用一些自以爲不易被人識破的迷惑人的語言把這種仇恨掩飾起來了。可是他們的意圖是明顯的，那就是消滅它，使它不能在地球上立足，根除它使它不能再存在於人們的思想之中。這就是工黨領袖們必須

爲他們的主子所作的事。我的一些好心腸的但是十分糊塗的朋友們希望我參加的，正是這種工作。

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土地以及生產、分配和交換的手段歸公共所有」。這一直是人所公認的定義。舊制度經過少不了的激烈鬥爭而成爲過去，新制度爲全體人民打開一條通往新的美好生活的道路。爲了這個，先進的志士們慘淡經營地工作，爲了這個，成千成萬無名的男女獻出了自己的時間，拿出所有的零錢，去組織街頭集會、散發傳單，在風天雨地中遊行，而他們的心中永遠懷着一個偉大的希望，永遠看到那昭示「未來」的「紅色的黎明」。可是美國業主和他們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中用重金所僱傭的走狗們，却毫不加以隱諱地宣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在英國和西歐維持資本主義的生存。他們不許可人民再談論或宣傳社會主義。

指望擡昇爲頭號劊子手的莫里遜，就擔當了割斷祭品的喉管的任務。他說：「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確定理應關係社會利益的事物的社會責任。」這就是對喉管的一刀，生命的血液流出來了，對於莫里遜和他的一派人物們來說，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了。如果說莫里遜和艾德禮是社會主義者，那末艾登和邱吉爾也可以算作社會主義者了，可是我們仍在錯誤地稱他們爲「右翼社會主義者」。他們不是甚麼「右翼社會主義者」，也不是任何其他種類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讓我們用一點時間研究一下劊子手莫里遜是怎麼一回事。據鬼話說，他和他的那一派人都是「社會主義者」，邱吉爾、艾登那一幫人是「資本主義者」。莫里遜提出了「十項關係社會利益的事業」。我們要談談其中的兩項，但是如果把十項都拿來研究的話，其結果都是一樣的。他的第一項是某種企業如郵政、電訊、電氣、煤氣、廣播、採煤、內陸運輸、鍊鋼等一類工業之收歸公

有。他的第六項是幫助私營企業之「經營與擴大」。

電氣、煤氣、廣播這幾種關係社會利益的事業，是由保守黨收歸公家控制的，所以保守黨人也算是社會主義者了。工黨領袖們計劃擴大資本主義，於是社會主義者也可以說是保守黨人了。這就是包括工會和合作社在內的勞工運動被領入的死路。

除了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化的這一種圖謀未遂的虐殺行爲以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工黨關於美國資本主義的新奇論調。這一種窮兇極惡的壞東西現在居然被他們給披上至聖天使的白袍而抬出來了。它是進步的！他們對我們說：二十年來，美國政府一直都比歐洲大多數國家進步。諸位請聽工黨全國書記摩根·菲利普斯所說的話吧，他說：「二十年來，除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以外，美國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

你們曾聽說過這樣的話嗎？這二十年來，除很少的時間以外，英國都是在最爲反動的保守黨內閣和國民內閣治下生活的。大批人口失業，兵員薪餉減削，失業救濟減少。工黨領袖們和一般議員們都曾大聲疾呼地說兩次大戰中間的一段時期內全國在保守黨治下的情況是多麼可怕。可是，現在特別提出來給我們看的「進步的」美國，據菲利普斯說來，還不如在反動的保守黨治下的英國「進步」呢。菲利普斯頂好再重新研究一下吧。

杜魯門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小人物」，他在故鄉密蘇里州參加政治是由一個出名的幫會頭子潘德爾加斯特作他的政治老闆而把他一手提拔起來的。這一個潘德爾加斯特起先只在密蘇里州胡作非爲，倒還平安無事。可是他作了一筆生意，這的確是一筆大生意，他把他在密蘇里州的一批產業賣給了一家大公司，價錢是七十五萬美元。一百萬美元的四分之三。很不壞！不幸的是，他必須到密蘇里境外的芝加哥去辦手續並簽署字據。他當時正設法逃稅，這就犯了聯邦的法律，因

此坐了兩年的牢。他出獄以後不久就死了，他的兒子吉姆繼承了他的衣鉢。我還不能肯定，但是也許他就是「嘿，嘿，好漢們全都到齊了」那一支歌子的原作者。

不管怎麼樣，反正把杜魯門捧上政治舞台去當傀儡的，就是這一幫人。他一就任總統，反動勢力就猖狂起來了，戰爭宣傳和政治迫害發動了，因而就在工黨新方針公佈以前不幾個星期的時候，美國全國律師公會主席就在律師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說：

「我們的秘密警察奉命監視我們的信仰和社會關係，特務和情報員被派來搜集我們的言論並隨時報告我們的行踪。鄰人們被主使着互相探密，偶語閒談也要被轉報給新的權威當局。」

他接着還說：

「許多人受懲罰，僅僅是因爲他們『宣傳』和『鼓吹』某些思想，儘管並沒有甚麼非法行動；許多律師被投入獄中，因爲他們積極爲他們的委託人辯護。」

出面爲十二個共產黨人辯護的律師，因爲過分熱心地爲他們的委託人辯護，結果被判處了徒刑，這一段話無疑地與這一回事是有關係的。

此外，還有舊金山的哈里·布里治的事件。他是一個具有戰鬥性的碼頭工人人工會的富於戰鬥意志的領袖，美國勞工聯合會很久以來就企圖破壞這個工會。在過去兩年中，布里治的工會所屬的產業工人聯合會已經被拖入反對布里治的鬥爭中。起初的產聯與勞聯比較起來，還算是進步的團體。可是在美國普遍存在的「恐怖」情況下，以菲利普·慕來爲首的產聯領袖們不願作受迫害者而願作迫害者，現在已經在政策上完全與勞聯站在一條綫上了，正如工黨政府與保守黨站在一條綫上一樣。

在這十五年中，曾經對哈里·布里治進行了最荒謬的控告。當局唆使各種各樣的騙子、偽證人和著名的罪犯提出了不利於他的見證。一個控告失敗了，就再捏造一個。最後他們終於藉着一個很明顯的陷害案件達到了目的，把他判了五年徒刑。在審訊的過程中，他的首席律師被判了六個月徒刑，助理律師被判了三個月徒刑。「進步的」美國就是這樣的。

就在莫里遜和菲利普斯大彈其陳詞濫調的時候，好萊塢的十個著名人物（包括影片監製人、電影脚本作家和其他的人）就因為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上拒絕答覆個人的問題而下獄去服一年的徒刑了。在進監獄以前，他們發表了以下的聲明：

「開始的時候是十個人。只是十個人。而現在全國電影協會為保衛……馬丁·戴斯、帕內爾·托馬斯和路易斯·希登茲的理想……宣佈說又要在好萊塢進行關於『共產主義』的再一次的調查了。」

「我們相信全國電影協會——進行第一次調查的『巨大的手指』——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全國電影協會說，這一次上黑名單的要有一百個人。只不過又有一百個人而已。這是他們所『應許』的。」

「這就算完了嗎？除了一百個人以外，所有其他人都平安無事了嗎？最近在華盛頓對歐溫·拉鐵摩爾教授進行的訊問就說明了這一點。」

「拉鐵摩爾宣誓說：我現在不是、從來也不是一個共產黨人。」

「麥卡錫的狗腿子布登茲說：這是共產黨人的花樣。」

「拉鐵摩爾辯駁說：但是我所發表的著作證明我是不同意共產黨的政策。」

「布登茲回答說：高級共產黨人准許其他共產黨人攻擊自己人以掩飾他們是共產黨人的事。」

實。

「麥卡錫高聲說：有罪！」

「誰能相信這種恐怖的迫害將在另外一百個人被逐出電影業以後收場呢？不，不會就此收場。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調查還要來的。調查只會這樣收場：不願意在政治上屈服於全國電影協會的人就不能在好萊塢工作。調查的收場將是：你如果不說『是』，那就只好上黑名單。問題不在於共產主義，而在於一聲『是』。」

「這種迫使人們在政治上屈服的辦法並不是首創的。一九三四年，柏林烏發電影製片廠的電影工作者就曾奉命宣誓說自己不是共產黨人、同情者或自由主義的受騙者，以證明他們百分之百的德意志主義。」

「不到一年那種誓言又不够了；任何人要在製片廠工作就必須完全擁護納粹的綱領。就此完了嗎？我們都知道德國的情況是演到什麼地步而收場的。我們所不知道的只是這裏的情況將如何收場。」

「關於這一點的答覆，必須來自後台、舞台，來自作家、導演和影片監製人的辦公室。在一九四四年六月有代表兩萬二千名電影工作者的十九個協會和工會斥責全國電影協會。」

「它們一致通過決議，說全國電影協會是『由反勞工的破壞工會的人們組成的黨派性的政治集團』……是『一個有法西斯主義趨向和目標的組織』。」

「今天，全國電影協會仍然如此。只不過是更加放肆、更加狂妄了，因為它妄自認為恐懼和冷戰已經使得電影工作者動彈不得了。」

「果真是這樣嗎？我們認為不然。我們不相信兩萬二千個電影工作者會容許『巨大的手指』

決定他們如何生活、思想、說話和製作影片。

艾爾瓦·貝西、赫伯特·貝勃曼、萊斯脫·柯爾、愛德華·德梅特萊克、約翰·霍華德·勞遜、小林·拉德爾、艾伯特·馬爾茲、塞繆爾·

歐涅茲、埃德里安·斯考特、道爾頓·特隆波。」

這個「巨大的手指」——大企業的「巨大的手指」指向美國的各地。在各級學校，在教堂和醫院，在藝術界和科學界，無論甚麼地方，只要有進步的思想，一切恐怖勢力就都要向它撲來。你如果不停止思想，就要下獄。放在哈得遜河口供人欣賞的不應該是自由女神，而應該是這個巨大的手指，作為對任何敢於把一點新思想帶進這遍地恐怖、流氓橫行的國家的人們的警告。

我想起了一個到美國去旅行的英國人的故事。這個英國人在到哈得遜河口的時候向一個美國朋友說：

「我看你們有些習俗與英國的有些相像。」

這個美國人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英國人指着自由女神解釋說：「哦，我看你們也是主張為死去的人立像的。」

假如自由在美國還沒有死去的話，「巨大的手指」也無疑已經使它奄奄一息了。

偉大的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曾於一九三五年訪問美國，他回去以後寫道：「美國的自由女神手裏揮舞一根火炬，在她的背後可隱藏着淚之島（艾利斯島）的監獄。」他刻劃了歐洲「追求美國金元的人們在金元上帝、金元聖父、金元聖靈面前匍匐膜拜」的醜態，然後又說：「在哈弗爾，乞兒們爭奪着美國的銅元，假如歐洲還不停止向美國匍匐膜拜的話，這就是未來歐洲的象徵。」

這是十五年以前寫的。現在，在一九五〇年，莫里遜和菲利普斯也成了「哈弗爾的乞兒」。

馬雅可夫斯基在這次訪問美國以前十年也曾到哈瓦那去參觀雪茄煙和食糖工業。他所看見的事情激起了他極大的憤慨。他尖刻地描寫了種植園主，特別是億萬富豪的雪茄大王亨利·克萊，以及他所賴以致富的殘酷的剝削情形。若干年以後，雪茄大王的兒子劉歇斯·克萊將軍在柏林作了軍事長官。他不僅與美國強盜頭子們一樣的憎恨蘇聯，而且因為別人嚴厲地抨擊了他家之所以致富的道理而有，並且表示出一種特別的私忿。有這樣一個代表「巨大的手指」的陰險、惡毒、而有成見的仇恨蘇聯的人在柏林，怎麼會不接二連三地發生挑釁的事件呢？

我剛收到芝加哥的一位老朋友的信，他是我四十年的老朋友了。四十年來，他經常到紐柏雷圖書館（這地方類似海德公園的大理石拱門而範圍較小）門前發表宣傳演說。他在這封信裏告訴我，他受到一夥流氓的滋擾——「巨大的手指」指向他了。「巨大的手指」不僅是在美國進行搜索，在英國也是一樣。英國作家普里斯特萊先生的可悲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他使我們相信他是一生維護和平和進步的。但是他因「太疲倦」而不能參加和平運動了。普里斯特萊一向是一個很善於說話的人，但是他的辭彙中似乎漏掉了「受了威嚇」這一個字眼。無論如何他總是說「太疲倦」了，而在美國，著名的作家霍華德·法斯特却入了監獄。

顯然，除了共產黨以外，對於美國資本主義來說，最大的潛在威脅是工會運動。於是「巨大的手指」又指過來了，結果產生了塔夫脫—哈特萊法。英國工黨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的選舉以後把廢除勞資糾紛法定為他的首要工作之一。但是這個法律比起塔夫脫—哈特萊法來，却已經是和善的東西了。塔夫脫—哈特萊法這種反動的法律惡劣得竟使臭名遠揚的反動派、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也不得不提出抗議了。勞聯過去和現在都是許多行業工會的聯合會。勞聯所屬的組織大半在它們自己的工業中有強大的勢力，對於那些地位不那麼優越的組織是漠不關心的。在美國，千

百萬半熟練和不熟練的工人沒有任何組織。勞聯對他們是不感興趣的。產業工人聯合會起初是以與反動的勞聯對抗的進步組織的姿態出現的，對這些重要的工人羣衆表示特別關懷。在這個組織裏共產黨人發揮了最積極的作用。現在他們已經被迫退出了負責的職位。在產聯與它本來要對抗的組織之間，已經是沒有甚麼分別了。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過程中的領導人物是一個狡猾的小人物，名字叫作賽姆·龔柏斯。紅色和粉紅色的社會主義者，都是這個賽姆所仇恨的。他熱愛資本家。他把私人企業和阨之而來的美元奉爲神聖。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組成後不久，賽姆有了一個極大的發現。這個發現使他躍躍思動，於是他就將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把這個發現提出來了。可以這樣說，光怪陸離的騙人的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美國那樣行得通。祈禱治病法以及各種各樣荒唐的迷信鬼話都很容易取得人們的信任。巴納姆的名句「每一分鐘出生一個傻瓜」就是指着他本國人民說的。伊利亞·愛倫堡在美國某大學演講以後說，他有了非常生動的印象，瞭解了甚麼是「一羣傀儡」。

好，聽老賽姆向孩子們說甚麼吧。他說，他唯一關心的就是他們的福利以及如何改善他們的境況。爲了達到這種目的，他和他的同伴們就必須與老闆們開會討論。結果如何呢？大家仔細聽賽姆說吧，不然諸位就可能漏過一些東西。

譬如說吧，他們到了華盛頓。老闆們下榻在阿斯托比爾特飯店（假如這就是最華貴的旅館的話）。賽姆和他的朋友們住在一個第五等的小客棧裏。老闆們在阿斯托比爾特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作爲會議室。賽姆和他的夥伴們就必須爬出他們所住的廉價小客棧到老闆們自己的地盤上去會見他們。當然，不能期望那些老闆們到賽姆的「跳蚤窠」裏去。於是，他們到了阿斯托比爾特飯店，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來。這時候老闆們傳過了一匣上等的哈瓦那雪茄煙。賽姆和他的夥伴身

上只帶着廉價的下等雪茄煙，而下等雪茄煙是不能遞給吸慣哈瓦那雪茄煙的大人先生的。於是他們坐在會議桌旁了，與坐在他們對面的大人先生們的潤綽氣派相形之下，心裏感到特別的自卑。

在這種情況下，很顯然，不能得到最好的結果——賽姆就是這樣說的。他又說，假如我們有薪水和活動費的話，我們就能在阿斯托比爾特飯店開房間，請大家抽哈瓦那雪茄煙，於是我們就不會有自卑感，我們就能與那些與我們打交道的人站在同等地位上，而這是對我們的會員有利的。

賽姆大致是這樣說的，而且毫無困難地使人們接受了他這一套。這樣，高級工會領袖們就鑽進了「上流人物的圈子」，成了富豪的好朋友，而且像他們一樣，或者比他們更熱衷於維持現狀，並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工人參與獨立的政治活動。

老賽姆已經和他的祖先躺下了好多年了，但他身後却留下了一對出色的繼承人——馬休·伍爾和「天爺」格林。後者曾於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到倫敦來，議員們還被邀到下議院帝國大廳去聽他談論美國。會議主席是勞工大臣喬治·伊薩克斯。我那次到會了，我發現大約只有十幾個工黨議員在聽他演講。我從來沒有聽一個長大成人的人說過那樣令人難忍的廢話。但是他自然譴責了塔夫脫——哈特萊法。他說，那是束縛工會運動手足的鐵鏈。是的，先生，那的確是一件很壞的事情。於是他們決心反抗它。決心在一九四八年的競選運動中全面出動，硬要廢除它。「天爺」，我們決心熱烈地參加政治。美國勞工聯合會所有的會員都捐獻了許多錢，籌了數百萬美元的鬥爭經費。「天爺」，這的確是一個鬥爭。我們發動了我們的會員，使他們參加鬥爭，我們的動員是空前廣泛的。「天爺」，我們的確這樣做了，我們勝利了。這就是他告訴我們的，他們在競選鬥爭中勝利了，這就是說他們一直追隨在民主黨後面，花了會員們的錢而為民主黨活動。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勝利了」，然後他又說：「我們經過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把我們的一切都投入了這場鬥

爭，結果，天爺，假如不是南部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進行骯髒的交道，阻止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撤銷的話，我們就勝利了。」這樣說來，鐵鏈仍然存在，仍然在束縛着美國工人，但是格林先生却要與共產主義進行鬥爭而保衛存在於美國的自由了——是資本家掠奪並剝削工人的自由，而不是工人進行反抗的自由。工黨領袖們推崇備至的「進步的」美國政府就是這樣的。流氓資本家和流氓政治——這一直是美國的規律。

在侵略朝鮮時所使用的也就是這種伎倆。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每日快報」：

親愛的先生：

由於本國政府人士和其他人士發表着關於朝鮮事件的欺騙性的言論，假如閣下願意惠賜一些「新聞自由」，發表所附文章的話，我是非常感激的。

我知道，由於報紙必須接受某種政策，要在這件事上作出正面的決定是不容易的。但我仍然相信閣下會同意：假如與普遍所接受的意見相反的一個意見能廣為傳佈的話，這是只會有好處的，所以我把文章寄給你，希望你加以好意的考慮。

你忠實的

威廉·加拉赫（簽字）

七月三十一日，我收到了這樣的回信：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你的文章，「每日快報」不擬採用，特此奉還。

某某

不過我並沒有氣餒，我把同樣的信和文章寄給了「新聞紀事報」，從這家報紙，我收到了相似的答覆：

親愛的加拉赫先生：

我們拜讀了你所附來的文章，十分感激。不過這文章似乎不宜發表。

某某

兩次試投都失敗了，隨後，我又試了一下「每日先驅報」，以下就是我从這個報紙收到的答覆：

編者對於閣下寄來文章，表示感謝，但非常遺憾，這篇文章不能採用。

以下就是那一篇三次見拒的文章：

「有偉大傳統的英國人民爲什麼要爲美國的億萬豪富的利益而被美國化的工黨和保守黨領袖拖入新的世界大戰呢？讓所有關心這件事的人一讀美國工業史，他或是她就會發現這是一部令人髮指的記錄。

「美國工人階級的鮮血染紅了這部歷史的每一頁。當任何大工業區的工人由於境況惡劣、工資菲薄而舉行罷工的時候，一羣兇手和歹徒就開進了罷工地區。然後警察局長出面了。他把那些兇手歹徒任命爲副警察局長，給他們一個證章，於是他們就能「爲了維護法律」而棒打並槍擊工人了。

「在這件冒牌的、騙人的遵法主義血跡斑斑的外衣背後，美國壟斷資本家對美國工人階級幹

出了最惡毒、最殘酷的暴行。

「這是無可置辯的事實，無數的材料可以證明這一點。現在他們又打算把這種罪惡的暴行向其他國家輸出，作為輸出投資資本的前奏，因為資本的積累在美國已經到了世界史上空前的程度。

「我們來看一下對於朝鮮的陰謀是怎麼樣佈置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東京與麥克阿瑟和美國陸軍部長會談以後，就去漢城，那兒他在議會裏對李承晚和他的夥伴們說，在反對「共產黨」——當然是指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戰爭中，美國將給他們充分的支持。

「然後在挑釁完成以後，美國召開了一個非法的安全理事會會議，因為出席這次會議的會員國都是接受美元的國家，所以就草草通過一個反對朝鮮的決議。然後侵略開始了，但是侵略是在通常用來對付美國工人階級的冒牌、騙人的法律的外衣下進行的。麥克阿瑟將軍得到了一枚「代理警察局長證章」。

「工黨領袖前些年當騙人的法律被用來對付美國工人的時候，也曾對它加以譴責，而現在竟美國化到這樣的地步，居然要求英國工人唾棄並踐踏他們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會同美國資本家來攻擊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人民：這是可恥的事情。

「但是要考慮的還不僅是這一點，我們也必須考慮到英國這個民族的遭遇。工黨政府毫不徵詢本國人民的意見，就把英國的海軍，或是其中的一部分交給美國指揮。我們的青年的生命交給美國億萬豪富去支配了。因此，「大哉不列顛王國，海洋的王國」這首歌就成了對不列顛往昔雄偉壯觀的可悲的嘲笑了。不列顛雄獅已經成了一個鬼鬼祟祟的小資產階級幫兇，跟着華爾街老虎去「吃人」。當然，英國人民決不會容忍這種情況的。

「這些人就是莫里遜、菲利普斯之流的新盟友。就是這些人，我們的青年得為他們去送死。」

第二十六章 誰要和平？

半美國人半英國人的邱吉爾，一九四六年在美國的時候，被美國壟斷資本家當作一個馴服的工具，來掀起反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運動。事實上，這是反對一切國家前進中的工人階級的。

那時議會中的工黨議員，整個說來，是堅決反對邱吉爾的美國路線的。但是在美國，報紙、電台和電影晝夜不停地進行着一個「污蔑」的戰爭運動。結果是產生了駭人的戰爭歇斯底里。華爾街最大的巨頭之一，在杜魯門政府佔有很高重要位置的福萊斯特爾，因為對俄國咆哮而發了瘋，結果跳樓致死。

資產階級隊伍中這種普遍的瘋狂性的原因是什麼呢？那就是瘋狂。一切國家的人民都厭惡戰爭。他們需要和平。只有瘋子才會真正努力從事於戰爭宣傳。

蘇聯正在放映一部新影片，片名是「陰謀」。這部影片是根據匈牙利的審判案攝製的。它同樣也可能是根據捷克斯洛伐克的審判案的。而且，它可以說是適用於全世界的整個資產階級的。歷史的進程（我們和他們都是它的一部分）已經判定他們的死亡。

一個名叫麥凱爾·戴維遜的隨軍記者，曾經要求注意這個事實，即歡迎美國軍隊的僅有的通知是由韓國銀行家協會簽字的。於是他繼續說道，要普通人民相信，共產主義對他們是一大危險，正如共產主義對銀行家一樣，這是非常困難的。

我應該說這是困難的。解放軍所到的地方，地主滾蛋，資本家和銀行家也滾蛋。人民仍然保有他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業、自己的國家資源；而解放軍正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日益成長着和前進着。

資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來說，是注定要死亡的。這裏我們應當注意到，九十年以前美國有一個北方政府和一個南方政府。南方政府是爲了使南方各州脫離聯邦而成立的。在南方軍隊蓄意挑釁（進攻桑特砲台）之後，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代表一個統一的美國對南方政府宣戰。南方政府的首腦是傑弗遜·戴維斯。那一次戰爭持續了四年，是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之一，結果北方勝利、奴隸解放和美國統一。

在戰爭過程中，英國的報紙對林肯和北方發出了一切卑鄙的攻擊和誹謗。它們企圖恫嚇英國人民，使他們承認和支持南方，反對北方。但是，這個企圖失敗了。我前此已經引過卡爾·馬克思讚揚英國工人階級，讚揚英國工人爲對付本國那些希望支持蓄奴各州以反對北方的人所採取的立場。

北方有「自由的工資勞動」，即資本主義，但是和奴隸經濟比較起來，資本主義是先進的經濟形態，因而它必然要代替更落後的奴隸生產方式。在朝鮮，北部有一個人人民主國家，正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重建他們的國家。在南朝鮮則有一個以李承晚爲首的傀儡政府；他早年多半在美國過活，並且是一個公認的美國資本家的走狗；他準備把朝鮮變成美國資本家投資和剝削的場所。

顯然北朝鮮的現代社會主義經濟遠勝過南朝鮮的資本主義經濟，正如九十年以前美國北部的資本主義經濟勝過美國南部各州的奴隸經濟一樣。

資產階級雖然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他們決不會太平無事地離開世界舞台。他們寧願毀壞世界，而不願讓它落到工人階級的手裏。因此，侵略朝鮮的事情發生了，想把它當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序幕。

但是，和平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不僅如此，資產階級——特別是美國的億萬富豪們，已經變得完全絕望了。中國的解放對他們是一個可怕的打擊。美國帝國主義者曾經把中國和遠東看作一個新的「黃金之國」，妄想從那裏得到貢品和源源不絕的利益。現在，他們想得到便宜錢的美夢，已經變為永久性危機的惡魔。絕望的人是不可能清醒地思考的，他們不考慮前途怎樣就投身於事變之中。這裏應該指出，我們爭取和平的人們，認為眼前的事實正給我們建設一個快樂和繁榮的將來的機會。但帝國主義者只是想到眼前和利潤。結果，他們就必然要犯錯誤，我深信，在時間的進程中，在朝鮮的冒險將證明是美國人和那些愚蠢地參與這樁怯懦事情的人們的大錯。

但是，爭取和平的人是鎮靜而堅決的，有公認的歷史的進程支持他們的努力。

最近，我乘假日去了蘇聯。我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呆了一些時候。在每個地方，我都發現人民在奮發地重建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嚴重破壞的城市。任何地方都沒有想到戰爭或任何關於戰爭的談論。他們的全部願望就是和平。任何看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巨大破壞的人，都會重視這個事實，即深受戰爭痛苦的人民，決不願再看到另一次戰爭。在這三個城市裏，如同在整個蘇聯一樣，他們時時刻刻在前進，在上進。可能阻礙他們前進的唯一東西就是戰爭。戰爭是一個可怕的罪惡，是可能降臨在他們頭上的最壞的東西。而和平將使他們有機會能夠樹立在社會主義建設之下究竟能完成什麼樣的業績的榜樣，這就會震驚資本主義世界，會戳穿蒙蔽一切勞動人民注意力的帝國主義的「鐵幕」。

我訪問了著名的普第洛夫工廠，這個工廠現在已改了名字，以列寧格勒最優秀的兒子之一基洛夫同志的名字命名。在那裏，我在和工人與負責人的談話中，對於他們正在完成什麼樣的事業，對於工人們因為他們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而感到的驕傲，得到深刻的印象。偉大的工人，在他們的前面就有一個偉大的目標——但是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和平是絕對必需的。

在烏克蘭，我訪問了一個集體農莊。我從來沒有過這樣一個有趣的和令人興奮的體驗。這個村莊的環境是非常吸引人的。我們是乘汽車去的，到那裏的時候，村莊裏正在舉行和平集會。我們受到熱烈的歡迎，並且被領去看集體農莊的範圍和它的各種財產。目光所及盡是一片醇熟的穀物成浪的海洋。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東西。他們的牲畜，實在是肥壯的牲畜，清潔而美觀，使人看到時產生一種愉快的感覺。我們穿過馬廄，看到他們大羣的馬匹。每一匹都是好馬，都得到小心的照顧。在農莊中，他們有自己的種馬，我們穿過馬廄的時候，裏面大約有十來匹從兩天到一個月的小馬。一個大菜園，成百的雞，此外還有一所製磚工廠——也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農民正在那裏忙着製磚，他們製磚，就使他們能够不斷地建築房屋。這個村莊準備完全重新改建。據我看，那個正在完成中的計劃，將建造一個理想的村莊，確實美麗得很。集體農莊主席本人就是一個農民，他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對我妻子和我說：「一兩年內再到這裏來，那時你們將不認識這個地方了。」

我們在回國的路上，在捷克斯洛伐克呆了兩星期，那裏我們發現了同樣的氣氛。各地，無論在工業地區或鄉村，他們的一切力量正貫注於在鞏固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重建他們的國家。鄉村中的合作社獲得極大的成功，並穩步地代替着舊的浪費的小塊耕種方式。工業部門中的社會主義競賽——健康愉快的競賽，時時刻刻地在提高產量。隨着生產的增加，生活水平也上昇了。

同樣地，到處都表現了要求和平的願望，表現了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與英國人民之間親善的願望。在東歐所有國家中，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引導這些國家中領袖和人民的思想的是和平重建。

我在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有許多愉快和有趣的體驗，但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我參加在卡羅維發利郊外的兒童村揭幕典禮。

這個兒童村建築在美麗的山谷裏，有一條清澈誘人的小溪流經村的中央。住宅是非常引人心目的。村裏面住得下一千個少年。村裏有它自己的發電廠，自己的郵局，自己的鐵路和自己的村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如同在東歐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一樣，沒有像我們這裏所有的兒童犯罪的問題。

我已經說過，所有的人的思想都貫注於重建他們的國家，這就影響了他們對兒童的態度，也影響了兒童對長輩的態度。他們有負責任的機會，因此，他們的思想不可能墮落到想破壞，和想幹那些在英國很流行的其他的事情。我遞了一個條子給一位美國同志，指出了這一點，並且說，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在匈牙利與其他東歐國家一樣，他們正替他們的少年建造這種特別的村莊，而在英國，我們却時刻在考慮替我們的許多少年建造特種的監獄。那位美國同志把那個條子遞還我上面加了一句：「美國的情形還要加倍」。

從美國的歇斯底里，和從蘇聯與東歐國家所進行的熱烈而穩步的重建工作中，可以得出甚麼教訓呢？那就是一切爭取人類進步的人必然要求和平。一切把利潤放在人類幸福之上的人必然追求戰爭。

英國工人階級熱情地、堅決地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給資本家帶來利潤的剝削制度的鬥爭，由

來已久。現在，有人却要求他們背叛自己的事蹟，背叛他們偉大的湖自憲章運動到平等主義者，到瓦特·台勒、約翰·鮑爾和農民起義以來的傳統。背叛這一切，並且與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英國的僕從們爲伍，不僅要與朝鮮人民爲敵，而且還要與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爲敵，以鞏固資本主義，或者在這失敗以後，把世界毀滅掉。

我確信，英國工人階級，英國的職工運動，儘管他們的思想可能很受運輸大廈欺騙宣傳的毒害，但是，他們絕不會陷到這個可恥的泥坑裏去。他們將站起來，像獅子一樣站起來，正如他們過去曾經好多次站起來那樣，而宣佈：「我們擁護締造和平的力量，我們反對戰爭販子和帝國主義者，我們要求更高、更好的生活，我們要求社會主義的新世界。」

譯後記

本書作者威廉·加拉赫是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主席，生於一八八一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的卓越的領袖。自一九三五年起加拉赫連任英國議會下院議員達十五年之久。加拉赫為反對英國統治集團的反動政策和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獲得英國工人階級的熱烈愛戴。

加拉赫在本書中通過他在議會中的鬥爭敘述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九四五年秋天工黨政府上台到一九五〇年秋天這一段時期中英國的政治情況。作者以生動而有力的筆觸，無情地揭露了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的黑暗、反動和虛偽，特別着重地刻劃出英國右翼工黨政府叛賣工人階級利益、屈從美國、出賣民族獨立的真面目。作者在這本書裏顯示出英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堅忍不拔的鬥爭精神和對於無產階級的正義事業必將勝利的無限信心。

除本書以外，加拉赫還著有「克萊德河畔的反叛」、「雷聲隆隆」等書和許多政論文章。

譯者

一九五三年四月